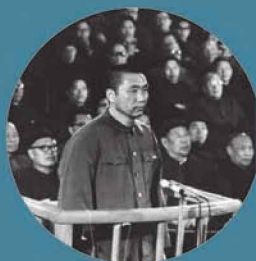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MASSES TYRANNY AND POLITICAL SPECULATION :  
WANG HONGWE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王洪文與「文革」（下）



從保衛幹部到主席接班人，  
從權力巔峰到政治深淵！

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當他同張春橋、  
江青、姚文元勾結到一起之後，資產階級個人野心惡性膨脹，  
終於走上了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MASSES TYRANNY AND POLITICAL SPECULATION :  
WANG HONGWE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王洪文與「文革」(下)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德]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王洪文在辦公室



左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



王洪文在毛澤東書房



1973年，王洪文在機場迎接外賓



1973年，王洪文迎接法國總統蓬皮杜



1973年8月，王洪文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1976年，王洪文在毛澤東逝世追悼會上（右一）



王洪文在法庭



王洪文在法庭（左二）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sup>1</sup>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則在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11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5
體例說明.....	021

## 025 | 1977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3.6；中發〔1977〕10號.....	027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029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年7月17日通過）1977.7.17；中發〔1977〕21號.....	105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1977.9.23；中發〔1977〕37號.....	108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9月.....	110

## 251 | 1979

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9.1.4.....	253
---	-----

## 259 | 1980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對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定性處理的意見1980.2.13；中紀二辦秘字〔1980〕25號.....	261
---	-----



中共中央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1980.9.26；中發[1980] 73號 .....	264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11.2.）最高人民檢察院.....	266
國家檔案局印發《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的函1980.12.09；國文件發〔1980〕455號.....	291

## 295 | 1981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資料組1981.1.....	297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1981.01.23；特法字第一號...	374
王洪文研究論文 .....	393
「文革」研究文獻.....	395
後記.....	419

1977

---



## 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1977.3.6；中發〔1977〕10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五個月來，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導的專門機關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對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政治歷史進行了認真的嚴肅的審查。王張江姚專案組堅持「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和「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對專案組搜集和群眾揭發的「四人幫」的反動歷史罪證，反復進行了調查核實。根據大量的確鑿的證據，現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在「四人幫」大量銷毀罪證的情況下，這次審查工作所以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取得豐碩戰果，是由於領導重視，全黨動員，充份發動了群眾，正確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肅反工作路線。有關省市特別是上海市委、山東省委、江蘇省委主動地積極地協助王張江姚專案組，做了很多工作。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揭發的大量事實，是驚心動魄的。它告訴人們，蔣介石國民黨的典型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怎樣通過各種複雜的管道，千方百計地打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又是怎樣採取陰險狡詐、兇狠毒辣的手段掩蓋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鑽進了黨的領導核心。它還告訴人們，「四人幫」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扭轉中國歷史前進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極為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材料之一》、《材料之二》令人信服地證明，我們黨同「四人幫」鬥爭的性質，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們

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鬥爭的繼續。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揭露了一批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在鬥爭中不斷地純潔了我們黨的隊伍。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確有極少數偽裝得很巧妙，隱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長期沒有被我們識破。這種事實，過去有，今後也還會有。這反映了階級鬥爭的長期、曲折性和複雜性。但是，不管反革命分子偽裝得多麼巧妙，隱藏得多麼深，終將被我們黨和人民群眾揭露出來，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王張江姚這三個反黨集團，證明任何偽裝的反革命要搞垮我們這個黨都是癡心妄想，證明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無比正確，證明毛主席締造和培育的黨是不可戰勝的。

中央將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作出關於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的決議。各級黨委應大力做好《材料之二》的傳達、宣講工作，進一步發動群眾，深入揭發批判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惡歷史，為十屆三中全會處理「四人幫」的問題作準備。報刊宣傳上，在中央關於「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決議公佈以前，應由中央兩報一刊根據《材料之二》先發表批判文章，有組織地公佈材料。各地報刊的宣傳，應與中央兩報一刊的宣傳口徑一致，不得搶先發表《材料之二》的揭發交代材料。

本通知和《材料之二》的傳達範圍，與中央（1976）24號檔和《材料之一》的傳達範圍相同。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將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

#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 (材料之二) 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

## 目錄

### 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的歷史罪證

#### 一、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

- 1.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充當特務
- 2.張春橋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
- 3.張春橋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
- 4.張春橋隱瞞國民黨特務身分和反革命歷史混進革命隊伍
- 5.張春橋混入革命隊伍後，長期隱瞞他的反革命歷史和反革命社會關係

#### 二、張春橋偽造入黨歷史

#### 三、張春橋隱瞞官僚、地主家庭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

- 1.張春橋長期隱瞞官僚、地主家庭
- 2.張春橋長期包庇他的反動父親張開益

#### 四、張春橋包庇他老婆、叛徒特務文靜

- 1.文靜是叛徒、日本特務
- 2.張春橋長期隱瞞、包庇文靜的叛徒特務問題
- 3.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叛徒特務文靜

### 叛徒江青的歷史罪證

#### 一、江青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捕後自首叛變

#### 二、江青與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關係密切

#### 三、江青積極從事擁蔣活動，為國民黨效勞

#### 四、江青與徐明清長期互相包庇她們的自首叛變問題

五、江青包庇她哥哥、特務反革命分子李幹卿

六、江青隱瞞地主家庭

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罪證

一、姚文元長期包庇他父親、叛徒特務姚蓬子

1. 姚蓬子是個有嚴重罪行的叛徒、特務分子
2. 姚文元長期隱瞞、包庇姚蓬子的反革命歷史
3. 姚文元包庇姚蓬子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勾結
4. 姚文元勾結王洪文、張春橋包庇叛徒特務姚蓬子

二、姚文元是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乾兒子

三、姚文元隱瞞地主家庭

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

一、王洪文為自己大搞樹碑立傳活動

二、王洪文大量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

「四人幫」相互包庇，大量銷毀他們反動歷史材料，殘酷迫害知情人的罪證

一、姚文元密藏有關張春橋和文靜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材料

二、張春橋勾結王洪文等人殘酷迫害揭發他歷史問題的革命群眾

三、王洪文、張春橋收繳、密藏江青的歷史材料

四、江青勾結林彪、葉群、吳法憲等查抄、銷毀有關她政治歷史的材料

五、江青查找審訊過她的國民黨特務趙耀珊（黑大漢）的下落，妄圖掩蓋她自首叛變的罪惡歷史

六、江青為掩蓋她的醜惡歷史，勾結林彪、陳伯達、葉群、張春橋等殘酷迫害知情人

七、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及其黨羽收繳、銷毀叛徒特務姚蓬子的材料，包庇姚文元

1.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收繳總政保存的有關叛徒特務姚蓬子的材料

## 2.張春橋和「四人幫」的黨羽在上海收繳、銷毀有關叛徒特務姚蓬子的罪行材料

### 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的歷史罪證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一九三二年春，國民黨復興社在濟南建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の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張春橋返回濟南，在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指令下，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分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混進黨內。

### 一、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

#### 1.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充當國民黨特務

張春橋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由於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

#### 【徐伯璞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我叫徐伯璞，又名徐寶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歲。山東肥城縣人。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駐綏遠省黨務特派員，山東省黨部委員，中訓團區黨部委員，教育廳政治指導員，山東濟南正誼中學校長，偽教育部科長等反動職務。追隨C·C·特務頭子陳立夫、陳果夫幹了近二十年。



一九三二年我當濟南正誼中學校長時，張春橋是我校五五級學生。他同我關係很好。當時，張在學生運動中，表面積極，暗中告密，是個兩面派人物，經常同復興社份子學校訓育員黃僖棠、范貫三等接觸。

一九三三年，正誼中學有一次舉行周會時，有一部分學生散發傳單，鼓動罷課，要求抗日。這時張春橋曾向我密告我校領導學生運動的程鳴漢、鹿效曾、鄭慶拙等學生的情況。我將這幾名學生的活動的表現，向偽教育廳作了報告。後來我以「煽動罷課、污辱師長」為藉口，將張春橋告密的幾個學生開除了，並將程鳴漢等人活動情況告訴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們嚴加懲處。不久，反動當局以共黨分子名義，逮捕了程鳴漢，在審訊中嚴刑拷打，判處無期徒刑，死在獄中。

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時，做過部分交代。

徐伯璞親筆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注：徐伯璞，現在江蘇省。黃僖棠，已逃臺灣。范貫三，已死。

下面是我南京市軍管會一九五二年對徐伯璞的判刑決定書。決定書中所說一九三三年國民黨反動派開除、逮捕濟南正誼中學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就是張春橋告密的。

### 【南京市軍管會對徐伯璞的判刑決定書】

影印件原文

被告簡歷與犯罪事實

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書

徐伯璞 男 四八 山東肥城 碑亭巷如意里二十一號 在押

蔣匪特派員、省黨部委員、秘書、政治指導員、社教司科長、匪中訓團區黨部委員、華中同學通訊小組長、北京偽博物院顧問、民眾讀物審查委員會委員等。一九二七年任綏遠匪特派員時，勾結閩匪錫山，將中共黨員路雨亭、劉志田二同志「強制離」歸化至今下落不明。一九三

三年春在正誼中學時，將領導學運的鄭某等六人開除學籍。同年三月二十日勾結偽法官逮捕領導學運的程路漢非刑拷打並判無期徒刑，後程死獄中。與反革命分子葉澈梅勾結盜竊國家古物四十四樣，二百八十五件，「三反」中訂立攻守同盟。並經常的祕密集會，散布反動言論，挑撥團結煽動落後，在運動中有計劃的打擊領導。

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三款及第十條第三款處徒刑十二年。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起算）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

主任 粟裕

副主任 唐亮

注：此件存南京市公安局。決定書中的程路漢即程鳴漢

## 2. 張春橋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

一九三三年春，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

### 【李樹慈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志會」的，後改為復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復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我是「華蒂社」的負責人，也是刊物的主編。開始，在國民黨報紙《曆下新聞》副刊上出版

《華蒂》週刊，後由黃僖棠向復興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貼，編印出版單行本的《華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復興社經營的午夜書店印刷、發行。《華蒂》週刊出版後，黃僖棠就叫我寫一份「華蒂社」社員名單交給他，以便上報復興社南京總部。名單中有張春橋、馬吉峰等十餘人。「華蒂社」的任務是為復興社的反動政治服務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蔣反共，配合反革命「圍剿」。復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刊物，跟學生聯繫交往，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復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摹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著《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

李樹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注：李樹慈，又名李束絲，國民黨復興社分子，現在黑龍江省。陳慶璋，一九五〇年去香港。

【反革命特務分子馬吉峰一九六八年六月的親筆供詞（節錄）】

影印件原文

抗戰前李樹慈（束絲）、孫耀南（任生）組織「華蒂社」，是要把濟南各學校的文藝團體統一起來，把濟南各學校的愛好文藝的青年都集中在他們的領導下。這種情形是與山東濟南的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C·C·派」與「復興社」的鬥爭有密切關係。因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復興社」抬頭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個角落去。「華蒂社」就是在這種目的下組織起來的。當時參加的正誼中學張春橋、第一師範的

孫耀南等，濟南高級中學的李東絲（樹慈）、金燦然（欣聲）等等。

金燦然（欣聲）在「華蒂」快垮臺時，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對我說：

「吉峰，你知道『華蒂』是什麼意思嗎？」

「它不是what的譯音嗎？」

「你把它看得這末（麼）簡單了，華蒂，這是中華法西斯蒂的含義！」

「這成了復興社的組織了！」

「這就是他們的組織，不的話，黃華棠、黃喜（僖）棠他們能出錢！」

上所供事實，完全屬實。

罪犯

馬吉峰謹呈

六八.六.二十七

注：馬吉峰，又名馬峰，反革命特務分子，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勞改，一九七〇年病死。他的這個筆供是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的檔案中查出的。孫耀南，現在山東省。金燦然，已死。黃華棠，已逃臺灣。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學》月刊七月號報導的「濟南」消息（節錄）】

影印件原文

濟南

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峰、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的人。

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週刊，一個月刊。

【一九三四年天津《當代文學》一卷五期刊登的《濟南通訊》（節錄）】

影印件原文

濟南通訊

### 露石

從前有很久歷史的「華蒂社」，曾一度興盛過，曾出過三期的月刊，社員有五六十人。馬吉峰、張春橋等，他們在從前都是華蒂社的中堅。

一九三三年濟南出版的刊載有張春橋反動文章《銀鈴》、《秋》的《華蒂》月刊創刊號和第二期的封面、目次。

注：這是從山東省濟南市查出的。

### 3.張春橋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

一九三五年五月，張春橋到上海後，在復興社特務、反動報《大晚報》副刊《火炬》主編崔萬秋的指使下，經常發表反動文章，瘋狂反對魯迅。

#### 【沈醉關於崔萬秋是復興社特務的證明材料】

##### 影印件原文

我於一九三二年冬參加匪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後，便在特務處上海特區當交通聯絡員，崔萬秋當時已參加了特務處，是特務處上海特區領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區有十多名直屬通訊員，由區長直接領導，由交通聯絡員聯繫。我每月送薪金給他，並取回幾次情報。他的情報相當多，還經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我曾問過他，這麼多錢用得完嗎？他說還不夠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貼一些進去，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我擔任上海匪特區交通員兩年左右的時間中，都由我約崔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幹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等見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務頭子戴笠還叫我約崔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崔萬秋當時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火炬》上連載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動的長篇小說《三根紅線》我曾問他，為什麼刊載這種小說？他笑著說，不刊登這些，怎麼能表現出我傾向「進步」呢？崔萬秋告訴我，他對副刊文章的選擇很認真，他約了不少的所謂志同道

合的人給他寫稿和辦專欄，對一般不相識的人來稿，如無特別能引起讀者興趣的東西，是不採用的。

沈醉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注：沈醉，曾任國民黨軍統局本部處長等要職，一九六〇年特赦。現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

### 【陳蘭蓀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看了《人民日報》登載的《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後，知道狄克就是張春橋，他的那篇反動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現在將我知道的崔萬秋揭發如下：

崔萬秋，現年七十多歲，人稱「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參加了蔣匪軍統特務機構和反動青年黨，為軍統頭子戴笠收買成為軍統祕密情報人員，充當文藝界的密探，以中左姿態出現在上海文壇，利用其職業掩護，收集「左聯」和地下黨的情報，分裂、破壞進步文藝陣營，並發展運用人員，建立軍統情報「內線」，是反對「左聯」和迫害魯迅先生的主要幕後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軍統頭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漢，後到重慶，主編《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繼續進行特務活動。戴笠因崔萬秋在上海、重慶文藝界從事祕密情報活動有功，派他為軍統局「國際情報專家」、偽國際宣傳處長、外事局長董顯光充當副手，上海臨解放前，董匪顯光逃往臺灣任匪外交部長，崔萬秋隨其逃到臺灣。

陳蘭蓀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陳蘭蓀，軍統特務，解放後被我關押，一九七五年寬大釋放。

### 【崔萬秋充當軍統特務的證據】

影印件原文

崔萬秋 上海站直屬員

注：上面的兩張卡片，第一張是國民黨的人事檔案，第二張「情報人員成績卡」，是國民黨保密局（原軍統局）的檔案。這兩件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 【于黑丁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張春橋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動文人崔萬秋，是其反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張春橋所寫攻擊魯迅的反動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就是發表在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大晚報》是孔祥熙出資辦的一個反革命輿論陣地。張春橋一到上海就結識了崔萬秋，並且積極為《大晚報》效勞，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張春橋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發表後，他曾對我說，這篇東西寫好後是交給崔萬秋的，崔認為文章寫得不錯，提出文藝創作方面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展開爭論。而當這篇文章受到魯迅批判後，他又惡毒攻擊魯迅是「小題大作」，是劃「小圈子」，「陷於宗派之中」等等。他還說，崔萬秋也不同意魯迅的做法。吹噓「崔萬秋為人是不錯的。」張春橋這些反革命活動是得到崔萬秋的支持的。

于黑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注：于黑丁同志，現任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長。

## 【徐錫駒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萬秋合編《筆》月刊時，曾改編小說《八月的鄉村》為電影劇本，初稿寫成後，我就送給崔看，要他同意。但崔萬秋反對我改編為劇本和拍攝成電影。崔萬秋對我說：「魯迅作序的《八月的鄉村》，是被國民黨所反對的。在魯迅作序的《八月的鄉村》出版後，我當時在《大晚報》就組織狄克寫《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對過魯迅，魯迅寫了《三月的租界》來反擊，引起了一場論戰。我看見這部小說就有氣，你拍它做什麼！」

徐錫駒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徐錫駒，歷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後被我關押，已刑滿就業。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張春橋於四月下旬又給魯迅寫黑信，進行猖狂反撲。他寫這一黑信時的通信地址是「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這是張春橋以反動的《大晚報》副刊《火炬》編輯部為據點，在崔萬秋的指使下，圍攻魯迅，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的證據。

## 【張春橋的反動文章和黑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信，請寄大晚報火炬星期文壇編輯部轉我吧！

狄克

注：張春橋的黑信，原件存魯迅博物館。據《魯迅日記》記載：「四月二十八日……得狄克信。」

魯迅在世時，張春橋明槍暗箭攻擊魯迅，但在魯迅逝世以後，他出於



反革命的需要，搖身一變，在上海《大晚報》和《熱風》上發表《魯迅先生斷片》、《速寫紅蘿蔔》等文章，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魯迅的「學生」，偽裝進步，掩蓋其特務面目。下面是張春橋寫的《速寫紅蘿蔔》等文章。

#### 4. 張春橋隱瞞國民黨特務身分和反革命歷史混進革命隊伍

一九三七年九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省復興社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於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 【趙福成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我叫趙福成，又名趙君弼，今年七十一歲，山東巨野縣人，家庭地主。

一九三〇年，在國民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畢業後去日本內務省員警講習所留學，一九三一年回國，在濟南山東員警教練所當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同年底，回濟南充任警察局東關分局長，總務科長，兼防空司令部總幹事。日寇侵佔濟南後，我曾擔任濟南市警察局長，章邱縣長，曹州道尹，山東省政府宣傳處長，汪偽孫良誠部參議等漢奸職務。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時，由該校調查統計室主任王泰興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復興社特務組織，化名趙用明。回濟南後，我的復興社關係轉到濟南，由復興社山東省負責人秦啟榮領導，和我一同進行特務活動的復興社份子有柏俊生等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不久，秦啟榮曾委任我為冀魯邊區遊擊司令部警衛大隊長。我參加復興社後，回到濟南進行特務活動的任務是：瞭解韓復榘政治動態；刺探日本人和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以我家為據點，掩護復興社在濟工作人員和過往人員的活動並保障安全。後來我曾掩護過一些復興社特務在濟南的活動。還掩護過復興社特務張春橋過往濟南混入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復興社特務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趙氏

轉給我一封密信，內有兩隻密令。

第一隻密令寫：著警衛大隊長趙福承留在濟南，相機打入日偽組織，以資掩護而便工作，另有聯絡人員去取情報。

冀魯邊區遊擊司令秦啟榮（章）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日

第二隻密令寫：茲有張春橋去住你家，希一切關照，注意安全。

此致

趙福承

秦啟榮（章）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張春橋也是復興社特務。過了一個星期，張春橋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兩個多月。張春橋在濟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裡住，這是秦啟榮安排的，因為山東是韓復榘的地盤，蔣韓有矛盾，韓不允許蔣特活動，住在我家可以掩護他的活動，保障他的安全。

張春橋住在我家期間，不願談他的經歷和他在濟南的活動情況，他總是單獨出去活動，從未帶別人來過我家，也沒有人到我家來找過他，行蹤詭密。他曾向我打聽過韓復榘的政治動向，我告訴他，日本松井大將曾來濟勾結韓復榘。張春橋還分析日本人來後形勢，他說：「日本人對在家禮（青幫）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剷除。」事後，我把張的這些話告訴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佔領濟南前夕，張春橋突然對我說，他要去延安，我因為知道他是復興社的人所以對他說：「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說：「你留下幹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了，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再找你。」我聽了張的這些話以後，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負有任務的。

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時，他說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脫給他穿走了。他還向我說：「我算是從山東走的。」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迷人聽聞，掩護其身分。他還託付我關照他父親，後來我當警察局長時，就提拔他父親張開益當了庶務主任。

趙福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注：趙福成，解放後判刑勞改，一九七五年寬大釋放。秦啟榮，一九四三年被我擊斃。柏俊生，特務分子，解放後被我鎮壓。

【趙福成一九五〇年在勞改隊的親筆供詞（節錄）】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園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復興社，已受命留濟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趙福成寫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注：這是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的案卷中查出的。

【趙福成關於他一九五〇年在勞改隊親筆供詞的說明】

影印件原文

關於我一九五〇年在濟南勞改隊寫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張，張不知我」這句話的含意，現在我說明一下：

解放後一九五〇年，我在濟南勞改隊寫思想情況彙報時，我曾寫過我與張春橋認識，寫的詞句中有這樣的話：「我知張張不知我」。我這句話是指什麼說的呢？就是說一九三七年九月，復興社秦啟榮密令我留

下，準備打入日偽組織，同時還有個密件，通知我關照張春橋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後，張春橋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這年十二月初張去延安了。復興社山東負責人秦啟榮祕密通知我關照張住我家，我當然就瞭解張也是復興社份子。但張並不知我是復興社，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所以我寫「我知張，張不知我」。

一九五〇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歷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復興社給我的原信件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趙福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胡彰武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經秦啟榮介紹在濟南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充當機要交通員，經常為復興社傳送機要文件。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秦啟榮在指揮巷十八號會客室，交給我兩封密信，叫我給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給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轉給趙君弼（注：趙福成）的。秦啟榮考慮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還叫我囑咐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濟南，參加日偽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單，填好年月日，聽候命令。我將這兩封信都交給了柏俊生。柏將給趙的那封信收下後說：「我交給君弼吧！」然後，柏將秦啟榮給他的那封信拆開看，這時，我就把秦囑咐的那些話給柏說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關於秦啟榮給趙君弼的那封信，是什麼內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原名胡憲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胡彰武，一九六〇年判刑，一九六二年保外就醫。

【趙正平的證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秦啟榮要我給趙君弼傳信的情況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寇侵入濟南前，我為秦啟榮轉過一封信給君弼。信上寫的什麼我不知道。是趙君弼來我家時，我把這封信交給他的。

趙正平 口述（章）

柏良 整理（章）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注：胡彰武將秦啟榮的密信交柏俊生後，由柏的老婆趙正平轉交趙君弼即趙福成。柏良，趙正平之子。

秦啟榮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密令趙福成相機打入日偽組織，掩護復興社分子。抗日戰爭開始後，蔣介石同韓復榘之間的矛盾加劇，韓命令捕捉秦啟榮。韓的這個命令，被柏俊生的把兄弟何冰如得知後密告給柏，柏即要他老婆趙正平通知秦啟榮逃跑。秦逃離濟南後給柏寫了一封信，命令柏代他監督趙福成執行掩護復興社特務的任務。下面是秦啟榮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給柏俊生的親筆信。

影印件原文

俊生大哥鑒弟此次得能脫離濟南悉我兄嫂所賜予兄以事既不能離濟可在濟作鑿護工作令趙君弼兄參加偽組織請大哥隨時監督勿使其真心與敵偽效力並隨時掩護在濟秘密工作同志及過往濟南之工作人員為要另有詳件與君弼請代轉勿此順祝冬祺。

弟 啟榮 （章） 十二月十日

冰如兄處代為致意

注：這是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繳獲的敵偽檔案中查出的。

## 5. 張春橋混入革命隊伍後，長期隱瞞他的反革命歷史和反革命社會關係

【張春橋一九五〇年填寫的簡歷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有否參加過其他政治組織或政治活動？ 無

在其他黨派及各界中有何重要關係？ 無

【張春橋一九五二年填寫的黨員登記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 男 三十六 漢 山東省巨野縣

曾否參加反動黨團、反動軍隊和迷信團體？擔任過什麼工作？現在有無關係？何人證明？沒有。

【張春橋一九六〇年填寫的幹部履歷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 平原省巨野縣 現年四十三歲

有何重要社會關係，姓名、職業、政治狀況現在關係？ 沒有

何時何地參加何種反動黨團、軍隊、封建會道門？任何職務受過何種訓練？何時脫離關係？何人證明？ 沒有

## 二、張春橋偽造入黨歷史

張春橋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的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和脫黨分子。不久，被當時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布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為了掩蓋他的反革命歷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以後，仍把參加這個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一九五〇年填寫的《簡歷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何時何地何人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介紹入黨候補

及轉黨年月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經顧光門、雄飛介紹重新入黨。  
三九年二月轉正。

注：吳成志，即宋振鼎，叛徒，現在內蒙。

### 【宋振鼎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從蘇州反省院出來後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為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

宋振鼎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吳仲超同志的證明】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變自首、住過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

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吳仲超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注：吳仲超同志，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

### 三、張春橋隱瞞官僚、地主家庭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

#### 1. 張春橋長期隱瞞官僚、地主家庭

張春橋的家庭，祖輩三代都是山東省巨野縣官僚、地主。巨野縣解放以前的三年內，張家有土地八十五畝九分，全部出租，房屋二十二間，直到一九五五年其父張開益還收房租。張春橋在歷次寫的自傳和履歷表中，把家庭出身填寫為「中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將自己打扮成一個身世清白的「革命左派」，長期向黨隱瞞了官僚、地主家庭。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填寫的登記表、自傳的節錄。

【張春橋一九四四年寫的《反省自傳》】

影印件原文

我剛到延安填表時，在出身欄中，我寫了中農。應填城市小資產階級。

【張春橋一九五二年填的《黨員登記表》】

影印件原文

家庭經濟情況，如同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樣，靠薪金維持。

【張春橋一九七三年填的黨的十大《代表名冊》】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 男 五十六 漢山東巨野自由職業者自由職業者

【中共山東省巨野縣城關區委員會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關於張春橋家定為漏網地主、沒收全部房屋的決定（節錄）】

影印件原文

張協忠 漏網地主

現有經濟情況：

有土房七間 瓦房六間

沒收意見：

沒收土房七間瓦房六間：沒收此十三間房子現在完（全）出租。

因此全部沒收



三大街沒收分配小組

五六.一二號

同意以上沒收意見

中國共產黨巨野縣城關區委員會章

一.三

注：張協忠是張春橋的祖父。

### 【貧農女社員賈蓮閣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我在十三歲那年，因為受地主壓迫，家裡人口多，逃荒要飯，五千錢把我賣給惡霸地主張開益家當使用人。張家三代都在舊政府做官。進張家後沒有幾天，張開益就到一個縣當信局子的局長，跟去的張開益的老婆和他的兒子張善寶（即張春橋），二兒子張紅寶，還有我，共計五人。我在他們家裡，整天讓我端尿盆、端洗臉水、洗衣服、燒水、掃地、擦桌子、看孩子，起五更睡半夜，累得死去活來，哪一件做不好，就挨打挨罵，飯也不讓吃飽。張開益在那裡待了一年半，又回到巨野老家，我仍給張家幹那些活。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尺多深的雪，他們叫我一個人從早到晚打掃一天，才把四進院子打掃完，我的手、腳都是那時凍壞的。最難忘的是那年善寶他娘硬賴我偷了三千錢，逼著我承認，讓我跪在地下，拳打腳踢，一連跪了三個深夜。有一次讓我去宗莊給善寶老娘家送東西，路過我家順便看看娘，叫善寶他娘知道了，抓住我的頭髮，按倒地下，毒打一頓。我到十八歲，他們又逼我給善寶一個四十多歲的姑父當二房，經過一個長工的幫助，才使我逃出虎口。

賈蓮閣 口述

李文義 記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 2.張春橋長期包庇他的反動父親張開益

張春橋的父親張開益，當過軍閥張宗昌的縣郵政局長，國民黨少校軍醫、山東省會公安局棲流所長，日寇侵佔山東後，任偽濟南警察局衛生科庶務主任、山東保安三團軍醫主任，日本投降後，又當了國民黨濟南市戒煙院院長，是個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張春橋在他寫的自傳、履歷表中把他父親說成是「小職員」、「醫生」，「一生不得志的知識份子」，長期隱瞞包庇。一九六一年，張春橋利用職權，把其父張開益弄到上海供養起來，逃避群眾鬥爭。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填寫的登記表、自傳的節錄。

【張春橋一九三九年填的《人員登記表》】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

二十二

父：小職員，母 無業

【張春橋一九四四年寫的《反省自傳》】

影印件原文

我的父親，在二十幾歲時考上了郵務員，當了三等郵政局長。他是一個一生不得志的知識份子。

【張春橋一九五二年填的《黨員登記表》】

影印件原文

父親一代是醫生，近二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日偽——國民黨機關作醫生。

張春橋的父親張開益一九三七年任國民黨山東省會公安局第二棲流所長的相片，和一九四七年任國民黨濟南市政府戒煙院院長的《調查表》注：這兩件是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繳獲的敵偽檔案中查出的。

## 四、張春橋包庇他老婆、叛徒特務文靜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晉察冀邊區

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後，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派她擔任了重要職務，是上海市革委會專案工作和清查敵偽檔案的負責人之一。後來她表面上不擔任什麼職務，但仍參與上海市委的領導。

### 1. 文靜是叛徒、日本特務

【文靜一九六三年填寫的《幹部履歷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擔任區委宣傳委員，日寇大掃蕩中被俘（在園坊村）負傷。由平山被壓（押）到石家莊，先在石家莊日寇憲兵司令部，後解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隊，在監獄中關了半年，後動搖自首，叛變了革命，為敵人作宣傳工作，達半年之久。

【王曉初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叫王曉初，河北平山縣人。一九四三年投敵，一九四四年春被扣到日寇駐石家莊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第一四一七部隊，與李淑芳關在一個木籠裡。後來我們一起參加了宣傳班，日本矢野中尉宣布李淑芳為班長，為敵搞反共宣傳，積極編寫宣傳材料，記起的有「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棄暗投明」、「玩火自焚」等。她還為敵出謀劃策，搞策反宣傳。李親自講演，宣揚「中日提攜」、「共存共榮」，謾罵共產黨、八路軍，作過廣播宣傳，與日寇中西少尉祕密外出散發傳單。她參加了日寇組織的「反共同盟」。她對日寇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員，特別是年輕的女幹部，她總是對日寇說這個是廢物，說那個思想不良，而被關進木籠。由於她忠實為日寇效勞，受到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稱讚，稱她是「巾幗英雄」、「新派紳士」、「女中豪傑」、「東方的摩登女士」。給她的薪金

多，待遇也高。

王曉初（汪雨菲）  
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王曉初，現在河北省。

## 2. 張春橋長期隱瞞、包庇文靜的叛徒特務問題

下面是張春橋親筆填的部分幹部履歷表的節錄。

【一九四五年填的《幹部履歷表》】

影印件原文

愛人姓名：文靜，愛人是否黨員：是。

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嶽區黨委認識的，但四三年反掃蕩中文靜受傷被俘，直到今年始回邊區。她的組織問題，據稱已經天津市委解決，但未經正式轉來，現在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係）。

【一九四七年填的《幹部調查表》】

影印件原文

文靜本人則是學生，十七歲開始參加C·Y（注：即共青團），中間失掉過關係。一九四二年來解放區，在分局黨校學習，後至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幹事。四三年反掃蕩被俘。四五年六月逃出後，至今尚未恢復關係。

【文靜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和張春橋於一九四三年秋確定戀愛關係後調離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掃蕩中，我被俘自首叛變。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一九四六年結了婚。

一九六七年張曾提出離婚，但同時又說，你還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寫信給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以後，張春橋去北

京回來，就不再提離婚問題，而是想辦法把我包庇下來。後來，姚蓬子死了，張春橋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談姚母的安置問題，他叫我一起聽聽。他說：還是接來，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頭，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當時意識到對我也可能採取這個辦法。有一次他又對我說：「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打倒我。」在整黨期間，張春橋又包庇我，叫我請假休息，逃避整黨。有一次王洪文對我說：「你的問題拖著吧，反正沒有開除黨籍。」現在看來，「四人幫」都參與了這個問題。張、姚二人的直系親屬中都有叛徒問題，這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討對策。

文靜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張春橋在京期間，與文靜經常直接通信，還通過同其子女和秘書的來往信件保持密切聯繫。

【張春橋同文靜來往的部分信件】

張春橋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給文靜的信中說：

「二十六日信收到。請代我向爸爸問候，就說我打電話來過。」

「如果發生問題，一切從簡，不要驚動什麼人。弟弟們可以通知一聲，但是，要他們不要到上海來，此事，應由佩英通知。」

【張春橋、文靜通過與其子女通信保持聯繫的部分信件】

文靜在她的女兒海娃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給張春橋的信上親筆旁注：「市委在交流學習理論經驗大會上口頭通知的。」

【張春橋通過秘書何秀文和文靜保持聯繫的信件選印】

影印件原文

春橋同志：

流傳的所謂「毛主席最新指示」（即「二十三條」），文靜同志要我轉送請你一閱。特送上。

此致

敬禮

何秀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3.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叛徒特務文靜

【王洪文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給姚文元的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前天向你請示，到你那裡去一次有一件事當面請示彙報，主要是趁你來上海向你請示一下關於文靜同志的問題。

就是文靜同志的工作問題，我有個想法：文靜同志能否繼續到市革會調研組工作。因為這些問題不便向春橋同志請示。對這個問題如何處理，請文元同志指示。

洪文

六月一日

注：這是從上海查出的。信件上「存上海」是姚文元寫的。

【秦根富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包庇，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她雖沒有職稱，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並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發給她中共中央檔，市委、市革委會檔，市革委會各組辦、報社和各區、縣、局的情況報告、簡報等重要文件、材料。有的不發給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而由徐景賢提出，經張春橋同意，也照發給她。一九六八年，文靜的叛徒、特務問題被群眾揭發後，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秉承

張春橋的旨意，為了掩人耳目，讓文靜稱病不工作，長期躲在家裡，但仍照發給所有檔，由專人送到家裡。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傳達黨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精神後，才停發。

多年來，市委召開黨員負責幹部會，文靜有時坐在後臺聽，有時給她放會議錄音，或者給她看會議檔。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工作人員秦根富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黃濤、何秀文一九七六年三月給文靜的信】

影印件原文

文靜同志：

準備了一個在全市批鄧大會上的發言，看來既長又顯得散了些，送上一份，請你抽時審看、指正！

祝

好！

黃濤

三月二十八晚

文靜同志：

這幾份材料是幾位市委領導同志和朱永嘉同志準備在批鄧大會上的講話稿，已送春橋同志審閱，昨晚退回，現將春橋同志審閱的意見一併抄附，請閱。

致以

敬禮

何秀文

三月二十九日

注：這兩件是從上海查出的。

【上海市委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年發給文靜的部分文件】

注：黃濤，上海市委常委，現已監護審查。

【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在反黨分子張春橋的蓄意包庇下，張的老婆、叛徒特務文靜，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先後擔任過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等要害部門的負責人，管過專案，抓過全市動態等項工作。為此，我曾收到機關革命同志的來信，說文靜歷史上叛變自首，不應擔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給張春橋看，張看後即把信交還給我，根本不予置理。後來，從河北省來了外調人員，要調查抗戰時期和文靜一起關在日本憲兵隊的另一個人的情況，並要瞭解她們為憲兵隊工作的情形，也為張春橋所拒絕。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會組織組有兩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靜的檔案，並說了幾句懷疑張春橋的歷史的話。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少庸、王承龍等商量，由徐景賢等到組織組取走文靜的全部檔案，密封存在市革委會檔案室，並由王洪文派金祖敏澈底改組了組織組，對兩位革命同志進行殘酷打擊，整了八年之久。此後，張春橋表面上授意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但她實際上仍過問聯絡組的工作，並經常把當時專案辦公室的負責人等找到家裡出謀劃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間，王還常到文靜家裡去，以看望為名，商量工作。

一九七二年底，張春橋回滬時還和文靜生活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張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張要王洪文回滬時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談了文靜的政治歷史問題，並說張要和文靜離婚，徵求馬、徐、王的意見。但王洪文回京以後，文靜仍通過子女繼續和張保持密切聯繫。一九七五年六月反黨分子姚文原來滬，王秀珍去問姚這件事，姚



表示文靜的歷史不成問題了。同年八、九月間，反黨分子王洪文來上海時，還專門設宴單獨宴請了文靜。

據馬天水說，他早就看過文靜寫給江青的一封長信，交代文靜自己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但在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以後，繼續讓文靜到市委保密室看絕密檔，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並讓她聽取市委召開的黨員會議的重要傳達等。對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辦公室還一直給文靜送檔。

王、張、江、姚和我們這些「四人幫」的餘黨，十年以來，長期包庇、窩藏文靜這一叛徒、特務，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徐景賢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 【王洪文處的工作人員肖木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等召開所謂「兜情況」會議，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會上提出要出動民兵，在報紙、電臺發表反革命的所謂「告人民書」等。最後，四個常委說要等去北京開會的幾個書記回來後再定。

十三日中午，反黨分子張春橋老婆文靜要她女兒打電話叫我和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去她家裡談一下。我們去後，文靜說：「難道就這樣完了嗎？你們有沒有什麼辦法？」朱說：「常委說要等去北京開會的幾個書記回來後再定，沒有辦法。」文靜竭力煽動說：「他們不搞你們可以搞嘛。可以組織寫作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連、發動。我不相信群眾起不來。」朱和我表示要等北京開會的回來後再說。

肖木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 叛徒江青的歷史罪證

江青，女，又名李雲鶴、李鶴、李雲古、藍蘋等，一九一四年生，原籍山東省諸城縣，家庭出身地主。一九二六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軍閥部隊軍官王克銘家，仍過著剝削階級生活。一九二九年春，在濟南加入山東省實驗劇院，深得該院院長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趙太侔的賞識。一九三一年春，由趙太侔資助進青島大學當旁聽生。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加入共產黨，同年七月俞啟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黨的關係。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聯」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自首叛變，十二月出獄。不久與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來往，關係密切，並在影劇界積極從事擁蔣活動，為國民黨效勞。一九三七年七月，江青到西安，與叛徒徐明清訂立攻守同盟後混入延安。同年十月，她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 一、江青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捕後自首叛變

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滬西區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當教員期間，與共青團中央交通樂若在兆豐公園接頭後，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入獄不久，就自首叛變出獄，成為可恥叛徒。

#### 【先大啟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李雲古，女，山東人，左翼文化組織成員。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被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區逮捕，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在偽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我參加過勸降談話。有一次趙耀珊迫使李雲古自首，打李一個耳光，我以偽善面孔勸李自首，說：「你的問題很簡單嘛，只要轉變就好了。」當時，李表現很可憐的樣子。以後李雲古就自首了，由訓練股長閻松年和趙耀珊經辦了自首手續，李的自首登記表和保證書我審查過，其中寫了反對共產主義、擁護三民主義等內容。自首登記表和保證書由我報送了南京特工總部。一九

三四年間，自首的女性如張惠芬等人的自首手續，都是經我保送南京特工總部的。

先大啟親筆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注：李雲古，即江青。先大啟，中統特務，一九三四年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編審組長，負責辦理被捕人員自首手續。後任中統局四川省調統室主任等要職。解放後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趙耀珊，綽號「黑大漢」，叛徒、中統特務，一九五四年被我鎮壓。閻松年，叛徒、中統特務，一九五一年被我鎮壓。

【先大啟一九五八年的供詞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還有個女的李雲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後我同他（她）談過話。

先大啟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

【先大啟一九六八年的親筆供詞（節錄）】

影印件原文

李雲古被捕案件：李雲古，山東人，女性，一九三五年初（注：應為一九三四年十月）被捕，經過不詳，當時經匪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長趙耀珊談話，據趙談李參加左翼文化組織。

先大啟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注：上面兩件是從公安部先大啟案卷中查出的。這兩件供詞證明，先大

啟確曾參與處理江青自首一案。

### 【叛徒徐明清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三六年叛變出獄後去西安。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從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說：「我不願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關係處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這次來，不告而別，也沒有帶什麼關係，反正有你在這裡，好辦。」並問：「要到延安去學習，能找關係進去嗎？」我說：「我帶你去八路軍辦事處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說：「你被捕出來的情況，我在上海聽說過了。」我說：「真倒楣！我有兩個叛徒對質，在杭州又有兩個叛徒老鄉，知道我一些情況，要出來，只好履行自首手續。」江說：「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當時在獄中也寫了個聲明，說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以後也決不參加共產黨，但這還不行，還得填寫自首登記表，才叫保釋。」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紹，經八路軍辦事處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對我說：「在西安對你說的有關我在上海被捕後寫聲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對別人胡說。」並威脅我「你如果說出去，我可要找你算帳，叫你吃不消。」接著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時我正在填寫黨員登記表，我只填寫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被捕後，經保釋出獄，隱瞞了自首叛變的問題。我把登記表給江青看，江青看後說：「我的事只要你胡說，你就照這樣填吧，我也不管。」江青為了混進中央黨校學習，還要我給她寫一個假證明，說她是「九一八時的黨員，在上海有黨的組織關係」，我也照辦了。三八年七、八月間，中央組織部的負責同志問我：「江青被捕有問題嗎？」因為江青曾威脅過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變情況說出去，所以我回答：「沒有聽說江青有問題」，又一次欺騙了組織。

徐明清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注：徐明清，女，一九三三年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一九三五年被捕叛變，後又混入黨內。

### 【斯季英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四年十月間，樊伯滋（劇聯成員）對我和鄭毓秀說，李雲古到上海失蹤了，一定是被捕了。過了大約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鄭毓秀也被捕了，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獄中聽鄭毓秀對我說：「李雲古和她一起關在小監房（又稱優待室）裡。特務股的頭頭看李雲古長得漂亮，夜裡常常叫李去特務股陪那幾個頭頭喝酒。」還說：「李雖漂亮，但有一隻腳腳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腳趾確有缺陷）我因知道鄭毓秀是叛徒，對她非常氣憤，沒有理她。

斯季英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注：斯季英同志，女，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鄭毓秀，女，叛徒，已死。

### 【覃曉晴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原（夏緯）的介紹認識了李鶴。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後改名為「無名劇人協會」）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淨。這年秋後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路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不斷提我上樓去審訊。這時，我心裡很悲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淨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

吧，她和我們談起過你。」還說：「你看有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裡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很活潑，京戲唱的怪好聽，還給我們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家」的肖桂英。

一九三五年春，我出獄以前，向特務供認了我認識的「無名劇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鶴。

覃曉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覃曉晴，女，一九三四年被捕叛變，現在浙江省。李鶴，即江青。

## 二、江青與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關係密切

張春橋在國民黨特務分子崔萬秋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的時候，江青同崔萬秋的關係也很密切。她自首叛變出獄後，結識了崔萬秋，同崔來往頻繁，關係很深。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經常發表文章，刊登劇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麼「典型的北國女性」，山東戲劇運動的「功臣」。

【《大晚報》刊登的吹捧江青的部分文章和劇照徐錫駒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崔萬秋在上海主編《大晚報》副刊「火炬」時，認識了藍蘋。崔對我說過：藍蘋是從山東來的，他在報刊上替她宣傳，捧她出名，她很感激他。從此，崔萬秋同藍蘋的關係非常密切。崔萬秋還對我說過：藍蘋三十年代在上海被國民黨抓去過，寫過悔過書，後被人保釋出來。

徐錫駒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 【馬彥祥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江青在上海參加戲劇活動期間，積極和新聞界人士接觸，結識了崔萬秋。一九三五年四月，江青進電通影片公司以後，崔萬秋在他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剪影》上，不遺餘力地為江登文章，發消息，組織專訪，登照片。江青與崔萬秋的來往極為密切。

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所顧問 馬彥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張常人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晨報》當編輯，兼在聯華影業公司任職。那時崔萬秋利用《大晚報》副刊，多次發表「藍蘋」署名的文章，並組織《大晚報》記者對江青進行專訪，發表吹捧江青的報導、劇評，刊登江青的照片。崔萬秋知道江青的住址和電話號碼。關係密切。後來我知道了崔萬秋是國民黨特務。

張常人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注：張常人，原北京回民學院教員，現住北京市。

### 三、江青積極從事擁蔣活動，為國民黨效勞

江青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自首叛變出獄後，追隨「四條漢子」，反對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積極參加擁護「國防文學」的簽名運動，大演「國防戲劇」、「國防電影」，向蔣介石獻媚，為國民黨效勞。

### 【趙丹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執行王明路線，背著魯迅解散「左聯」，鼓吹「國防文學」，並發起簽名運動，對抗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革命口號。

當時「劇聯」負責人曾拿一張關於「國防文學」口號的啟事，要我們「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知名之士」簽名於上，我在簽名時，我確鑿記得江青也在上面簽了名（簽名藍蘋）。

《賽金花》的話劇本，是夏衍在反動的「國防文學」口號下出籠的一部宣揚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的大毒草，當時即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嚴厲斥責：「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一九三六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四條漢子控制下，決定在第三次公演時，演出《賽金花》一劇。藍蘋當時十分醉心於賽金花這樣一個反動腐朽的角色，自己拼命想演而又不出面，卻讓唐納為她爭演此角色。當時王瑩也爭演賽金花一角，雙方爭執不下，致使劇團鬧分裂。最後在「左翼」領導人夏衍、章泯等人的主持下，讓藍蘋演了《大雷雨》一劇的女主角，才算甘休。

趙丹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九三六年九月，國民黨反動派當局借蔣介石五十歲生日，發起「購機祝壽」運動。上海電影界在流氓頭子黃金榮的組織下，搞了個「購機祝壽遊藝大會」，所得票款獻給蔣匪購買飛機，「以厚國防」。江青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向蔣介石獻媚。下面是《大晚報》刊載的「上海電影界購機祝壽遊藝大會」江青準備演出獨幕劇《求婚》的廣告。

影片《狼山喋血記》被國民黨反動派吹捧為「國產影片之中最有意義最傑出之作」，是「國防電影標本」。江青在這部影片中扮演第二女主角劉三的老婆。



左邊是江青參加演出《狼山喋血記》的廣告和劇照

《賽金花》這個賣國戲，受到魯迅尖銳批判後，江青仍吹捧它是一部「很優秀的創作」。下面是江青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署名籃蘋在《時事新報》發表的《三八婦女節》的文章

影印件原文（節錄）

可是創作劇呢？不能說沒有，如夏行（注：應為衍）先生的《賽金花》，《秋瑾》，曹禺先生的《雷雨》和《日出》，以及其他的獨幕劇，這都是很有意義，很優秀的創作。但是我們還是覺得不夠，不夠！

#### 四、江青與徐明清長期互相包庇她們的自首叛變問題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一九七二年農林部審查了徐明清的被捕叛變問題，定為叛徒。徐明清一九七三年多次寫翻案信給江青，江為掩蓋自己的罪惡歷史，極力為徐翻案。

【農林部一九七二年對叛徒徐明清的處理報告（節錄）】

影印件原文

對叛徒徐明清的處理報告

國務院：

一九三五年四月，徐明清（當時叫徐一冰）在上海「教聯」（全稱「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作黨的地下工作時，因叛徒莫仲僑出賣，在上海被蔣匪警察局逮捕，三個月後解押杭州蔣匪浙江反省院小車轎分院。徐在蔣匪反省院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向敵人屈膝投降，寫了「自白書」、「悔過書」，填寫了「自首自新人登記表」及「同黨線索表」，供認了參加「教聯」活動和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的身分，據本人交代出賣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九人（證明材料為五、六人），叛變了革命。

根據這次審查結果，徐被捕後，喪失革命氣節，向敵人自首叛變，出賣組織，出賣同志，性質嚴重，應重作組織處理，為此，我們認為：

應定為叛徒。

農林部黨的核心小組（章）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

【徐明清寫給江青的翻案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敬愛的江青同志：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總的情況，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為，想您大體上是瞭解的。

徐明清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

江青同志：

為了能夠正確的解決我的政治生命問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向您請求幫助，請原諒。

徐明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

江青同志：

去年九月一日農林部核心組對於我的歷史結論和處理意見報告讓我看，並要我簽字，同時宣布在中央批示前，照此執行。我看到把我定為叛徒，清除出黨。

向上一級組織反映或申訴，同樣得不到注意和解決，這不知是什麼原因？在我個人，在無可奈何之際，不得已向您囉嗦，希望您有機會時給予可能的幫助。

徐明清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五、江青包庇她哥哥、特務反革命分子李幹卿

江青的哥哥李幹卿，充當過日偽和國民黨的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防奸組組員。一九三九年在日本憲兵隊特務指揮下，李幹卿兩次寫信對江青進行策反，是個有歷史罪惡的特務、反革命分子。解放後，江青竭力包庇李幹卿，要李隱瞞策反她的罪行，並通過葉群、王效禹提拔李當了幹部，享受特殊照顧。

李幹卿任國民黨鐵路員警巡官的登記表

注：這是從濟南鐵路局公安處保存的敵偽檔案中查出的。

### 【李幹卿關於他給江青寫策反信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九年春，江青通過別人從香港先後寄來了四封信，每封信內有七十五元的舊法幣。有一封信被日本憲兵隊隊長寺田扣壓了。不幾天，寺田和伍長石古、特務巡官張興家把我抓到憲兵隊，他們問我和江青的關係，開始我不承認，他們就打我，後來寺田拿出江青的照片來，我承認了江青是我妹妹，寺田就不打我了，對我說話也客氣了。他叫我寫信讓江青回來，並說只要江青回來了，可讓我當個省長、廳長。後來把我放了，還叫我定期到憲兵隊去，有時寺田也到我家來，問我有沒有來聯繫的人？江青有沒有來信？過了一月左右的時間，我給江青寫了第一封信，內容是以我、母親和大妹妹的名義讓江青回來。信交給了寺田，怎麼發出的我不知道，過了一個時間，沒有消息，寺田又叫我給江青寫第二封信，內容和第一封相同。以後日本憲兵隊每十天、半月找我一次，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才停止。

李幹卿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李幹卿關於江青包庇他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解放後，我和江青有多次見面。我先後去北京兩次，江青來濟南五、六次。一九四九年江青來濟南時，我對江青說：「因你從香港給我寄錢來，憲兵隊把我找了去，打我，讓我給你寫了兩封信，你收到了嗎？」江青說：「我都知道了，以後不要再說這些事啦。」一九五七年我去北京，住了四十天，江青把我接到中南海談話。同年秋，江青來濟南，我向她談了濟南鐵路局要審查我的歷史問題。江青說：「你要穩住，不要害怕，還有上邊嘛！」後來我又給江青寫信，說有人找我的麻煩。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二日江青回信說：「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完全可以不理。」一九七三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住了十六天，江青在人大會堂接見我，送我二斤茶葉，一架進口照相機。對我的生活也有一些照顧，一九六九年把我的工資由六十四元五角提到八十三元，住房有兩間增加到六間，還免收房費。

李幹卿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江青一九六〇年給李幹卿的親筆信】

影印件原文

哥哥：

你最近的來信收到了。

姐姐還在醫院裡，需要動一個手術，沒有危險，請放心。

我有一年的樣子沒有給你信，一方面因為身體差和忙一些，另一方面也沒有什麼事好告訴你。今天姐姐給我看了你以前的一封來信，你要求來北京，說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孤單，我認為應該和你談談。你不能來北京，因為找不到職業，你應好好地在目前的職位上工作，能夠有工作有飯吃就是好的，至於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濟南我就和你談過，只要自己拿穩了，是不怕這個的，你若拿不穩，出了岔

子，我完全不能負責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我們是勞苦家庭出身，應克苦生活、努力工作！你現在究竟做什麼工作？一個月多少薪水？房子是否還是不出房租？在濟南租一間房子一個月多少錢？以上這幾個問題，請來信詳細告訴我。祝你和嫂嫂好！

江青  
五月十二日

注：信中提到「有人找你的麻煩」，是指李幹卿所在單位根據上級的指示審查李的反革命歷史問題。

#### 【濟南軍區張慶祥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江青的哥哥李幹卿，在國民黨時期當偽警察局的巡官，解放後被濟南鐵路局留用，經有關部門調查，是一個有歷史罪惡的反革命分子。江青為了讓李幹卿逃避群眾的揭發和批判，千方百計地予以包庇。一九六九年春，江青通過葉群給王效禹打電話說：「江青的哥哥李幹卿在濟南，聽說生活很困難，住的條件也很差，你們是不是安排一下。」先是安排李幹卿住在省革委會生產指揮部大院內，由生產指揮部供給。後來江青又別有用心地打電話，叫李幹卿搬家，不要住在機關，結果被迫又把他安排在濟南軍區第一招待所的宿舍居住，佔用六間平房的一個獨立院，工資由六十四元五角增加到八十三元，還享受著免收房費、生產補助、困難救濟等特殊照顧。

張慶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六、江青隱瞞地主家庭

江青出身於地主家庭，一直過著剝削階級的生活。江青長期欺騙

黨，說她家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父親是「手工業工人」，過著「淒涼」的生活，隱瞞地主家庭。下面是江青填寫的自傳和表格的節錄。

【江青一九三七年寫的小傳】

影印件原文

小傳 江青

我是產生在一個已經走向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裡，在我的記憶裡童年的生活是充滿了恐怖、淒涼的情調。

【江青一九四四年寫的年表】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一四年生於山東省諸城縣是一個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

【江青一九五〇年寫的幹部簡歷表】

影印件原文

姓名江青

家庭出身手工業工人

【中共山東省委調查組關於江青家庭情況的調查報告】

影印件原文

關於江青家庭情況的調查報告

江青出身於山東省諸城縣的一個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關經營旅店和木匠鋪，有房屋十四間，敞棚六間，雇長工一人，還雇有兩個盲人專為她家推磨，忙時雇有季節工若干人。後其父將店房出賣，典入本縣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畝，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萬多斤糧食，全家不勞動，以剝削為生，江青從小就過著寄生生活。

李德文娶兩個老婆，江青是李的小老婆所生。

中共山東省委調查組（代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人民公社社員徐懷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我叫徐懷，男，年七十五歲，貧農出身，俺老輩就給地主王練堂當佃戶。我二十來歲那年，地主王練堂將求佳鄰、葛合頭等村的佃戶租種他的老畝四十八畝地（合市畝一百二十畝）典給了城裡東關李狼（李德文），從此俺又給李家當佃戶，租他大畝地三畝八分（合市畝九畝半），每年交地租九百一十二斤，共租種了四年。到李家交地租時，只要麥子、穀子、大豆三種，曬不乾，揚不淨不收，逼著推回來曬乾揚淨再交，對佃戶進行殘酷剝削。

山東省諸城縣城關公社

陳家林大隊社員 徐懷口述 李樹義記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人民公社社員李發蘭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我叫李發蘭，女，年七十四歲，貧農出身，是齊溝大地主王練堂的佃戶，租種了老畝二畝多地，後來王把這部分地典給東關李德文家，俺又給李家交租。每年交租三次，有麥子、大豆、穀子，一老畝每年交六鬥糧食（合兩百四十斤），俺每年交給李家地租五百斤。另外，每年一畝地還交地錢兩吊伍，共交五吊多錢。打下糧食來，有時交晚了，李德文就親自到俺家催，種這點地可把窮人禍害了，俺年年沒吃的，都叫地主剝削去了。

山東省諸城縣城關公社求佳

鄰大隊社員 李發蘭口述 閻仲業記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罪證

姚文元，浙江省諸暨縣人，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地主兼資本家家庭，是叛徒特務姚蓬子的兒子，國民黨特務頭子、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的乾兒子。一九四八年姚文元混入黨內。長期以來，姚文元隱瞞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的政治歷史問題，利用竊取的權力，勾結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竭力包庇有嚴重歷史罪惡的叛徒特務姚蓬子，並且在政治上同姚蓬子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姚文元頑固地堅持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採取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結幫營私，反對毛主席、黨中央，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個隱瞞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 一、姚文元長期包庇他父親、叛徒特務姚蓬子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個證據確鑿、罪行嚴重的叛徒特務分子。姚文元早在入黨時就隱瞞了姚蓬子的反革命歷史，入黨後又長期隱瞞包庇。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為了掩蓋他的政治歷史問題，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合謀，千方百計地包庇姚蓬子，把姚蓬子祕密「保護」起來，逃避黨和人民群眾的審查。

#### 1. 姚蓬子是個有嚴重罪行的叛徒、特務分子

姚蓬子，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天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一九三四年四月叛黨出獄，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領導下充當文化特務，擔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等反動要職，長期進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姚蓬子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的《脫離共黨宣言》】

影印件原文（節錄）

共產主義之路、在中國已經成為一條悲慘的絕路。



共產黨所領導所發動的暴亂行為、直接的毀壞農村、毀壞僅有的民族工業、將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力量減少到零度、結果客觀上事實上完全成了帝國主義的別動隊。

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後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為復興民族文化，盡我個人的力量。

【姚蓬子一九五五年親筆寫的《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經過》（節錄）】

影印件原文

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經過

姚蓬子

第二天看守所長叫我到他房間裡去，要我在那裡寫。我寫同魯迅、柔石、潘漢年、田漢、華漢、馮雪峰、鄭伯奇、錢杏村等發起左翼作家聯盟，並擔任理事，還說以上的人都是左聯的理事。我同魯迅等辦過萌芽月刊，同丁玲等辦過北斗雜誌，還自己編過文學月報。我加入黨是潘漢年介紹的。

關於左聯黨組織的負責人，我說先是潘漢年，後是華漢。關於有那些黨員，我說有馮雪峰、華漢、錢杏村等。

左聯會員的住址，我說了馮雪峰、陽翰笙、錢杏村，都是他們以前住過的地方。我說和魯迅先生見面是在內山書店，同柳亞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傾，住在什麼地方也寫上了。這以後，張道藩到獄中來過一次，是在法官的審判室中接見我的。他說已看到了我的叛黨的自白書，不久就可以覓保釋放。

我既已成為叛徒，而且拿著中統特務機關的津貼而成為它的一員。

到漢口以後，我先在中統的臨時辦事處看到徐恩曾，他說每月仍給我一百元津貼。

注：這是審查胡風反革命集團期間姚蓬子的交代。

【袁逸之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慶國府路二八二號，匪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書，約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務頭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偽法幣給我對我說：「姚蓬子明天來家，你把錢給他。」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看門副官王積善上樓來對我說：「姚蓬子來見你，要不要見他？」我說：「叫他上來。」王引姚上樓來見我。我把徐交的錢給了他，他卑躬曲敬的樣子對我說：「袁秘書，謝謝你。」在抗戰這段時期，姚蓬子從漢口撤退到重慶，表面上仍打著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會上闖，而暗裡卻單線直接和特務頭子徐恩曾聯繫，供特務機關使用。

袁逸之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 【張文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姚蓬子早在抗日戰爭前，曾為中統前身特工總部所逮捕。不久，他便成了中統特務。他常在一些反動報刊發表文章，他自命為「文化人」，但實際上是以當時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為後臺，受徐匪的領導、指揮搞反動活動。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間，在重慶川東師範匪局本部，曾幾次碰到過姚蓬子。當時我任匪中統局第一組第二科長，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匪要到一筆津貼（數目記不清楚）。

張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注：袁逸之，中統特務，已寬大釋放。張文，國民黨中統局本部秘書、重慶區區長，已特赦。

## 2. 姚文元長期隱瞞、包庇姚蓬子的反革命歷史

【姚文元一九四九年親筆填的《青年幹部登記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父親個人的政治態度是一個「民主人士」，對黨及政府擁護

【姚文元一九五三年親筆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父親：姚蓬子，作家書屋經理，政治上擁護共產黨。革命低潮時的脫黨知識份子。

【姚文元一九五五年親筆寫的他同姚蓬子關係的材料（節錄）】

影印件原文

對姚蓬子的問題，我應向黨明確表示態度：我和父親在政治上沒有任何聯繫，也沒有任何隱瞞他政治行為的事。如果發現我有任何隱瞞，黨可以給我最嚴厲的處份。

【冒金龍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滬新中學理二班讀書時，我在校內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

那時姚文元標榜他父親姚蓬子開設的「作家書屋」出售進步書籍，是與魯迅一起參加「左聯」的進步作家，並以此為榮，對黨組織隱瞞了姚蓬子的地主、資本家、叛徒特務身分。蒙蔽了一些同志，因而於一九四八年十月混入黨內。

冒金龍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孫志尚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二甲班讀書，與姚文元是同班同學，我在班級裡擔任地下黨黨小組長。當時為迎接上海解放，突擊

發展了一批黨員。姚文元入黨時對組織隱瞞了他的父親姚蓬子的叛徒、特務反革命身分和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真實情況，把他父親說成是開設「作家書屋」的「進步作家」、「民主人士」。而那時我們也不瞭解姚文元的父親和家庭的真實情況，因此，於一九四八年十月被姚文元混入黨內。

孫志尚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注：冒金龍同志，現上海市盧灣中學黨支部書記。孫志尚同志，現在上海市乒乓球廠。

### 【上海市華業裡委朱學芳等六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我們都是威海衛路林村的居民，與姚蓬子是鄰居，親眼目睹，姚文元與他的反動老子關係極為密切。

姚文元參加工作後，我們經常看到他在節、假日到家中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與金英結婚以後生第一個小孩時就搬到他父親家三樓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還雇了保姆伺候他們，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姚文元夫婦更是經常來他父親那裡享受高價食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九六七年春節、一九六八年姚蓬子病重時我們都親眼看到姚文元原來過。姚蓬子夫婦也經常到姚文元家裡去。姚文元的大女兒小紅，是從小就放在姚蓬子家裡撫養長大的。一九六九年姚蓬子病死以後，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將書籍（籍）、家具滿滿裝了一卡車搬到康平路姚文元家裡去了。

華業里委

朱學芳顧大偉

王秀月馮翠英

呂月英王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 3. 姚文元包庇姚蓬子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勾結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與胡風等反革命分子關係極為密切，經常在一起攻擊我黨。姚文元對胡風等在他家裡攻擊、謾罵我們黨的罪行不報告、不揭發，反而吹捧胡風是「進步」的。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姚文元要反革命兩面派，掩蓋他同胡風分子的關係。

【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審幹辦公室一九五五年關於  
姚文元的父親政治歷史情況和社會關係調查報告（節錄）】

影印件原文

姚（文元）的父親與胡風、彭柏山、潘漢年關係均很好，並有往來，姚文元也見過面；但這些情況姚一直未交代過，而且一直強調自己與家庭關係惡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組織彙報，這次反胡風鬥爭開始，姚從未把這種具體情況進行揭發。

解放後姚文元在他自己家裡見過胡風並從他父親口裡聽到胡風對黨不滿，罵我們黨的文藝領導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見過胡風。同時在家裡也見過胡風分子梅林也從他父親口裡聽到梅林發牢騷，對解放後的現狀不滿，但這些問題姚從未揭發過，也未向組織彙報過。

解放前，姚經常閱讀與研究過胡風的書，如希望、泥土、螞蟻等出版的書籍雜誌。解放後姚文元同樣買了很多胡風的書籍。如胡風的「論現實主義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從未批判過，反胡風鬥爭開展後姚文元和（還）把胡風等書籍放到外面公開的書架上。

姚文元同樣認為胡風是進步的，路翎寫文章很有「才華」。對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風侮蔑香港黨的文藝領導同志是「逃兵」來反攻黨對他的批評，姚文元也認為是對的。

調查人朱振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組織上對姚文元同志父親的政治歷史情況和社會關係進行了調查，由區委審幹辦公室朱振芳同志寫了上述調查報告。

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組織部（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

#### 4. 姚文元勾結王洪文、張春橋包庇叛徒特務姚蓬子

【顧漢松等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姚文元竊據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後，他的叛徒、特務父親姚蓬子於一九六六年底糾集了國民黨中校、偽三青團區隊長等一些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蒙蔽了一些群眾，以姚文元「勁松」的筆名，成立了一個「勁松戰鬥組」。姚蓬子自任組長，標榜自己是「資反路線的受害者」，叫囂「搞我就是搞姚文元」，「現在是受壓迫最深的人最革命」。他還主持召開所謂中文系教工平反大會，他在會上惡毒的辱罵共產黨員是「拿著鞭子的人」、「國民黨」、「特務」、「狗腿子」，煽動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起來反攻倒算，蠱惑有的人毆打黨員幹部，破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姚蓬子混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後，群眾意見很大。當時的工總司組織組組長丁德發向王洪文匯報了此情況，王竟說：「姚文元父親參加造反隊倒蠻好，這樣，工總司就更硬了。」二月二十三日在錦江飯店，丁又向張春橋彙報，說姚蓬子參加造反隊不合適，張聽後板著面孔把丁攆走，並責令丁寫檢查。王洪文知道丁收回了姚蓬子的造反隊袖章後，大為惱火，訓斥丁：「給工總司闖了大禍！」「得罪了姚文元，誰擔當得起責任！」

上海師範大學教師顧漢松殷海國

上海五一電機廠工人丁德發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姚蓬子，曾在原上海師範學院當過教員。

### 【沈舟根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底，全國正掀起了揪叛徒的高潮，上海師院也刷出了要叛徒姚蓬子交代罪行的大標語，有的群眾組織勒令姚蓬子報到受審，同時通過姚蓬子瞭解情況的也比較多，這時「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還有王少庸慌了手腳，要上海市革委會專案辦公室出面將姚蓬子保護起來。提出了幾條保護保密措施：有關姚蓬子問題的材料不准洩露，一律交專辦；通知上海師院革委會，不准任何群眾組織成立姚蓬子專案組，不准批鬥；不准上海師院革委會、上海作協的組織組接待外調人員，不准外調人員直接找姚蓬子談話，調查提綱要經市專案辦公室審批後方能叫姚蓬子寫證明材料；對通過姚蓬子瞭解情況的單位人員要注意，要詳細登記，嚴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發現問題要馬上報告市專辦處理。並要姚蓬子家的所屬華業里弄黨組織做好對姚蓬子的安全保衛工作，有人問姚蓬子家住在什麼地方，回答不知道，發現有人要通過姚蓬子瞭解情況要報告市專辦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又規定，凡通過姚蓬子瞭解情況的一律不接待，非調查不可的要經中央文革批准。

上海師範大學沈舟根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二、姚文元是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乾兒子

姚文元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拜國民黨特務頭子、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和徐的小老婆費俠為「乾爹」「乾娘」。姚文元同徐、費的關係十分密切，一直保持到徐、費逃臺灣。姚文元始終向黨隱瞞了這一重大政治歷史問題。

### 【袁孟超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六年五月，國民黨特工總部總務科長周伯良，在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場附近開設水果店，樓上設西餐部，請徐恩曾（國民黨特工總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任中統局副局長）及其姘婦費俠（叛徒）去參觀並擺酒席招待。徐、費通知姚蓬子、卜道明和我及我的妻子傅伯群一起參加宴會。席間，費俠誇讚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好。徐恩曾說：蓬子的兒子長大一定會像蓬子一樣，成為一個文學家。卜道明說：那就把姚文元給費俠吧。徐恩曾說：做乾兒子好。並問蓬子是否同意？姚蓬子回答：那可太好了。徐說：我們可成了乾親家啦！於是大家祝酒，祝賀徐恩曾和費俠有了乾兒子姚文元。後來，徐、費常到苜蓿園新村姚蓬子家，更加喜歡姚文元。

袁孟超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

注：袁孟超，中統特務，已寬大處理，現在吉林省。卜道明，中統特務，已逃臺灣。

### 【黃理文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姚蓬子住在南京市石鼓路，我常到姚家去。第一次去是同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的小老婆費俠（後任蔣匪幫立法委員）一起去的。姚文元當時約五、六歲，叫費俠為寄娘。姚蓬子也向我介紹說：「費俠是文元的過房娘。」費俠和姚蓬子一直來往甚密，經常要姚蓬子修改文章，有時就叫姚蓬子寫了以費俠名義發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夏，我在武漢常看到費俠帶著姚文元去看電影和文藝演出。一九四一年夏，田漢在重慶凱歌歸酒家宴請，出席的人很多，我和姚蓬子都去了，姚文元是由費俠帶去的。

黃理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姚文元母親周修文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姚蓬子和徐恩曾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姚蓬子出獄以後，住在南京苜蓿園期間，徐恩曾和費俠經常到我家去。這時徐恩曾經過卜道明每月給我家送一百元錢，直到我家離開南京。費俠很喜歡姚文元，到我家時，費俠要姚文元叫她媽媽，我也要姚文元叫，姚文元也就叫她媽媽。

到重慶以後還是經常來往，姚文元還是叫費俠媽媽。

周修文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

注：黃理文，歷史反革命分子，已寬大處理，現在上海。

### 三、姚文元隱瞞地主家庭

姚文元出身於地主兼資本家家庭。他家在浙江、上海、北京有大量的土地和房產，長期出租土地、房屋，放高利貸，雇工剝削。姚文元一直向黨隱瞞了地主家庭成份。

【姚文元一九四九年親筆填的《幹部登記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節錄）

姚文元高中三資本家參加革命時有父親、母親及一個妹妹，無不動產。動產有書籍（開書店）。經濟來源是書店的利潤。

【姚文元一九五三年親筆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節錄）】

影印件原文

家庭經濟情況：過去（一九四三年前）苦，經濟來源靠父親做編輯寫文章

【姚文元一九七三年親筆填的黨的「十大」代表名冊（節錄）】

影印件原文（節錄）

姚文元浙江諸暨資產階級學生

【諸暨縣姚江公社下村大隊黨支部的證明材料】

## 影印件原文

姚文元的家五輩都是大地主。父親姚蓬子全部繼承了祖父的財產。解放前，他家有田一百一十畝，樓房九間，平房三間，是下村二十戶地主中最大的一戶。土地除每年自己種二十至三十畝外全部出租，每畝每年收租三石左右。雇有長工一人，短工五至七人不一，對長短工很苛刻。收租的鬥特別大，群眾有這樣的口謠：蓬子老爺的鬥，是毒蛇的牙齒，惡狼的嘴。同時還放高利貸，殘酷剝削貧苦農民。

姚蓬子在土改前夕就搞破壞活動，將家裡的主要財產全部轉移到上海等地，只剩下了不能搬走的房子和一些破家具、農具。一九四九年十月還托姚壽章將一間店屋以十六石大米賣給陳阿毛，後被農會發覺追回。

姚江公社下村大隊黨支部書記

姚法苗（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姚長慶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我是土改時擔任姚公埠下村農會委員，負責文書工作。在土改時，我們下村劃上地主的有姚蓬子、姚乃定、姚文燦等共二十戶。其中算姚蓬子財產土地最多，佔有土地一百餘畝，分布在錢池、泮家、俞家、姚家、全家、姚公埠三村。解放前除自己雇一個長工種二十——三十畝外，其餘全部出租。按照土改法規定定為地主成份。

土改前夕，姚蓬子將浮財全部轉移到本縣青塔大隊和上海等地，留下的只有一些舊家具、農具及房屋土地，已全部分配給貧下中農。

姚長慶（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姚文元家的堂匾】

受姚家殘害的茅龍泉同志的照片

茅龍泉同志的控訴

影印件原文

我是涓池公社下陳大隊貧農社員，今年六十一歲。一九四〇年，我給姚文元家做長工，講明工資一年六十元。一次挑重擔中，我腳被戳破，仍逼我下水幹活，弄得化膿潰爛。地主婆馮雅琴（姚文元祖母），看我不能幹活了，就誣我偷他家一百元錢，把我趕了出來。我回家後，腿越爛越嚴重，不能勞動，老婆和我離了婚，最後鋸掉了一條腿，成了終身殘疾。

茅龍泉（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

### 一、王洪文為自己大搞樹碑立傳活動

《材料之一》提供了王洪文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大量罪證。《材料之二》的這一部分，著重揭發了王洪文利用竊取的職權，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財物，生活腐朽糜爛的罪惡事實。這些材料證明，王洪文是一個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正在走的走資派，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王洪文墮落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雖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但參加革命以後，不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觀，資產階級思想不斷發展。現據廣大工農兵群眾特別是上海市工人群眾的揭發，王洪文在部隊就不是一個好戰士，復員後在工廠也不是一個好工人、不是一個好幹部。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當他同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勾結到一起之後，資產階級個人野心

惡性膨脹，終於走上了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王洪文為給自己樹碑立傳，把他在上棉十七廠的辦公室專門保留下來展覽，王秀珍多次帶領「小兄弟」們到這個辦公室，進行所謂「傳統教育」，培養對「四人幫」的感情。同時，他還親自策劃炮製了所謂《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長達三萬餘言，捏造事實，歪曲歷史，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領袖」。

#### 【王秀珍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為了給他自己樹碑立傳，他混進市革會以後，經常在我們面前吹噓自己所謂「造反史」，念念不忘他在十七棉的辦公室，他說：「這個辦公室是有意義的，要保留下來。」由於王洪文經常放毒，我對這個辦公室也有了反革命的感情。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這個辦公室的考慮，告訴了十七棉黨委負責人。他們照辦了，連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選民證和他用過的桌椅都照原樣保留著。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兩次帶領「小兄弟」去這個辦公室開會，以增強對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帶了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對黃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這幫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團，效忠王洪文，為王洪文爭氣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馬天水和我多關心新選進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給他們補上文化大革命這一課。當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個晚上，我借這個機會帶祝家耀、周宏寶、張國權、陳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去十七棉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紹了所謂王洪文的「造反史」。我還要他們不要忘記這些「歷史」，要為王洪文爭氣，為「四人幫」效忠。

十七棉為王洪文樹碑立傳在編寫大事記，我是積極支持的，交待他們要搞好。

王秀珍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 【高順興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為了篡黨奪權，親自策劃編寫了《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為自己樹碑立傳。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見廠黨委副書記董秋芳時，一再誇耀自己對十七廠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並說他「一有空就回憶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廠的文化大革命好好總結一下。」董回滬後，即將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廠黨委作了傳達。同年十二月，經王洪文同意，抽人著手編寫《大事記》。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來上海時，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審查。王看了以後，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一開始就說「我昨天一連看了二遍，很受教育。」接著他又提出：「《大事記》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現了近二百處卻一聲不響。還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衛科同廠黨委發生衝突「要詳細記載對今後是有好處的」。又說「十七廠奪權應比一月革命早。」要把十七廠奪權日期由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篡改為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廠是全國最早的奪權單位，拼命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奪權最早發起人製造「依據」。他還作賊心虛地交待：搞《大事記》的事「千萬不要傳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這個《大事記》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謂的「革命左派」、「優秀的共產黨員」，把他寫的大字報吹成是「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推動了十七廠「群眾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大事記》中說什麼「王洪文的一席話，使得同志們增強了鬥爭的信心，覺得眼前的道路又寬又亮了。」還說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紡廠一次，這個「三十廠的文化革命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等等。王洪文甚至編造了自己「為了迎接更大的鬥爭風暴，更加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一來，這個不學無術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變成了所謂的「工人領袖」。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王洪文一手策劃的

《大事記》也就成了他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證。

上海第十七棉紡廠高順興王樹理曾勇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王洪文保留展覽的在上棉十七廠的辦公室

王洪文授意炮製的《大事記》

## 二、王洪文大量貪汙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

王洪文利用竊取的職權，巧立名目，採取種種手段大量貪汙盜竊，揮霍國家財物，吃喝玩樂，生活腐朽糜爛，是一個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沈少良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見下頁）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王洪文到北京後，生活上已有補貼，但他還每年數次向上海大量要錢，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他還經常以試戴、試用、試看、試聽、試嘗等名義，巧取豪奪，無償地從上海竊取高級手錶、電視機、電影放映機、照相機、答錄機、收音機、打火機等新產品，以及大量名煙、名酒和其他高級食品。他要來的錢和物品，除供他本人窮奢極欲，揮霍享受以外，還用來大搞請客送禮，進行政治交易。

王洪文經常用請吃、請喝、看電影、送東西的手段，拉攏腐蝕幹部，特別是對上海來京的頭頭，都要設宴，大吃大喝，進行反黨宗派活動。一九七五年、七六年，在全國計畫會議召開前後，王洪文多次利用吃喝的時候，向他的心腹黃濤面授機宜，策劃黃在會上放炮、發難，向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猖狂進攻。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來北京，他立即要人用專車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談，這已成了慣例。對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經常用請客送禮等手段，進行陰謀活動。王洪文在住地請客，用的都是高級酒、菜、

煙、茶，但他感到還不闊氣，就到大飯店設宴招待，中國菜吃膩了，還要做外國菜。他這些小兄弟經常比誰被請的次數多，吃得高級，誰最受王的信任。可見吃吃喝喝已成了反黨分子王洪文和他的同黨衡量政治關係的標誌。

沈少良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注：沈少良同志，原王洪文的秘書。

### 【韓仁和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國家財物。在他竊據了領導職務後，串通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竊取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錶、石英電子手錶、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制，突擊一周，造出二十隻，王僅選去二隻，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五塊高級占（鑽）石牌雙日曆手錶，調動了七個工廠、一個商店的四十餘名技術人員，化費國家資金一萬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制杯蓋，化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制了兩套模具，這一項就耗費國家資金一千六百多元。

上海市輕工業局工作人員

韓仁和劉思仁吳行慎

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王洪文貪汙盜竊的在北京的部分高級用品和現金，

王愛清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王洪文不僅在政治上極端發動，生活上也是極端糜爛的。他一人在北京、上海就佔用了九輛汽車。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來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滿意，大發牢騷說：廚師不給好的，理髮椅子型號不對，枕頭不好，床單不好，檯燈不好，給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為了圖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給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是雞、鴨、魚、肉，還嫌不夠，又提出要吃燕窩。經常吃烤蛤蜊，有時還吃炸牛排、牛尾湯等法國名菜。他喝的是「茅臺」、「人參」、「三鞭」等名酒。他不讀書，不看報，經常要秘書廖祖康代他劃圈批文件，他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玩牌、下棋、釣魚、打獵、打鳥、看電影，為了打獵，甚至不參加會議，不接電話。他釣魚有時從早上四、五點鐘一直釣到九、十點鐘，從下午三點一直釣到晚上八、九點鐘。他用的釣魚杆，有的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釣餌還要放香油、茅臺酒。他以戰備為名，從部隊弄來吉普車，裝上專用燈光，經常深更半夜帶人驅車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還經常打野鴨子，要工作人員為他趕鴨子。他還經常在住地周圍打鳥玩。他共有獵槍、鳥槍十二支。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個小時，打撲克有時長達十幾小時。王洪文有時竟摔手錶玩，一邊摔一邊說什麼：反正戴手錶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去年，王洪文從國家體委要了一輛「佳娃」牌摩托車，一日數次騎著玩。王洪文這種糜爛透頂的生活，比大地主大資本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愛清

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注：王愛清同志，原王洪文的警衛。



### 【何關明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竄來上海三個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級別墅，整天過著花天酒地的資產階級生活。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餚，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干貝、海參、蛤蜊、鵝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貧下中農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鳳梨，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王洪文經常設宴請他的餘黨、親信吃喝，三個多月就請了二十多次。他以視察為名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事先派人安排吃喝，要人家準備名酒名菜，每到一處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幾乎整天吃喝玩樂，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動。一百多天之內，看了八十多部電影。他還常常硬拉著工作人員打撲克、下軍棋，玩通宵。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臺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裡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煽扇子。

他在上海三個半月，窮奢極欲揮霍，據不完全統計，就化了二萬餘元。真是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

上海市委招待處工作人員  
何關明 葛健 陳世章 朱友生 王鈺  
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 【王愛清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反黨分子王洪文在北京住的一所房子已經很好，但他不滿足，又到郊區霸佔了另一座樓房。他住了兩次，仍不滿意，又從軍隊要了一幢更好的房子，還要總參管理局給他擴建一個供他玩樂的「活動場所」。為了建造這個「活動場所」，花幾千元做了一個模型，他看後覺得燈光不新穎，要仿照上海友誼電影院裡的燈光。為此，專門派人到該電影院實地考察。王洪文的這幢房子在原來的基礎上改了一下，增加了一個「活動場所」，就花了幾十萬元。後來他又對室內的布置不滿意，要有關部門仿照某地休息室的地毯、沙發進行布置。有些工作人員看到王洪文的這幢房子說：「林彪過去造這樣的房子，現在王洪文也造這樣的房子。」王洪文聽到後惡狠狠地說：「這是右傾翻案風」。

王愛清 沈少良 賈德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注：賈德祥同志，原王洪文的司機。

王洪文打獵專用的吉普車、特製的聚光燈

王洪文在北京打獵用的槍支和子彈

王洪文騎著玩的進口摩托車

「四人幫」相互包庇，大量銷毀他們反動歷史材料，殘酷迫害知情人的罪證

#### 一、姚文元密藏有關張春橋和文靜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材料

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唯恐他們的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計地掩蓋他們的罪惡歷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利用他

們竊取的權力，與林彪、陳伯達、吳法憲、葉群一夥相勾結，派人查找有關他們歷史問題的材料，祕密轉移銷毀。他們還在上海、蘇州祕密組織人，偽裝紅衛兵，以「掃四舊」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繳、銷毀有關他們政治歷史問題的各種材料。對瞭解他們歷史情況的某些人，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私立專案，祕密逮捕，長期關押，殘酷迫害，殺人滅口。

金祖敏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從上海祕密送給姚文元四件材料，其中三件是一九五五、五六年上海市委組織部審查張春橋參加復興社問題和黨籍問題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反映文靜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材料。金祖敏給姚文元送材料的信說：「最近我們在考慮備戰工作清理資料和舊市委的審幹檔案中，發現中央有關同志的材料，清理同志清到即密封起來，準備送少庸同志，並略告了我一下，我感到這個材料不宜轉市其他同志，特與吳定君同志聯繫速轉給您，請您閱知。另外在我們組織組整理資料中也整理到一份文靜同志材料我想也轉給您為宜，至於這些材料沒有擴散過，從整理中，我們整理同志一發現即轉交給我。特一起送上請您閱。」姚文元拆閱了這些材料，不報告毛主席、黨中央，作賊心虛地批註：「內件未拆，不知內容，請報告春橋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規定處理。」實際上姚文元把這些材料密藏了達七年之久，一九七六年十月姚文元被隔離審查後，才從他的住地查出。這是「四人幫」互相包庇的一個鐵證。

## 二、張春橋勾結王洪文等人殘酷迫害揭發他歷史問題的革命群眾

### 【陳美痕等六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們在審查本校前黨委書記的政治歷史問題時，發現宋振鼎於一九三二年被捕叛變，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非法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宋親自介紹張春橋加入了這個組織。我們把這個問題寫了一個調查報告，上報中央文革和上海市委，結果材料落入張春橋的老婆、叛徒特務文靜之手。於是張春橋、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黑幹將，以「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炮打無

產階級司令部」等罪名，設立專案，進行變相抄家，大搞逼供信，大搞精神折磨和身心迫害，長達八年之久，有的被隔離或拘留，硬是要把我們打成「現行反革命」。更有甚者，他們懷著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罪惡目的，蠱惑人心地提出要搞出一條「黑線」，妄圖打倒中央領導同志，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  
陳美痕 徐嘉然 陳效宗  
嚴中 王奇峰 熊自強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 三、王洪文、張春橋收繳、密藏江青的歷史材料

#### 【廖祖康給王洪文的信】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

市專案辦三月二十六日來報告，請示如何處理工農兵印刷廠資本家胡伯洲處抄來的防擴散照片、畫報和一些其他照片、畫報等。這些東西，文化革命初期群眾抄家，市專案辦同志於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去拿來，照片三萬多張，畫報若干。

專案辦的報告已轉維國、少庸同志。

送來的照片、畫報已退游曾專案組史培元同志。史培元同志提出：這些東西擬暫放，有些東西可能還要清理一次，特別是對照片的底片和「反動照片」有好多「吃不准」，建議清檔組一起幫助清理，有些可能還有用處，這樣做，不知是否妥當？

廖祖康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

注：廖祖康，原王洪文秘書。

【王洪文密藏的有關江青歷史問題的部分材料】

【張春橋密藏的有關江青歷史問題的部分材料】

【張春橋一九六八年給江青的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您好。幾個月沒見了，很想念您。從報紙照片上看，你的身體好，才放心一些。

另外，從一個反革命家裡搜查到您的一張照片，還有一本反革命刊物，一併送上。

請您多多保重身體。

敬禮

春橋

四月一日

注：張春橋給江青的信，是從江青住地查出的。

#### 四、江青勾結林彪、葉群、吳法憲等查抄、銷毀有關她政治歷史的材料

【吳法憲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大約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個晚上，葉群突然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叫江騰蛟到北京來一趟，她有要事和江騰蛟談。要江騰蛟到達後直接去葉群家。

這次我沒有見江騰蛟也不知道葉群交代什麼事，江騰蛟接受任務後就回上海去了。

大約過了兩三天，江騰蛟乘夜航來到北京，住在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江騰蛟告訴我他到了北京，要我去空軍招待所見他一下。我當即到了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見了江騰蛟和張彪（當時空四軍政治部文化部長）兩人。江騰蛟告訴我，江青、葉群告訴他去組織上海空四軍的一些

幹部子弟充當紅衛兵查抄一些文藝黑幫的家，江騰蛟說，查抄了很多家，抄了一麻袋材料。江騰蛟打開給我看了一下，其中有書和筆記本子，照片，信的底稿，談話的記錄，但江騰蛟沒有給我看具體內容。不一會葉群進來了，江騰蛟又給葉群看了一下，葉群說：「不要看了，你交給我，我給她送去，江青正等著。」於是葉群就立即把材料拿走了。

吳法憲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 【張彪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文化革命初，一天下午，江騰蛟把我找去，對我說：吳司令（吳法憲）要找幾個人辦一件事。「上面」有人有一些材料散失在三十年代一些文藝界人的家裡，不能擴散出去，要組織人抄來，這件事一定要辦好。第二天，江召集我、龔著顯、劉世英、陶崇義等策劃，決定由我和劉世英等偵察住址，由龔著顯、陶崇義等組織人。幾天後在晚上，由江騰蛟負責，分五個小組，分別抄了一些人的家，後來把抄來的有關江青的文件、書信裝進一個麻袋，由江和我乘飛機送到北京，交給了葉群、吳法憲。一九六六年十月中下旬，組織一些人冒充紅衛兵到蘇州抄了一個人的家，將抄來的東西裝成一個小皮箱，由江騰蛟派人送到北京。一九六八年三月，我還夥同北京來的一個人在上海抄了秦桂貞的家。抄來的東西，當晚由北京來的人乘飛機帶回北京。

張彪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 【趙根生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林彪、葉群，指使他們在上海的死黨，組

織一些人，冒充紅衛兵，抄了一些三十年代文藝界人士的家，片紙不留。十一月初，葉群讓我把抄來的一大口袋文件、書信、筆記本、舊報紙雜誌、照片、劇照等，拿到他的辦公室，由她親自整理編目。葉群對這些東西很感興趣，對我說：「這些材料是很重要的，是江青同志交代要搞的，要密封放在最保險的地方。」六七年一月十日左右，葉群對我說：「你去把後院的火爐子捅開，要把那些材料銷毀，你先不要拆封。」過了一會，江青來了，葉群把她領到後院，由江青親自監督，把那些材料全部銷毀了。

趙根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趙根生同志，曾任林彪辦公室秘書。

### 【周金銘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江青為了掩蓋她的醜惡歷史，文化大革命以來，多次偷偷地銷毀她的歷史罪證。每次銷毀罪證材料時，都要把門緊緊關上，燒完了還要把紙灰搗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她抱著一堆材料，還有許多她自己保存的她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到十樓一個小房間去銷毀。她讓楊銀祿同志去拿火柴，並作賊心虛的對楊說：「這是一堆沒有用的東西，他們整我的黑材料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去吧，我自己燒！」江青關上門，燒了一個多小時，弄得滿屋子烏煙瘴氣。江青還經常對我們說：「有人整我的黑材料，誰也整不出個名堂來。」

江青自己保存五個保險櫃，保險櫃的鑰匙她自己隨身攜帶，從不離身，洗澡時都要帶到浴室。一九六七年以來，她清理了五次，每次清理時她自己都要銷毀一些材料。

周金銘 楊銀祿 劉玉庭 劉真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 【周淑英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大約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時，有一次江青發瘋似的大怒，說有人整她黑材料，並說已被她拿到手。她說：「誰想整我，什麼都別想抓住」。她把許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樓樓上的一個房間全部銷毀了。不許我們任何人進，燒的滿屋子都是煙。江青為了掩蓋其醜惡歷史，私自銷毀許多材料。

周淑英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周金銘、楊銀祿、劉玉庭、劉真、周淑英同志，原為江青處的工作人員。

### 五、江青查找審訊過她的國民黨特務趙耀珊（黑大漢）的下落，妄圖掩蓋她自首叛變的罪惡歷史

趙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審訊江青的中統特務，是江青自首叛變的重要人證。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饒漱石專案組查找趙耀珊的下落，妄圖掩蓋自己的罪惡歷史。

## 【原中央專案二辦饒漱石專案組給江青的報告】

影印件原文

關於黑大漢的情況，已查明：黑原名趙耀珊，又名趙立人、鄭玉龍、老韓、安徽人。一九三三年春任江蘇省委書記，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當即叛變，當了特務。解放後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被處決。檔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蘇北勞改農場。

與黑同時被捕的有省委交通葉蓁，又名李文碧、無錫阿妹，叛變後同趙同居。現住上海歐陽路一三一號。

饒漱石專案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



注：這是從江青住地查出的。

## 六、江青為掩蓋她的醜惡歷史，勾結林彪、陳伯達、葉群、張春橋等殘酷迫害知情人

### 【林立衡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問他在幹什麼？他開始不說，並叫我不跟他住在一起，江騰蛟就安排我在另一住處。後來我又再一次追問林立果在幹什麼，他向我吹噓說：江青、葉群給他一個「任務」，借「除四舊」、「查黑幫」，同江騰蛟的女兒、周建平的女兒等，抄三十年代跟江青在一起的一些人的家，把凡有文字的東西，全部搜集起來，裝了一麻袋。二月份，我回北京後，在毛家灣見葉群、林立果連夜清查麻袋裡的東西，聽見葉群說，江青這麼多化名，除了「藍蘋」這個名字外，不知哪些是有關她的，還是交給她去處理吧。

約於一九六七年，我聽葉群對林立果說：江青要逮捕孫維世，說這個人是「特務」。葉說江青要葉群派人到大慶去抓這個人，江對葉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葉群說孫維世是個老演員，知道江的老底。後來我曾問過葉，孫維世怎樣了？葉講「聽說死在監獄裡了。」江青殺人滅口、蛇蠍之心，何其毒也！

林立衡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

注：孫維世同志，女，原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副院長，一九六八年十月在被關押期間病故。

### 【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四年反黨分子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間，曾對我說過，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區接頭時被巡捕房扣留過，問我公安局有沒有她被捕的指紋檔案，要我查找送給她看。

一九六六年我還聽說，江青要警衛處處長王濟普同志去查過她過去在上海被捕的檔案材料，這是江青企圖銷毀她被捕叛變罪證。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問題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說我們搞了她的「黑材料」，夥同張春橋把我們逮捕關押，進行殘酷迫害，使王濟普同志致病身亡。

黃赤波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 【王濟普同志在被關押期間寫的一封信（節錄）】

影印件原文

有件事，我考慮了很久，沒有敢講出來，就是六六年的四五月間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檔案處查過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談了一下經過情況及大體時間，當時敵人是誤捕了人。

王濟普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注：王濟普同志信中說的「女客人」，即江青。

#### 【秦桂貞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抗戰前，我在上海給一個資本家當傭人，當時住在環龍路（現南昌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夏，江青（當時叫藍蘋）租了這個資本家的房子住，我服侍過她，和她熟悉，知道她的一些情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上海市革委會一個姓王的男同志對我講，北京首長叫你

去。北京首長，我就認識江青。我會燒菜，可能叫我幫她燒菜。我就對姓王的同志講，我回去和同事關照一下。當天晚上，把我送上飛機，大約半夜十二點左右到北京。他們把我接到航空招待所，天天送飯到房間給我吃，也沒有人來看我、問我。到了第五天的一個晚上，來了幾個穿軍裝的，他們自己介紹說，我叫葉群，我叫陳伯達，是江青委託來看你的。他們問我生活情況，認識那些人？和那些人有來往？第六天，進來三個解放軍，把我的語錄本和衣服都扔在地上，在語錄本裡夾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後來，他們又把我換了一個地方，我哭著吵鬧，要求回家，他們就打我，說我是特務、反革命、反黨分子。第二次提審我，是從我家拿去的照片，一張一張地問照片上的人都是誰？就是沒有看到我原來保存江青的照片。以後又用汽車把我送到很遠的郊區，關在監牢裡，用各種法西斯手段迫害我，弄得我一身病，失去了勞動力。就這樣，我莫名其妙地被江青關了七年，一九七五年釋放回上海。

秦桂貞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 【王育民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和葉群、戚本禹等人在京西賓館，布置我們四個人到上海調取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檔案材料，當時指定陳虹同志為組長，我為副組長。我們在上海接收檔案的過程中，市公安局管檔案的同志說，有一部分「通天」材料，讓我們最好也帶回北京。當時經請示，江青批准我們把材料全部帶回來。我們把材料運回北京後，江青要我們看看這部分材料是些什麼內容，並寫一報告。我們看了以後才知道，這是上海市公安局偵破一個案件的材料，內有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雜誌、報刊資料等。報告江青後，她說這些材料沒有保存的必要，可以寫個報告銷毀。我們根據江青說的內容，以陳虹和我二人的名義寫了一個報告，經過江青反復修改，上送批准以後，這些材料就全部銷毀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江青卻反咬一口，說我們搜集她的黑材料，搞她的黑專案，對我們搞逼供，把陳虹同志關進監獄六年多。江青之所以不擇手段地對我們進行迫害，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她三十年代的一點醜聞，欲置我們於死地。

王育民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王育民同志，現在天津市工作。

## 七、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及其黨羽收繳、銷毀叛徒特務姚蓬子的材料，包庇姚文元

### 1.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收繳總政保存的有關叛徒特務姚蓬子的材料

總政秘書處胡劍英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給江青寫信，說總政保存一包涉及叛徒特務姚蓬子的材料，並誣告李德生同志。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立即指派徐海濤、李漢榮把材料取走，交給了王洪文。他們作賊心虛，在取材料的收條上不敢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蓬子的名字，只寫「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取走了「一包材料」。

#### 【胡劍英給江青的信】

影印件原文

洪文、春橋同志：

請設法把這些材料取來。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

敬愛的江青同志：

您好！為了澈底揭開總政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查清十次路線鬥爭中的一切問題，揭露總政頭子罪行，我向您報告一件事。

我是總政秘書處保密員。曾在原軍委辦事組政工室管過文件。大約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由政工室的梁文魁同志交給我一包密封材料叫我保存，什麼內容沒告訴我。上面有宋奇光、黨作積、梁文魁三同志簽的名。一九六九年底，總政新組建時，這包材料同政工室的其他文件一起移存到了總政保密室。

一九七二年一月，為了揭發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澈底清查與林彪反黨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我曾向領導建議查閱這包材料，經請示李德生、田維新批准後，領導指定秘書處盧雲典、趙仲起同志和我三人啟封進行了查閱。內容是：軍委辦事組派宋奇光等三人調查瞭解李偉專案中涉及到姚文元同志父親姚蓬子的一些情況。查後，即向李德生、田維新寫了報告，並建議將材料上報中央。但一直未得到答覆。這包材料至今仍存在總政保密室。

從一些材料看，黃永勝有不少批示，幾次是直接批給葉群的，葉群看後又退給了黃永勝。我認為，這裡面黃吳葉李邱一定搞了鬼。而李德生、田維新又為什麼批准查閱不提出任何處理意見？是否將此事報告了中央也未得而知。

特此報告。並建議將材料直接上交中央。

致以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總政秘書處胡劍英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

【徐海濤、李漢榮從總政取走姚蓬子叛徒問題材料的收條】

影印件原文

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原軍委辦事組政工室宋奇光、黨作積，幹部室梁文魁三人密封了的一包材料，上繳中央。

移交人 胡劍英

接收人 徐海濤 李漢榮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徐海濤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給王洪文送姚蓬子叛徒問題材料的報告】  
影印件原文

洪文同志：

遵照你和春橋、江青同志的指示，昨晚我和李漢榮同志去總政將胡劍英同志保存的一包材料取回。同時取回了胡劍英同志關於經口頭請示李、田批准曾啟封這包材料的說明，以及李、田批准中央二辦查看這包材料啟封日期的批件。

現將以上材料送上。

徐海濤  
三月二十三日

注：徐海濤，總政保衛部原副部長，「四人幫」死黨。李漢榮，總政幹部部幹事。

2.張春橋和「四人幫」的黨羽在上海收繳、銷毀有關叛徒特務姚蓬子的  
罪行材料

【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給張春橋的信】  
影印件原文

何秀文同志存，勿擴散。

春橋  
十一月十日

春橋同志：

十一月九日靜安區公檢法軍管組，送來有關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兩本。現送上請查收。

致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馬天水等人一九七三年五月銷毀姚蓬子寫的交代材料的批件】

影印件原文

關於姚蓬子所寫材料如何處理的請示報告

市委：

最近，我室十四組在清理防擴散材料過程中，發現一份姚蓬子於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寫的材料。這份材料是這樣形成的：在六七年七、八月份，紅衛兵小將配合劉少文專案組調查劉少文歷史問題過程中，通過姚蓬子了介（解）劉少文的有關方面問題，做了筆錄，姚蓬子親手寫了這份材料（詳見附件）。現請示這份材料如何處理。

市革委會專案辦公室（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附：材料共十一頁。

天水、景賢、秀珍同志，此件擬銷毀，妥否？是否需報洪文同志並請閱示。

王少庸

五月十六日

注：上面兩件是從上海查出的。

【馬天水等人一九七四年七月  
大量銷毀姚蓬子的罪行材料銷毀材料的批件】

影印件原文

關於處理姚蓬子有關材料的請示報告

市委：

原上海師範學院姚蓬子專案組在結束專案審查時曾將姚蓬子的有關材料移交給我室文藝專案組（即當時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專案組），最近該組在全面清理專案材料時，對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處理，鑒於去年我室十四組清理出有關姚的材料已報請市委領導同志批示同意銷毀，因此對這批材料，我們意見也予以銷毀。

當否，請審批。

（附材料目錄一份）

市革委會專案辦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擬同意。請天水、秀珍同志閱批。

王少庸

七月二十八日

【銷毀材料的目錄（影印件原文見下頁）】

注：這是從上海查出的。

影印件原文

材料目錄：

編材料頁編材料頁



號提供人日期材料名稱數備注

- 1.姚蓬子1968.3.24.我所知道的叛徒
- 2.姚蓬子1968.3.26.有關王一知的一些問題
- 3.孔羅荪1967.12.25.有關姚蓬子38年後在漢口和重慶的情況
- 4.梅林1967.12.27.有關姚蓬子在漢口和重慶的情況
- 5.湯靜逸1968.1.12.有關姚蓬子和中統的關係問題
- 6.姚蓬子1967.12.29.有關三六年《扶輪日報》的一些資料（此系摘抄材料）
- 7.湯靜逸1967.11.6.關於姚蓬子叛充反動派文化特務情況（此材料抄於上海公安局檔案）
- 8.潘浙（潘眠石）1955.12.21.關於姚蓬子的情況（摘自公安局檔案處）
- 9.陳一安1968.1.16.關於姚蓬子、田漢、丁玲等的材料
- 10.陳一安1968.1.16.關於姚蓬子的情況（此系提審筆錄）
- 11.袁逸之1967.11.14.關於姚蓬子的情況
- 12.祝韻雅1968.1.27.關於姚蓬子的情況
- 13.李竹聲1968.2.14.關於姚蓬子的情況
- 14.關露1968.2.15.交代姚蓬子的情況
- 15.先大啟1968.2.10.關於姚蓬子的材料
- 16.魯迅論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摘抄材料）
- 17.余百魯1968.1.23.關於姚蓬子（摘抄餘百魯檔案材料）
- 18.蔡力行1968.1.22.關於姚蓬子的材料（摘自公安局檔案處）
- 19.顧玉良1968.1.2關於姚蓬子的材料
- 20.方秋葦1968.1.2.關於姚蓬子、袁孟超、卜道明等人的情況
- 21.馮乃超1968.1.3.關於姚蓬子的情況
- 22.周頌棣1967.12.21.關於姚蓬子的情況
- 23.賀繩寰扶輪日報概況（摘自南京市公安局檔案室）
- 24.蔡力行1967.12.11.自白書
- 25.蔡力行1967.12.11.關於姚蓬子的補充材料
- 26.瞿光熙1968.1.3.關於姚蓬子的材料
- 27.趙銘彝1967.12.29.叛徒姚蓬子材料

28.余百魯1967.8.26.姚蓬子丁玲、馮雪峰三人的關係

29.季蘇1967.8.16.關於姚蓬子、樓適夷等人的情況

30.華林1967.9.21.回憶在重慶時的文藝俱樂部

31.黃芝岡1967.11.9.關於抗戰文協和抗戰劇協

32.周修文1969.1.14.給上海師範學院年四旺兵團的信

注：以上材料除備註中注明系摘抄材料外其餘均系本人親筆交代材料。

中共中央辦公廳

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發出

##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節錄）（1977年7月17日通過）1977.7.17；中發[1977]21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致認為，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繼承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遺志，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和對他們採取的一系列果斷措施，是完全正確的。全會一致表示同意。

全會認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代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率領我們黨一舉粉碎了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消除了黨內一大禍害，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這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個偉大勝利，對於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增強團結，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

辟，建設社會主義，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是一個反革命的陰謀集團。他們根本反對「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進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就同林彪一夥勾結在一起，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黨的十大以來，王張江姚「四人幫」使用種種陰謀手法，猖狂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實現全面奪取黨政軍領導權、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他們利用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陰謀組織自己的「內閣」，妄圖打倒周恩來同志。他們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瘋狂打擊和誣陷鄧小平同志。他們對毛主席、黨中央先後確定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極端仇視，瘋狂反對，妄圖打倒華國鋒同志。他們大搞反黨亂軍的陰謀活動，私立祕密聯絡點，私整中央負責同志的黑「材料」，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和各種管道，煽風點火，大造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輿論。他們竭力破壞生產，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妄圖造成全國性的經濟癱瘓。他們推行「穩住上海，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反革命策略，妄圖把全國的局勢搞亂，以便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期間，他們喪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以後，「四人幫」以為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偽造毛主席指示，提出蠱惑人心的口號，進行一系列的罪惡活動，陰謀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實行反革命復辟，妄圖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使社會主義的中國重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在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的政變陰謀以後，他們密謀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武裝暴亂，也迅速遭到徹底的破產。

（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披著馬列主義的外

衣，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肆意篡改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篡改黨的基本路線。他們根本否定毛主席對我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蓄意顛倒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係，精心炮製出一個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全盤否定毛主席領導的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否定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否定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瘋狂地反軍亂軍，妄圖毀我長城。他們招降納叛，任人唯親，結幫營私，結幫篡黨，殘酷迫害革命的老幹部、中年幹部、青年幹部和革命群眾。他們肆意摧殘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發展資本主義，破壞社會主義。他們瘋狂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崇洋媚外，賣國投降，裡通外國。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唯物主義、辯證法，大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他們推行的路線，是一條極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中央對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政治歷史進行了認真的嚴肅的審查。根據王張江姚專案組調查核實的大量證據，現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張春橋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濟南就充當了國民黨特務，進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張春橋在上海繼續從事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抗日戰爭開始後，張春橋隱瞞了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分和反革命歷史，混入黨內。

江青一九三三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入獄不久，就自首叛變，成為可恥的叛徒。叛變出獄後，積極從事擁蔣活動，為國民黨效勞。一九三七年，她隱瞞了地主家庭出身，隱瞞了自首叛變的反革命歷史，重新混入黨內。

姚文元出身於地主兼資本家家庭，是罪行嚴重的叛徒特務姚蓬子的兒子，又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乾兒子。姚文元長期向黨隱瞞了他

的地主家庭出身和政治歷史問題，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竭力包庇叛徒特務姚蓬子，並且在政治上經濟上同姚蓬子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姚文元頑固地堅持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反黨反社會主義，是隱藏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王洪文同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瘋狂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罪惡活動。他利用職權，貪汙盜竊，侵吞國家財產，生活腐朽糜爛。他是一個罪惡累累的吸工人血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

「四人幫」為了掩蓋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互相勾結，利用竊取的權力，大量收繳、銷毀有關他們反革命歷史的罪證，殘酷迫害知情人，殺人滅口。

##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1977.9.23；中發〔1977〕37號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

現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發給你們。

《材料之三》的主題是，集中揭露「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和罪惡活動。這個材料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揭露「四人幫」炮製「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蓄意顛倒敵我關係，篡改毛主席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第二部分，選擇黨的十大前後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造謠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長期以來，「四

人幫」利用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和其他管道，肆意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散布大量的反動思想和反革命謠言，在思想上理論上造成極大的混亂。《材料之三》中彙集的「四人幫」的反革命謬論，是學習黨的十一大路線，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很好的反面教材。

根據中央的部署，十一個月來，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廣大群眾集中打了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第一個戰役，又打了揭批「四人幫」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惡歷史的第二個戰役，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在，應當以華國鋒同志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國共產黨章程和葉劍英同志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同志的閉幕詞為指導，結合傳達「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幫」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並且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進行批判。

各級黨委要在傳達、學習十一大檔的同時，做好《材料之三》的傳達和宣講工作。要認真地研究「四人幫」的反動思想，抓住「四人幫」炮製的反革命政治綱領，揭露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批判他們篡改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努力，密切聯繫實際，在各條戰線澈底肅清「四人幫」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和流毒，全面地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體系，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傳達的方法和步驟上，要聯繫《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的有關部分，宣講《材料之三》，要先訓練骨幹，學好十一大文件，做好宣講工作的理論思想準備。

本通知和《材料之三》的傳達範圍，與《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的傳達範圍相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 （材料之三）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9月

### 目錄

#### 第一部分 「四人幫」蓄意顛倒敵我關係，篡改毛主席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 一、「四人幫」炮製反革命政治綱領，妄圖打倒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

（一）張春橋鼓吹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謬論

（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鼓吹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謬論

##### 二、「四人幫」打著「反對走資派」的旗號，妄圖把專政機關的矛頭指向黨內

（一）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二）公安部尹肇之等同志的揭發

（三）「四人幫」指使其在公安部的黨羽把專政機關的矛頭指向黨內

（四）施義之在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議期間的反黨講話

（五）「四人幫」及其在公安部的黨羽背著華國鋒同志炮製的《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紀要（討論稿）》

（六）「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對中央和地方黨委負責同志搞反革命偵察

##### 三、「四人幫」煽動揪「軍內走資派」，反軍亂軍，妄圖毀我長城

（一）江青、王力、關鋒等人夥同林彪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

（二）江青組織「炮隊」，「放火燒荒」，反軍亂軍

（三）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軍亂軍的部分罪證材料

（四）徐海濤反軍亂軍的發言提綱

（五）陳亞丁大肆鼓吹寫揪「軍內走資派」的文藝作品

- (六) 徐景賢、王秀珍、丁盛鼓吹「軍內資產階級」的謬論
  - (七) 「四人幫」力圖把他們控制的民兵組織，變為所謂「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的工具
  - (八) 張鐵生污蔑人民解放軍的反動言論
- 四、「四人幫」操縱輿論工具，推行反革命的政治綱領，大肆煽動揪所謂「走資派」
- (一) 「四人幫」惡毒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
  - (二) 「四人幫」惡毒影射攻擊華主席
  - (三) 「四人幫」打擊、誣陷鄧小平同志
- 五、「四人幫」策劃炮製所謂「與走資派鬥爭」的文藝作品，醜化和攻擊黨的領導
- (一) 「四人幫」與其黨羽于會泳等人策劃炮製所謂「與走資派鬥爭」的文藝作品
  - (二) 「四人幫」炮製《反擊》等反動電影的有關材料
  - (三) 「四人幫」在「寫與走資派鬥爭」問題上大造反革命輿論
  - (四) 在「四人幫」寫「與走資派鬥爭」的反動號召下，全國出現了一大批《反擊》式的反動作品
- 六、「四人幫」力圖把他們控制的學校，變成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工具
- (一) 北京大學黨委的揭發
  - (二) 清華大學黨委的揭發
  - (三) 「四人幫」鼓吹把學校辦成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專業」
  - (四) 「四人幫」打著「開門辦學」等旗號，煽風點火，反黨亂軍
  - (五) 遲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教育部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反黨講話記錄（節錄）
- 七、「四人幫」煽動揪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所謂「走資派」，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
- (一) 王洪文在經濟建設部門煽動揪所謂「走資派」
  - (二)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反動日記



- (三)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指使其黨羽金祖敏收集黑「材料」，攻擊工業交通各部
  - (四) 江青指使謝靜宜、遲群收集整理外貿系統的「材料」，誣陷鄧小平同志和外貿部門
  - (五) 「四人幫」及其黨羽在七機部層層揪所謂「走資派」，篡奪各級領導權
  - (六) 「四人幫」及其黨羽在冶金部門層層揪所謂「走資派」，篡奪領導權
  - (七) 「四人幫」及其黨羽在鐵路部門層層揪所謂「還鄉團」、「走資派」，篡奪領導權
  - (八) 「四人幫」及其黨羽層層揪所謂「走資派」，嚴重破壞農業生產
  - (九) 「四人幫」及其黨羽在科技部門層層揪所謂「走資派」，嚴重破壞科技事業
- 八、「四人幫」妄圖篡改毛主席規定的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路線
- (一) 否定毛主席對我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反對「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下中農
  - (二) 反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
  - (三) 依靠新老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路線

## 第二部分 「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造謠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 一、對抗毛主席對王張江姚搞「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批評
  - (一) 毛主席對王、張、江、姚的批評
  - (二) 「四人幫」抗拒毛主席、黨中央批評的有關材料
- 二、對抗毛主席關於缺少文藝作品，應該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
  - (一) 毛主席關於缺少文藝作品，應該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
  - (二) 「四人幫」對抗毛主席批評的罪證
- 三、對抗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

- (一) 江青同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的來往電話記錄
- (二) 江青、姚文元在陳亞丁等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給江青信上的批語
- (三) 江青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給姚文元的電話記錄
- (四) 于會泳、浩亮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給江青的報告和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的批語
- (五)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談話記錄（節錄）
- (六)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藝界、新聞界部分人員的談話記錄（節錄）
- (七) 劉慶棠的揭發交代
- (八) 光明日報社的揭發

#### 四、攻擊毛主席肯定的電影《園丁之歌》，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 (一) 「四人幫」扼殺《園丁之歌》的罪證
- (二) 湖南省委的反擊和「四人幫」的陰謀活動
- (三) 「四人幫」的反撲
- (四) 張平化同志的揭發
- (五) 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黨委的揭發

#### 五、攻擊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公開放映的電影《海霞》

- (一) 于會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江青的電話記錄
- (二) 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于會泳的電話記錄
- (三) 于會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給江青的電話記錄（節錄）
- (四)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談話記錄（節錄）
- (五) 于會泳等人炮製的攻擊《海霞》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批註
- (六) 于會泳的交代

#### 六、蓄意歪曲毛主席對《水滸》的評論，大肆宣揚「宋江架空晁蓋」，污蔑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

- (一) 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關於評《水滸》的指示全文
- (二) 「四人幫」歪曲毛主席關於評《水滸》指示的有關材料

## 七、攻擊毛主席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

- (一) 新華社的揭發
- (二) 遲群、謝靜宜一九七六年五月在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習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 (三) 兩校「大批判組」編輯的《鄧小平言論摘編（初編）》（節錄）
- (四) 《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彙報提綱〉出籠的前前後後》（節錄）
- (五) 《文匯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發表的《兩個提綱一條黑線——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節錄）

## 八、攻擊毛主席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 (一)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 (二) 大寨大隊郭鳳蓮等同志的揭發
- (三)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馬天水等人的談話記錄（節錄）
- (四) 姚文元審定修改的梁效、任明的一篇反黨文章（節錄）
- (五) 姚文元在《論總綱》一文旁所作的反動批語
- (六) 上海機床廠董煥章等同志的揭發
- (七) 毛遠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談話記錄（節錄）
- (八) 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揭發
- (九) 上海鐵路局劉白濤同志的揭發

## 九、攻擊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華國鋒同志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報告

- (一) 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給《紅旗》雜誌社的電話記錄
- (二) 姚文元砍掉華國鋒同志報告的一九七五年《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目錄原稿〔略〕
- (三) 《紅旗》雜誌社林兆木的揭發
- (四) 姚文元刪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普及大寨縣》
- (五) 人民日報社李克林同志的揭發
- (六) 上海市農業局董家邦同志的揭發

(七) 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十、反對毛主席關於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船舶的指示

- (一) 關於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的問題
- (二) 「四人幫」污蔑買船是「假洋鬼子」
- (三) 關於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問題

十一、反對毛主席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號召，攻擊周恩來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 (一)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在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一文上所作的反動批註的影印件
- (二)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談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 (三) 《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 (四) 《文匯報》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 (五) 《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 (六) 廣播事業局的揭發
- (七) 「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攻擊「四個現代化」

十二、江青裡通外國，賣國求名

- (一) 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 (二) 新華社揭發姚文元利用職權掩蓋江青裡通外國的罪行
- (三) 原總參測繪局局長張清化的揭發交代
- (四) 江青出賣黨和國家重要機密，送給美國人維特克的軍事地圖等材料的影印件〔略〕
- (五) 國外出版發行的維特克寫的《江青》的影印件〔略〕

## 第一部分 「四人幫」蓄意顛倒敵我關係，篡改毛主席制定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我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從思想理論上來說，就是圍繞著堅持還是篡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展開的。這是這次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四人幫」全面篡改毛主席的偉大理論，篡改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篡改毛主席關於黨內走資派問題的完整論述。他們拋出「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誣衊在我們黨內軍內有「一個資產階級」，根本顛倒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係，妄圖打倒一大批黨政軍革命領導幹部，摧毀我們黨，摧毀我們的軍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華主席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準確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特別是精闢地論述了毛主席關於走資派問題的完整學說，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幫」在這些問題上製造和散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極右派的謬論。華主席在報告中指出：「『四人幫』在『走資派』問題上製造了這麼多荒謬理論，借這個題目進行了這麼多罪惡活動，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他們明目張膽地宣揚：『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勤勤懇懇，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汙腐化的走資派。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這夥新老反革命，對我們黨、對我們軍隊、對我國革命，充滿了刻骨的仇恨。他們喊出了被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動階級渴望報仇和復辟的心裡話。他們不但要向社會主義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們是地地道道的『還鄉團』。我們黨有一套從建黨時期到文化大革命的經過考驗的老中青幹部，我們黨有一支經過考驗的無產階級軍隊，這都是『四人幫』篡黨奪權不可逾越的障礙。『四人幫』要打倒我們黨、我們軍隊的這一套

幹部，就是妄圖摧毀我們黨，摧毀我們軍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張春橋所說的『改朝換代』，『總把新桃換舊符』，另立他們封資修大雜燴的『新天朝』。這是他們在『走資派』問題上一切謬論的要害所在。」

### 一、「四人幫」炮製反革命政治綱領，妄圖打倒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

「四人幫」炮製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從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四人幫」所謂的「革命」，就是復辟。他們反對的所謂「走資派」，就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他們憑藉竊據的權力，大肆鼓吹他們這個反革命政治綱領，並且把它推行到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經濟各個領域中去，專政機關要「鎮壓走資派」，軍隊「要揪軍內走資派」，文藝「要寫同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教育要辦「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專業」，各條戰線都要「層層揪走資派」。

「四人幫」的這個反革命政治綱領，是從林彪那裡揀來的破爛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參加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老幹部。「四人幫」繼承了林彪的衣鉢，打著反對「走資派」的旗號，搞陰謀，搞分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

#### （一）張春橋鼓吹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謬論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在一次會議上談話記錄（節錄）】

在我們黨內，首先在政治局內部有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

【張春橋的談話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春橋：

無革（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

現在的階級關係，對走資派要很好議一議，這一條不解決，要正確對待文革談不上。

顛覆政權的不是榮（毅仁），當然榮也想搞，但代表新老（資產階級）的是黨內走資派。

有一批人根本是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要求是懂得的。戰爭一結束，就帶來利益，再前進就不行了。

我們黨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等認識統一了，就結束了；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快二十八年，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十二省的會。找第一書記來，都是合他（注：指鄧小平同志）胃口的。

當前，上海生產要搞好，要警惕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燃料，他沒有道理麼，我看有人搞鬼，還求人家要，對外國資（產階級）這麼迎合。國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中國資（產階級）軟弱。這些人就是資（產階級）。

商業部是壟斷資（產階級），連自由資（產階級）都不如。

注：張春橋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北京同黃濤作了兩次密談。這是徐景賢聽黃濤傳達張春橋談話時的記錄。

#### 影印件原文

張春橋蓄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拋出了「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反革命理論。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張春橋在釣魚臺和上海市委常委黃濤作了兩次密談，黃濤返回上海後，向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作了傳達。張春橋說：「對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戰爭結束後，給他們帶來了利益，對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著幹的……當社會主義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他們就站在對立面去了。」張春橋又說：「現在的階級關係，對走資派要很好議一議，這一條不解決，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就談不上。」張春橋還胡說什麼「我們黨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等認識統一了，就結束了；現在搞社會主

義革命，快二十八年了，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許多人的認識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

一九七六年二月，馬天水、我、王秀珍、黃濤、李彬山去北京參加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又多次竄到京西賓館馬天水套間大肆放毒，散布「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謬論。二月十九日晚，張春橋把大批老幹部都說成是比老資產階級還厲害的走資派。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張春橋又進一步把大批老幹部都說成是「敵人」，他提醒我們要團結對「敵」，還特意引了柳宗元的話「敵存滅禍，敵去招過」來啟發我們，這就是要我們把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老幹部當作「敵人」加以打倒。早在七五年十二月，張春橋就向肖木面授了柳宗元的這兩句話，要肖木打電話告訴上海寫作組的朱永嘉，按這個精神「搞階級鬥爭」。後來，張春橋又在朱永嘉給他的一封信上作了黑批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在黨內，在中央。」「在中央」三個字下面劃了兩條粗線。七六年二月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更是多次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央領導同志是什麼「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找到釣魚臺，他又一次地指名攻擊中央和軍隊的領導同志，並污蔑先來開會的五個省的第一書記「看來都難以轉彎子」。他陰險地說：「我最近在讀《阿Q正傳》，看到小D和阿Q打架，鬧派性，他們還不知道是走資派趙太爺在挑動。有些地方兩派至今鬧得很厲害，就是因為背後有走資派。」張春橋這是煽動「層層揪」走資派，猖狂地反對毛主席親自批准的華國鋒同志在中央打招呼會議上的重要講話。

張春橋拋出「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反革命理論後，一再下令要在理論戰線和文藝戰線全面推行。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張春橋又在釣魚臺向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作布置：回上海後立即召開一個理論工作座談會。張春橋親自規定了討論題目：「究竟什麼叫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怎麼限制法？」張還指定參加會議的要包括「理論隊伍，文藝創作人員、報紙編輯記者。工農兵理論骨幹



等」，並說「他們要寫東西，要早作準備」。他下令要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他說，「文藝創作寫社會主義革命要寫得更深一點，實際鬥爭和理論上都很深了。」張春橋還說，「寫不出是因為自己對資本主義道路有點想，對資產階級法權感到舒服。」那就是說，你不去寫所謂的走資派，你自己就是走資派。後來，張春橋在北京又接見了上海市寫作組的一個領導，密令要組織上海的作者到其他省去體驗生活，寫大走資派。

我回上海以後，立即和馬天水、王秀珍、朱永嘉等商量，在七六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召開了有幾百人參加的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我在會上大肆傳播張春橋的黑話，鼓吹要描寫各種各樣的走資派，我當場把文教系統一位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老幹部說成不是叛徒特務、不搞貪汙腐化的有個性的「走資派」。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我還在上海市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作了「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事先送給張春橋審閱並得到了他的批准。我在講話中提出了三個問題：為什麼自稱「老革命」的人，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會變成走資派呢？造成這種變化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麼呢？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這種階級關係的變化呢？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的反動理論。在「四人幫」和我的控制下，上海的宣傳文教陣地毒草叢生，報紙、刊物、出版物、文藝創作中大量充斥著所謂的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和文章，矛頭直指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同志。我犯了為王、張、江、姚「穩住上海，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陰謀忠實效勞，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的嚴重罪行，我完全認罪服罪。

徐景賢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 【馬天水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張春橋把我和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臺，對我們說，回去以後先組織理論隊伍骨幹學習，要討論所謂民主派如何變成

走資派的。回到上海後，我先召開市委常委會進行了傳達，根據張春橋的黑旨意，經過我和徐、王策劃，把市委常委會引向主要討論民主派如何變成走資派的問題。同時，徐景賢布置朱永嘉組織了一二百人的理論骨幹學習討論所謂民主派如何變成走資派的，從政治上、經濟上、歷史上各個方面討論了民主派如何變成走資派的所謂論據，流毒甚廣。接著我們又把市委常委會上的一套搬到了區縣局幹部會議上，進一步煽動大批所謂民主派變走資派問題，我還按著四人幫的腔調在會上胡說過鄧小平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有一股復辟勢力，主要是在上層。徐景賢散布民主派變走資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王秀珍散布鄧小平是還鄉團總團長，還有一些分團長。接著四月二日在市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我和徐、王策劃組織大會發言，其中主要內容是徐景賢講的民主派如何變成走資派的。這次大會完全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周總理和華國鋒同志。妄圖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領導同志。

馬天水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

### 【朱永嘉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一九七六年二月初，張春橋下達黑批示，說：「要注意出修正主義，特別是中央出修正主義」，張春橋的這一反革命黑批示，矛頭完全是對著華主席的，是與他二月三日的反革命黑文相呼應的，接著張春橋又給我們下達反革命的黑批示，要我們去抓反映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文藝作品，妄圖借此來打倒中央與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志，接著他又下令召開全市性的理論工作座談會，討論黨內資產階級什麼時候成為主要矛盾，民主派怎麼變成走資派，接著又要肖木給我們帶信，說他正在看魯迅的小說風波，說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現在都還在活動著，他想到阿Q和小D，不應該互相揪住對方的小辮子，而應該去揪趙七爺的大辮子，應該去揪張勳的大辮子，根據他的反革命黑指示，我們立即炮製了一篇

反革命的黑文，題目叫做《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在全市掀起了一股揪辮子風，在報刊上真是黑浪陣陣，張春橋看了還不滿足，認為問題的根子在於那個被廢棄了的皇帝和社會制度，矛頭完全對準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張春橋這麼接二連三緊鑼密鼓的給我們下達那麼多的反革命黑批示，始終圍繞著一個中心，那就是「四人幫」要篡黨奪權，一個反革命目標，那就是「四人幫」要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志。

（二）《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發表了《革命與資本——讀〈汪精衛賣國記〉有感》，署名戚承樓。這是張春橋授意炮製的一篇反革命文章。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間，肖木打電話來說，張春橋找他談了一次話，說他讀了《學習與批判》連載的《汪精衛賣國記》上、中、下三篇以後，感到把汪精衛一開始就說成是投降賣國的，這樣一部歷史就無法理解了，汪精衛還是有一段革命的前半生，正因為他有資本，才能賣國。他這一番話的反革命目的，是利用汪精衛賣國這個問題，把矛頭對著我們廣大的革命老幹部，對著我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志，是為了進一步論證民主派到走資派的必然規律，而且不僅是走資派，還可能是投降派，我們就是根據張春橋這個反革命意圖炮製的這一篇反革命黑文。

朱永嘉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注：朱永嘉，原上海市委列席常委，寫作組負責人。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在朱永嘉的一封信上的批語】

影印件原文

初看了一下（注：指一九七六年《學習與批判》第三期根據張春橋授意寫的《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一文），總根子是辮帥這一點似乎還可以考慮。辮子黨

的頭子應是那個被廢除了的皇帝吧？應是整個舊制度吧？

三月十三日

(二)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鼓吹的「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謬論

【江青的一次講話（節錄）】

老幹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記】

現在對無產階級專政真正危險的，不是這些人（注：指黃維等），而是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

【原王洪文處工作人員肖木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陰謀家、野心家王洪文，為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一直處心積慮地妄圖打倒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老同志。從批林批孔開始，就一直在我面前宣揚：現在講革命經驗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過去那些東西（指民主革命）有什麼用！一九七五年底、七六年初他又說：井岡山傳統過時了，民主革命那一套吃不開了。現在到處有走資派，走資派就是復辟派，這些人還不就是當時的那些民主派，等等。我由於站在「四人幫」立場上，接受了他這個反動觀點，因此，在七六年五月中旬回上海時，在一次業餘作者座談會上鼓吹過這個反動觀點。

肖木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毛遠新一九七六年六月初的反黨講話】

毛遠新在講話中所說的國務院六月份要召開的會議，就是《材料之一》上講到的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四人幫」陰謀利用這次會議，打

倒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篡黨奪權。

【下面是毛遠新親自修改的他的講話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國務院六月份要召開的經濟工作方面的會議上，想發動各省、市攻一下。我們也要做點系統的準備。當然，涉及到中央各部的問題，要注意口徑，涉及到部長這些人不一定點名字，但是非要說清楚，不能客氣。

通過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資產階級在那裡，就在共產黨內。鬥爭方向明瞭，應該敢碰了。黨內資產階級掌權，怎麼能行呢！

最大的障礙是在老爺那裡，一類老爺國家，（二）老爺省，三老爺市，障礙就在這裡。

【遲群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關於「從民主派到走資派」這一公式和「從民主派到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規律。」這樣的公式和內容是從「四人幫」那裡來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毛遠新都說過，時間大體是在七六年三、四月間。

我曾宣揚過這一反動觀點。

遲群

七七年六月五日

【下面是遲群宣揚「民主派」必然發展到「走資派」的兩次講話記錄和清華大學畢秋生等同志的揭發】

（甲）遲群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教育部

臨時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節錄）

還有一個所謂經驗問題。老幹部、老知識份子，特別強調經驗。但是，是什麼經驗，要作階級分析。他們的經驗就是復辟倒退的經驗。退一步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對現在沒什麼現實（意義），還給自己貼一點金。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那一套經驗不行了！

(乙) 遲群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在清華大學  
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任何經驗都有社(會性)、實踐性,我們要的經驗是社(會主)義革命經驗、文革經驗、與走資派鬥爭的經驗。他可以大講萬里長征、抗戰、打蔣家王朝,他在某種意義上為走資派抹金,把民主派當成社(會主)義英雄。他們這些民主派在社(會主)義成了走資派,也是規律。

(丙) 清華大學畢秋生等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以來,遲群多次講,「鄧小平這個還鄉團團長被揪出來了,還有副團長、政委、參謀長、團員呢!」「還有穿軍裝、戴帽徽、領章的走資派」,「是中央一級的大官,現在還在臺上掌握一部分權力,裝模作樣」,「揪出他們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走資派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層人」。

畢秋生 吳曉平 劉淑敏

楊廣義 董群 朱慶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

## 二、「四人幫」打著「反對走資派」的旗號,妄圖把專政機關的矛頭指向黨內

「四人幫」及其在公安機關的黨羽,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竭力推行他們反革命的政治綱領,提出「對走資派實行專政」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反動實質,就是要把專政機關的矛頭指向黨內,把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幹部污蔑為「走資派」,對他們實行法西斯專政。「四人幫」及其在公安部的黨羽,妄圖通過一九七六年六月的全國公安局長會議,把這個反革命的政治綱領推行全國。華國鋒同志當時就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加以堅決的制止,挫敗了「四人幫」的陰謀。

### （一）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四人幫」蓄意歪曲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論斷，顛倒敵我關係，倒轉專政矛頭。他們叫嚷：「反革命殺幾個人、放幾把火，沒有什麼了不起」，「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走資派」，力圖把公安機關專政矛頭指向黨內。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華國鋒同志指示這次會議是要議一下打擊現行反革命的問題。而施義之、祝家耀卻秉承「四人幫」的旨意篡改會議方向，把專政矛頭指向黨內，說什麼公安工作到了一個「轉捩點」，「要轉好思想彎子，適應新的形勢」。他們精心炮製了一個《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紀要（討論稿）》，大肆誣蔑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走資派」，胡說什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總是同黨內走資派的復辟倒退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公安機關「特別要警惕黨內的資產階級、還在走的走資派」，要「重視深挖後臺」。施義之還一再出題目強要到會同志討論「對走資派怎樣實行專政」、「怎樣偵察」，等等，並且向到會的省公安局長追問：「你們那裡有幾個走資派？」他們陰謀的實質是要把公安工作這把刀子殺向黨內，把專政的矛頭指向黨中央和各級黨委。華國鋒同志及時察覺了他們的詭計，並且根據毛主席關於走資派問題的論述，明確指出，只有少數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才屬於敵我矛盾，多數是願意改正錯誤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專政機關把矛頭指向走資派，就是把矛頭指向黨內。華國鋒同志堅決不准搞這樣的會議紀要，挫敗了「四人幫」的陰謀。

這次會議以後，施義之、祝家耀等人公然對抗、嚴密封鎖華國鋒同志的指示，不向核心小組傳達，並利用一切機會繼續販賣他們的黑貨。特別是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後，他們緊密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步伐，又是辦理論學習班，又是組織人寫文章，還企圖在《內部參考》上發表，繼續大肆鼓吹「走資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公然散布張春橋、江青的黑話，說什麼「現在主要是國內有出現吳三桂的危險」，叫囂「誰篡改或者違背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誰就是我們的死敵」，影射攻擊華國鋒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毛遠新在遼寧的親信、爪牙，還組成公安、

組織等部門的聯合辦公室，到處搜集所謂黨內敵情，居心十分險惡。

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

## （二）公安部尹肇之等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施義之、祝家耀秉承「四人幫」的旨意，一九七六年六月炮製《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紀要》，陰謀把專政矛頭指向黨內，受到了華國鋒同志的嚴厲批評，並不准他們印發這個《紀要》。但施義之、祝家耀封鎖華國鋒同志對他們的批評，打著學習理論，探討公安工作新課題的幌子，繼續販賣「四人幫」的黑貨。一九七六年七月，施義之、祝家耀強令參加公安部機關第一期讀書班的同志，按照《紀要》的精神，寫了一篇題為《公安機關必須同黨內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文章，讓在全部工作人員大會上宣講。之後，施義之還打算把這篇文章送新華社，在《內部參考》上發表。八月十九日，施義之又跑到中央政法幹校，親自組織寫作班子，寫一篇關於資產階級在黨內，公安機關怎麼辦的輔導報告的詳細提綱。他說：《紀要》雖然沒有發，你們可以找來參考。限你們十天時間，不吃飯，不睡覺也要完成任務。還說這個搞好了，就是最大的業務等等。這說明施義之、祝家耀蓄意對抗華國鋒同志的指示，倒轉專政矛頭，妄圖把公安機關變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

尹肇之 曹妙慧 朱國玉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

## （三）「四人幫」指使其在公安部的黨羽把專政機關的矛頭指向黨內

【祝家耀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對我說：「社會上的反革命殺



幾個人放幾把火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在談到天安門事件時，王洪文又對我說：「天安門事件是走資派挑起來的，走資派是主要危險。」我完全是按照「四人幫」的反革命意圖做的，去年六月公安局長座談會時，我和施義之、張其瑞背著華主席炮製了一個公安局長座談會記（紀）要，把打擊走資派作為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如寫進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總是同黨內走資派的復辟倒退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要重視挖他們的後臺。」目的就是妄圖改變專政性質，倒轉專政矛頭，把專政機關這把刀子砍向黨內，為「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效勞。

祝家耀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注：施義之，原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祝家耀、張其瑞，原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 （四）施義之在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議期間的反黨講話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華國鋒同志指示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研究打擊現行反革命的問題。但是，施義之、祝家耀秉承「四人幫」的旨意，篡改會議方向，把會議引向討論「對走資派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下面是施義之的反黨講話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召集人會議：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於前門飯店晚7·5.355（房間）

施義之同志指示：

各組討論的問題：

（1）研究敵人活動特點規律，就得研究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2）為什麼黨內資產階級和反革命聯繫起來。

(3) 敵人製造散布謠言，在社會上有市場，在內部市場多為什麼？研究下謠言的欺騙性。

(4) 公安機關如何適應當前鬥爭形勢。

A、鬥爭的對象、任務變了，鬥爭的矛頭應對準誰。

B、鬥爭的形勢、鬥爭的手段有那些變化。

C、同黨內資產階級作鬥（爭）靠什麼，對走資派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D、鬥爭的政策問題，二類矛盾，錯綜複雜。

E、公安機關對敵鬥爭，如何加強隊伍建設。

(5) 資產階級在黨內，公安機關如何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

#### (五) 「四人幫」及其在公安部的黨羽背著華國鋒同志炮製的《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紀要（討論稿）》

這個紀要，是「四人幫」妄圖對中央領導同志，對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的一個鐵證。文中所說「最近查獲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是指對「四人幫」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

這個紀要，受到華國鋒同志的嚴肅批評和堅決制止，沒有發出。

【下面是《紀要》的原文（節錄）】

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深入，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黨內走資派已成為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階級，成為整個資產階級的主體和核心，成為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因此，國內外的階級敵人越來越把復辟的希望寄託在黨內走資派身上。我們公安機關要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不僅要注意社會上老的階級敵人，而且更要看到新產生的反革命分子，特別要警惕黨內的資產階級、還在走的走資派。這就要求我們公安機關在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時，注意他們同黨內走資派之間的聯繫，重視深挖他們的後臺，發現重要線索，及時報告黨委。對走資派的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打擊。

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總是同黨內走資派的復辟倒退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個特點越來越明顯地顯露出來。

據各地統計，在最近查獲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中，新產生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黨團員、幹部、職工以及幹部子女占很大比重。這些人中，有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當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他們興高采烈，認為只要鄧小平上臺，就有「出頭之日」。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就兔死狐悲，拚命反抗。

這些新產生的反革命分子，十分仇視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狂熱追求資本主義復辟，兼有新老資產階級的反動、沒落、腐朽的特徵，具有極大的瘋狂性和破壞性。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六）「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對中央和地方黨委負責同志搞反革命偵察

##### 【遼寧省委的揭發】

去年六月，毛遠新從北京傳來黑話說：「鄧納吉在黨內是有市場的，在高級幹部中有相當的市場」，「現在出來鬧的都是小嘍羅，大人物不好輕易說話，不說話不等於沒有話」等等。毛遠新在省委內的同夥，立即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大肆鼓噪。

李伯秋說：「現在革命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又在黨內，民兵工作的任務轉變也就在這裡」，「我們的民兵工作現在不做好，等到大難、國難臨頭，那就來不及了」。他還指令在公安部門的親信研究「對黨內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問題。

毛主席逝世後，他們又組織公安部門和組織部門合開「兩長會議」，專門布置向所謂的黨內資產階級作鬥爭，特別強調要監視各級黨委主要負責同志的動向。李伯秋說：「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是看出了黨內、黨外都存在著階級敵人」，要「瞪大眼睛，特別注視黨內資產階級」。尤其嚴重的是，毛遠新、尹燦貞、黃吉忠等人竟敢不顧黨紀國

法，對省委領導同志甚至對中央政治局同志動用偵察手段。

中共遼寧省委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

注：李伯秋，原遼寧省委書記。尹燦貞，原遼寧省委常委。黃吉忠，原遼寧省公安局副局長。

### 三、「四人幫」煽動揪「軍內走資派」，反軍亂軍，妄圖毀我長城

「四人幫」反軍亂軍，由來已久。現在查明，「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口號，就是一九六七年江青、王力、關鋒等人夥同林彪炮製出來的，當時就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在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出於篡黨篡軍的需要，又炮製了「軍內資產階級」的反動謬論，竭力在軍內推行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到處「放火燒荒」，煽動揪「軍內走資派」，妄圖打倒葉劍英副主席和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軍隊領導同志，篡奪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權。現在，真相已經大白，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貫反軍亂軍，妄圖毀我長城的總後台，不是別人，正是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

（一）江青、王力、關鋒等人夥同林彪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夥同林彪反黨集團炮製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提出了「澈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煽動反軍亂軍。

【下面是江青、林彪一夥炮製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材料（節錄）】

影印件原文

林總：

江青同志囑速送你批示！

胡癡

一月十日

全軍文革小組並

林副主席：完全同意

一，對軍隊高級領導機關、軍隊院校和文藝團體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進行指導。當前，要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澈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陰謀詭計，熱情地堅定地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

請予批示！

關鋒 王力

唐平鑄 胡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二）江青組織「炮隊」，「放火燒荒」，反軍亂軍

【蘇延勳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江青把遲群、謝靜宜和我找去說：「我這個人愛放炮，是個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彈，又有炮隊，現在就把你們當炮彈放出去，去放炮。」她派謝、遲和我，分別到軍委總部、海軍、陸××軍防化連和空軍「點火放炮」。江青派我們去「點火放炮」是有計劃有預謀的。當年除夕，謝、遲和我分別從陸××軍、空××師回來向她彙報情況時，她見面第一句話是：「炮隊回來了。林彪有艦隊，我有炮隊」。她舉起酒杯說：「為我們鬥爭的勝利乾杯！」她的所謂「鬥爭」，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鬥爭，是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蘇延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蘇延勳，原軍委空軍副處長。

### 【江青指使其黨羽陳亞丁「點火」、「奪權」】

陳亞丁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在駐京部隊文藝單位一些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江青同志指示叫我「點火」，「奪權」，「管全軍文化工作」。我現在既沒有職務，也沒有個組織，我現在是孤軍作戰。想了很久，只好找幾個我比較熟悉、比較瞭解的同志來談一談。我不敢找組織，不敢找部長們，因為陣線還不清，找錯了門不好辦，再說也不瞭解情況。我今天請同志們來就為一個目的——點火。

江青同志讓我奪權，讓我把全軍文化工作的權奪回來，我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支持。你們這些同志我比較熟悉、瞭解，我現在是一個人，連個助手也沒有，所以就將你們幾位請來了。

我衷心希望江青同志不僅管軍隊文化工作，而且希望她也管軍隊其他工作。

江青同志要我回到總政就是要放火燒荒，今天叫你們來就是叫你們回去放火。

注：陳亞丁，原總政文化部副部長。

### （三）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軍亂軍的部分罪證材料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下午

在總參×部彙報時的講話記錄（節錄）】

總參的問題要解決一下，××部、×部、××局的問題，剛才×××同志不是講盤根錯節嘛，這話講得對，你們研究一下，繼續發動群眾，把蓋子揭開，揭總參領導的問題。

還要繼續克服右傾思想，發動群眾揭，要把上邊的蓋子揭開，有困難，但不是那麼大。這次我們要下個決心，一定要揭開，揭不開就砸，砸不開就用炸彈炸。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在總參作戰部彙報時的講話記錄（節錄）】

如果蘇修、美帝真的打來，我懷疑作戰部會有「維持會」。真的打起仗來，總參會有維持會長、副會長，一套班子都齊全。

【王洪文、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

對總政黨委的談話記錄（節錄）】

張春橋：你越辯解，對你越不利。證明你還沒有轉彎子，你的思想感情沒有變化。這個樣子，保衛部不就變成翻案部了?!你們這一套，沒有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就開不成這個會，出不了這個文件，不信把文件拿到清華去，讓他們評論。好像總政是桃花源，右傾翻案風就刮不進來，就是刮進來也刮不到你保衛部?!

你說沒有追查的謠言只有兩份，我那裡那一份算不算？（×：不算。）你們對謠言從未向我報告，只送了空軍的一件，你們批了不傳、不信，但不要追。我收到後就感到奇怪。這個問題到了總政，保衛部就可以寫這樣的報告，總政的幾位領導同志就可以畫圈。這就是你們相信了這個謠言。

王洪文：說穿了，問題不在直政部，問題在總政某些領導同志，包括你×××自己，去年就曾煽風點火，如說什麼「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這種煽風點火，下面才敢這樣幹。在總政出現這種事，並不感到奇怪，在去年這種政治氣候下面。總政黨委裡面有沒有人傳過政治謠言。解放軍報班子裡就是傳謠言的窩子。

張春橋：我覺得總政現在那麼被動，推都推不動。我還不承認我打招呼晚，我打招呼比那個單位都早，我說總政如果不轉彎，影響全軍，有一天中央要用總政，用不上。

【張春橋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在總後彙報時的講話記錄（節錄）】

總後已經癱瘓了，我看癱瘓得越澈底越好。不要怕派性。打內戰也可以，有些問題要靠打內戰才能解決。

【總政的揭發】

「四人幫」及其親信張秋橋，製造軍事博物館《歷史綜合館》事件，妄圖打擊、誣陷葉劍英副主席和鄧小平同志，打倒一大批軍隊領導

幹部。

《歷史綜合館》，於一九七一年十月經葉副主席批准進行準備。一九七五年十月，在葉副主席主持下，經軍委常委討論，同意預展計畫，隨後開始內部預展。一九七六年二月間，軍博群工組幹事白世藻到《人民日報》社，誣告《歷史綜合館》「緊密配合了右傾翻案風」，「樹了鄧小平」，「不適當的突出了葉帥」，等等。「四人幫」的黨羽魯瑛如獲至寶，便根據白的誣告材料，編發《人民日報》《情況彙編清樣》送姚文元，姚唯恐陰謀敗露，對《清樣》中公開攻擊葉副主席和軍委徐、聶副主席的地方作了刪改，同時在另一處居心險惡地把「老幹部」三字改為「不想搞社會主義的人」。然後，姚文元於三月一日批發《人民日報》《情況彙編》特刊第二三四期，張春橋於二日即將其批發給總政：「請將情況查明告我」，四日又下達了三條黑命令：第一，立即閉館；第二，原封不動；第三，儘快查明。

張秋橋在負責調查《歷史綜合館》時，按照「四人幫」的黑旨意，歪曲事實，硬說「這個展覽突出了鄧小平，太過了」，「責任應該總政負」，「主要問題在指導思想」等等。他公然把軍委和總政十一位領導同志在審查該館時談的意見和原始記錄搜去，把參加審查的一些領導同志的簽到名單抄走，一併報告了張春橋。張春橋接到《調查報告》後，為等待時機拋出這顆反革命「炮彈」，批：「存總政」。張秋橋心領神會，責令把「所有綜合館調查材料保存好」，揚言「將來運動深入以後還會弄這個問題」。九月初，當軍博領導提出對該館作部分修改後繼續開館時，張秋橋說：「不要太著急，應著重看綜合館問題和缺點有多大」。總之，張秋橋及其主子「四人幫」必欲置葉副主席、軍委和總部領導同志於死地而後快。

總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注：張秋橋，原總政宣傳部副部長。



### 【海軍政治部的揭發】

「四人幫」及其黨羽遲群、謝靜宜打著「開門辦學」的旗號，反黨亂軍。一九七五年二月，北大到海軍來舉辦「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班」。學習班開始前，兩校大批判組就插了手，密謀策劃要寫「列寧後七年反復辟的經驗」的小冊子，並說這是「中央定的」，作為「重點文章來抓」。這本以和工農兵合編為名，實際上由他們一手炮製的小冊子《堅持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蓄意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鼓吹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鼓吹要「識破那些戴著紅領章，要抓槍桿子的陰謀家」，還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被法國地主資產階級還鄉團在德國首相俾斯麥的支持下殘酷絞殺的」等惡毒語言，影射攻擊敬愛的周總理，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遲群、謝靜宜還在清華指派專人與海軍一些人祕密串連，吹風交底，非法搜集、整理矛頭指向毛主席、華主席、葉副主席和鄧小平同志的黑材料。一九七六年二月，他們搜集了海軍主要領導同志傳達、貫徹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和關於調整黨的文藝政策指示精神的談話記錄，以兩校大批判組的名義，炮製了一篇《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文章，經張春橋、姚文元親筆修改後，發表於三月六日《人民日報》。這篇黑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對毛主席一九七五年關於文藝問題的一系列指示進行了猖狂攻擊，對鄧小平同志以及海軍主要領導同志進行了誣陷、打擊。

海軍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 【空軍政治部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後，「四人幫」加速了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採取極其詭密和卑劣的手段，搜集材料誣陷葉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其他領導同志。八月十八日王洪文祕密接見了馬寧等，二十日馬寧背著空軍黨委常委，把葉副主席、鄧小平同志等中央

軍委領導同志對空軍的指示、講話材料，密送給了王洪文。尤其不可容忍的是，在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逝世、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極其悲痛的治喪期間，馬寧在九月十四日為毛主席守靈時，毛遠新和馬寧單獨串連密談，十七日又一次守靈時，馬寧把葉副主席、鄧小平同志等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對空軍的指示、講話記錄，交謝靜宜帶給了毛遠新。這是「四人幫」反黨亂軍，妄圖打倒葉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其他領導同志的一件嚴重罪行。

空軍政治部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馬寧，原軍委空軍司令員。

### 【王秀珍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我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去北京，在王洪文處住了四天。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王洪文向我談了全國批林批孔的形勢，談了軍隊的問題，散布了很多亂軍的謬論。王洪文對我說：總的全國批林批孔形勢很好。談到軍隊問題時，他說：第九、十次路線鬥爭沒有解決問題，第九次路線鬥爭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翻案，十次路線鬥爭是蓋子沒有揭開。特別是總政、總參、總後、裝甲兵、炮司，主要是這些單位蓋子沒有揭開。總部（總政、總參、總後）多次運動蓋子沒有揭開。如總參，人換了路線沒有換，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變。

「四人幫」抓不到軍隊，就抓「第二武裝」。王洪文多次攻擊軍隊不可靠，路線不端正。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市委手裡。民兵指揮部這個班子要配備好，要把總工會常委多派進去，他叫我們配備人。

「十大」以後，王洪文對我們說：我要搞全國民兵總司令部，我親自抓，把周宏寶調全國民兵總司令部，打起仗來依靠民兵。

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召集市民兵指揮部頭頭開黑會，進行路線交底，他反革命叫囂說：誰要一個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再把民兵拉起來。黑會散了以後，王洪文問馬天水，倉庫裡還有多少武器沒有下發？馬天水告訴他一個數字，他還問馬天水武器在那個倉庫裡放著？馬天水說：在井（警）備區倉庫，王洪文說：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裡，放在軍隊倉庫裡不放心，要下發到民兵手裡，打起仗來民兵手裡有武器等等。他還說：準備上山打遊擊。在毛主席病重期間，馬天水告訴我，王洪文打電話給他，急催發槍。後來，市民兵指揮部寫了發槍的報告給市委，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

#### （四）徐海濤反軍亂軍的發言提綱

【徐海濤一九七六年二月寫的發言提綱】

影印件原文

- 一、打開缺口，落實政策，「舉逸民」，翻掉文化大革命的案，批派性，打掉無產階級的新生事物，為「舉逸民」開路。
- 二、公開舉起杏黃旗，聚集復辟勢力。
- 三、用隱蔽鬥爭配合，制造反革命政治謠言
- 四、整頓

注：徐海濤，原總政保衛部副部長，「四人幫」死黨。

#### 【總政的揭發】

徐海濤在「四人幫」的直接指揮下，明目張膽地猖狂攻擊毛主席、黨中央。一九七六年二月，他親筆寫了一個所謂「發言提綱」，把矛頭指向一九七五年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提綱的第一條是攻擊落實黨的政策和反對批資產階級派性。惡毒誣蔑落實黨的政策是搞「一風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搞「還鄉團」，「舉

逸民」；攻擊批資產階級派性是「打掉無產階級新生事物，為『舉逸民』開路」。提綱的第二條是攻擊黨的組織路線。他胡說「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拼湊資產階級司令部」，「公開舉起杏黃旗，聚集復辟勢力」，攻擊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任命的軍隊各大單位領導班子，誣衊「軍隊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提綱的第三條是妄圖把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揭露和批評當作謠言追查，他還暗中插手追查，指使地下戰鬥隊骨幹採取秘密調查，栽贓誣陷，查上線挖後臺，妄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提綱的第四條是攻擊毛主席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指示，攻擊葉副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事實證明，徐海濤的這個提綱，是「四人幫」直接指揮下炮製的一個反黨亂軍的行動綱領，是「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鐵證。

總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 （五）陳亞丁大肆鼓吹寫揪「軍內走資派」的文藝作品

【陳亞丁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全軍

基層文化工作湛江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掌握住社會主義時期階級特點，這特點就是走資派在黨內，在軍內。因此，寫好同走資派的鬥爭，這當然是文藝創作上的新的課題。

【陳亞丁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解放軍文藝》社

召開的學習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不要以為寫穿軍裝的走資派，就是給部隊抹黑。這不要緊。我們搞《千秋大業》時有嘀咕，現在看來深度不夠。

尤其要向上海學習。上海這方面比較敏感，顧慮也較少，敢於支持正確的東西。

【陳亞丁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全軍

參加全國曲藝調演領隊會議上的一次講話記錄（節錄）】

關鍵是兩個問題沒解决好，一個是軍隊特殊論，這個問題創作人員

和領導幹部中都有，什麼軍隊教育和地方不一樣，什麼軍隊寫這方面的作品會不會把部隊搞亂了，什麼走資派穿著軍裝、戴著紅領章、紅五星行不行……還有很多呢，軍隊是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反潮流不好反，一句話，軍隊特殊論。因此，地方上寫這類作品行，我們軍隊寫這類作品從地方上找個對立面可以，而從部隊內部找對立面就顧慮重重，問題很多，這必須通過學習主席指示加以很好解決，從根本上講，軍隊沒有任何特殊。階級鬥爭軍隊就特殊嗎？誰也不能說軍隊沒有階級鬥爭，軍內沒有走資派嗎？確實有幾個走資派在那擺著，都是大傢伙。有什麼特殊？既然有，因此在文藝上反映這種鬥爭也沒有什麼特殊，在鬥爭的具體方法上有些特殊，而沒有本質上的特殊。不駁倒軍隊特殊論，我們這個創作就搞不起來。

#### （六）徐景賢、王秀珍、丁盛鼓吹「軍內資產階級」的謬論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人幫」的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指使他們的親信，在上海警備區某部某連，不顧幹部戰士的反對，強行布置討論「軍內資產階級」問題。會後，他們炮製了《×連理論討論會情況報告》，上報下發。八月十三日，南京軍區原司令員丁盛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竄到這個連隊講話，鼓吹「軍內資產階級」的謬論。

【下面是徐景賢、王秀珍、丁盛的講話記錄（節錄）】

景賢：辯論軍隊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資產階級，有沒有走資派，有三種不同的看法。開始，有的領導不同意，說他們頭腦發熱。我看，他們是考慮問題很深，不是頭腦發熱。

丁司令講：就這個問題開展討論，我們有許多單位不敢，還怕。

景賢講：有些同志提出軍隊三有怎麼辦？怎麼辦，鬥嘛！

我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是必要的。不讓討論就不行了。

王秀珍：對資產階級在黨內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實踐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軍區開會，我講了，鄧小平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階級，是一條路線，要批深批透是要費力氣的。資產階級在哪裡？走資

派還在走。這個我們是一樣的適用。為什麼軍隊沒有資產階級？

景賢：我贊成把黨內資產階級的討論更深一步，你們討論這個問題，具有極大的尖銳性。這個問題是頭腦清醒提出來的，不是頭腦發熱提出來的。

丁司令講話旗幟鮮明，帶頭講路線鬥爭。

#### （七）「四人幫」力圖把他們控制的民兵組織，變為所謂「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的工具

【「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民兵指揮部於一九七六年  
炮製的對民兵的「宣傳教育」材料（節錄）】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於黨內走資派比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危險得多，所以我們民兵的主攻方向應該革黨內走資派的命，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規律所決定的。

把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民兵繼續革命的重要任務，不停頓地進行戰鬥。

要搞清楚民兵與黨內資產階級鬥，既要認真對付他們搞「和平演變」，又要隨時準備粉碎他們的武裝暴亂。

#### （八）張鐵生污蔑人民解放軍的反動言論

【張鐵生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  
在瀋陽軍區某部二營的講話記錄（節錄）】

黨內資產階級、軍內的資產階級是一個當今世界上、社會上最腐朽的一個階級，最墮落的一個階級，最反動的一個階級。

黨內的資產階級呀，在部隊尤其厲害。

資產階級司令部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咱部隊是什麼態度？也去執行嘛，如果抵制的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跟著走、順著幹的話性質就變了，雇傭軍或者是一個御用軍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 四、「四人幫」操縱輿論工具，推行反革命的政治綱領，大肆煽動揪所謂「走資派」

「四人幫」操縱原北京兩校大批判組、原上海市委寫作組，連篇累牘地炮製反動文章，宣揚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綱領，並且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大肆叫囂「走資派」是「一層人」，鼓吹要層層揪「走資派」。「四人幫」一貫在報刊上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妄圖奪周恩來總理的權，組織他們自己的「內閣」。他們瘋狂地攻擊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同志，千方百計地要把華國鋒同志搞下臺，要把葉劍英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搞下臺。瘋狂地攻擊和誣陷鄧小平同志，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 （一）「四人幫」惡毒影射攻擊周恩來總理

【江青鼓吹揪「現代大儒」，影射攻擊周總理

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一次「批林批孔」會議上的  
講話記錄（節錄）】

現在文章很少提到現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們提出一篇。現在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不提。以前的不提無神論，唯物論，現在的不提現在的儒。難道我們現在沒有儒了嗎？沒有，為什麼反孔老二？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蔣介石是總代表。

【「四人幫」大批「宰相」，攻擊周總理

（甲）朱永嘉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批林批孔一開始，「四人幫」就認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時機到了，一齊瘋狂地跳出來向黨進攻，他們第一個就是反對和陷害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刮起批宰相的陰風。七三年八月間，姚文無從北京打電話給我，說×××批孔的文章馬上就要發表了，你們批孔的文章準備得怎麼樣，這樣我們就根據他布置的意思趕寫了二篇文章，一篇是《論尊儒反法》，

一篇是《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鬥爭》，他還不滿足，七四年一月間，姚文元又親自趕來上海，當面給我們布置反革命任務，他說：「關於呂不韋的問題，江青說那篇文章不錯，主要是提出呂不韋的問題。（也就是批了宰相，江青的矛頭是對著敬愛的周總理的）把這個案顛倒過來了，那一段歷史可以細緻的研究一下，《呂氏春秋》的核心是儒家。」還說：「《呂氏春秋》尊儒反法，時代特點要點出來，今天文匯報一篇短文是講了階級關係不同，地主階級力量大了，你們一篇早一點改出來」，姚文元要我們搞《呂氏春秋》就是為了根據江青的反革命意圖，繼續反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姚文元當時看到我們有一點害怕的樣子，他說：「怕什麼，社會主義允許犯錯誤，不會垮，垮了也沒什麼嘛，物質不滅。」姚文元那個反革命氣焰就是那樣囂張，為了篡黨奪權那個反革命目的，為了反對和陷害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四人幫」是不顧一切的。姚文元回到北京後，還一次又一次的來催《呂氏春秋》的文章，他還說：「這是一篇政治文章」。在七四年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這篇《評『呂氏春秋』》的黑文，同時發表的還有梁效的《孔丘其人》。這些反革命的毒草文章，掀起了批宰相的反革命陰風。在這個問題上，我完全充當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輿論工具。

朱永嘉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 （乙）新華社的揭發

「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班子（即「羅思鼎」）在《紅旗》上發表的《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藉口批宰相李斯「容忍趙高的陰謀」，惡毒影射攻擊敬愛的周總理。姚文元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指令新華社通知全國報紙轉載這篇反動文章。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四人幫」控制的《紅旗》，發表大量反動文章，攻擊周總理】

紅旗雜誌社的揭發

黨的十大以後，紅旗雜誌在「四人幫」的控制下，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動文章，惡毒攻擊周總理。例如，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紅旗》發表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一文，是「四人幫」直接布置原上海市委寫作組精心炮製的。這篇文章借古諷今，大批呂不韋的「折衷主義」。江青大加讚賞說：「這篇文章好處，是批呂不韋，呂是個宰相。」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紅旗》發表的《孔丘其人》，是江青出題目由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炮製的黑文章。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親自將該文送給姚文元，姚文元看後立即複江青：「看了一遍，覺得寫得較生動，可以用」。文章以批林為名，但通篇不講林彪如何尊孔，卻用許多現代語言描述孔丘的言行，影射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紅旗》發表的《讀〈鹽鐵論〉》是兩校大批判組炮製，由姚文元親自審定的。姚文元秉承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旨意，在修改這篇文章時，親筆加上「他們極力吹捧『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利議》）」。

紅旗雜誌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四人幫」控制的《光明日報》、《文匯報》，  
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攻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

（甲）光明日報社的揭發

在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後一個多月，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寫的小評論《孔丘之憂》。文章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影射攻擊周總理，並且大批「憂」字，把悼念周總理的全國人民污蔑為「哭喪婦」。文中寫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

借批唯生產力論、階級鬥爭熄滅論、洋奴哲學為名，大批四個現代化，攻擊周總理。如《光明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梁效」寫的《經濟建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讀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四月二十一日刊登「金風」（即上海市委寫作組）寫的《澈底批判鄧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學》，八月二十六日頭版頭條刊登「梁效」寫的《抓住路線問題深入批鄧》，都有借批唯生產力論，而大批四個現代化的內容，惡毒地攻擊周總理、鄧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光明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 （乙）文匯報社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幫」及其在上海餘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要「追風源」的反革命喧囂聲中，《文匯報》在三月五日發表新華社的一篇新聞稿時，明目張膽地把周總理為雷鋒同志的光輝題詞砍掉。接著，又在三月二十五日第一版的新聞報導中，悍然拋出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反動語句，瘋狂地攻擊周總理、鄧小平同志，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各地發來的大量抗議信、電，嚴正要求；「文匯報必須向全國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鬥爭鋒芒直指「四人幫」。馬天水等人慌了手腳，急忙電告王洪文、張春橋，乞討指令，密謀對策。「四人幫」變本加厲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反撲。張春橋氣勢洶洶地責問：「為什麼唯獨查文匯報?！」王洪文惡毒地叫囂：「刪掉總理題詞算個屁事！」姚文元無恥地狡辯：「編輯不刪稿子，那就不要辦報了！」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在王、張、姚的直接授意下，召開緊急會議，統一口徑，向全市宣布了顛倒黑白的所謂「市委意見」，胡說什麼：「現在有人利用《文匯報》的報導大做文章」，「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嚴重政治事件。」四月一日，徐景賢、朱永嘉等又專門竄到《文匯

報》「代表市委」表示「慰問」，「致敬」，大肆吹噓報社「又經受了兩條路線鬥爭風浪的考驗」。他們指令報社要把群眾的抗議信、抗議電全部集中起來，轉給「四人幫」，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和迫害。

文匯報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審定的《孔丘其人》的反動文章】

批語影印件原文

江青批語：

請春橋同志提出意見退我。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拂曉

張春橋批語：

這篇文章，比現有的文章通俗，可以發表。

春橋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江青批語：

請文元同志提出意見退我。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姚文元批語：

江青同志：看了一遍，覺得寫得較生動，可以用。一些細節，可以由編輯部去查對校核。此文「紅旗」收到後也已同時送我。如同意這樣

處理，請退我辦。

姚文元

三月二十六日

編輯組同志：

請你們核讀一道，可安排本期用。若有修改處可商作者後告我。我留下一份再看一道。

姚文元

二十七／六（二十七／三）

【「四人幫」控制的宣傳工具發表的  
大量攻擊周總理的部分反動文章的影印件〔略〕】

（二）「四人幫」惡毒影射攻擊華主席

【「四人幫」炮製《再論孔丘其人》，攻擊華主席】

（甲）人民日報社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通過，任命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總理。三天以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四人幫」的旨意，炮製了《再論孔丘其人》，惡毒地攻擊華國鋒同志。這篇反革命黑文，是同張春橋陰謀篡黨奪權的自供狀《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緊密配合的。

這篇文章原稿寫道，孔丘五十六歲由司寇代理宰相，管理司法公安工作。稿子送給姚文元後，姚文元怕露出馬腳，打電話給魯瑛，叫他暫時不要聯繫。二月二十四日見報時，把露骨攻擊的話改得比較隱晦了。

人民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

（乙）《再論孔丘其人》一文的影印件〔略〕

（丙）《再論孔丘其人》初稿原件的部分段落

影印件原文

孔丘利用陰謀手段，混上了魯國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長官），不久又升為司空（負責建設、規劃等事務），接著調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後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職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復辟的地盤了。

（丁）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給魯瑛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最近看的東西太多。

《再論孔丘其人》，你們自己可以定。

劃出的地方，我看了一下。

聯繫當前鬥爭，有的可以聯繫；有的聯繫勉強。要實事求是，不要勉強，如司寇宰相，是公安部長，容易給外國記者造謠、污蔑弄到材料：暫時不要聯繫的，不必聯繫。

【「四人幫」及其黨羽炮製《堅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

《「克己復禮」再批判》等反動文章，攻擊華主席】

光明日報社的揭發

一九七五年八月間，華國鋒同志在有關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要搞急了的指示。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光明日報》一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寫的《堅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一文，借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攻擊華國鋒同志。文章說什麼：「有人名為共產黨員，卻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毫無熱情，對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的事情深為反感。」還說，這種人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辯護士」，是「資產階級老爺的挑戰」，「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恥背叛。」惡毒地影射攻擊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梁效」寫的《「克己復禮」再批判》，借批孔丘，惡毒攻擊華國鋒同志。文章用孔

老二先後做過中都宰（相當於地方長官）、司空、司寇（相當於公安部長）和攝相（相當於代總理）的一段經歷，影射攻擊華國鋒同志，說什麼「孔老二繼續大搞『克己』，靠這種政治騙術，終於蒙蔽了季氏，當上了魯國的中都宰，三、四年間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後並擔任了三個月攝相的職務。三、四年的時間不算長，三個月的時間就更短了，但是這對復辟派的孔老二來說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一上臺，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復辟的希望變成復辟的行動，大搞『複禮』了。一時妖霧重來，謠言四起，把魯國搞得亂七八糟。」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光明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

### 【「四人幫」利用抗震救災，貶低和攻擊華主席】

#### 新華社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唐山發生強烈地震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派出了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央慰問團，奔赴災區，親切慰問災區人民。華國鋒同志不辭辛勞，不避艱險，深入群眾，把毛主席、黨中央的親切關懷送到災區人民心坎上。「四人幫」對華國鋒同志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的光輝形像，怕得要死，千方百計地限制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央慰問團活動的公開、內參和圖片報導。

唐山抗震救災報導開始後，姚文元多次給新華社電話，設下重重關卡，不讓充份報導華國鋒同志的慰問活動。八月二日，姚來電話：「關於慰問團的活動，內參要選登有參考價值的。抗震救災照片搞黑白片就可以了，不要搞彩色的。抗震救災的報導發稿時間要拉開些，太集中了不好。」八月六日，新華社赴唐山記者組發回第一篇關於中央慰問團的通訊《親切的關懷，巨大的鼓舞》。姚文元看清樣後惡狠狠地說：「昨天講了山東抗震救災稿隔天再發，今天又送來了慰問團、解放軍兩篇。你們要通盤計畫，不要太集中。全國還有其他的大事，學習、批鄧、抓

革命、促生產等。慰問團的這次發了就差不多了，以後主要是實際行動。」在姚文元的黑指令下，許多反映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央慰問團的活動的報導和照片，就此不能在報上同群眾見面了。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四人幫》授意《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攻擊華主席】

《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

發表的關於抗震救災的社論（節錄）】

影印件原文

解放以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也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激烈的時候。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妄圖利用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時的困難，扭轉革命方向，復辟資本主義。

【上海《學習與批判》發表《山崩地裂視若等閒》的反動文章，

攻擊華主席 原上海市委寫作組副組長王知常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九期發表《山崩地裂視若等閒》一文，署名欣啟明。文中如「每當出現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候，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就總要跳出來造謠惑眾，散布悲觀情緒，宣傳開歷史的倒車，妄圖取消革命，復辟資本主義」，等等，是《紅旗》胡錫濤布置《愈經磨煉，意志愈堅》一文時傳達的姚文元在編前會議上的講話。此文是把矛頭對準華國鋒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

王知常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姚文元在電視報導中竭力貶低華主席】

### 廣播事業局的揭發

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後，多次陪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會見外賓。會見前，華國鋒同志在毛主席住處門口迎接外賓；會見結束後，華國鋒同志送走外賓。按照慣例，這些活動都要編入電視片。可是，姚文元審片時，卻下令刪去華國鋒同志在門口迎接外賓的鏡頭，蓄意貶低華主席。

一九七六年八月，姚文元在審看華國鋒同志率領慰問團慰問唐山、天津等地震災區的電視片時，藉口「不要暴露災情」，砍掉了華主席許多感人的鏡頭。

廣播事業局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 【「四人幫」炮製《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攻擊華主席】

#### 光明日報社的揭發

王張江姚「四人幫」在毛主席逝世以後，加緊了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偽造了「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並通過他們所控制的輿論工具，加以大肆宣揚。

十月二日，華國鋒同志在一個檔上的批示，戳穿了「四人幫」的偽造。他們一方面由張春橋出面，阻止下達華國鋒同志的批示，說什麼「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另一方面，「四人幫」及其親信於十月四日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拋出「梁效」寫的反黨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是他們加快步伐、妄圖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信號。文章瘋狂叫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一切修正主義路線頭子要篡改這一既定方針，必然要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閹割它的革命靈魂，磨滅它的革命鋒芒。」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



場的。」

光明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四人幫」及其黨羽魯瑛、遲群炮製的  
《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勇往直前》反黨文章】

人民日報社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四人幫」在《光明日報》拋出梁效的反黨黑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與此同時，「四人幫」以及魯瑛、遲群還炮製了另一篇題為《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勇往直前》的黑文，後改題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狠鬥走資派》，準備在十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由於「四人幫」的垮臺，未及出籠。這篇黑文比《光明日報》那篇黑文更為狡詐、毒辣。文章別有用心地提出所謂「鄧小平一類走資派」的問題，叫嚷要「警惕走資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要始終把眼睛盯著走資派」，「決不能稍微鬆懈我們的鬥志，讓走資派像惡狼一樣，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反撲過來」。矛頭直接指向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人民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

下面是準備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發表的反動文章初稿〔照片略〕

【「四人幫」大肆鼓吹層層揪「代理人」，

把矛頭指向華主席、葉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新華社的揭發

「四人幫」利用新華社製造輿論，肆意攻擊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同志。一九七六年一月底，「四人幫」在遼寧的親信在一次會上首先發難，藉口批判來自上邊的「奇談怪論」，把攻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和國

務院的一些領導同志和國務院一些部委。一九七六年二月初，姚文元親自審發了新華社關於這次會議的兩篇內參稿件。稿件中，公然點了華國鋒同志和葉劍英同志的名字。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姚文元審改了《清華大學黨委在鬥爭中加強黨的建設》。這篇稿子是遲群、謝靜宜授意寫成的。寫稿過程中，遲、謝幾次找記者談話，提出要「搞一篇對全域有指導性的東西」，說什麼「有一層人勢力很頑固」，要特別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一級盯一級」。「一級一級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稿中按照「四人幫」的要求，特別強調：要警惕走資派篡奪「各級」領導權，提出「哪裡出修正主義，哪裡有走資派，就要在哪裡鬥爭」，「誰搞修正主義，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造誰的反」。稿中還特別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姚文元又加了一段話：「提高警惕，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三）「四人幫」打擊誣陷鄧小平同志

#### 【江青造謠污蔑鄧小平同志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  
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據說去年查謠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還擴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我今天說的不僅是這個，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所以我說他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叫他漢奸，正確不正確？我們的主席還在保著他啊，我說話是我個人的意見。

#### 【張春橋攻擊污蔑鄧小平同志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給他兒子毛弟的信（節錄）】

### 影印件原文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

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們也不要吹出去）

####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黨羽劉湘屏攻擊誣陷鄧小平同志】

##### （甲）衛生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晚，王洪文向劉湘屏授意說：「鄧小平現在又搞翻案了」，「改不了啦」。劉湘屏緊密配合，對鄧小平同志進行誣陷和誹謗。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前後，劉湘屏就一再叫嚷鄧小平同志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要「批倒鬥臭」。當群眾對此提出意見時，劉湘屏仍頑固堅持，並連叫三聲「就是死不悔改！」

一九七六年六月，劉湘屏誣衊鄧小平同志為「鄧納吉」，還叫嚷「應開除他的黨籍」。公然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

劉湘屏給鄧小平同志橫加罪名，捏造鄧小平同志要赤腳醫生「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動文痞姚文元看到劉湘屏捏造的謠言，如獲至寶。親自在一份材料上批：「穿資本主義的鞋，走修正主義的路。此種急於翻案而語無倫次的語言是復辟派的一大特色。」並在署名「苗雨」，題為《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的一篇黑文裡廣為宣傳，流毒甚廣。

中共衛生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

注：劉湘屏，原衛生部部長。

##### （乙）姚文元在衛生部一個文件上的批語

##### 批語影印件原文

送「紅旗」閱。此件有一些材料，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竟鼓吹要赤腳

醫生「穿布鞋」「穿皮鞋」。即穿資本主義的鞋，走修正主義的路。此種急於翻案而語無倫次的語言是復辟派的一大特色。姚文元6/3

【「四人幫」與其在人民日報的黨羽密謀

發表文章、編造材料，攻擊誣陷鄧小平同志】

下面是姚文元給魯瑛的電話記錄（節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晚十二時三十分）（我們又寫了一篇通訊，講鄧是中國的那（納）吉—魯）當然，說鄧是那（納）吉沒有什麼問題，但講到匈牙利事件時，要注意到當時赫魯曉夫是插手的，出動了坦克。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晚十一時十分）匈牙利事件，你們可以搞個小資料——那（納）吉是個什麼人。

搞好後送我看看。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十分）匈牙利事件，你們可以編個內部資料。

匈牙利的納吉這篇資料，春橋、江青同志提了些意見，修改後再送我看。

【姚文元及其黨羽炮製反動文章，造謠攻擊鄧小平同志】

（甲）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給魯瑛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梁效寫的《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總的意見要簡要。從政治上說，是明擺著的。要作階級分析。組織上都在查。怎麼聯繫不亦（宜）寫的很具體。根子在鄧，鄧代表他們的利益。

這篇文章，講清根子在鄧，教育群眾認清這點，就行啦。從去年七八九以來的謠言，有些就是從鄧那來的，集中批鄧。主題要突出，題目要短。

你們劃線的地方也推敲一下。說他是這個反革命輿論製造公司的總經理，是可以的。

（乙）「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的

《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的反動文章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署名梁效的文章：《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這篇文章是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社寫作組同梁效合夥寫的，題目是根據姚文元「黨內確實有個資產階級」的黑批示定的。姚文元對稿件作了精心修改，並親筆加上了鄧小平「就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誣陷鄧小平同志。

下面是姚文元對這篇文章的修改稿的影印件〔略〕

## 五、「四人幫」策劃炮製所謂「與走資派鬥爭」的文藝作品，醜化和攻擊黨的領導

「四人幫」在文藝界推行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綱領，提出要「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他們所需要的「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文藝作品，就是歪曲和篡改黨的歷史，醜化革命領導幹部，醜化黨，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反革命輿論的毒草，就是像反動電影《反擊》那麼一類東西。拿他們搞的這些東西同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右派炮製的那些反黨貨色比一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四人幫」在文藝界推行他們這條反革命的政治綱領，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一)「四人幫」與其黨羽于會泳等人策劃炮製所謂「與走資派鬥爭」的文藝作品

于會泳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份，有一天晚上，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江青把我和浩亮、劉慶棠找到了釣魚臺十七樓會議廳開會。張春橋也在場。江青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說：「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對你們說一下。現在那幾個樣板團裡演的那些戲，都是些老掉牙了的，很少有社會主義時期的內容，特別是一個也沒有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戲。這怎麼行?!現在我就給你們這個重要任務：你們趕快布置給幾個京劇團把電影《春苗》、《第二個春天》、《戰船臺》改編為京劇。這個事，我和春橋已經商量過了。這些都是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戲，能和當前的鬥爭緊密配合。今年就拿出來上演，紀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我們答應後，曾提出搞成京劇恐怕今年來不及。江青馬上打斷說：「把別的戲放一放嘛！這是重點。」又說：「這很容易嘛，有現成的電影，也不是創作新的戲。」張春橋說：「要理解這個任務的重要性。看來『五·一六』是來不及了。可在『八·八』或者『八·一八』上演。國慶日也可以嘛！但最遲不能過國慶日。」江青說：「還是越早越好。就這樣啦！你們馬上回去抓緊落實吧！」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張春橋向我下達了「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經核心組議定，我們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積極傳達貫徹了張的黑指示。其中一次主要的會議便是三月中旬根據張春橋「文學方面可以先走起來」的黑指示所召開的「重點文學作品座談會」。我曾在這次會上傳達了張春橋二月份黑指示的基本內容。我記得的有：「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是當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寫這種題材，概括的廣度要大些，可以寫一個地區，一個市，甚至一個省，一個部；同時要有思想深度；要寫出走資派的特徵；等等。從那次會議以後，張春橋黑指示的流毒便傳遍了全國，並隨之而出現了大批所謂「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這就

是妄圖通過文藝大造反革命輿論，打擊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同志，製造全國混亂局面，以便亂中奪權。

于會泳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

【于會泳等人關於部署「寫與走資派鬥爭」

作品問題給張春橋的報告（節錄）】

影印件原文

春橋同志：

為了認真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貫徹中央負責同志最近關於文藝創作要寫同走資派作鬥爭的指示精神，文化部從三月十六日起召開了創作座談會。到會的有文學、電影、戲劇方面的老、中、青作者共十八人，其中業餘作者九人、專業作者九人。會議於三月二十三日結束。

到會同志在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過程中，還聯繫創作實際，討論了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與刻劃走資派形像的關係、作品的深度與廣度相結合等問題，更堅定了「根本任務」的觀念，創作指導思想有了進一步的明確。很多同志談到，原來認為走資派如果是高級幹部，寫起來有困難，不好表現，作者的生活積累有限；有的有顧慮，怕醜化黨的領導。現在認識到，反映同走資派的鬥爭，要抓住現實生活的本質。走資派不能簡單地貼上去，要圍繞英雄人物來設計走資派的活動。要敢於寫較高級幹部中的走資派，因為走資派越是職位高、權力大，它的危險就越大。在描寫中要注意寫走資派的目的是塑造英雄人物，要努力把同走資派的鬥爭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上寫，等等，使作品有思想深度，有較高的品質。

在學習和領會指示精神的基礎上，會議制訂了創作規劃，共二十部作品。

按題材來分，有工業五部，農業五部，鐵路三部，海運一部，教育四部，科研二部。

按體裁形式來分，小說方面有長篇五部，中篇三部，短篇三部；電影劇本七部；戲劇劇本二部。

上述作品寫到中央有關部門一級或省一級的走資派的有八部，寫到地、縣一級（包括工廠）的走資派的有十二部。

當否，請指示。

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二）「四人幫」炮製《反擊》等反動電影的有關材料

【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榮泳霖  
給遲群、謝靜宜的信和遲群的批語】  
影印件原文

遲群的批語：

反擊在走資派那裡，已成為強級地震。政治上思想上路線的正確和藝水上的完美，二者統一，是趕走資產階級老爺的保證。

榮泳霖給遲群、謝靜宜的信

遲群、謝靜宜同志：

我和政治部幾位同志的意見，應當接著《反擊》繼續集中力量跟走資派鬥下去。《反擊》在河南拍攝，引起了一系列的反響，劉建勳同志在一次省委幹部會上講：「你們為什麼對《反擊》這樣感興趣?!《反擊》也不是寫的河南，中央還要審查嘛！」立即有一位省委宣傳部的年輕副部長起來質問：「你為什麼對《反擊》這樣不感興趣呢?!」《反擊》尚未上映，而引起了各種人的注意，是因為它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走資派特別是跟大走資派鬥爭這樣一個大題材。而當前，如何認識走資派有一層人？這一層人有的還在走，我們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繼續鬥，如何進一步深入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等等一系列問題，不僅是文藝作品迫切應當反映的題材，也是運動進一步深入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的電影能在這些問題上有所突破而給觀眾以啟發，那即使



是有多大困難我們也應當幹。目前中央（注：指「四人幫」）批發三個材料，更說明瞭這種迫切性，也更使我們看到了《反擊》描寫跟走資派鬥爭中深度上的嚴重不足。

接著《反擊》寫下去，困難是會不少的，但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應當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貢獻，必須知難而進，永遠鬥爭下去。

不知可否，請閱示。

榮泳霖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

#### 【原《反擊》寫作組負責人季燕平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奉四人幫的旨意，遲群、謝靜宜指定兩校黨委各一名副書記直接領導炮製反黨電影劇本《反擊》。遲、謝反復強調「這是大局」，「要快，五·一出劇本，十·一出影片。」炮製期間，遲、謝的黑指示和系統的講話有十次之多。于會泳把《反擊》列為文化部重點專案，並派四人前來「指導」。

遲群說劇本「不要侷限於教學改革，要納入大的政治鬥爭中來」，在銀幕上「表現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他一再堅持劇中的走資派「就寫他一個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書記」，以「充份寫出右傾翻案風的嚴重性」為名，把韓凌寫成「還鄉團」，抓江濤，說什麼「罷官撤職關起來——這是走資派對革命派的一貫手段，不足為怪」。遲、謝除了親自點名攻擊一些領導同志外，還通過清華黑聯絡點提供給寫作組一批他們私整的黨政軍負責同志的黑材料，指令要剝「走資派」關心四個現代化的畫皮，用這種極其陰險的手法，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妄圖打倒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另一方面，遲、謝還厚顏無恥地向寫作組吹噓「四人幫」和他們自己的所謂「英雄事蹟」，讓劇本「集中力量寫好江濤」，寫省委「趙大姐怎樣控制局面的」，為他們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八月，在他們的驅使和矇騙下劇本出籠了。當河南一些地方引起極為惡劣的影響時，遲群卻興高采烈地說：「《反擊》在走資派那裡已成為強級地震。」

季燕平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原《反擊》寫作組負責人徐葆耕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八月上旬，寫作組擬寫反映大學生去邊疆當農民的《理想之歌》，並為此向黨委打了正式報告。直接領導寫作組的清華黨委副書記榮泳霖和北大黨委副書記魏銀秋表示同意，並經北影廠同意準備去青藏深入生活。但清華政治部領導人周家愨、吳煒煜反對，說：「站在兩校的角度，還是要寫大題材，揭露兩個決議以後走資派還在走。」於是，榮泳霖又以個人名義向遲群、謝靜宜打了書面報告，認為「應該接著《反擊》繼續集中力量跟走資派鬥下去。」遲群、謝靜宜肯定了這份報告。

九月六日，榮泳霖、吳煒煜、魏銀秋三人到寫作組談「形勢」。榮說：「鄧小平垮臺以後，這一層人是怎麼走的？他們不是一般的右，而是一個反黨反馬列反毛主席的集團。吳說：「現在對毛澤東思想的估計要升溫。要研究走資派在新形勢下怎樣窺測方向，潛伏爪牙，等待反撲，保存自己，鎮壓革命的。」魏表示同意他們的意見。

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以後，大約九月十八日前後，吳煒煜又說：「第二部電影要一直寫到主席去世，對主席遺志是繼承還是背叛。」我們表示沒有生活，吳說：「過兩周也許能夠給你們講一講，現在還看不清楚。」

九月二十六日，榮泳霖、魏銀秋去北影看《反擊》。在回來的汽車上，我們再一次表示：對當前鬥爭不瞭解，很難寫。榮說：「就寫按既定方針辦還是不按即（既）定方針辦。」這一險惡陰謀還沒有付諸實

施，四人幫就完蛋了。

徐葆耕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

（三）「四人幫」在「寫與走資派鬥爭」問題上大造反革命輿論

下面是鼓吹「寫與走資派鬥爭」的部分文章的影印件〔略〕

（四）在「四人幫」寫「與走資派鬥爭」的反動號召下，全國出現了一大批《反擊》式的反動作品

下面是部分毒草作品的影印件〔略〕

## 六、「四人幫」力圖把他們控制的學校，變成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工具

「四人幫」根本違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鼓吹學校只辦一個專業，就是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專業」；只培養一種人，就是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先鋒戰士」。他們妄圖蒙蔽青年充當他們的反革命打手。他們竭力要把學校變為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四人幫」一手操縱的兩校大批判組，就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急先鋒。一個時期，這個所謂「大批判組」，成為「四人幫」幫中央的喉舌，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發號施令。他們大肆鼓吹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動謬論，毒化思想，貽害全國。「四人幫」還利用他們控制的學校，通過各種管道，祕密串連，進行反黨亂軍、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一）北京大學黨委的揭發

「四人幫」及其黨羽遲群、謝靜宜直接操縱的「兩校大批判組」，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急先鋒。「四人幫」的黑講話、黑指示，由它偽造成所謂「中央精神」，四處傳播，流毒全國；「四人幫」篡黨奪權需要的許多材料，由它編印散發；「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部署，

由它首先推行；「四人幫」向黨進攻的反動理論，由它加工製造。它是「四人幫」的喉舌和控制全國輿論的指揮棒。三年來，「兩校大批判組」共寫文章二百一十九篇，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百八十一篇，其中大量的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服務的反黨文章，「四人幫」直接點題授意的就有三十六篇。他們還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編寫了一百多種材料。這些活動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敬愛的周總理和英明領袖華主席，誣陷鄧小平同志，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多次召見「兩校大批判組」，說什麼「劉少奇、林彪是大儒，黨內還有大儒，不然為什麼搞這麼大的運動」，並給他們念一份外電，借外國人之口向他們交底：「中國當前的鬥爭，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溫和派和以江青為代表的激進派的鬥爭」。

四屆人大前後，兩校大批判組在「四人幫」的指揮下，圍繞著他們的組閣陰謀，掀起批「因循守舊」、反「經驗主義」的黑風，揚言要發動一個「比批林批孔還要大的運動」，「向權威挑戰」，妄圖把周總理和具有豐富革命經驗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因循守舊勢力」、「經驗主義者」，統統打倒。

當全國人民沉痛悼念周總理逝世的時候，遲群竟指令「大批判組」在《馬、恩、列論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語錄中，加進列寧關於「哭喪婦」的語錄，同時還拋出反動雜文《孔丘之憂》，歇斯底里地叫嚷：「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以最惡毒的語言攻擊周總理和廣大革命幹部和人民群眾。

一九七四年二月，江青親自出題，要「大批判組」炮製《孔丘其人》，連寫八稿，用畫像的手法，從出身到作風，以至「重病在身」，全面影射攻擊周總理。江青稱讚寫得「生龍活虎」，姚文元也說「寫得生動」。有人問這個像畫的是誰，遲群險惡地說：「你看像誰就是誰」。按照江青的黑旨意「大批判組」還連續炮製了《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讀〈鹽鐵論〉》、《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等一大批反黨文章，借所謂「批儒評法」，對敬愛的周總理進行惡毒的影射攻擊。

同時他們還炮製一批黑文，借吹捧呂后、武則天把江青比附為現代「法家女皇」，在《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中，叫嚷要有一個「法家領導集團」在中央主持工作，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他們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在不長的時間內，炮製了八十餘篇文章，編造了一批黑材料，採取歪曲篡改，造謠中傷，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等卑劣手段，惡毒攻擊、誣蔑鄧小平同志。

毛主席提議華主席擔任代總理、總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後，他們攻擊的矛頭又集中指向華主席。遲群叫嚷，現在還不能說「左派已組織起來，並把右派打倒了」，到處鼓吹揪「還坐在主席臺上」的「正在走的走資派」。「大批判組」連續射出《再論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一支支攻擊華主席的毒箭。遲群為《再論孔丘其人》定調，親筆在二月十三日清樣上批道：「應突出其特點，一上臺就十分兇惡地從政治上組織上進行反攻倒算，復辟、翻案，把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的行動」。他們拋出《評〈論總綱〉》等三本小冊子，掀起所謂批「三株大毒草」的運動，瘋狂影射攻擊華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毛主席逝世後，遲群叫嚷「現在正是戰鬥的時候，要大寫、特寫、快寫！」他們以「四人幫」偽造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炮製了二十五篇反黨文章。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可抗拒》等文章中，居心險惡地把當時的形勢描繪成「右派」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得勢於一時」，為「四人幫」發動反革命政變呼風喚雨，推波助瀾。他們炮製的《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為「四人幫」發出了篡黨奪權的動員令。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 （二）清華大學黨委的揭發

「四人幫」及其黨羽遲群、謝靜宜肆意篡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路線，歪曲黨的教育方針，千方百計把清華變成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妄圖把學員培養成所謂鬥「走資派」揪「一層人」的打手。他們

胡說「清華只有一個專業，就是同走資派鬥爭的專業」，「能跟走資派鬥，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資派鬥爭上」。他們迫使學校的一切工作都圍繞「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政治任務」轉，還根據江青的黑旨意，準備在各專業開設通史課，吹捧呂后、武則天，為江青登基當女皇造輿論。遲、謝常常把「四人幫」的一些黑指示偽造成「中央精神」，通過各種管道傳播出去。「四人幫」在各地的黨羽都把清華視為「中心」，或登門密談，陰謀策劃，或交換情報，轉遞黑材料。遲群指令學校信訪接待組「不要只揪幾個小泥鰍」，「要注意搜集一些省以上走資派的情況」。他們大量捏造和散發了攻擊誣陷鄧小平同志的黑材料，還搜集和整理了五名政治局委員，一名副委員長，四十一名省委書記，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副部長、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黑材料，為「四人幫」大揪「一層人」，打倒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提供反革命炮彈。

他們打著開門辦學的旗號插手全國，破壞革命，破壞生產。被他們干擾破壞的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機關、國家機關以及解放軍共一百九十多個單位。一九七六年暑假前，遲、謝親自主持召開了所謂開門辦學經驗交流會，公開煽動在開門辦學中與掛鉤單位黨的領導相對抗。在遲、謝的指使下，一些人利用開門辦學擅自召開座談會、報告會，大肆宣揚「四人幫」的反革命政治綱領，煽動層層揪「走資派」。遲群還指派他的「聯絡員」同一些地區的壞頭頭非法串連，拉隊伍向黨奪權，傳遞黑材料，散布「四人幫」的反動謬論。「四人幫」垮臺後，還給外地同夥通風報信，惡毒誣衊「中央出了趙高」。

遲、謝還指揮清華在外地分校的親信插手當地運動，把誣陷攻擊鄧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對外開放，按照遲、謝的「接待提綱」，接待了當地一千五百多個單位近十萬人，大肆傳播「四人幫」的反革命謬論，流毒甚廣。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 （三）「四人幫」鼓吹把學校辦成所謂「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專業」

#### 【謝靜宜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遲群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份左右，在清華黨委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過：資產階級在黨內，走資派還在走，這是一個大問題。儘管我們學校有五十多個專業，實際上就是一個專業，就是敢於造走資派反的專業。

遲群的這些話，也是從「四人幫」那裡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毛遠新在吹噓「朝農經驗」時曾說過：我們朝農培養出來的人，就是敢於造走資派反的人，就憑這一條，我就批准他畢業。張春橋當時很讚賞地說：只要有這一條就行。

謝靜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 【遲群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與清華大學原政治部副主任

##### 吳生榮、吳煒煜的談話記錄（節錄）】

我們學校對全國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僅是學校地位，而且培養的人出去到各地，是造走資派反的。我們學校就是培養同走資派作鬥爭的先鋒戰士。

### （四）「四人幫」打著「開門辦學」等旗號，煽風點火，反黨亂軍

#### 【遲群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在清華大學

##### 開門辦學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放暑假了，今年又是七、八、九，各地情況不一樣，很不平衡，存在的問題很多，這好啊，哪有這樣的好事啊，我們找都找不到這樣的好事。回去聽一聽，看一看嘛，回來以後湊一湊，集中集中，這是好事。我說你就把它當成開門辦學來對待。有什麼不得了呢？無非是有的人真想瞭解一下清華是怎麼搞的運動。對照我這個單位，我這個地區研究研究有什麼一致的地方，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無非是還有的人研究研

究走資派還在繼續走，這是策略上的問題。

我們開門辦學，上好階級鬥爭這門主課，遇到當地運動介入不介入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關係到每一個同志，我們不是世外桃源，早就介入了。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堅定不移，要採取積極主動的這樣一個方針，不要畏首畏尾，縮手縮腳地，怕什麼？無非是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出了點毛病，喝幾口水嘛。這也是個鍛鍊。

吃飽了飯就得研究一下子怎麼辦，我說，這就有希望。逼得自己用腦子，親自來體會一下遇到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這不是活生生的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嗎？

提高警惕，警惕誰呀？首先警惕走資派，就是說密切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首先要注意走資派的動向。上主課要有個重點，抓一個小流氓或一個小玩意兒鬥一鬥，那也需要，但是走資派也希望這麼做，因為他要轉移鬥爭的大方向。

【朱永嘉一九七六年二月

在政治課函授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三月份去，外地正是變化時期，現在上海與外地溫度還相差很大。

現在去講，是起放火作用，火是要放的，材料可以發。馬老講話，指出要集中目標。

要講原來課程，如脫離原學科，整個都講右傾翻案風，講運動，就變成你在指揮運動。要講這個問題，但不要丟掉原來學科的基本東西，聯繫當前，這樣火放下去，你又很主動。

（五）遲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教育部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反黨講話記錄（節錄）

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點盯住當權派。

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總支、分黨委、校黨委，一層盯一層。我們學校就要盯著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國務院、中央。沒這一手，怎麼對付走資派？



## 七、「四人幫」煽動揪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所謂「走資派」，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

「四人幫」在國民經濟各部門推行他們的反革命政治綱領，煽動層層揪所謂「走資派」，處處抓所謂「還鄉團」。他們任意給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工農業生產的負責同志，扣上「唯生產力論」的「走資派」的大帽子。他們把廣大幹部和工農勞動群眾堅守崗位，努力生產，大幹社會主義，誣蔑為「替資本主義打基礎」，「給走資派臉上貼金」。他們炮製「踢開黨委鬧革命」，「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反動口號，煽動停工停產。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不少工礦企業和人民公社的黨組織癱瘓，革命隊伍分裂，人心渙散，生產下降。有些地區資本主義氾濫，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盛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大削弱。「四人幫」這夥禍國殃民的黑幫，蓄意破壞生產，妄圖造成全國性的經濟癱瘓，然後倒打一耙，把罪責栽到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的頭上，藉以實現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

### （一）王洪文在經濟建設部門煽動揪所謂「走資派」

【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檔上的批語（節錄）】

影印件原文

我建議大足廠的群眾踢開領導班子自己鬧革命，組織成新的領導班子。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在三機部一個單位的一封信上的批語（節錄）】

影印件原文

我們應該支持這個所的廣大職工造所領導和三機部某些領導人的反。該奪權的就要奪權。

洪文  
一月四日

【王洪文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在國防科委、  
七機部負責人彙報時的講話記錄（節錄）】

要通過這次把運動深入搞透。現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後策劃者、深的搞出來。主席講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比較難的是在黨內，領導層要追下去，千萬不要手軟，揪出一個拿來教育群眾。

不要手軟，准的該抓就抓，該批就批，該鬥就鬥。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反動日記

【下面是姚文元反動日記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外國人都說：宣傳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傳毛的主張」「繼續革命」的，但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經濟工作什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

（三）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指使其黨羽金祖敏收集黑「材料」，攻擊  
工業交通各部

【下面是姚文元在金祖敏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上的批語影印件】

批語影印件原文

送春橋、洪文同志參閱。後面所附典型例子（崇洋、卡國產、刁難、因進口而自己生產反而下馬等等）是我聽意見時請金祖敏同志找的，相當尖銳地揭露出經濟工作中的路線鬥爭，這也是不正之風！請考慮是否要印出來給政治局同志看看，簡報上是完全看不到這類實際材料的。

姚文元

一月二十九日

#### （四）江青指使謝靜宜、遲群收集整理外貿系統的「材料」，誣陷鄧小平同志和外貿部門

【下面是謝靜宜、遲群給江青送「材料」的信】

影印件原文

遵江青同志的指示，將文匯情況、解放情況中有關鄧小平崇洋媚外喪權辱國的修正主義路線在外貿系統的流毒和影響，整理了一個綜合材料，送去二份。

謝遲

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

#### （五）「四人幫」及其黨羽在七機部層層揪所謂「走資派」，篡奪各級領導權

七機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四人幫」積極插手七機部，通過其代理人舒龍山、葉正光、曹光琳篡奪了七機部的領導權。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一次會上，江青對舒、葉、曹進行反革命交底，並向舒龍山面授機宜，在紙上寫了「策略」二字，詭秘地遞給舒龍山看後隨即擦掉。舒、葉、曹在這次會上緊密配合江青瘋狂攻擊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江青則竭力為他們撐腰打氣。這次會後，王洪文把舒龍山單獨留下來密談了一個多小時。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她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大罵七機部老幹部「厲害」。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王洪文當著舒、葉、曹的面，指名誣譏七機部的主要領導同志「坐在右的一邊」，七四年「右」，七五年「更右了」，並提出「領導班子，除部、院兩級外，有些廠所班子問題也要解決」。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王洪文對舒龍山、葉正光說這次運動要抓「幕後的」，「不要手軟，准的該抓就抓，該批就批，該鬥就鬥」，「趁這個機會打翻身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對舒、葉說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線」。舒、葉、曹對「四人幫」的旨意心領神會。他們猖狂地攻擊毛主席親自圈閱的關於解決七機部問題的中央一九七

五年十四號檔是「修正主義綱領」，誣衊經中央批准召開的一九七五年七機部一、二院批林批孔彙報會議是「翻案的會，復辟的會，分裂的會」。舒龍山說：「黨內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從廣度上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從深度上來看，從中央到地方，從幕前到幕後」。葉正光惡毒地說「從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長的黑線」。舒龍山還叫嚷，「在領導權問題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再等了」。曹光琳說，「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決司令部的問題，不然要犯歷史性的錯誤」。舒、葉、曹的同夥還鼓吹什麼「舒龍山思想，就是解決領導權再加上鐵的手腕」，並揚言對部、院領導機關「進行一次大手術」，反動氣焰十分囂張。

舒、葉、曹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層層揪「走資派」，瘋狂地把矛頭指向華國鋒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七機部部、院到基層的一大批領導幹部肆意打擊陷害、開除黨籍、撤職降薪、關押揪鬥，並利用清查鎮壓革命幹部和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同時，在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中，把他們的同夥拉入黨內，塞進領導班子。從一九七六年四月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把七機部在京廠、所以上單位的領導班子改組了百分之八十，篡奪了領導權。他們顛倒敵我關係，混淆階級陣線，造成了黨組織和幹部隊伍的不純、革命隊伍的嚴重分裂。他們結幫營私，自成體系，橫行霸道，使許多單位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多年來，中央對解決七機部問題作過多次重要指示，「四人幫」和舒、葉、曹百般抵制和干擾，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嚴重地干擾和破壞了七機部的革命和生產。

中共第七機械工業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注：舒龍山，原七機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葉正光，原七機部黨的核心小組列席成員；曹光琳，原七機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

## （六）「四人幫」及其黨羽在冶金部門層層揪所謂「走資派」，篡奪領導權

### 冶金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四人幫」及其死黨毛遠新和親信陳紹昆、魏秉奎等人，到處煽動層層揪「走資派」、抓「還鄉團」，把冶金工業搞亂了，特別是把重點冶金企業的各級領導班子搞癱瘓了。許多企業的黨委會開不成，工作抓不了，革命和生產遭到嚴重損失。僅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這三年間，全國就少產鋼二千多萬噸。

我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鋼深受「四人幫」之害。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毛遠新在鞍鋼亂箭齊發，層層揪「孔老二」、「回潮總代表」，大搞所謂「吹氧會」，提出什麼「大風高溫，層層燒透」，把六十多名老幹部作為重點「吹氧」對象，把鞍鋼許多廠礦領導班子「吹」垮了，隊伍「吹」散了，企業「吹」亂了。一九七六年，毛遠新又製造混亂，層層揪「代理人」、「走資派」，使鋼產量下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準，整整倒退了五年。

「四人幫」把黑手伸進了武鋼，他們指使夏邦銀等人，給公司黨委扣上「民主派到走資派」、「十年一貫制的走資派」、「搞唯生產力論的走資派」、「翻案派」、「復辟派」等大帽子。他們對十一名公司黨委書記，要打倒七人，另外四人，不打倒就打跑。他們還散布「搞生產是給走資派臉上貼金」，「爐子熄火就是勝利」的反動謬論，破壞生產，使一九七六年鋼產量比一九七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四人幫」在鄭州鋁廠的爪牙，在一九七六年猖狂地叫囂：「要打倒一批，趕走一批」。他們給總廠的四個黨委書記、副書記，扣上了「右傾翻案的代表」、「走資派」的罪名，把總廠黨委搞癱瘓。十一個分廠黨委也被他們搞亂了九個。這就使這個占全國鋁氧產量百分之六十的鋁廠，有一年的時間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狀態，損失嚴重，造成全國幾十個鋁廠由於缺鋁氧全部或部分停產。

中共冶金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注：陳紹昆，原冶金部部長。

### （七）「四人幫」及其黨羽在鐵路部門層層揪所謂「還鄉團」、「走資派」，篡奪領導權

#### 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的揭發

「四人幫」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力圖切斷鐵路這個國民經濟的大動脈。張春橋叫囂：「鐵路是必爭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們把毛主席親自圈閱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一九七五年中央九號檔，污蔑為「復辟綱領」。他們破壞鐵路運輸的反革命部署，是堵塞樞紐，打亂幹線，搞垮全路。他們把黑手伸到鐵道部機關，伸到鐵路一些單位，誣譏建國以來鐵路工作是「條條專政」，「資產階級專政」，「走資派專政」。他們在部機關和一些鐵路單位另搞一套，打擊一大片，層層揪「走資派」，到處抓「還鄉團」；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結幫篡黨，以幫代黨，糾集壞人，製造事端，中斷運輸。「四人幫」的罪惡活動，嚴重破壞了鐵路的革命和運輸生產，一九七六年全國有十幾條幹線，經常不能暢通，處於堵塞半堵塞狀態，嚴重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影響了城鄉交流，影響了戰備，影響了人民生活。

鄭州鐵路局是「四人幫」控制的重點。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同唐岐山密談，許唐當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並要他「代表中央過問湖北的事情」。「四人幫」的親信崔修范除了在部機關大肆散布「毛主席圈閱的中央九號檔，錯了也可以批」，「鄧納吉雖然垮臺了，還會出現新的納吉」，惡毒攻擊毛主席、華主席，誣陷鄧小平同志以外，還在鄭州與唐岐山密謀策劃，答應唐「在鐵道部兼個職」。唐岐山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幹了大量的篡黨奪權陰謀活動。他瘋狂地攻擊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是「老右」、「投降派」，污蔑河南省委負責同志是「走資派」。狂叫「走資派是一層，反革命一大片」，「要抓緊當前有利時機，充份利用政治上占上風的時候，搶進一班人」，陰謀奪取各級領導權。他們對一些領導班子中的革命幹部，有的撤換，有的採取派所謂「工管組」、「幫辦」、「助理」等辦法，頂班奪權。他們的反革命罪

惡活動，把一個好端端的鄭州鐵路局弄得烏煙瘴氣。

去年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蘭州鐵路局層層揪「代理人」，組織上動大手術，點名和大字報上點名批判各級幹部，給他們戴上「走資派」、「翻案派」、「算帳派」、「復辟派」、「投降派」各種帽子，嚴重挫傷了廣大幹部和職工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去年，「四人幫」伸向太原鐵路局的黑手多次到清華大學祕密串連。「四人幫」在清華的親信對他們說，「走資派不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機關有，工礦企業也有，大單位有，小單位也有」。「走資派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層人，幾層人」。太原鐵路局的這幾個人根據「四人幫」的旨意，公開叫嚷「衝破走資派的重重阻力」，「趕走還鄉團」，並提出「各單位清理各單位的走資派」，「面向基層，遍地開花」的反革命部署。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太原局管內的鐵路幹線不暢通，樞紐堵塞，機車趴窩，列車停運。對此，他們竟然惡狠狠地說：「生產一癱瘓，造成混亂，我們就有辦法了。」這就充份暴露了「四人幫」及其親信破壞鐵路運輸的罪惡目的。

中共鐵道部臨時領導小組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 （八）「四人幫」及其黨羽層層揪所謂「走資派」，嚴重破壞農業生產 農林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四人幫」刮起的層層揪「走資派」的妖風，使農業學大寨運動和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這幾年，全國糧食生產增長不快；棉花三年連續減產；油料大幅度減產。在他們直接插手的地方，如雲、貴、川、閩、浙、贛六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區，惡果更為嚴重。在這些地方，堅持搞集體的幹部被打成「走資派」，煽動搞單幹的人被封為「革命派」，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受到破壞，資本主義大肆氾濫，生產大幅度下降。

在浙江，「四人幫」及其死黨和親信，層層揪「復辟勢力代表人物」，把省委同志比作「孔老三」，地委書記比作「孔老四」，縣委書

記比作「孔老五」，要統統打倒，搞得許多地方的黨委無法工作，損失極為嚴重。溫州地區就是一個典型。前幾年，那裡的領導班子被搞癱瘓，革命無人抓，生產無人管，農村集體經濟瀕於瓦解。一是糧食三年連續減產，由餘糧區變成了缺糧區，過去正常年景調出商品糧一億多斤，一九七六年調進糧食近三億斤。二是分田單幹，永嘉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產隊全部或部分搞了分田單幹。三是投機倒把，黑市猖獗。溫州市市場基本上被資本主義佔領，煤、鹽、油經常脫銷。四是階級敵人乘機破壞，反革命政治謠言和反動標語、傳單不斷出現，流氓阿飛橫行霸道。「四舊」復活，黑書黑戲紛紛出籠，聚眾賭博，宗教迷信十分嚴重。

河北省保定地區，幾個壞人在「四人幫」的操縱和指揮下，大搞「打倒一切」，非法免去三名地委書記，另任命了三名地委書記、副書記和九十五名縣委常委、地直局級以上領導人。他們在全區各縣分裂黨委，大搞突擊提幹，到處奪權，大搞打砸搶抄抓，支持煽動壞人翻案，大搞階級報復，復辟資本主義。有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嚴重地破壞了保定地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七六年全區糧食比一九七四年減產十三億四千萬斤，由餘糧地區變成了缺糧區。

福建省莆田地區，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給農業生產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農村集體所有制出現了一次大倒退，不少地方集體耕地幾乎分光。仙遊縣十九個公社（鎮）中，有十八個公社、三千一百個生產隊分田單幹，共分掉耕地十三萬畝，占全縣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多，全區糧食大減產。資本主義活動猖獗，聚眾賭博，封建迷信，買賣婚姻盛行。

中共農林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 （九）「四人幫」及其黨羽在科技部門層層揪所謂「走資派」，嚴重破壞科技事業

#### 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一九七二年，周總理多次指示加強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四人幫」借題發難，誣衊周總理「刮理論妖風」，在科技界大反所謂「右傾回潮」。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又利用中國科學院感光研究室一封不符事實的來信，煽動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妄圖打倒一大批革命領導幹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及其死黨毛遠新、遲群，布置在中國科學院的黨羽柳忠陽、肖劍秋等人，抓住《中國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大作文章，顛倒是非，向黨進攻。他們誣衊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整頓中國科學院是「復辟」，《彙報提綱》是「復辟綱領」，把中央決定的對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及政治部的調整和加強，誣衊為「拼湊復辟班子」，「文化大革命以來，資產階級篡奪科學院領導權的一個先例」，猖狂叫囂要「順藤摸瓜」，揪出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七六年七月，姚文元又布置調查「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同自然科學工作有何關係」，調查所謂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現狀與歷史。柳忠陽等人按照「四人幫」的旨意，以「路線分析」為名，進一步大揪所謂「走資派」，把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成員百分之七十打成「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派」，把一大批革命幹部打成「還鄉團」、「復辟勢力」、「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四人幫」及其黨羽踐踏毛主席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把廣大科技人員誣為「臭老九」，視作「專政對象」，瘋狂打擊迫害。他們鼓吹「科學無用論」，取消科學研究機構，毀壞科研設施、設備儀器和技術資料，迫使大批科技人員改行。

由於「四人幫」的破壞，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受到嚴重摧殘，一些科研領域停滯不前，國民經濟中許多重大科技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拖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後腿。科學研究隊伍出現青黃不接的嚴重狀況。

尤為嚴重的是，「四人幫」及其黨羽竟然不顧唐山地震的前兆和預報資料，熱衷於搶班奪權，干擾破壞京津唐渤海地區震情監視和預報工

作。唐山大震後，他們又惡毒攻擊華國鋒同志「以抗震壓革命」，繼續進行破壞活動。

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

## 八、「四人幫」妄圖篡改毛主席規定的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路線

「四人幫」根本否定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時期我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拋出一套所謂「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新變動」的荒謬理論。他們所謂的「新變動」，就是老幹部變成「走資派」，老工人變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貧下中農搞社會主義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識份子「臭老九」。而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像馬天水、于會泳、遲群、張鐵生、翁森鶴、陳阿大那樣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搶者，則是他們依靠的所謂「先進分子」。這樣，他們就全面地顛倒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係，把自己放在同全國人民為敵的地位。

(一) 否定毛主席對我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反對「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下中農

【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文上所寫的攻擊毛主席的旁批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層的劃分，似無一篇明確分析的文章？

【張春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談話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春橋：

我感覺有些說法有些亂了。依靠整個工人階級，好像工人內部沒有

矛盾了。那就不合辯證法了。

【張春橋一次講話記錄（節錄）】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這個「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階級「左派」。

【張春橋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我們工人自己也有弱點的，某種意義上來說，還不如農民呢，一個農民的生產，是全過程的。一個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工種，有的前道或者後道工序就不知道了，有的早班晚班也不聯繫。這是會影響自己的世界觀的。看不到全域。

【肖木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七五年二、三月的一天，在一次選擇馬恩列《論無產階級專政》語錄的會上，在讀到有關老工人的一條語錄時，張春橋說：「有人（顯然是攻擊哪位中央領導同志）喜歡講依靠老工人，這不對。對老工人也要階級分析。」姚文元聽了很活躍，說：「你老兄欣賞（賞）的這一條，一定選上。」

肖木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原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葉昌明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張春橋在一次「工總司」頭頭的會議上，對勞動模範進行了惡毒攻擊。他說：王進喜是站在保守勢力一邊的。這些勞動模範有樸素的階級感情，認為聽領導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另外，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要保自己的榮譽，對繼續革命就想得少了。

葉昌明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張春橋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

在上海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現在的青年工人更不行，他不懂工人，也不懂農民，問題比較多。

【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去，說到農業學大寨的問題時，張春橋攻擊陳永貴同志：「農民總不行，搞社會主義革命，思想跟不上。」我當時說：「那王鐵人活著就好了。」他馬上說：「也不見得。」

張維維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朱永嘉的揭發交代】

為了配合張春橋「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我們還利用全面專政這篇黑文，大肆鼓吹張春橋的反革命思想，把張春橋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修正主義黑貨吹到與列寧主義並駕齊驅的地位，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張春橋還布置我們搞工人隊伍的調查，搞調查的目的是為了炮製張春橋那個反革命思想體系服務的。

朱永嘉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原上海市委寫作組下屬工業經濟組王複初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朱永嘉、王知常秉承「四人幫」的黑旨意，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會上，污蔑和分裂工人階級，把工人隊伍分成四部分。胡說什麼：第一部分是老工人，他們「有的解放前就當包工頭的，有的是技術工人，工資很高，革命到頂了。也有很好的老工人，受苦深。他們也有短處，地位變化了，生活條件變化了，繼續革命覺悟差了。」第二

部分是，「解放前後當藝徒，『三反』、『五反』中的積極分子，對黨有感情，現在是工廠裡的主要骨幹。他們的問題是想物質刺激的多，受蘇修的一套影響多，動不動要搞管、卡、壓，動不動要搞物質刺激那一套。」第三部分是，「五八年前後進廠的，這些人吃修正主義的桃子不多，不少人還是臨時工，吃過修正主義路線的苦。六六年起來造反，路線鬥爭覺悟高，造反精神足，對文化大革命有感情，問題是黨的觀念少一些，勞動關沒完全解決。什麼事可幹，什麼事不可幹也弄不懂。有些人造反有私心雜念，掌權後老是倒退，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新的流氓無產階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用過這種人，蔣介石就靠了這些人。這些人是我們黨的一部分基礎。」第四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還是紅衛兵的，六八年進廠的新工人，他們熱情、單純，學習努力，反映快，鬥爭經驗很少，幼稚，沒經過鍛鍊。」

王複初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

## （二）反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

【張春橋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上海黨代會  
大學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我們現在還沒有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觀好的知識份子。

【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同原上海市總工會  
常委的談話記錄（節錄）】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批、改還要繼續。你們要有準備，有了準備就罵一頓臭知識份子，不要以為風平浪靜，沒有事。首先一點是同志們不要輕易相信他們。

【遲群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學習朝農教育  
革命經驗現場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文化大革命前是有教訓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的學生基本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破壞的作用。

【張鐵生一九七六年一月一十八日在北大的講話（節錄）】

也就是說這樣一些人（注：指教師隊伍）可以這麼估計他們，不論是哪個社會，不論是哪個國家，不論是哪個階級掌權，他們都可以憑著那點知識、本錢混飯吃。恐怕蘇修打到中國來時，他們還可能打著白旗上街去歡迎，這可沒准。假如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話，恐怕他比現在還高興，比現在搞教育革命還適應，比現在還吃香、賣力，掙錢還得多，這個恐怕是事實吧！我那麼想：到那個時候，如果真的變了天了，他們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萬歲了，也不再喊共產黨萬歲了。他們要喊誰萬歲？咱就不知道了，恐怕誰統治中國他就喊誰萬歲，這有什麼辦法？世界觀決定的。

（三）依靠新老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路線

【有關叛徒于會泳的材料】

（甲）馬少波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于會泳，原名于輝詠，山東省乳山縣人，一九四七年參加膠東文化協會所屬的文工團當樂隊隊員。一九四七年秋，國民黨反動派向我膠東解放區重點進攻時，于會泳驚慌失措，對革命喪失信心，把自己的東西包了一個包袱，隱藏在棲霞縣某村的一個地窖內，並偷偷寫了一封信放在包袱裡面。這封信開頭寫道：「蔣軍官兵弟兄們：」信的內容大意是：「現在貴軍進攻膠東，我的生死難保，可憐我家裡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們如果搜查出這些東西時，懇請寄到我的家裡，我將永世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下面寫了他自己的名字，並留了他的家鄉的地址。

我軍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點進攻之後，我們發覺了于會泳這一醜惡行徑，當即將他隔離反省，進行審查，按喪失革命立場，嚴重政治動搖，向敵人搖尾乞憐的問題進行了嚴肅批判之後，調離了文工團，到會部行政事務部門監督勞動，以觀後效。（我當時是膠東文化

協會黨總支書記兼會長，于會泳的問題是我主持處理的。）

文化部藝術局馬少波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

### （乙）上海音樂學院黨委的揭發

于會泳原是我院教師，一貫表現不好。肅反時向審查對象通風報信，受到批評後心懷不滿，在反右派鬥爭中，與右派分子攻擊肅反是所謂「侵犯人權」等反動謬論相呼應，叫嚷他參加肅反工作「上當了」，「今後打死我也不幹了」。在教育工作中，系統宣揚封資修的反動文藝觀點，因而多次受到重點批判。這樣一個人竟被江青、張春橋看中，硬拉進上海京劇院《海港》劇組，當上了音樂創作組長。當時我院將於的上述問題書面報告張春橋，提出此人不應重用。但張卻夥同江青，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強行把正在受審查的于會泳調到北京包庇起來。對此，我院黨委及部分教師再次上報材料，不少學生也多次發電報給江、張提出意見和抗議。但江、張竟指使于會泳回校「造反」。一九六七年六月，我院學生就於的問題當面質問張春橋，張卻叫嚷：我就是要保于會泳。後又多次揚言，他就是要和江青一起保，誰反對他們保于會泳，就是「同無產階級司令部唱對臺戲」。而且給上海音樂學院扣上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本營」的大帽子，進行鎮壓。在「四人幫」及其黨羽的包庇和支持下，于會泳竊取了院革委會領導大權，對揭發過他的問題的革命同志大搞反攻倒算，殘酷迫害一百多個革命幹部和革命師生，甚至把人逼瘋、逼死。

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丙）章力揮、言行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智》、《海》二劇組完成演出任務返滬前

夕，張春橋、姚文元又一次來到虎坊公寓，對我們和聞捷說：「本來江青××和我們想給于會泳找幢房子住在北京，免得回去再受衝擊，但這樣做難以保密，怕瞞不過紅衛兵。」這時于會泳跑了進來，他們又對於說了這番話。張還叮囑於講：「你回上海考驗一下也好！只要你什麼都不承認，我們就可以出面保你！」後「四人幫」就採取了種種卑劣手法，甚至偽造于會泳是《智》劇的編導、作曲，對於進行包庇，並加重用。

章力揮 言行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 (丁) 于會泳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我之所以能夠為九大代表、十大代表、中央委員、文化組成員、文化組副組長和文化部部長，我心裡完全清楚是江青、張春橋一夥搞的。

我在擬定文化部副部長名單時，曾特地「請示」過張春橋安排浩（亮）、劉（慶棠）為副部長。張春橋說：「當然！這個我們（指「四人幫」）早就研究好了的」。

二中全會期間，王洪文對我說：「『中央』（指「四人幫」）已經研究過了，政治思想和行政工作，給你們安排了一位中央委員，是從遠新（指毛遠新）那裡來的。我認識他，叫張維民，是在中央讀書班認識的」。

在我擬定文化部副部長名單之前，有一次在張春橋那裡，他談到他找袁水拍談過話，說：這個人表現不錯。和江青研究過了，將來安排袁當副部長。

于會泳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



【有關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的材料】

（甲）張鐵生的信和所謂「白卷」的影印件

張鐵生在考卷背面給招考單位領導寫信，哀求滿足他上大學的「理想和要求」，他在信中說：「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下面是張鐵生的信和所謂「白卷」的影印件〔略〕】

（乙）中共遼寧省委關於張鐵生的審查情況報告

對新生反革命分子張鐵生，經過審查證明，張鐵生是「四人幫」及其在遼寧的死黨和親信毛遠新等人一手炮製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個反革命打手。

一、張鐵生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在興城考試，先答了語文卷，得三十八分；數學卷得六十一分；最後，答理化卷，只答了化學部分第一題的三分之二，得六分。在眼看上大學無望的情況下，就在答卷的背面寫了一封信，苦苦哀求「尊敬的領導」滿足他上大學的「理想和要求」。考後，他惟恐錄取不上，托人到縣公安局、教育局找熟人挖門子，並寫信求情「在錄取考生時考慮考慮他」。毛遠新得知張鐵生的信後，如獲至寶，要《遼寧日報》寫按語準備發表，並派人進行「調查」，作出了所謂「張鐵生一貫表現很好，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均未發現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毛遠新親自改寫了《遼寧日報》「編者按」，吹噓張鐵生「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經過一番精心炮製，所謂《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就出籠了。這是一場反革命政治騙局。

二、張鐵生在「四人幫」和毛遠新的一手扶植下，上了大學，入了黨，成了鐵嶺農學院黨委副書記，當上了四屆人大常委。他們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大肆宣揚張鐵生的所謂事蹟。江青親自出馬，吹捧張鐵生「又紅又專」，「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在四屆人大期間，江青一語雙關地對張鐵生說：「要學點歷史和社會，既學當獸醫，也要學人醫」。毛遠新多次吹捧張鐵生是「教育革命的闖將」，「新生力量的代表」。今年一月，張鐵生以去大寨參觀為名，竄到北

京。毛遠新的秘書、于會泳、浩亮、薛玉珊等陪看電影。毛遠新的秘書和莊則棟還送了禮物。遲群、謝靜宜先後七次接見，在遲、謝的策動下，張鐵生在清華、北大作「報告」，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遲、謝又親自為張鐵生聯繫去山西進行反革命活動。

三、張鐵生瘋狂進行反革命活動，他惡毒攻擊毛主席沒有接見四屆人大代表，是「給四屆人大潑了冷水」。他反對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叫嚷「讀那些沒有用，我是不讀的」。他多次惡毒攻擊周總理，散布說：「人們都不希望周總理犯錯誤，這是人們的良好願望。」一九七六年中央發出一號檔後，他惡毒攻擊華國鋒同志是「右傾翻案勢力的代理人」，對葉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他都一一進行惡毒攻擊和謾罵。他對黨的老幹部懷有刻骨仇恨，叫囂老幹部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煽動「要動大手術，一動到底」，「對上層建築部門必須百倍採取組織措施，改變階級成份。」他還把矛頭指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叫嚷「鄧納吉就在部隊」，「部隊的問題特別令人擔心，一旦風雲變幻，不知道它跟著那個階級走」。他極力鼓吹「四人幫」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叫嚷：「心願張春橋當總理，毛遠新參加中央領導」，「他們應有更大的權力，掌握國家機器。」「四人幫」被粉碎後，張鐵生如喪考妣，更加瘋狂，煽動「現在需要槍，不給就搶」，「得搞第三次革命」。策劃上山打遊擊，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大量的確鑿的事實證明，張鐵生是一個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四、張鐵生原名劉鐵芳，其生父劉進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投資開油房、雜貨店，任經理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劉進炎與蔣匪東北騎兵保安第一支隊副司令李樹藩關係密切，一九五八年興城縣公安局曾對劉進行拘留審查。一九六八年，張鐵生因生父名聲不好，怕影響自己的前途，改名張鐵生。事實證明，他墮落成現行反革命，是有其深刻的階級根源的。

中共遼寧省委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有關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鶴的材料】

（甲）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同賴可哥的談話記錄（節錄）

對各種人要看革命表現，對各種人要作歷史分析，翁（注：指翁森鶴）不管如何壞但歷史上應承認他。

（乙）浙江省委工作人員汪弘毅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張春橋多次指定浙江省委把翁森鶴安排為黨的「十大」代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張春橋就向省委領導同志說，翁森鶴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工人起來造反最早的，要看到這個歷史。在選十大代表的時候，王洪文又對譚啟龍同志說，浙江選工人代表，要把翁選上。「要照顧歷史，即使工作難做一些，也要盡力爭取選上。」

汪弘毅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丙）中共浙江省委關於翁森鶴的審查情況報告

現行反革命分子翁森鶴，原系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混入黨內後曾竊取廠革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副主任、省革委會常委、省委候補委員等職。

翁森鶴是「四人幫」在浙江的兇惡的走狗。王張江姚多次召見他，吹噓他是「全國工人運動造反最早的頭兒」，「有才幹，要培養」，要省委「支持他們工作」。翁森鶴早就追隨林彪反黨集團搞陰謀活動，批林整風期間，群眾曾揭發他的問題。一九七三年王洪文竄來杭州時，兩次找他談話：「要翻身靠自己鬥」，「要頂住十二級颱風」。一九七四年，又指名要翁列席省委常委會。從此翁騎在省委頭上稱王稱霸。當他的錯誤受到中央領導批評時，王洪文在北京又找翁談話安慰、打氣，說：「要說觀點，我們是一個觀點的，但是政治局不是我王洪文一個人。」「你們的大字報是正確的，老實說是駁不倒的」。翁就更死心塌地投靠「四人幫」，狂叫「王洪文做『接班人』」，我們做他的基礎，建

立一支龐大的隊伍」，要「鞏固王洪文的地位」。

翁森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英明領袖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收集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大搞反黨亂軍活動。

他得到張春橋的「我們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的教唆後，「像夏天吃冰棒，無限舒服」。他「走路想著坐天下，吃飯想著坐天下，開會講著坐天下，睡覺夢著坐天下」，把「坐天下」作為「要解決的最高問題」。他對王洪文在上海把權都抓在「四人幫」的黨羽和親信手中的「經驗」奉為至寶，迫不及待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咒罵革命老幹部是「老死屍」，是「復辟勢力代表人物」。叫嚷「要在政治上把老幹部打得暈頭轉向，乘他們還沒有醒過來的時候，就動手把權奪過來」。他炮製奪權綱領，在所謂《關於把浙江問題解決好的幾點建議》中，要省委責成杭州市委先走一步，在半年時間內，在他們的監督下，解決領導班子問題，大搞突擊發展黨員，突擊提拔幹部。他夥同現行反革命分子賀賢春給杭州市委發出「通牒」，附去六十個人的名單，強令「三天內落實」「官位」。還同「四人幫」親信張永生及賀賢春提出一批名單，強要省委派到省級機關和省屬單位擔任領導職務。他們策劃建立各級批林批孔小組，凌駕於黨委之上；指定一批人參加各級黨委常委活動；並採取「飛過海」、「上督落」等手段，在全省刮起了「雙突」妖風，使許多單位的領導權被篡奪，造成黨員、幹部隊伍嚴重不純。

翁森鶴等還陰謀篡奪軍權，妄想由翁擔任省軍區副政委。並策劃建立了第二武裝——杭州市民兵指揮部，妄圖代替我人民解放軍和公安機關。他們挑起大規模武鬥，任意抓人打人，私設監牢，搞管教隊，大搞所謂「砸破廟」，對革命幹部和工人群眾搞打砸搶，實行法西斯專政。

他極力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散布「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凡是黨委機器還在轉動的，就是形勢不好，就要想盡辦法砸爛它」等反動謬論，衝擊各級黨委，造成許多黨政機關癱瘓半癱瘓，廠礦停產半停產，使我省工農業生產遭受嚴重損失。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敲詐勒索，

已查實的七千一百八十一元。在生活上極端腐朽糜爛。

大量確鑿的事實證明，翁森鶴是「四人幫」一手培植起來的罪惡累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

【有關流氓、打砸搶者陳阿大的材料】

（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業交通組的揭發

陳阿大是一個流氓惡棍，王洪文的「五虎將」之一，「四人幫」在上海的一個反革命打手。

陳從小就同流氓阿飛鬼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他打起「造反」旗號，叫囂「膽大就有官做」，緊跟王洪文，死保張春橋，夥同「小兄弟」黃金海、葉昌明、戴立清、馬振龍等地痞流氓，任意抓人，私設刑堂。強迫公安機關釋放同夥，去拘留所搶劫犯人。其父為資本家子女窩藏黃金被揭發，其弟尋釁毆打揭發人，被扭送派出所，陳阿大圍攻派出所，強迫給他父親「貼紅紙」平反。他大搞打砸搶，到處挑動和指揮武鬥，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為王洪文保駕解圍、翦除異己，革命群眾「炮打張春橋」時為張鎮壓群眾打頭陣，深得王、張的歡心，被封為「造反派的優秀代表」，將其安插到市革委會工交組當負責人。一九六八年十月，王、張內定陳阿大為「九大」代表，再強令基層黨組織把他突擊拉入黨內，而陳從未交過《入黨志願書》。後又安插他為市總工會副主任、市委「列席」常委，並塞進四屆人大任常委。陳阿大對王、張感恩戴德，賭咒發誓要「為司令（指王洪文）爭氣」，死心塌地為「四人幫」賣命效勞。

陳阿大一貫胡作非為，橫行霸道。竊據領導職務後，更加肆無忌憚，動輒打人罵人，拳打要他出示出入證的值勤戰士。在一次研究處理一起陳插手製造的假案的會議上，一個局黨委副書記提了一點不同意見，陳當場揪住這個幹部，破口大罵。他利用掌管全市房屋調配大權，

自稱「房總統」，大搞政治交易，貪汙房租補貼。他還依仗權勢，敲詐勒索，巧取豪奪，強拿白吃，侵吞貴重的新產品、「抄家物資」，厚顏無恥地聲言「貨幣對我不起作用」。

陳阿大夥同王秀珍，控制市總工會，把工會系統凌駕在各級黨組織之上。經常召集「小兄弟」聚會，傳達領會「四人幫」的意圖，進行「路線交底」，內定幹部任免，任意點名提幹，大搞結幫篡黨活動。特別是在批林批孔中，包庇起用大批壞人，大搞「雙突」，指使各級工會踢開黨委，進行「第二次奪權」。陳阿大還利用竊取的權力把他的老婆、弟弟、舅子都拉入黨內，並強行安插為公司或工廠的黨委副書記。

陳阿大一貫緊跟「四人幫」，瘋狂對抗黨中央，充當篡黨奪權的急先鋒。他任意砍掉國家下達的基建專案，積極安排所謂「王洪文工程」，「王秀珍工程」、「陳阿大工程」，破壞國家統一計畫。一九七六年，他積極收集編印整中央和國務院同志的黑材料，為「四人幫」提供反黨「炮彈」。叫囂要張春橋當總理，指名道姓地攻擊華國鋒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負隅頑抗，毀滅罪證，積極參與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歇斯底里地狂叫要「把腦袋吊在褲帶上」，「馬上大幹」，出謀停電，癱瘓鐵路交通、沉船堵塞吳淞口，在飛機跑道上堆放鋼錠封鎖機場，並布置「小兄弟」向各單位吹反革命黑風，進行煽動，瘋狂對抗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業交通組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乙) 下面是陳阿大的一份沒有填完、沒有入黨介紹人，  
沒有支部同意、上級黨委批准的所謂「入黨志願書」

影印件原文〔略〕

(丙)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圈閱同意的任命陳阿大為上海市委「列席常委」的批件

影印件原文

春橋、文元、洪文同志：

經在家常委研究，擬增加陳阿大、葉昌明兩位同志列席市委常委會議。

當否，請指示。

馬天水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

請常委傳閱。

馬天水

二月二十二日市委常委會議上，馬天水同志已宣讀。

## 第二部分 「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造謠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四人幫」一貫標榜自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動輒誣衊中央領導同志反對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又一貫標榜自己光明正大，而誣衊中央領導同志造謠言，搞陰謀，搞分裂。那麼，究竟誰反對毛主席，誰是謠言的製造者呢？

馬克思、恩格斯說：「要對付這一切陰謀詭計，只有一個辦法，然而具有毀滅性力量的辦法，這就是把它澈底公開。把這些陰謀詭計徹頭徹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們失去任何力量。」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指示的這個辦法，我們選擇了黨的十大前後若干重要政治事件，將事實的真相告訴群眾，以澈底揭穿「四人幫」的陰謀。這些事實充份證明，正是「四人幫」，瘋狂反對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正是「四人幫」，是一個大搞修正主義，大搞分裂，大搞陰謀，大造謠言的反革命合股公司。

## 一、對抗毛主席對王張江姚搞「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批評

毛主席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幫」，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對王、張、江、姚進行了批評和幫助。江青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給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各同志的信中，承認「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的好」。王洪文、張春橋表面上也承認了錯誤。但是，他們對毛主席、黨中央的批評教育，心懷刻骨仇恨，私下對他們的親信發洩不滿。一九七六年，他們公開翻案，顛倒是非，造謠誣衊，瘋狂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 （一）毛主席對王、張、江、姚的批評

（1）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難改呢。」毛主席批評了「上海幫」，毛主席說：「她（指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說：「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2）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示全文：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準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3）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批



判了「四人幫」的反黨宗派活動，嚴厲地警告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在反復講了「三要三不要」之後，毛主席尖銳地批評他們「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毛主席明確指示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強調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主席還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檔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 （二）「四人幫」抗拒毛主席、黨中央批評的有關材料

【江青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  
擅自召集的十七省、市、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鄧小平在四川、雲南對那一派都整。凡是造反派都要整，凡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都要整。我是首當其衝的。因為我是努力執行主席革命路線的。在執行過程中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那是另一回事。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全國謠言很多，據說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實鄧小平就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年輕的同志要懂得這件事。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  
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中央有兩個部倒楣，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負責人用了新人，其實底下老的解放了相當大一批。還有體委，整莊則棟整得很厲害，這都是在後頭的。整我在前頭。四月到主席那裡告狀，所謂請教，那個辦法是告狀。主席就批了一個文件出來。他（注：指鄧小平同志，下同）就利

用這個檔，說是學習主席的批示，不報告主席，就鬥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對雙方都批了，內容暫時在這兒不說。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講主席批他們的，把對我們的誇大了，特別是對我。他在政治局是採取三種辦法，一種是拉，拉得很緊的；一種是欺騙蒙蔽；一種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師，所以他首先打我。他無組織無紀律，不報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襲擊。因為我怕影響團結，我就都擔起來。他還不甘心，還要弄。

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學，搞突然襲擊，鬥了我四個月。這是怎麼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還有春橋，當然春橋說罪魁禍首是他呀，五八年就爭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問題呀。文元的文章寫了要批判經驗主義，文章寫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發了一篇社論，記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這個社論大體上是說了這個（手舉《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書）。這件事對我印象比較深，我比較仔細地看了這個社論。這是個重要事情，我不過是在偶爾的一個場合，而且是在沒有睡覺的情況下，說了批經驗主義，所有的都弄到我的頭上來，不聽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這樣的，主席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準不高而來，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讀了，這一件沒有公開。主席這個批示，他不學習。主席批示，經驗主義還是放在前頭了，經驗主義、教條主義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這樣講的。而且把新華社的人也弄上去鬥爭我，我一看那個形勢不對頭，我想，我都承擔吧，我還替新華社記者都承擔了。

【江青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小靳莊的講話記錄（節錄）】

鄧小平是造謠公司的總董事，也叫總經理。他造毛主席的謠，造我的謠，造革命同志的謠，分裂黨，分裂黨中央。誰跟主席革命，他就打擊誰。文化部、體委、小靳莊，都受鄧小平的壓。他要把遲群和小謝打

入十八層地獄，還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還惡劣。他要登基，當皇帝。

我不敢給你們送材料，送材料成一條罪狀。我送一點批林批孔材料，是公開的，不是什麼祕密，也是罪狀。

【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專程竄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裡，把上海去開會的馬天水、我、王秀珍、黃濤、李彬山找來，又叫把已經睡覺的南京軍區丁盛司令員單獨找來，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彭沖同志和廖漢生政委。

江青說：「你們是『上海幫』啊，你們知道吧，他們把我也說成『上海幫』啦！」

「要集中火力揭批鄧小平，去年他鬥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裡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

還說：「什麼言論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獨立王國，法西斯！」

江青在這裡以控訴鄧小平為幌子，直接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在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曾經指著江青說：「她算上海幫，你們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幫」，江青懷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賓館發洩來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同張春橋有一次談話。我說：「在毛主席逝世以後，聽說市委機關裡對誰今後可能擔任什麼職務有些議論。」這時，張春橋說：「要謹慎小心，特別是你們幾個人講話要注意。」張惱火地說什麼：「人家已經講我們是『上海幫』了！有一次北京的什麼外事招待會，偏偏把我們幾個排在一起，那個時候我就給總理提了意見。」張春橋惡毒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因為是毛主席批了他們是「上海幫」。

徐景賢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今年四月底，我出差去北京，在張春橋那裡我問「是不是毛主席批評你們了」。他說：「沒批我，批了江青」，「讓我們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接下去他又說：「列寧搞了工農檢查院，選了好多工農參加中央工作，結果也不解決問題，變修了。二百多個中央委員能解決問題嗎？」他就是這樣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毛主席對他們的批評和挽救。出於階級本性，他對二百多個中央委員，尤其是工農中央委員是刻骨仇恨的。

張維維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姚文元的秘書郭文給新華社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郭文同志（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電話：

文元同志要轉告你們：

據群眾來信揭發：朱、穆、李（注：指朱穆之、穆青、李琴同志）曾傳播過所謂四聯（人）邦（幫）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望他們交代謠言來源和擴散情況，向中央寫簡報。

## 二、對抗毛主席關於缺少文藝作品，應該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

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的兩次談話中尖銳指出：「百花齊放都沒有了」，「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鄧小平同志為了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對文藝狀況進行了一些調查。「四人幫」氣急敗壞，攻擊毛主席、黨中央抹殺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並且指使他們的黨羽于會泳、浩亮、劉慶棠、張維民等人炮製材料，硬說文藝革命「呈現出萬紫千紅，春色滿園，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對抗

毛主席的批評。一九七六年，他們竟公開發表文章，肆意攻擊鄧小平同志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是刮「右傾翻案風」。

### （一）毛主席關於缺少文藝作品，應該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

（1）毛主席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同鄧小平同志的談話記錄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

（2）毛主席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書面談話全文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

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

魯迅那時被攻擊，有胡適、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國民黨。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群眾。

已經有了《紅樓夢》、《水滸》，發行了。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們怕什麼？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進攻，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

以前的《萬水千山》沒有二、四方面軍，這不好。現在聽說改好了。

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

《反杜林論》，柏林大學撤了杜林的職，恩格斯不高興了，爭論是爭論麼，為什麼撤職？杜林這個人活了八十多歲，名譽不好。處份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蔣介石的時候，報紙、廣播、學校、電影都是他們的，他們蒙蔽人民。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我學孔夫子、資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馬列，十月革命後才學馬列，過去不知道。反動派沒有多少威力，靠剝削過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壯丁，所以我們不怕他們。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錦州，他不打，最後兩天他去了，俘虜十萬人。又消滅了廖耀湘。長春、瀋陽解放。

釋放俘虜放的好，國民黨怕得很。

## （二）「四人幫」對抗毛主席批評的罪證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

大寨和文藝界、新聞界部分人員的談話記錄（節錄）】

有人說，現在什麼也沒有，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成績全部抹殺。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出的東西不少，當然和八億人口相比，我們出的東西還不夠多，但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比那時多，這個我有材料。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

在上海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記錄（節錄）】

從上海來看，文化大革命以來，在文藝創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如剛才講的小說，文化革命前每年出二、三部，現在五、六部，這是一方面。上海創作的樣板戲有好幾個，其他戲也很多。電影也是這樣，最近出的幾部品質還是比較好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成績很大，應該肯定。

【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反黨分子王洪文親自參加了在上海延安西路二〇〇號召開的上海文藝工作座談會，他在會上大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文藝創作的成績，直接對抗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關於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重要指示。會議結束以後，王洪文並要我把會議情況整理成一份簡報，特別把文革以來出版多少部小說（中、長篇都有），大大超過文革以前等，列舉具體數字，印成鉛印的白頭簡報直接送給他，他後來帶到北京去，作為直接向毛主席進攻的炮彈。我在這個會議上也大擺成績，並為王洪文提供了反黨材料，犯了嚴重的罪行。王洪文在會上還猖狂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別人打成修正主義，而掩蓋自己是修正主義的真面目，向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批判進行猖狂反撲。

就在這一個時期前後，我聽朱永嘉、陳冀德等人說，姚文元還下達

黑指示，要寫作組通過出版社等收集全國文革以來出版過多少長詩、短詩集，後來又下達要統計全國出版過多少中、長篇小說，並且要把其中所謂優秀的作品的內容摘報給他。姚文元這種做法也是直接針對毛主席關於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重要指示的。

徐景賢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四人幫」指使其黨羽于會泳等人大量炮製的  
對抗毛主席批評的所謂《調查報告》等材料】

(1) 于會泳等人炮製的「調查報告」等反黨材料的影印件〔略〕

(2) 于會泳等人炮製的反黨材料選印

(甲) 《從中、長篇小說的出版看文學創作情況——調查報告》

(節錄)

為了對當前文學創作現狀進行一些基本瞭解，我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後全國中、長篇小說新作品的出版情況作了初步的對比性調查。

(1) 文化大革命後三年的總數（七五年一～八月不計在內），比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總數要多。

(2) 從發展趨勢看，文化大革命後幾年逐年增加的幅度較大。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反映，去年該社僅出版長篇兩種，今年至八月底止已出版八種，全年預計出版十五種。目前列入計畫、正在寫作的文學新作有一百多種，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數字。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乙) 《全國文藝刊物出版情況》（節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自一九七二年起，全國各地相繼辦起了各種文藝刊物，出版情況逐年有所發展。截止一九七五年九月底為止，

中央級和省、市、自治區級的文藝刊物共出版有五十一種以上（中央級的四種，省、市、自治區級的四十七種）。

從繁榮創作方面看，上述刊物於近年來發表了大量新作。這批新作的鮮明特點是，以反映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以來各條戰線鬥爭生活的題材占絕大多數。為了推動這方面創作，有些刊物還在編輯方面採取了種種積極措施，如舉辦《熱情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鬥爭》徵文（《吉林文藝》，一九七四年）或開闢「新人新作」專欄（《朝霞》，一九七四年）。

從作者隊伍方面看，上述刊物為培養和團結廣大專業和業餘作者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新作者——主要是工農兵業餘作者的不斷湧現，是這些刊物創作隊伍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發展評論方面看，上述刊物多數都有評論專欄，綜合性文藝刊物普遍地每期發表不同數量的文藝評論，並注意了及時對新作予以推薦或批評。

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 （丙）《文藝領域中右傾翻案風幾個突出的問題》（節錄）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關懷下，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中央負責同志率領廣大文藝戰士創作了一大批革命樣板戲，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奪目的工農兵英雄形像，為無產階級在文藝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做出了榜樣。自大力普及革命樣板戲以來，全國許多地方戲曲劇種普遍移植革命樣板戲，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移植革命樣板戲推動了地方戲曲開創了新生面。特別是自學習和貫徹毛主席關於影片《創業》的批示以後，無產階級文藝革命形勢有了一個新的飛躍發展，呈現出萬紫千紅，春色滿園，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戲劇、音樂、舞蹈、曲藝、美術等藝術品種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藝術品質和年產量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就拿過去比較薄弱的環節電影故事片來說，也比一九七四年增長一倍多，出現了不少思想性、藝術性都比較好的影片。



群眾性的業餘文藝創作也空前活躍。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深入工農兵火熱的鬥爭生活，與工農兵相結合，改造世界觀，把演出的重點轉移到基層，百分之六十場次到工廠、農村、連隊演出，使文藝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總之，以革命樣板戲為標誌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促進了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日益繁榮。這是對那種妄圖否定革命樣板戲和文藝革命，散布「今不如昔」的謬論者最有力的批駁。

無產階級文藝革命一直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前進的。在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領域政治謠言四起，偽造毛主席的指示，有少數人公開打著「我是有來頭的」旗號，大刮右傾翻案風。

在學習貫徹毛主席對影片《創業》批示時，據知由於黨內有人說過「《創業》問題，實質是路線問題」，因而有的人就說：「文化部要檢查路線錯誤」，「要挖文化部的後臺」。北京電影製片廠有的幹部說：「政治局看《海霞》時，為什麼××同志不參加？她過去講了那麼多話，還管用不管用？」中央樂團有的人說：「為什麼主席在鄧副總理的信上做批示？給主席的信收不到嘛！」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破門而出，攻擊對影片《園丁之歌》的批判，說什麼「把《園丁之歌》研究一下，……我們的思想混亂是怎麼造成的？要追根！」並且組織了班子寫了文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

【經姚文元修改審定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反黨文章（節錄）下面是文章中有關段落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在革命樣板戲帶動下，戲劇、文學、電影、音樂、舞蹈、曲藝、美術、攝影等，都有所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無論在品質方面或數量方面，更有新的飛躍發展。

至於群眾性的業餘文藝創作，這幾年更是空前活躍，生氣勃勃。總之，大量的事實證明，以革命樣板戲為標誌的文藝革命，促進了社會主

義文藝的日益繁榮，促進了藝術品種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呈現出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

請問右傾翻案風的鼓吹者，你們攻擊革命樣板戲「一花獨放」，「阻礙文藝發展」，根據何在？

注：這篇反黨文章，是「四人幫」御用的文化部寫作班子寫的，以「初瀾」的筆名發表。

### 【反對毛主席「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

造成「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的局面，不是偶然的，這是「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反對「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主義的必然結果。下面的材料，證明「四人幫」是如何一貫反對「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的。

#### (1) 原文化部寫作班子負責人張伯凡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四人幫」利用為他們所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自六九年前後以來，在重要社論、樣板戲的劇組文章與出版物中，公然篡改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制定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在這一方針的內容中砍掉了「百花齊放」，根本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七二年後，于會泳布置「初瀾」寫作班子炮製的一批黑文章，繼續進行這樣的篡改和歪曲。當廣大群眾和幹部批判他們破壞「二百」方針的罪行時，于會泳在七三年底傳達反黨分子江青的黑話，竟造謠說：「現在有人拿『八花齊放』來攻擊我們的作品少。」

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電影《創業》作了重要批示。「四人幫」及于會泳一夥施用了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段，慌忙企圖掩蓋他們篡改「二百」方針的罪行。當時，《紅旗》編輯部在把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和「梁效」炮製的所謂談「二百」方針的黑文章報送姚文元以後，還來要「初瀾」寫作班子再趕寫一篇。而于會泳在文化部一些會議上也假惺惺地說：「過去對貫徹『二百』方針不夠自覺」，「我們要進

一步貫徹『二百』方針」；他還布置我：對過去劇組文章中刪掉了「百花齊放」的地方，要趕緊告訴有關單位，再版時「要加上去」。但是，實際上姚文元一夥心懷鬼胎，始終沒有把已經炮製了的這幾篇黑文章在《紅旗》上拋出來。在「百家爭鳴」的問題上，他們用同樣的手段搞陰謀詭計。文化部在七五年十一月份召開創作評論會議，反黨分子張春橋向于會泳布置說：這個會「就是爭，最好爭得越激烈越好。」于會泳對與會人員聲稱：「要解除顧慮，暢開思想，展開爭鳴。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私下卻要我們將與會人員發表的一些正確意見、觀點，列為「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整出黑「材料」，作為「從文藝方面批鄧的專題」。他們篡改、破壞「二百」方針的罪惡目的，是要在文藝方面推行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

張伯凡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2）對外友協宋天儀等同志的揭發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晚，王、江、姚接見中國藝術團時，姚文元說：「同志們要有信心，執行毛主席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根本不提「百花齊放」這一條。近幾年來，在出國藝術團的對外講話稿和宣傳材料中，凡提到「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都要把「百花齊放」抹掉。一九七五年四、五月間，「四人幫」背著中央授意炮製的赴拉美中國藝術團《宣傳提綱》中說：「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這是毛主席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所制定的根本方針」，把「百花齊放」一筆勾掉。翻譯曾問文化部的有關負責人，這句話應理解為毛主席文藝方針的全部還是一部分，他說：「在文藝方面這三句話就夠了」，然後又作賊心虛地加上一句：「你們翻譯時最好不要譯得太死，最好譯成既可以理解為全

部，又可以理解為一部分」。

對外友協宋天儀資中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下面是出國藝術團的對外講話稿和宣傳材料中  
砍掉「百花齊放」的影印件〔略〕】

### 三、對抗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三月，「四人幫」給電影《創業》安了十大罪名，將《創業》一棍子打死。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對電影《創業》編劇張天民同志來信作了重要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份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化政策。」「此信增發文化部及來信人所在單位。」「四人幫」對毛主席的批示極端仇視，拼命反抗，竭力抵賴十條罪名不是他們搞的。江青污蔑給毛主席寫信是「告了老娘的刁狀」，猖狂地叫囂「老子不怕」。

【下面是「四人幫」扼殺《創業》，抗拒毛主席批評的有關材料】

#### （一）江青同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的來往電話記錄

##### 影印件原文

遵江青同志囑，打電話給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報》用了極大的篇幅吹捧《創業》，我建議《人民日報》和《紅旗》今後不要再登這類東西。

另外，我建議，對《創業》電影組織一篇有說服力的評論文章。這種評論權力我們不能放棄。可以評好，也可以批壞，總之，要按照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努力來建設文藝理論隊伍。沒有評論隊伍，是不能健康地繁榮創作的，有時間的話，我們確實要總結一下，建國以來文藝戰線上的鬥爭。

以上意見妥否，供參考。

文元同志來電話：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中午我起床後就給人民日報打了電話，要他們以後不要登這類文章，要登要經我同意。我在電視上看了一半不到，給我的印象是很亂，不清楚，別的還不能下評論。我還注意到當時中央首長給送《矛盾論》和《實踐論》，是指的那一位？

（二）江青、姚文元在陳亞丁等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給江青信上的批語

批語影印件原文

江青的批語：

請春橋、文元同志參閱。《創業》電影現已知是真人真事，但不是鐵人，待弄清後再說。

退江青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姚文元的批語：

有的同志告訴我：華政委的某些話幾乎是有關同志原話（如「婆婆嘴」）。另報告文學及歷次報導均沒有黨中央派飛機送「矛盾論」「實踐論」，不知怎麼加上去的。

姚文元

二月二十五日

（三）江青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給姚文元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囑：給文元同志打個電話：

關於《創業》的評論，按我們的批示精神寫，但我們不看。現在不急著發，過幾個月冷卻一下再說。

(四) 于會泳、浩亮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給江青的報告和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的批語

【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的批語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請春橋、文元同志批示。

江青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這個報告提出了一些問題，但似沒有把事情過程及產生原因說清楚：即報告文學是很動人的，為什麼電影中會出現這些錯誤呢？建議有關部門及創作單位認真討論江青同志的批評，從思想上把問題弄清楚，作一有分析的報告。另七頁有注，妥否僅供參考。

文元

三月十一日

同意文元同志意見。請文化部把事情搞清楚，才能真正總結經驗。

春橋

三月十二日

會泳同志：

我同意春橋、文元同志的意見，請照辦。

原件和信都請退我。

江青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 【于會泳、浩亮給江青的報告的影印件】

注：此件是毛主席批評的「四人幫」加給《創業》的「十條罪名」的原文。

####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聽了您對《創業》的批評後，我們心裡一直不安。開了會進行了檢查。現將初步檢查報告如下：

《創業》這部影片，我們過去不但看過，並且還提了三次修改意見，從原來的三小時十五分的放映時間縮短為兩小時二十五分。

我們在雙片送審的報告中，雖然也對此片提出了一些缺點，說了一些存在的問題，但是沒有抓住存在問題的實質及其要害。在這次您指出此片存在嚴重的問題之前，我們一直認為此片是很好的，認為搞成這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一些場合還宣揚過這部影片。

從您批評後，遵囑我們對照了您原來所推薦的報告文學《鐵人的故事》，又看了該片，感到兩者差距很大。初步感到有以下問題：

一、《創業》此影片所表現的題材是很好的，是重大的，是應該用各種文藝形式加以表現的。但此影片並沒有把這一題材表現好，不如報告文學感人，也不如報告文學脈絡（絡）清楚。因為這是一個重大題材，所以不應等閒對待，應該特別嚴格要求。

二、影片中三次籠統地提到「黨中央」和「中央首長」，如毛主席著作是「黨中央派專機從北京送來的」，「帳篷（篷）是中央從上海特調的」，「中央首長和全國人民期望著我們」。這些，顯然有意無意地起了給劉少奇、薄一波之流塗脂抹粉的作用。在報告文學中，絕無這種含糊其詞的提法，明確地指出：石油會戰是「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決策」。王鐵人的「兩論起家」，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全國群英會獎給他一套《毛澤東選集》，他學習毛主席著作更加勤奮、認真」，是自己搞起來的，不是影片所寫的那樣，什麼中央送書給他們的。

三、報告文學敘述了鐵人光輝的一生，但同時，寫了王鐵人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英雄」，「大慶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並沒有去著力宣揚還活著的人，和把油田會戰的勝利，歸功於大慶油田黨委。影片《創業》卻較明顯地存在著寫活著的真人真事的問題。據查，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許多是余秋里同志的語言，有的是原話，有的是據原話稍加演繹而來的，如：

——周挺杉說：「一個國家要有民氣，一個隊伍要有士氣，一個人要有志氣。」

——馮超說：「我們的會戰是在困難的時期，困難的地點，困難的條件下，上馬的。」

——華程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華程說：「我就抓住周挺杉不放」（據說原話是：「我就是抓住你王老鐵不放」。）

——華程說：「幹部要有個婆婆嘴，整天在你耳邊嗡嗡。要重視第一性資料，我們要為油田負責一輩子。」

——華程說：「大家可以橫挑鼻子豎挑眼，品頭論足嘛！」

——周挺杉說：政委是想「要建設一支拖不爛，打不垮的石油隊伍。」

——周挺杉說：「國家沒有油，國家有壓力，咱們是國家的主人，要分擔這個壓力。」

——華程對周挺杉說：「要觀大局，辨風向…」（余秋里同志在五九年二十一期《紅旗》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觀大局，看主流，辨風向，調動積極因素》。）

此外，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生活原型，如：

——康世恩同志是玉門油礦的軍代表，後來是大慶油田的領導人，與影片中華程的身分相似；

——打龍二井「水落油出」的情節，與康世恩同志領導打薩爾圖六十六號井的情況相似；

——周挺杉買土豆受批評的情節，又與康世恩同志處理過類似的事



件相似。

並不是說上述的語言本身存在什麼錯誤，而是說這種寫真人真事的風氣如果以合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則是後患無窮的。

【其中有些話顯然是錯誤的。江青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

【影片中使用的這些語言是否全部符合毛澤東思想，  
塑造領導幹部典型形像是否一定要選擇這些語言，

似可再研究一下。（此與真人無關，是創作上的問題）文元】

四、影片雖寫了創業上的艱苦精神，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得較差；而後者在報告文學中是作為重點方面之一來表現的。例如：工人群眾中本來有「天當房子，地當炕」這一類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豪言壯語，但在影片中，卻把這句話從一個落後的人物春生的嘴裡作為諷刺話說了出來。樂觀主義的警句，變成了悲觀主義的話柄。完全顛倒了。

五、在周挺杉的性格刻劃上，影片著重通過他愛衝動，愛發火，一會甩石頭，一會摔茶缸，一會又怒折樹叉等一類的行動，表現了一個魯莽漢子的形像，基本上沒有寫他的智慧，他的政策觀念和周密思考的方面。所以這個人物形像是單薄的，有缺陷的，因而不是不典型的。

六、影片中有許多戲有意地用貶低周挺杉的方式來抬高華程。如周說：「沒有條件，想方設法，拚死拚活也要上」，而華程接著說：「…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又如周說：「我們工人階級頂天立地地站著，……自力更生地建設我們的國家。」而華程接著說：「團結其他勞動階級，團結知識份子。」再如：在報告文學中，寫了鐵人他們打了一口井，品質稍差，而鐵人讓大家推倒重來，但在此影片中，則把周挺杉寫成一個在品質問題上受到批評的對象。

七、工程師章易之的轉變，一號人物周挺杉實際上並沒有起到作用。他倆見面一談就崩。在周受傷那場戲中，章易之的轉變，關鍵是章看到周的腿部受了傷，才轉了情緒。這裡有人情感化的傾向。

八、報告文學的脈絡（絡）十分清楚，影片卻有很多地方表述不清，讓人看不懂。具體表現在：1.情節上不清楚。如馮超因何被捕？老周師傅是怎麼被出賣的？馮超是怎樣進行破壞，造成噴井的？龍富貴的

來龍去脈不清，等等。2.技術性術語太多，一般人無法懂。3.有許多鏡頭組接上不清楚，亂蹦亂跳的地方。

九、報告文學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回述鐵人的過去，著力寫他解放後的鬥爭生活。影片對周挺杉這個人物，也應該主要放在會戰過程的矛盾衝突中塑造。但這裡卻用了很大篇幅去寫他解放之前。既造成浪費，又造成結構上拖遲。

十、主要人物的語言概念化。如，華程的語言中，大量地生硬地使用主席語錄和國際歌詞。從上可知：上述諸問題（特別是黨中央送書和寫真人真事等問題）在您所推薦的報告文學《鐵人的故事》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兩相比較，差別甚大。

以上是我們的初步認識，可能仍未抓到問題的實質。但，失敗和挫折的教訓，使我們懂得了不少的東西。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之低，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為此，使我們看不出影片中的嚴重問題，而且至今仍有一些問題沒有澈底弄清楚。另外，我們在工作作風上，也存在著粗枝大葉的毛病，對報告文學研究的不夠，為了急於趕節日出片，我們在審查上很不細緻，甚至有降低標準的傾向。這些不良傾向如不改正，對黨的工作，必然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下決心總結經驗教訓，努力糾正之。今後，一定在工作上，做到大膽謹慎，不驕不餒，細緻認真，嚴格把好關。

當否，請批示。

此致

革命敬禮

于會泳 浩亮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五）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談話記錄（節錄）

《創業》這個題材，是我推薦的，沒有排好，不細。許多地方，我看了幾次都看不懂。對這部電影，我是提過意見，但十條不是我提的。

張天民告了我的刁狀，說我看了，立即就停演。于會泳你說，這個情況你全知道，你為什麼不講？十條是文化部他們根據群眾意見（於：河南就有來信）整理的，文化部有缺點，十條確實是過份了。他們寫了文章，要公開批判，清樣都打出來送我了，張春橋同志也看過清樣，他也不同意發表、批判。我壓下來沒有批准。但是文化部他們把十條公開講了，評論清樣印出來了，我和張春橋同志都不同意發表。這些東西都在我那裡，黑字寫在白紙上，都放在我那裡。張天民信上說，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媽的什麼時候看過，什麼時候說過停演，這告的是刁狀。我的意思是，這部片子先這麼演著，逐漸在群眾中印象消失了，然後重新排一部好的，為的是怕損傷了大慶的積極性。

這部片子是有缺點的，張天民為什麼不檢查一下？主席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可見還是有錯誤的，為什麼不檢查？有許多對話是錯誤的，如「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是鐵人的話，為什麼要加到政委身上？「橫挑鼻子豎挑眼」，這是余秋里同志的話，餘還活著，在一個影片上為什麼把兩個還活著的高級幹部牽進去，不好嘛！還有吃窩窩頭，那時大慶吃窩窩頭嗎？這是給我們抹黑呀！丟礦砂，就是那個小布袋，打著手電筒在大草原上找東西，找什麼？我就看不懂，沒有交待清楚嘛。

張天民這個年輕人給主席寫信，後面總有人支持，可能有壞人。他本人沒有一點自我批評精神。年輕人，只要能做一點自我批評，他還是懂得大慶生活的嘛。那個叫什麼夫的導演，跳來跳去的，要查一下，背後有壞人支持，要追後臺。

#### （六）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藝界、新聞界部分人員的談話記錄（節錄）

張天民給中央寫信談的那十條，主席說，太過份了。這十條我不知道，是文化部搞的，但第八條我有責任，是說《創業》粗了些，有人逼著主席批，主席說《創業》無大錯，並不是沒有錯。《創業》我看就不要出國，可以重拍一部。

張天民你多麼大？（張說我四十六歲了）那你還是個娃娃，你告我刁狀，老娘今天要教訓你，有誰給你出主意。（張答，沒有）你必須給主席寫一檢討，你既敢給主席寫信，就必須給主席寫檢討，因為你說了謊，告了刁狀。

目前有人攻擊文化部，給文化部施加壓力，說文化部是大行幫，我替他們頂著，老子不怕。

### （七）劉慶棠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主席對《創業》影片的光輝批示下達後，一九七五年八月反黨分子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召集于會泳、王曼恬、浩亮和我到釣魚臺十七樓會議室，談主席批示的問題。

江青說：「張天民寫了兩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沒批。另封給鄧小平轉給主席，是鄧小平逼著主席批的。」又說：「主席還沒看《創業》影片，你們要搞兩個標準拷貝，一部送主席，另個送給我。」又說：「主席說無大錯，那就是還有中錯和小錯，並沒有說是優秀影片嘛！」

張春橋說：「主席用詞向來很嚴格，你們要去仔細理解。主席說無大錯，那還是有中錯和小錯嘛！並沒有說是優秀影片嘛！主席說調整政策，並沒說別的。」

姚文元說：「每當黨內要調整政策時，總有人利用借機鬧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這樣。」

劉慶棠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

### （八）光明日報社的揭發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對電影《創業》作了重要批示。八月二十一日，姚文元把莫艾找去，說：「無大錯並非十全十美」，「在評論此片時，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點、錯誤也評成好的」。他指令把標題

中贊《創業》的「贊」字改為「評」字。姚還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要求全責備」的話，十分惱火地說：「這是指領導說的，編輯要掌握這個精神，也不必寫在這裡」。又說：評論《創業》的文章，「先發一個版也可以了，聽聽意見，以後再發」。最後姚文元還別有用心地說：「又抓《水滸》，又抓《創業》，誰先誰後？我想還是把評《水滸》放在前頭」。

光明日報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 四、攻擊毛主席肯定的電影《園丁之歌》，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園丁之歌》是經華國鋒同志審查，並指示拍成電影的。「四人幫」橫加指責，污蔑《園丁之歌》是一株「大毒草」，姚文元攻擊「此劇的路線及其歌頌的人物都是錯誤的」。他們還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文章。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到湖南，看了電影《園丁之歌》，毛主席看後鼓掌，並說：我看是出好戲。但「四人幫」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繼續抓住《園丁之歌》大做反黨文章，把攻擊矛頭指向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 （一）「四人幫」扼殺《園丁之歌》的罪證

【張春橋、江青在審查《園丁之歌》時的反黨講話記錄（節錄）】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春橋、江青、文元同志審查此片，並作了指示：

江青同志：

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該是共產黨，怎麼能是教員？男教師的人物形像也不好。

春橋同志：

這個戲在教育路線上也有問題，學生受教師擺佈。現在有一種傾向

不好：讓孩子像小大人一樣。女教師有一點還是符合這個人物的，她熱愛工人；但最後，又給孩子出了個難題，這是壓服。結果是聽她擺佈。最後矛盾沒有很好解決和發展下去。

江青同志：

看不出典型環境來。女教師還給男教師說好話，男教師轉變也不合理。「沒有文化怎能擔起革命重擔」，這句話問題大了，這句話簡直是反攻倒算。女的表演簡直是青衣花旦，化妝像少奶奶。

【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扼殺《園丁之歌》影片的批語】

《園丁之歌》的電影應該上演，上演的同時發表批判文章。

江青

【于會泳給江青、姚文元報送初瀾的黑文  
《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信和江青的批語】

影印件原文

江青、文元同志：您好！

遵囑，已寫好評《園丁之歌》的文章。送上，請審閱。

此致

革命敬禮！

會泳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請春橋、文元同志先閱。並提出意見。

江青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節錄）

——評湘劇《園丁之歌》初瀾】

湘劇《園丁之歌》，是一出名為反映「教育革命」，實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唱讚歌的小戲。

這齣戲通過它的劇名和全部情節，特別是對俞英這個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觀眾宣揚了如下的觀點：一、培養我們青少年的「園丁」是教師；二、沒有文化就不能承擔革命的重擔；三、學生如不循規蹈矩地死啃書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顯，這些觀點都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舊調重彈，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在教育戰線上的一系列新的革命變革的反攻倒算。對此，我們必須堅決批判。

「花紅要靠育花人」，「培育還靠好園丁」，這是貫穿《園丁之歌》全劇的主調。這個主調，是要把作為教師的知識份子奉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園丁」來大加歌頌，因而這就不只是一個劇名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教育的領導權究竟掌握在誰手裡的大是大非問題。

「沒文化怎能將革命重擔來承擔」，這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反動謬論，它完全經不起革命實踐本身的檢驗。幾千年來的人類歷史，承擔革命重擔，推動歷史前進的，難道不是創造文化卻不能佔有文化的奴隸、農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隸主、地主階級的「聖賢」和資產階級的「精神貴族」？在我國人民近五十多年來的革命鬥爭史上，有多少從未進過校門的工農，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難道不正是他們，勇挑革命重擔，為黨和人民做出了貢獻？在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又有多少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歷史和現實的無數事實說明，這種「沒文化怎能將革命重擔來承擔」的謬論，簡直就是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反攻倒算！也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如果依著《園丁之歌》宣揚的那套去培育「桃李」，那就是依了地主資產階級，即使有了「高度的文化知識」，也不可能承擔無產階級革命的重擔，而只能成為修正主義的「社會棟梁」和資產階級的接班人，由他們去駕駛「時代的列車」，就會像蘇修出現的那種情景，大開歷史

倒車，復辟資本主義！

【在「四人幫」策劃、煽動下，在很短時間內，  
發表了近百篇批判《園丁之歌》的文章，  
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

下面是部分批判文章的影印件〔略〕

【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四人幫」和他們在文化部的親信扼殺影片《園丁之歌》，直接反對華國鋒同志。一九七四年春天，國務院文化組就告訴上海準備批判，市委布置報社印劇本、寫文章（當時我住醫院），七月十九日國務院文化組發出批判《園丁之歌》的通知後，我緊緊跟上，要上海報紙積極參加批判，連續發了初瀾等的文章，並布置工農兵作者寫文章。這時，我也看到了傳來的張春橋、姚文元的黑批示，姚文元批道：「《園丁之歌》宣傳的路線以及歌頌的人物都是錯誤的。」國務院文化組的通知寫得十分明白，《園丁之歌》是「內容有嚴重錯誤的壞戲」，「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扣了三頂大帽子，而且還盜用中央名義，說什麼「經中央批准，決定在京、津、滬、湖南四省市……進行批判。」這其實就是江青下達的「聖旨」。於是我不但在上海報紙上組織批判，而且在七四年八月上海的一個教育革命座談會上，學著「四人幫」的腔調，大講什麼：「《園丁之歌》，中央領導（「四人幫」）指出電影所歌頌的路線和人物都是錯誤的。所歌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宣揚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對學生實行管卡壓或搞軟的一手誘導，使他們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最後培養為資產階級接班人。」我還攻擊「影片宣揚知識份子領導學校，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一九七二年還出這樣的影片，說明路線鬥爭在繼續。」我大肆攻擊影片裡的女教員之後，還壓制教育戰線上同志們的不同意見，我胡說「在我們教師隊伍裡有一部分人還有這樣的反映，看到這樣的教師還認為是好教師，從影片看不出有害問題」等等，我這樣說，完全是顛倒黑白，把華國鋒



同志親自關懷下拍攝的歌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影片一棍子打死，搞亂人們的思想。這還不算，七四年八月，我決定上海話劇團的獨幕話劇《小將》上北京參加全國文藝調演時，還鼓動劇團的同志「和《園丁之歌》對著幹」，妄圖拖人下水。這是把矛頭對著華國鋒同志的。

徐景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 （二）湖南省委的反擊和「四人幫」的陰謀活動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文化局關於湘劇

《園丁之歌》問題的請示報告】

影印件原文

文化部：

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熱潮中，我們學習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學習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結合實際，認真研究了繼續搞好文藝革命的問題，並重新分析了湘劇《園丁之歌》等作品，認為《園丁之歌》是在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精神指導下產生的，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的，是一出好戲。雖然還有些缺點，但可以修改提高。為了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加強文藝領域裡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我們認為，繼續上演《園丁之歌》，放映這個戲的電影，出版、發行這個戲的本子，是必要的。同時，還請求將電影花鼓戲《兩張圖紙》的樣片，寄給我們，以便把這個戲改好。

以上報告，當否，請即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文化局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會泳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給江青的電話記錄】

## 影印件原文

于會泳同志來電話：

湖南省革委會文化局給文化部來報告，關於湖南湘劇《園丁之歌》的問題他們說通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重新作了分析，認為這是出好戲，是符合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雖然還有些缺點，但可以修改提高。並建議繼續上演，放映電影，出版發行劇本，是必要的。聽說這個報告是張平化同志要他們寫的。

〔江青的批語：電話告春橋、文元同志。我們三人一塊審查的。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

##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給于會泳的電話記錄】

##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囑，回于會泳同志電話：

關於《園丁之歌》，應向張春橋同志報告。因為：（1）張春橋同志主管文化部；（2）春橋同志對這個戲的意見比我的意見更完整、更深刻。我只是認為，園丁應該是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知識份子。春橋同志除同意我這個意見外，還認為有關教學問題，這個電影也是錯誤的，春橋同志這個意見，我說不清楚。我們是一塊兒審查這個電影的。

## 【文化部核心小組給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報告】

## 影印件原文

春橋同志：

九月一日我們收到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文化局的來件，說《園丁之歌》是一出好戲，因而要求放映影片《園丁之歌》。現將原件複製報上，請閱示。

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已分送：江青、文元同志

### （三）「四人幫」的反撲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  
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對張平化同志）你對《園丁之歌》那樣積極，造了許多謠，那個信說是你支持寫的，搞的？（張答：是。）你能夠造主席那麼多謠，而且你安排了給主席看，是不妥當的。說初爛（初瀾）就讓他爛了吧。一個服務員那樣造謠。我已經核實了，我對這個戲兩點意見，有意見我沒說，就是對內容有意見。那個戲是我們三個人審查的。它叫《園丁之歌》，我覺得園丁首先應該是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工人、貧下中農，怎麼會成了知識份子了呢。意見多、深刻的是春橋同志。你願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們當時說也不要批什麼，就壓起來。後來你們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瀾的文章我沒有看。初瀾是什麼人，我也不知道。

當時，好些內容很不好的電影也要出籠了，出籠很好。我覺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讓群眾鑒別，這是主席的方針嘛。毒草鋤掉還可以作肥料。《園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許馬克思主義的評論，來評它。（張平化：現在沒有見誰有這個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張：不是。）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點嗎？那應當說是有錯誤。你就是獨獨沒有登評《海瑞罷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來，就是你太積極了，告狀告到主席那裡，叫主席看，主席從來在這一類事上是超脫的。你叫服務員來探聽，找了那麼一大堆，然後說，這個戲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樣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樣映嘛，然後再改嘛。已經拍成了，國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這方面上我覺得我還很有一點熱心。他把園丁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可以拿原來的拷貝給同志們看一看，大家評論評論。

### （四）張平化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國務院文化組向北京、天津、上海市和湖南省革委會發出了《關於批判〈園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說：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湘劇高腔《園丁之歌》是一個內容有嚴重錯誤的壞戲。它的要害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初瀾的批判文章，並在三市一省發動了對《園丁之歌》的批判。而且強令湖南先批，這是「四人幫」的陰謀，後來他們就把責任推到湖南，說是你們自己先批的。一九七四年冬，偉大領袖毛主席來到了湖南。在十一月份的一天，毛主席提出要看看電影，省委接待處的同志開了一批影片的單子送給主席，主席圈了《園丁之歌》。當時，主席看完後就鼓掌。在主席身旁的服務員曾彩謀同志看到主席鼓掌，便對主席說：「主席呀，這是個受批判的片子呀。」主席問小曾和在場的同志說：為什麼要批判，你們講講有什麼問題？我看是出好戲。

一九七五年八月，省文化局根據省委的意見，向文化部寫了請示報告，提出《園丁之歌》不是壞戲，不要批了，要公演，如有不妥，請即指示。文化部接到這個報告，十分不滿，在會上點湖南的名，說湖南為《園丁之歌》翻案，「氣焰囂張」，給文化部的報告是「最後通牒」。

《園丁之歌》是在華國鋒同志的關懷下拍成電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看了電影《園丁之歌》鼓掌稱讚。這些情況，江青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她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硬要死死抓住《園丁之歌》大做文章。今年三月，我參加了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會議期間，江青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單獨召集十二個省。市和兩個大軍區負責同志開會。她在會上大講黑話，橫蠻整人，無理訓斥了許多同志。她在點名訓斥我的時候，惡狠狠地說：「你們為《園丁之歌》翻案」，「你們告狀告到主席那裡去了。你們要主席看《園丁之歌》，強加於主席。」對她的無理指責，我當時頂了她一下，我說：「我們認為湘劇高腔《園丁之歌》是好戲，不是壞戲，不是毒草。我們省委常委會議討論過，大家都說不應當再批判，而應當公演。我省文化局給文化部寫的請示報告，是根據我們省委的意見寫的，責任由省委承擔，首先由我承擔，不要批評文化局。為什麼不用省委名義寫報告，而用文化局名義寫呢？因為用省委名義，就要向毛主席、黨中央寫，而毛主席、黨中央並沒有要我們批判

《園丁之歌》，所以，我們只好要文化局向文化部寫報告。」江青聽了很不滿，她惱羞成怒，咆哮如雷，反而指責我說：「你不要氣鼓鼓地。」接著江青又說：「我的意見，就是不應當把兩個知識份子比作園丁。可能是春橋意見多一點。至於說初瀾批《園丁之歌》的文章，我沒有看，初瀾是什麼人，我也不知道。」江青當面撒謊，初瀾是什麼人的筆名，江青會不知道嗎？至於把兩個教師比作園丁，有什麼可責難的，毛主席提倡知識份子勞動化，而園丁正是培育果樹的勞動者，把教師比作培育幼苗的園丁，不是很恰當嗎？!

至於江青指責我們「強加於主席」，更是橫蠻無理到了極點。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親自圈定要看的影片，我們有什麼理由、有什麼權利不給毛主席看呢?!這裡使我更清楚地看到，江青之所以這樣猖狂地向《園丁之歌》進攻，首先，她是明目張膽地反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同時，她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英明選定和高度信任的接班人華國鋒同志，妄圖為「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掃清道路。

張平化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

#### （五）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黨委的揭發

一九七三年四月間，根據華國鋒同志的指示，當時主管電影工作的同志指派新影組成攝製組，去湖南拍攝電影《園丁之歌》。

攝製組在湖南省委大力協助下，在六月底完成了影片攝製工作。

影片上送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看完影片，江青叫嚷：「園丁應該是黨，怎麼是教師，是知識份子？」「桃花滿園，還是修正主義那一套。」又抓住一句唱詞：「沒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擔來承當」，說什麼：「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張春橋還大言不慚地說：「這類問題還不易看出來！」姚文元也幫腔：「還不如叫那個孩子去當工人」。就這樣砍殺了這部影片，不准送給毛主席看，也不准上演。

一九七四年初到七月，江青在接見電影工作者的兩次談話中，都責令要批判《園丁之歌》。「四人幫」在文化組的親信於、浩、劉下達黑指示，命令在三市一省組織群眾公開批判。

一九七四年底，在批判《園丁之歌》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湖南看了影片《園丁之歌》，鼓了掌，肯定了影片。可是「四人幫」嚴密封鎖消息，不准有關單位知道，也不給《園丁之歌》恢復名譽。

一九七五年底，劉慶棠主管電影，秉承「四人幫」的旨意，派人到新影追查過有無對批判《園丁之歌》進行翻案的情況。他們這樣做是直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華國鋒同志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委員會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

## 五、攻擊毛主席、黨中央批准公開放映的電影《海霞》

一九七五年春，周恩來總理觀看了影片《海霞》，肯定了這部片子。七月二十五日，影片編導謝鐵驪、錢江同志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文化部在處理影片《海霞》上的錯誤。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審查了電影《海霞》，決定按作者修改過的影片上映。「四人幫」極為不滿，百般刁難，攻擊電影《海霞》，並指使他們在文化部的親信，組織文章進行批判，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毛主席、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

### （一）于會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江青的電話記錄

#### 影印件原文

會泳同志來電話說：

關於《海霞》影片，情況很複雜，受到人的支持。在未改之前就肯定了。現在聽說要公影（映），讓群眾評論，有人又想把責任推出去。名義上改了一百多個鏡頭，實際上主要問題沒有改。現在有的人說話氣很粗。我希望當面向江青同志報告一下。

## （二）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于會泳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囑，回會泳同志電話：

有關《海震》的問題，既然情況複雜，我建議你向春橋同志當面報告。我這兩天又有點感冒。以後除錄音工作外，文化部的工作都要向春橋同志報告。

## （三）于會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給江青的電話記錄（節錄）

影印件原文

會泳同志來電話：

政治局的同志看《海震》，我和張維民同志去了，謝鐵驪、錢江同志也去了。看完後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我們四人就回去了。在看的時候，謝鐵驪在鄧付（副）總理和李副總理之間邊看邊談，我們沒有說話的機會。晚上去了八個政治局同志。

## （四）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談話記錄（節錄）

《海震》就不同了，基調很壞，改了一百多個鏡頭，再改也不行了，基調改不過來。現在，我還可以批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謝鐵驪、錢江，我過去幫助他們很多，他們還給我寫信，要我看「雙片」，幫助他們。我當時身體不好，沒有看，他們誤會了。我對他們幫助最多，他們連資產階級講的良心都沒有。這事是春橋同志管的。我從來不看「雙片」，我不上當，看「雙片」就得負責。他們給政治局寫信，給主席寫信，主席就沒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瞭解情況，看了「雙片」表了態。他們壓文化部，現在文化部壓力很大，我替他們頂住，老子不怕，老子頂著。有人說我翻案，這不是翻案，我現在要打反攻。

《海震》要批，但現在不批，因為會干擾評《水滸》，將來還得要批。

### (五) 于會泳等人炮製的攻擊《海霞》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批註

一九七六年三月，于會泳等人炮製了《右傾翻案風與電影〈海霞〉》一文，送江青、姚文元批發，姚文元作了批註，但此文後來未敢出籠。

#### 【《右傾翻案風與電影〈海霞〉》一文的影印件】

##### 影印件原文

〔送江青同志閱。此文寫得不夠理想，還須修改。有空時請翻閱，如有意見，請批後退我〕

《海霞》編導這些所謂「創新」，同革命樣板戲的創作道路是如此背道而馳，哪裡還談得上學習革命樣板戲的經驗呢？其實，《海霞》的「創新」並不新。它所追求的「散文式的抒情風格」，在外國資產階級影片中早就司空見慣了。所謂電影應該是「抒情詩式」的還是「散文式」的，長期以來就有兩派爭論。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都是所謂超階級的人性論。有的作品就把兩者調和起來，標榜什麼既是「抒情」的又是「散文」的。而《海霞》所追求的「風格」也不過是拾外國資產階級的牙慧罷了，它和無產階級提倡的標新立異是格格不入的。〔實際上受蘇修電影影響形式為內容服務。未講清楚。〕

《海霞》的錯誤傾向本來是顯而易見的，在攝製過程中就有同志提出過中肯的意見。影片上映以後，工農兵群眾和革命文藝戰士又提出了許多嚴肅的批評。但編導固執己見，終至鑄成錯誤。〔主要不要指向編導，而要指向右傾翻案風煽動、製造者〕

一部影片拍出來，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就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同時也要允許批評，允許反批評。《海霞》問題本來並不複雜，後來之所以尖銳化，根子是在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身上。有他撐腰，編導才那樣不聽人勸，我行我素；有他打氣，圍繞《海霞》問題的奇談怪論，一時甚囂塵上，謠言不脛而走；有他插手，便破壞了文藝隊伍的安定團結。總之，就是這個搞復辟倒退的總後台利用《海霞》問題，加大了文藝界右傾翻案風的風力。這就使得弄清《海霞》的問題，超出了對一部影片如何評價的範圍，成為了當前從政治



上、思想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個鬥爭內容。

注：文中的旁批，是姚文元寫的。

#### （六）于會泳的交代

##### 影印件原文

在這一階段，江青有幾次要批《海霞》的黑指示和黑話。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在大寨期間，在那次關於電影問題的會上，她公然叫囂：「《海霞》不是部好影片，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成了個城市大小姐。現在不批，將來要批！告訴你們文化部改的一稿也要批！」這就是說第一稿和第三稿都要批。

一九七六年春季，她在釣魚臺開會又講過與上述大寨會上同樣的話；而且另外又在講到「這是鄧小平支持的片子」之後，還說「那位鄧大姐可喜歡呢！他們可支援嘞！」

在這以前，劉慶棠向我說過：有一次江青找他去談電影問題，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場。在談到《海霞》問題時，江青說：「《海霞》這部片子拍出雙片來，他們沒有送給我看，可是先送給鄧穎超他們那條線兒上看。總理可支援呢！」

于會泳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 六、蓄意歪曲毛主席對《水滸》的評論，大肆宣揚「宋江架空晁蓋」，污蔑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對《水滸》這部小說作了評論。毛主席的這篇評論，是對當時給毛主席讀一些文學作品的蘆荻同志講的，後來由蘆荻同志整理出來。蘆荻同志所寫的材料證明，毛主席的評論，是對《水滸》這部小說的，沒有別的意思。但是，「四人幫」卻肆意歪曲毛主席的評論，大造反革命輿論，說什麼評《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一九七五年九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毛主席批

准的議題是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江青卻在大寨大講什麼《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影射攻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並且無理要求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同志識破了江青的陰謀，及時報告了黨中央。毛主席知道以後，憤怒地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明確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打擊了「四人幫」的反動氣焰。

### （一）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關於評《水滸》的指示全文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晁蓋於一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 （二）「四人幫」歪曲毛主席關於評《水滸》指示的有關材料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蘆荻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毛主席關於《水滸》的光輝論述，是同我談的。

主席一向關心歷史、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當時，他老人家雖在病中，萬機之餘，仍是手不釋卷；尤其愛讀魯迅的文章，讀時，常常發出贊許的笑聲。偶或，他也讓我提些問題，然後，通過解答，親切慈祥地給我講點歷史、文學史和魯迅。我曾向他請教過關於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八月十三日，我又請教了關於他提到過的那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的問題，然後談到了《水滸》。關於《水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由於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又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後來，又傳說主席有一個講話，其中提到了《水滸》。因此，當談到《水滸》時，我順便向主席請教了這件事。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接著我又請教他：既然如此，那麼《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裡？應當怎樣讀它？於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便講了那些見於《水滸》批示中的話。

主席非常推崇魯迅，每次談話，都要提到他。當他聽我說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說史稿時，便說，魯迅評小說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他更盛讚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的評論，稱揚魯迅對金聖歎的批判。他對《水滸》研究中長期沒有貫徹魯迅的評論精神，對金聖歎的腰斬《水滸》和大量發行的是這一腰斬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滿。因此，他發出了《水滸》批示，指示：《水滸》的主要的三種版本都要出，把魯迅的話印在前面。

主席講《水滸》時，談笑風生，和藹幽默。就該書的主導的政治傾向問題，他反復舉例，細緻地進行了分析。他在《水滸》批示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古為今用，從作品的認識價值出發，對《水滸》作了精闢的論述，為我們研究文化遺產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她（它）不僅是肅清學術研究中的階級調和論、唯心論的強大的理論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反修防修，教育人民群眾提高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

悟水準的強大的思想武器，使群眾不斷汲取歷史經驗，不斷提高識別投降派、革命蛀蟲的本領，掌握好革命領導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萬惡的「四人幫」，正是《水滸》投降主義的吹鼓手。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復辟三大敵人的統治，他們卻立即抓住了《水滸》批示，急忙進行篡改和歪曲，顛倒敵我，興風作浪，大造起反革命的輿論來。

批示發出不到三小時，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貫徹」的辦法，偷樑換柱，篡改了批示的精神內容。本來，批示一開頭，主席就明確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接著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屏）晁蓋於一〇八人之外。」說的分明都是這部書的問題。下面，批示揭露了《水滸》歌頌的宋江，乃是一個投降派、一個鑽進了革命營壘的地主階級分子；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這一部以農民起義為題材的小說，正是通過對宋江的頌贊來鼓吹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而姚卻偷天換日，拋開批示所談的內容，為之定出了一個所謂「宋江排斥晁蓋是為了投降的需要」的黑命題。九月，江青竄到大寨，又作了所謂評論《水滸》的黑報告，文不對題地瘋狂叫囂：「宋江一上臺，就組織個黑班底，把晁蓋架空了。」通過影射和比附的卑鄙伎倆，大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把罪惡的矛頭指向了敬愛的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隨之，他們御用班子的黑文章，便紛紛出籠了。

九月中旬，我奉主席命令，到大寨參加關於幾篇賦的注釋的討論。聽了江的黑報告的錄音後，對她違反批示精神的胡言亂語，十分氣憤，便向謝靜宜說了。隨後，在江青令人組織的「學習」她的黑報告的討論會上，我說：「沒聽懂。」表示了我的反感。在回來的火車上，謝靜宜對我說：「大寨的事，你回去不要彙報。」可見，這一幫魍魎魍魎，是多麼害怕太陽的光輝！而由於「四人幫」搗鬼，我從那以後便再也沒有見到敬愛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了。

蘆荻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所以不要以為評水滸這是一個文藝評論，同志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文藝評論，也不純是歷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

所以不要看低了評水滸這件事，說它是文藝界的事情。不是啊，不是那麼回事。你看嘛，主席對學馬列的指示這篇話，有的人就不提。我剛才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貢獻發展，有的人就膽敢刪掉。這你們就可以識別了吧，你看宋江怎麼樣處心積慮地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最後晁蓋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啦，晁蓋那個廳啊叫聚大義，晁蓋托膽稱王啊，他是造皇帝反的，他是聚義，像咱們這樣聚在一塊商量大事啊。

【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

在大寨和文藝界、新聞界部分人員的談話記錄（節錄）】

為什麼主席現在指示批《水滸》，大家考慮考慮。《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一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惡吏，佔據了各重要崗位，架空晁蓋，不然為什麼晁蓋頭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所以主席說，林彪一類如上臺搞修正主義很容易。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中說，對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限制，我們說這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貢獻，但是有人膽敢把它刪去。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張天民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晚，江青在大寨國際旅行社召集北影、長影、新影、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家著作注釋組、兩校寫作組、詞曲組部分同志共一百餘人談話，公開攻擊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和部隊。

江青說：「同志們，吃飯前給同志們講一點事。黨內路線鬥爭曲折的很。最近，有那麼一些人，把主席批評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傳達的，政治局沒有討論，給傳出去了。」

「我這個人天天挨罵。修正主義罵我，共產黨員還怕罵嗎？不挨罵，算什麼共產黨員？」

「最近，在北京我剛跟他們鬥了一盤。」「在北京我不自由，在這裡我心情舒暢。」「在北京我跟他們鬥了半年多了。」「我就是不怕罵，老娘就是不怕罵！」

「評《水滸》要聯繫實際。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件不給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在中央我看的檔最多了。」

「三十三條語錄（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政治局連一遍都沒學完。」「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領袖就是鄙人。」

國務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

「有人說樣板團拿補助，自己還交十二塊錢嘛！空軍伙食四十元，樣板團比他們差遠了。軍隊就有這種人，我又要罵人了，簡直是混蛋王八蛋！」

當有人把江青比做馬克思時，江青帶頭鼓掌。

長春電影製片廠張天民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劉慶棠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反黨分子江青召集于會泳、浩亮和我去鈎（鈎）魚台十七樓會議室布置錄音、錄相、推薦影片的會議。

江青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

劉慶棠  
一九七七年三月五日

【下面是姚文元審改的稿子】

新華社的揭發

經過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新華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發的《北京大學結合批鄧評論〈水滸〉》稿中，把鄧小平同志誣衊為「現代投降派」，「還鄉團」的「後臺」，說什麼「鄧小平和宋江，他們修正革命路線從而叛變革命，則是一樣的」，「現代投降派鄧小平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極盡排斥之能事」，「在他的策劃、指揮、煽動下，一時群魔亂舞，右傾翻案風四起，還鄉團大打出手。鄧小平做為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導演了向無產階級進攻、向資產階級投降的醜劇」。姚文元在此稿最後，還親筆加上一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是一個混進革命隊伍內部的投降主義者」，有意把鄧小平同志同機會主義頭子陳獨秀、王明、劉少奇、林彪之類並提。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姚文元審定修改的一九七六年第一期《紅旗》發表的

《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一文（節錄）】

影印件原文

《水滸》這部反面教材，所歌頌的宋江改變晁蓋的革命路線的過程就是從篡奪領導權開始的。這個混入農民革命隊伍中的地主階級的代理人一上臺，就推行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路線，很快改變了梁山農民革命根據地的顏色。這個事實說明，領導權掌握在什麼人的手裡，對於革命的成敗至關重要。歷史是認識現實的一面鏡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有些部門和單位由於領導權沒有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裡，因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得不到徹貫（貫徹）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受不到抵制和批判，資本主義到處氾濫。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奪回了被劉少奇一夥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進一步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警惕修正主義者篡奪領導權，仍然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重要問題。

姚文元修改時加上的一段話：

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特別強調了領導權的重要性。「屏晁蓋於一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

## 七、攻擊毛主席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

毛主席為我們黨制定了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爭取盡可能多的知識份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談話時指出：「教育界、科學界、文藝界、新聞界、醫務界，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點馬列的。」「老九不能走」。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學部老知識份子出席國慶招待會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

毛主席五月三日的指示，「四人幫」是親自聽到的。但是，他們竟然喪心病狂地把毛主席的指示作為「謠言」追查，並且公開批判。他們對傳達和執行毛主席這一指示的鄧小平同志等中央負責同志進行人身攻擊，惡意誹謗。

### （一）新華社的揭發

朱穆之同志聽說毛主席作過「老九不能走」的指示。朱穆之同志曾當面問姚文元，毛主席有無此指示，姚說是造謠；過了兩小時，姚又打電話說，有過這麼回事。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姚文元在新華社采寫的《南京一些科學家談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一稿上公然批道：「那句話（注：指毛主席上述指示）是捏造的、別有用心地篡改的。現在可作為批判右傾翻案風影響的反面材料了。」姚文元在修改新華社學習簡報時也說是「歪曲主席的話，毛主席根本沒有這個指示」。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姚文元在《南京一些科學家談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稿件的批語】

批語影印件原文

此件壓下未發，因其中那句話是捏造的、別有用心地篡改的。現在可作為批判右傾翻案風影響的反面材料了。

退新華社存

姚文元  
三月七日

（二）遲群、謝靜宜一九七六年五月在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習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講到教育陣地，教師都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我們沒有自己的教員、教授，以後靠他們才逐步培養了新的，但也是按照他們的思想體系培養的，「基本照舊」，除了不喊蔣委員長萬歲外，也差不多。

「老九不能走」，一開始我們就認為是錯誤的，毛主席不會這樣說。這句話有兩個錯誤：一個，「老九」不是我們的語言；第二，「不能走」，怎麼走了？文化革命幾年走到哪裡去了？

「老九不能走」，這個話是煽動和挑撥知識份子同黨的關係，是對毛主席的知識份子政策的根本否定。

（三）兩校「大批判組」編輯的《鄧小平言論摘編（初編）》（節錄）

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技術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還是要。

兩校「大批判組」加的反革命按語：又是無恥造謠！鄧小平用這類謊言對抗毛主席關於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蓄意製造混亂，挑撥知識份子和黨的關係。鄧小平站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立場上，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煽動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

(四) 《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彙報提綱〉出籠的前前後後》(節錄)

影印件原文

這是鄧小平喪心病狂地把「老九不能走」的謠言強加給毛主席的做法的又一次表演。

(五) 《文匯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發表的《兩個提綱一條黑線——從〈二月提綱〉到〈彙報提綱〉》(節錄)

影印件原文

鄧小平不就以「老九不能走」云云，大造毛主席的謠言嗎？

## 八、攻擊毛主席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在同李先念、汪東興同志談話時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李先念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傳達，毛主席圈閱的一九七五年中央第四號檔又向全黨作了傳達。這些，「四人幫」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們既是一夥反革命，就必然竭力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削弱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他們猖狂攻擊毛主席的指示是「謠言」，是「修正主義口號」，攻擊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搞「唯生產力論」，是「為資產階級重新登臺作『嫁衣裳』。」

(一)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我沒有聽主席說過。

(二) 大寨大隊郭鳳蓮等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江青第二次竄到大寨。她在九月五日下午的一次會上，肆意否定毛主席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明目張

膽地造謠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句話，毛主席根本沒有講過，純粹是造謠，那是造謠公司董事長造出來的。

郭鳳蓮 郭富銀 翟保金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三）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馬天水等人的談話記錄（節錄）

我的那篇文章（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他（指鄧小平同志）就提了一個意見，說共產主義要有物質基礎。但又說，不過後面講是講了一下。我說，共產主義的物質，我管不了。

（四）姚文元審定修改的梁效、任明的一篇反黨文章（節錄）

「《紅樓夢》裡有句話：『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發展生產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妄圖把人們引誘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為資產階級重新登臺作『嫁衣裳』。」

下面是姚文元修改的文章的影印件〔略〕

（五）姚文元在《論總綱》一文旁所作的反動批語

在《論總綱》一文中引用了列寧的教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又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文章說列寧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的標準。姚文元在列寧和毛主席語錄旁邊劃了一道線，還作了一個反動批語：「歪曲馬列，還是回到唯生產力論。」

【下面是姚文元在《論總綱》一文旁所作的反動批劃的影印件（略）】

注：箭頭所指的是姚文元的反動批語。

#### （六）上海機床廠董煥章等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馬天水在上海機床廠黨委辦公室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國家都這樣提的。沒有一個國家不講搞上去。這是任何國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義口號。」

董煥章 丁希賢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 （七）毛遠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談話記錄（節錄）

「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搞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基礎」，這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論」，搞復辟資本主義。

#### （八）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在北京時說到現在火車老晚點，張春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的火車最准點，分秒不差。怎麼能比那個。」

張維維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 （九）上海鐵路局劉白濤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幹部打招呼會議的小組會上，馬天水問我：你們鐵路運輸靠什麼上去的？我說：「靠毛主席三項指示，靠中央九號檔上去的。」這時馬天水氣勢洶洶地說：「你們鐵路運輸是壓上去的。你們敢字當頭，路線不對頭，越敢錯誤越大。希

特勒膽子比你們大的多哩。」

劉白濤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

## 九、攻擊經毛主席審閱批准的華國鋒同志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報告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黨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華國鋒同志在大會上作了重要報告，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華國鋒同志的報告，是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主席親自審閱批准的。但是，「四人幫」卻瘋狂地進行攻擊，江青惡狠狠地說：「這個報告說輕一點是修正，說重一點是修正主義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干擾和破壞這次會議，反對宣傳和貫徹華國鋒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所作的這個報告，妄圖砍掉大寨這面紅旗，破壞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革命群眾運動。

### （一）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給《紅旗》雜誌社的電話記錄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二十分

文元同志電話

一、華國鋒同志報告，中央已有檔發至基層，是否就不登了。

### （二）姚文元砍掉華國鋒同志報告的一九七五年《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目錄原稿〔略〕

### （三）《紅旗》雜誌社林兆木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反黨分子姚文元召集《紅旗》「六人小組」開會時，有的同志提出，有人對《紅旗》不登華國鋒同志的報告，

很有意見。姚文元惡狠狠地追問：「什麼人反映的？」並說：「我是不想登那個」。

林兆木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 （四）姚文元刪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普及大寨縣》

在人民日報社論《普及大寨縣》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送審稿中，姚文元刪去了「這同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樣，是農村中又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一段，貶低普及大寨縣的重大意義。

【下面是姚文元刪改的稿件的影印件〔略〕】

#### （五）人民日報社李克林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召開，我沒參加，留在報社每天和昔陽聯繫安排版面。開始三天，一、二版都是學大寨典型，版面很突出，到第四天，十九日上午，魯瑛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文元同志指示說，學大寨的版面搞這麼突出，沖淡了評《水滸》不好！」

第二天，果然把一二版都換成學理論、評《水滸》的報導，把原來安排在一版頭條的「煙臺地區實現機械化的經驗」，擠到了第三版，很不突出。此後再好的學大寨典型，也很少安排在一版。

經濟部李克林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六）上海市農業局董家邦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後，馬天水等人秉承「四人幫」的黑旨意，干擾、破壞會議精神的貫徹。他們不准提「建設大寨縣，縣委

是關鍵」。叫嚷「省委是不是關鍵?!還有中央呢?!」不准搞整黨整風，攻擊「這是靜止地搞，是老經驗，是形而上學」；不准派工作隊，污蔑這是「資反路線」，「桃園經驗」；不准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胡說資本主義在下邊是流，沅（源）在上邊，「當前主要解決沅（源）的問題」，甚至猖狂地說：「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咒罵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領導同志。他們還惡毒攻擊華國鋒同志的報告。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馮國柱在縣委書記會上說：「我向你們交個底吧！大寨會議文件，我們看了，議了，馬老說，主席圈閱的，不等於都同意，現在還要看，讓他表演表演嘛！」真是反動透頂。

董家邦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 （七）徐景賢的揭發交代

####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六月，陳永貴同志在蘇州召開的南方水稻生產現場會議上作了講話，重申了七五年華國鋒同志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重要報告的精神。陳永貴同志指出：去年派工作隊下去，「下得符合毛主席的教導」，把工作隊叫回來，「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這也是對「四人幫」和馬、徐、王等人的嚴肅批評，因為我們一直是反對華國鋒同志的報告，反對派工作隊的（我曾對上海縣委的負責同志講：「我不同意派工作隊，市委幸虧沒有派，如果派了要犯大錯誤。」這是我的罪行）。而馬天水在看到了六月份陳永貴同志的講話以後，非常反感，七月初的一個晚上，馬天水在錦江小禮堂對我和王秀珍激動地說：「陳永貴的報告有問題，去年派工作隊是錯誤的，今年撤工作隊是對的。他這樣說還是去年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調子。」馬天水說這個話的時候，毛主席早已任命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了，馬天水這個話不僅是對著陳永貴同志的，而且是直接反對華國鋒同志的。

談了以後，馬天水立即把陳永貴同志講話的這一段專門劃了出來，

還把陳永貴同志講的另一段話劃了出來（意思是大寨的根本經驗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只是大幹苦幹。而馬天水卻攻擊這樣說是「片面的，不全面！」），馬天水專門批上了自己的意見，直接送給「四人幫」張春橋，作為張春橋攻擊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炮彈。張春橋當即圈閱同意，並特意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把原件退給馬天水。

徐景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

## 十、反對毛主席關於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船舶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以來，經毛主席批准決定引進一些生產化纖和化肥的成套設備。一九七三年，經毛主席同意，開始向日本出售原油。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又親自批准向菲律賓出口原油，並同意周總理關於也適量向其他國家出口原油的建議。

為迅速發展我國遠洋船隊，周總理一九六四年就提出了造船和買船的打算，並經毛主席同意。一九七〇年，周總理指示，力爭一九七五年基本結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國輪船的局面，把立足點放在國內造船，在國內造船一時不能適應需要時，適當買進一些船舶，把遠洋運輸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的手中，這是完全符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的。

「四人幫」歪曲事實，捏造罪名，大肆攻擊進口成套設備、出口原油和買船，是「崇洋媚外」，窮凶極惡地污蔑鄧小平同志是「買辦資產階級」，「漢奸」，「賣國主義」，「比蔣介石還厲害」，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 （一）關於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的問題

【毛主席、黨中央關於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的批示

毛主席、黨中央一九七二年二月關於進口成套設備的批示影印件〔略〕

毛主席、黨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關於出口原油的批示影印件〔略〕】

【「四人幫」在出口原油、進口成套設備問題上



### 【向黨猖狂進攻的有關材料】

#### （1）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

##### 同馬天水等人的談話記錄（節錄）

鄧小平這批人，就是買辦資產階級，把中國工人的勞動成果送給人家，再把石油壟斷起來，把豬肉壟斷起來，完全是壟斷資產階級，比蔣介石還厲害，蔣介石壟斷不了全國。鄧小平路線，有些人執行得可舒服吶，可積極吶，思想太一致了。油反正在地下，給我們的後代留一點嘛，何必匆匆忙忙賣掉，而且價格還很便宜。洛克希德飛機廠的事，是有人受了賄。我們難道沒有受賄的?!過去買一條船，人家在船上放了很多東西，那些接船的船長、大副等，還不是收下了。有的可以給你在國外開戶頭。他們給大慶進口一套三十萬噸乙烯裝置，我挖苦他們說，大慶要進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盡開外國的拖拉機算了。這不是把毛主席樹的紅旗給抹黑嗎？

#### （2）張春橋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同外賓談話記錄（節錄）

進口設備要拿錢去買，就要有外匯。沒有外匯怎麼辦？就拚命出口。甚至於考慮進口外國的設備來開採一些煤礦，用開採出來的煤炭換外匯償還。這種辦法同臺灣蔣介石集團沒有多少區別。很多事中央不知道，他們沒有向中央報告，也沒有在中央討論過，就是管這些事的同志下決心就幹了。

#### （3）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

##### 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節錄）

鄧小平把咱們的原油，咱們的石油，連煤炭、棉布統統壓價出售，這些都是去年冬天幹的。如果給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國家，那還情有可原，他是賣給那些大資本主義國家呀。燃料我們自己缺呀。

我們最近還發現了高產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給外國人去了。煤炭、棉布壓價出售，我們八億人口啊，這不是出賣、不是漢奸行為？所以我說他連一個起碼的愛國主義者都不是。

#### （4）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談話記錄（節錄）

（有的工廠停產）因為沒有油。就是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搞的，石

油大量出口，換所謂先進設備造成的惡果。問題沒有解決，實際把資本主義石油危機轉嫁給我們。原油在資本主義世界很寶貴，化工原料。一是原油出口，一是煤、石油，給人家（日本），他們給設備，再用油、煤去換，租給人家，用設備償還，完全是賣國主義。

（5）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同外賓的談話記錄（節錄）

要外國資產階級出錢用外國的設備來開採我國的煤礦、石油，然後用開採出來的原煤等償還外國的債務，這完全是投降帝國主義、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政策。

（6）國家計委幾位負責同志的揭發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六月二十五日，國家計委向政治局彙報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時，「四人幫」在進出口問題上大做文章，瘋狂地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現將「四人幫」在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上的一些反動言論，揭發如下：

「四人幫」明明知道進口化肥和化纖成套設備，是毛主席批准的，經政治局同意的。「四人幫」也劃了圈。可是，在會上他們卻肆意進行攻擊。江青說：「你們把外國的設備安裝在大慶，是丟人，要追查是誰批准的。」張春橋說：「你們進口那麼多大項目，要批。」華國鋒同志當即予以駁斥，說，「進口的項目都是經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說不對，不能批過了頭。」張春橋蠻橫地說：「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們總是拿主席壓人。」

「四人幫」明知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一些原油，是周總理建議，毛主席批准的。但江青攻擊說，出口原油「把國際經濟危機轉嫁到中國人民身上，得罪了第三世界，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她惡狠狠地咒罵說：「這是洋奴、賣國、漢奸。」王洪文也說：「我們外貿部門有一批賣國主義者。」張春橋更赤裸裸地攻擊說：「外貿部有問題，不僅是外貿部」；「在我們黨內，首先在政治局內部有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並謾罵說：「你們崇洋媚外，買那麼多破爛，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給了多少錢。」

為了增加工礦產品出口，換回國內急需的設備、材料，有關部門曾

提議建立幾個煤炭出口基地以保證出口煤炭的品質和便於組織運輸，這根本不是什麼「租讓給外國」的問題。姚文元無中生有，惡毒地責問說：「有哪幾個礦山設想租讓給外國？租讓給哪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是日本、德國還是蘇修？」企圖給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扣上「賣國」的帽子。

林乎加 袁寶華 顧明 顧秀蓮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

## （二）「四人幫」污蔑買船是「假洋鬼子」

### （1）交通部臨時領導小組的揭發

為了迅速發展我國的遠洋船隊，周總理在一九六四年就提出了造船和買船的打算，並經毛主席圈閱同意。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又指示：力爭一九七五年基本結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輪的局面。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的立足點一向是放在發展國內造船工業的基礎上的。在國內造船能力一時還不能適應需要的情況下，適當從國外買進一些船舶，以減少每年用大量外匯租用外輪，使遠洋運輸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這是完全必要的。由於執行了這個方針，我國的遠洋船隊迅速壯大，已經基本上改變了主要依靠租用外輪的局面。「四人幫」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造謠污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不支持國內造船，熱衷於買船，惡毒攻擊買船是「崇洋媚外」，「投降賣國」，「七十年代的李鴻章」，「假洋鬼子」，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

中共交通部臨時領導小組

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

### （2）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在幾封來信上的批語（節錄）

影印件原文

那些迷信外國資產階級的「假洋鬼子」必然贊成和擁護立足於向外國買船，即劉少奇的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義路線。

### (3) 姚文元在修改新華社一篇報導時所加的攻擊言論

姚文元在修改新華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報送的一篇報導中，特別加了一段話，污蔑鄧小平同志崇洋媚外，壓制群眾，是「七十年代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

【下面是姚文元批改的稿件影印件〔略〕】

### (三) 關於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問題

一九七三年，四機部向中央建議從國外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中央批准了這個建議，「四人幫」當時也同意了。同年年底，四機部派人赴美國考察，美國康寧公司贈給代表團成員每人一件禮品玻璃制蝸牛。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開始，江青就製造了一起所謂「蝸牛事件」，她利用蝸牛禮品大做文章，一口咬定「送蝸牛是侮辱我們的」，惡毒攻擊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是「爬行主義」，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 (1) 關於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批件影印件〔略〕

#### (2) 四機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開始，江青收到我部第十設計院許文彬對我赴美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接受美國康寧公司玻璃蝸牛禮品一事的誣告信，如獲至寶，於二月十日清晨突然竄到我部，找許文彬，並給他寫了一封信。江青一口咬定美方送蝸牛禮品「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說什麼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是「屈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她狂叫：「那個蝸牛在哪裡?!拿來給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覽！」並要我們把「蝸牛」退到美國駐華聯絡處去，提出「抗議」。她還說：「美國這條生產線，我們不要它的了。」

敬愛的周總理知道這件事後，當即指示外事部門查清事情的真相。經調查，「蝸牛」在美國是一種工藝品，常作送禮和陳設之用，康寧公司送玻璃蝸牛並無惡意。中央政治局決定，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不印發，不下傳，已印發的收回。這就挫敗了江青製造所謂「蝸牛事件」，妄圖給中央領導同志加上「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陰謀。江青見陰謀敗露，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蝸牛退了回來，又把她寫給許

文彬的原信要了回去。

中共第四機械工業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 十一、反對毛主席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號召，攻擊周恩來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總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代表國務院，向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總理在報告中強調指出：「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四人幫」對抗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違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掀起一股污蔑、攻擊「四個現代化」的惡浪。他們惡意歪曲、篡改「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胡說「四個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徹底破壞毛主席關於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戰略宏圖。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 （一）張春橋一九七六年在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一文上所作的反動批註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鄧小平抱著科學救國的思想去法國，半個世紀以後，仍然是科學領

先那一套，真是難改呵。

(二)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談話記錄（節錄）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他們說現代化，不是孤立的現代化，包含誰掌握政權問題。我們要社會主義現代化，他們資本主義現代化。他們要四個現代化的目的就是資（產）階（級）上臺。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

(三) 《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影印件原文

他們搞現代化是假，復辟資本主義是真，衛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真意。

(四) 《文匯報》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影印件原文

所謂「四個現代化」，其源蓋出於李鴻章之流所創始的「洋」字型大小藥鋪。把「四個現代化」吹得震天響，似乎很有點「實業救國」的氣味，其實卻是十足的投降賣國。倘若誤服這帖毒劑，那麼，我國的自然資源將「化」為帝國主義的廉價原料，國家主權將「化」為烏有，社會主義所有制將「化」成官僚買辦所有制，半殖民地的苦難生活又將重現。

(五) 《學習與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發表的攻擊「四個現代化」的反動文章（節錄）

影印件原文

他們夢寐以求的「四個現代化日」，原來就是復辟資本主義日。

要搞現代化是假，反對革命化是真；把生產搞上去是假，把紅旗搞下來是真。

### （六）廣播事業局的揭發

姚文元不僅在公開宣傳中不許宣傳「四個現代化」，就是在內部簡報上寫了這樣的話，他也要惡狠狠地刪掉。一九七六年二月，《廣播局學習簡報》第一期上有這樣一段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四屆人大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綱領。」姚文元在審閱清樣時，把這段話全部刪去了。

中央廣播事業局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下面是姚文元刪掉「四個現代化」內容的  
廣播事業局學習簡報的原件影印件〔略〕】

（七）「四人幫」控制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攻擊「四個現代化」〔略〕

## 十二、江青裡通外國，賣國求名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人維特克訪華。江青抗拒周總理的指示，私自同維特克談話七次，長達六十小時。她出於篡黨奪權的需要，肆意編造歷史，美化自己，貶低和誹謗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她大量洩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奉送重要軍事地圖和機密資料，裡通外國，賣國求名。

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同維特克在一起的醜態〔略〕

### （一）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揭發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一日，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維特克來我國訪問，訪問期間，維要求會見江青。周總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江青出於篡黨奪權的野心，認為這是為她自己樹碑立傳、裡通外國、投降帝國主義的

大好機會，無視周總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見了六個小時。姚文元也參加了這次會見，同江青一唱一和。江青為了達到她預謀的目的，又要求到廣州再談，而且要談解放戰爭的情況。周總理指出：維來華後期表現不好，思想反動，來歷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江青聽了接待人員轉達周總理的指示後，大發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們管！」「你們膽子真大，敢來圍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維談了六次，連同前一次共談了六十小時。

江青與維一見面，就要維為她寫傳記。她對維說，「關於我本人的歷史，從來沒有對外國人講過，你是第一個外國人」，「我談的都可以發表」，「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諾的道路」。她信口開河，恣意編造歷史，喪心病狂地貶低和誹謗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抬高和美化自己，吹捧她的同夥，她說什麼「我是不是馬列主義者呢？是的」，「我是解決了公與私問題的人」，「我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談」，她貪天之功為己有，無恥地把自己吹噓成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將、文藝革命的旗手。

江青背叛黨和國家利益，出賣黨和國家機密，把包括政治、軍事、外交、人事、資源等許多方面的重要情況告訴了維，還把一些沒有公開發表的作戰地圖和照片送給維。特別是她把黨內鬥爭的機密情況和黨中央多次會議的時間、地點、決議以及解放戰爭期間的作戰情況和我軍總部番號等都洩露出去。她還準備將一份涉及許多黨和國家機密的大事記和抗美援朝五大戰役圖送給對方，後被阻止未送成。

江青對維曲意逢迎，百般諂媚，每天親自盛宴招待，贈送大量禮品，她大肆吹捧美國的電影、文學等，並繪聲繪色地敘述她從青年時代起就接受美國文化的薰陶，有意通過維特克告訴美國人，她是親美的。她還將她的反動詩「江上有奇峰，鎖在煙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親筆題在她照的廬山漢陽峰的照片背後，送給維，透露她妄圖篡黨奪權的狂妄野心。



江青為了掩蓋她裡通外國的罪行，夥同王洪文強令收繳有關江青與維特克的談話材料，銷毀罪證。

中共外交部核心小組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 （二）新華社揭發姚文元利用職權掩蓋江青裡通外國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同來華訪問的美國人洛葛仙妮·維特克進行了六十多個小時的談話，授意寫一本江青傳記。周總理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打電話給朱穆之同志，查詢維特克在同江青談話後寫過些什麼文章。一九七四年後，外電外報開始報導有關情況。新華社曾多次提出將有關情況向毛主席、黨中央反映，但均被姚文元扣壓。如：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文章，報導江青在同維特克談話中講了黨和國家的許多機密，並要求維特克把斯諾的《西行漫記》作為範本為她寫傳記；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分別報導，江青同維特克的談話受到毛主席的譴責；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聯社一則消息報導說，維特克在其辦公室丟失了她寫的江青傳的初稿；此後不久，外電又報導維特克「被丟失」的初稿已找到，等等。姚文元並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電話中稱：「今後這類挑撥離間的材料不登刊物」。他就是這樣利用職權掩蓋江青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由於姚文元三令五申不准反映這類情況，以致後來還有一些有關材料也未能向毛主席、黨中央反映。

新華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 （三）原總參測繪局局長張清化的揭發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二年八月中旬通知我去廣州江青處，八月十八日到後江青

對我說，她要與外國人談話，要我幫助她整理一下解放戰爭西北戰場情況（包括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還要整理抗美援朝戰爭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況。各種材料要簡單扼要，都要附圖。她對附什麼圖也作了要求，並提出限八月二十五日交卷，以供使用。隨即，我按她提出的要求把上述情況整理成三個材料並繪製《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沈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抗美援朝一至五次戰役《概況圖》、《中印邊界示意圖》、《中印邊界西段自衛反擊作戰略圖》、《中印邊界東段（東部）自衛反擊作戰略圖》、《中印邊界東段（西部）自衛反擊作戰略圖》和《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另，她還要求給她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圖上標繪了《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圖》。八月二十五日午後找我，我把材料和圖表交給了江青。

維特克訪華主要是想瞭解中國婦女運動情況，但江青、姚文元接見後，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罪惡目的，就把維特克單獨留下，江青又於八月二十五日將維接到廣州，維到後，當夜江青就與她開始談話，之後，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在五、六小時左右，長者達八、九小時，一直談到八月三十一日。

江青與維特克談話一開始就說：「你要我談什麼，我就談什麼，你要瞭解我什麼，我都可以告訴你。」在八月二十五日晚的談話中，主要談的是解放戰爭西北戰場的情況。在談話過程中，江青指著解放戰爭時期的那些圖表對維特克說：「這些圖表都是為你準備的，你可以帶走。」談完後，當場即將《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沈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和《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等重要圖表，拱手送給了維特克。

以上圖表的內容大部分是我們沒有公開的。江青裡通外國，出賣了大量的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如《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圖》中標明了毛主席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十八時從延安出發到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

七日到達西柏坡整個行動路線，經過的地點、時間以及在那些地方開過那些重要會議，發表了那些重要講話，寫了那些主要著作等等，還把當時我們最高統帥部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指揮位置的變化以及中央領導同志的代名，中央機關的組織和代號等等，詳細地暴露給了美國人維特克。又如《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中，標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期間，我軍在戰略防禦階段作戰經過和戰略進攻時期我軍作戰經過，這就把我軍在西北戰場整個內線、外線作戰的情況，我軍運動情況統統告訴了維特克。她還洩露了我軍在朝鮮第四次戰役損失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這次談話，是江青與維特克在廣州七天談話中最長的一次，從二十五日晚到二十六日凌晨，達八、九個小時之久。江青這個賣國賊還唯恐維特克聽不懂、記不下，幾次中途停下問維「聽懂聽不懂？」「聽的枯燥不枯燥？」當維特克接到圖表後，喜出望外，如獲至寶，連聲說：「謝謝，謝謝」「這些材料很寶貴，對我寫書幫助太大啦！」維還提出「我回去寫書，材料不夠時還請江青同志給補充材料。」江青滿口答應說：「一定照辦，一定照辦。」江青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重要機密的罪行必須徹底清算。

張清化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四）江青出賣黨和國家重要機密，送給美國人維特克的軍事地圖等材料的影印件〔略〕

（五）國外出版發行的維特克寫的《江青》的影印件〔略〕

1979

---



## 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79.1.4.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委、黨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現將此件轉發至縣、團級黨委，其要點可口頭傳達到群眾，但不要登報和廣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 《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

黨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間，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進行全面奪權，他們把這叫做「一月革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廣大幹部和群眾要求弄清事實的真相，明確問題的性質。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這種要求更為迫切，更為強烈。當前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現將我們的意見報告如下：

#### (一)

所謂「一月革命」，是指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竄回上海，到二月五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一段時間內，他們從上海打開缺口，進行全面奪權的陰謀活動。

一九六六年，張春橋、姚文元就同林彪、陳伯達、江青相勾結，竭力煽動群眾「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並通過處理「安亭事件」，背著上海市委同王洪文等簽訂「五條」協議；當赤衛隊起來反對他們炮製的「五條」協議時，他們就造赤衛隊的謠，製造

「康平路事件」，把赤衛隊搞垮，進而把上海市委和各級組織搞癱瘓。張春橋在分析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形勢時曾得意地說，赤衛隊進入康平路，「我們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這次較量是個轉捩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急忙趕回上海。一下飛機，就分別找徐景賢、王承龍和「工總司」的幾個頭頭密談。張春橋說：「我和姚文元兩人也參加你們一起。」並煽動說，「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麼幻想」，「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一月四日，《文匯報》第一個宣告奪權；五日，奪了《解放日報》的權；九日恢復出版了已經停刊的《支部生活》。張春橋、姚文元就通過這些報刊，「要點誰的名，就點誰的名」，大造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反革命輿論。

一月六日，他們假借全市各造反組織的名義，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同志，並把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揪到會場陪鬥，宣布不再承認曹荻秋同志為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勒令陳丕顯同志交代所謂「反革命罪行」，壓中央澈底改組市委。這個大會的策劃者就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大會的發言稿和口號也是經張春橋、姚文元審查修改的。這一次大會後，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全市的實際權力落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手裡。

接著，張春橋、姚文元又同王洪文、徐景賢等人密謀策劃，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當時由他們一手造成的生產癱瘓、交通阻塞、經濟主義妖風等嚴重情況，倒栽到陳丕顯、曹荻秋等同志身上，欺騙中央，蒙蔽群眾，在全市進一步掀起戴高帽子、遊街、揪鬥的惡浪，大規模地迫害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

在此期間，張春橋、姚文元幾乎天天同陳伯達、王力等人通電話，緊密配合，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不斷煽動「展開全面奪權鬥爭」。在這股逆流衝擊下，搞亂了全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在搞垮各級黨政組織和群眾團體的同時，張春橋、姚文元策劃建立他們的全市性政權組織。一月八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取了鐵路、海港、長航、郵電等局的領導權。張春橋叫嚷說：「火線指揮部可以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們還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來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派組織聯絡站」作為全市最高機構來代替市委，實際上就是妄圖以他們的面貌來改造黨、取消黨。張春橋並授意徐景賢去找「工總司」頭頭策劃貼「擁護張春橋當市委第一書記」的大標語。一月十九日，他們在拼湊班子的會議上，狂妄地把他們的反革命奪權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說可以叫做「一月革命」，全市政權組織可以叫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定名為《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二月一日，「一月革命萬歲」的標語貼遍全市。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開張。這個名稱，是張春橋同陳伯達、王力等人一起合謀的。張春橋說，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標誌著舊市委、舊人委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垮臺了，標誌著上海無產階級廣大的革命人民奪了權，當了政」。並說：「繼續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這是鬥爭的中心，鬥爭的焦點，成敗的關鍵。」後來因為遭到毛主席的批評，他們才不得不改換成「革命委員會」的名稱。但名稱改了，實質並沒有絲毫改變。

林彪、「四人幫」在這一陰謀活動中，瞞上欺下，大耍反革命兩面手法。他們一面盜用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的名義，去欺騙黨中央、毛主席；一面濫用毛主席的威信，去逼迫群眾。比如，明明是他們自己把一月六日大會的口號定為「打倒陳丕顯、曹荻秋」，在五日向中央的簡報上卻說：「明天造反派開大會，批判市委，口號升了級，變成打倒陳丕顯、曹荻秋。」再如，王洪文等人製造的「安亭事件」發生後，陳伯達又發電報又叫張春橋親自趕來，一再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可是，一轉眼間，張春橋卻簽字承認了這一切，反過來倒要華東局和市委作檢查。當時，陳丕顯、曹荻秋同志就曾責問陳伯達、張春橋，為什麼背著上海市委簽訂協定，出爾反爾？事後卻被倒打一耙，強加上



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莫須有罪名。凡此等等，都充分暴露了他們反革命兩面派的面目。

## （二）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所謂「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是一場反革命風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們搞亂全國，進行全面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它的矛頭是針對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是向無產階級奪權，向黨中央、毛主席奪權。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直占主導地位，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績是很大的，絕大多數黨員、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廣大工人階級是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在這十七年中，上海市委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帶領全市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幹部，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把一個半殖民地的舊上海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新城市，把一個「冒險家的樂園」建設成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和科學技術基地。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把上海市委誣陷為「修正主義的」、「反革命的」、「舊政權」，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陳丕顯、曹荻秋等一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強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策劃這一篡黨奪權反革命陰謀的頭目和主要骨幹分子，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餘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朱永嘉、陳阿大、潘國平、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葉昌明等人。他們確實是一夥反革命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搶者、反動文痞。他們通過這一場篡黨奪權的大陰謀，結成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

他們奪權以後，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政治綱領，大量製造假案、錯案、冤案，對廣大幹部和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瘋狂地進行迫害，逐步把上海變為搞亂全國、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基地。上海市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們的倒行逆施，早已十分痛恨，採取

各種方式進行了抵制和鬥爭，直至「四人幫」澈底垮臺。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迅速奪回了被他們篡奪了的上海市黨政領導權。

### （三）

為了充分調動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我們打算在黨中央批准後，市委明確宣布所謂「一月革命」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策劃的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把他們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宣布在所謂「一月革命」中被公開點名批判的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衛隊等群眾組織和幹部、群眾，以及一切假案、錯案、冤案，予以澈底平反，恢復名譽，一切誣陷不實之詞，予以統統推倒；宣布對參與策劃所謂「一月革命」，並在以後繼續進行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主要骨幹分子逮捕法辦，以平民憤。同時，向幹部和群眾說清楚，策劃這一反革命陰謀的，只是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及其一小撮餘黨，當時的各群眾組織和群眾是受蒙蔽的，是沒有責任的。要團結一致，共同揭批林彪、陳伯達和「四人幫」策劃的所謂「一月革命」的嚴重罪行，揭批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思想體系。根據「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我們意見，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可以先在內部做好工作，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統一認識，妥善解決。今後視情況再公開報導處理的結果。

我們相信，澈底揭露一月反革命風暴的真相，必將得到上海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熱烈擁護，有利於進一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心一意搞好四個現代化。

以上報告當否？請批示。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sup>16</sup>

<sup>1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上）》，人民出版社[內部出版]，一九八二年。



1980

---



##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對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定性處理的意見1980.2.13；中紀二辦秘字[1980]25號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是一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篡黨奪權、禍國殃民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粉碎「四人幫」以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對「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進行了清查，基本上摧毀了他們的反革命政治勢力，比較深入地揭露了他們的反革命面目。全國揭批查的群眾運動發展是健康的，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為了做好受審查人員的定性處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 一、定性處理的原則和方針

我們黨同「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鬥爭，是一場奪權與反奪權、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的大決戰。這場鬥爭持續時間長，牽連的人多，情況複雜。因此，對受審查人員的定性處理，要按照中央的政策辦，既嚴肅，又慎重。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純潔黨的組織，純潔幹部隊伍，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定性處理工作，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對定為敵我矛盾的，判刑的面要小。應判刑而免予起訴的，黨紀、政紀、軍紀處理要從嚴。對犯了錯誤，包括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

受審查的人員，無論問題多大，對其無辜的家屬和親友，都不得株連、歧視。

## 二、劃定問題性質的界限

對同「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應根據其參與篡黨奪權陰謀活動中的罪行大小、錯誤輕重確定其問題的性質。

（一）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屬於敵我矛盾。

- 1.同「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直接勾結在一起，組織幫派體系，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策劃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大事件，密謀打倒從中央到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領導幹部。
- 2.直接參與「四人幫」陰謀組閣活動，密選親信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竊取要職，妄圖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
- 3.有組織有計劃地搞祕密情報活動，誣陷迫害中央領導同志，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提供「材料」的。
- 4.按照「四人幫」的授意，有計劃地編寫反動文章，制造反革命輿論的組織者和策劃者。
- 5.按照「四人幫」的授意，策劃和組織反軍亂軍，建立反革命「第二武裝」，陰謀篡奪軍隊和民兵領導權的。
- 6.按照「四人幫」的授意，策劃和組織「砸爛公檢法」，倒轉專政矛頭，造成嚴重後果的。
- 7.組織幫派勢力，陰謀策劃篡奪中央和國家機關一個部、委或一個省、市、自治區領導權的活動，蓄意製造冤假錯案和武鬥事件，殘酷迫害幹部、群眾，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分子。
- 8.粉碎「四人幫」後，堅持反動立場，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破壞揭批「四人幫」的鬥爭，策劃組織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首要分子。

（二）犯嚴重政治錯誤、政治錯誤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追隨「四人幫」，參與了篡黨奪權的某些活動，情節嚴重的，定為嚴重政治錯誤；情節較輕的，定為政治錯誤。

### 三、組織處理的意見

（一）屬於敵我矛盾，罪行嚴重，態度惡劣，民憤很大的，應依法懲辦。

（二）屬於敵我矛盾，罪行雖屬嚴重，但過去對革命事業有較大貢獻，幾十年表現較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雖然犯有嚴重罪行，但不是「十年一貫制」，而且後來「欠帳」不多的；在揭批「四人幫」鬥爭中，有立功贖罪表現的，只要他們認罪，做出了應有的交代，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免予起訴，但黨紀、政紀、軍紀處理要從嚴。

（三）定為嚴重政治錯誤的，應調離領導崗位或機密要害部門。其中：

對錯誤情節嚴重，堅持錯誤，品質惡劣，群眾意見很大的，應撤銷領導職務，直至開除黨籍。

對有悔改表現，取得群眾諒解的，可免職下放，或另行分配工作，或回到生產勞動崗位。

（四）定為政治錯誤的，一般不給紀律處分。對一貫表現不好，態度很壞，不能取得群眾諒解的，則應給予必要的紀律處分。不宜在原工作崗位的，另行分配工作，有的可回到生產勞動崗位。

受審查人員中，屬於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只要把問題說清楚了，認識錯誤，接受經驗教訓，可不作審查結論，不給紀律處分。

### 四、做好審查結論，嚴格審批手續

對受審查人員的定性和處理，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要走群眾路線，經過黨委集體討論。一定要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作全面的、歷史



的具體分析，作出審查結論。切實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審查結論要同本人見面，聽取意見，本人所提意見合乎事實的，應予採納；證據確鑿，本人拒不承認的，仍應根據事實予以結論；堅持錯誤，無理取鬧，乘機翻案的，應加重處分。

組織處理的審批許可權，應按照幹部的管理許可權辦理。

凡涉及刑事處分的，要嚴格按照法律程式辦理。

對黨員的紀律處分，要嚴格按照黨章辦事。

關於軍隊在揭批「四人幫」鬥爭中受審查人員的定性處理問題，按中央軍委有關規定執行。<sup>17</sup>

## 中共中央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 通知1980.9.26；中發[1980]73號

現將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有關情況通知如下：

- 一、依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現在，預審工作已經結束，案件已到檢察院，預定在十月間提起公訴，依法審判。整個審判活動擬爭取十一月底前後結束。這次，將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辦法是，一案起訴，分庭審理，一案判決。這一案的其他罪犯，將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軍事法院陸續分別審判。
- 二、這次只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刑事犯罪，不審判工作中的錯誤，包括路線錯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解決敵我矛盾，處理路線錯誤是解決黨內是非。這兩個方面，必須明確地、嚴

<sup>17</sup> 《幹審工作政策檔選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格地區分開來。決不在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牽連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過錯、失察等。

三、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因為案情特別重大，將組織特別檢察庭、特別法庭，依法進行審判。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後將採取公開審判方式。中央和國家機關，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人民團體，民主黨派將有幾名代表參加旁聽。不讓外國人旁聽。

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造成了十年浩劫，其罪行之嚴重，危害之大，是難以估計的。這次只是審判他們的直接的、確鑿的罪行。在中央公安部所提起訴意見書中，對他們起訴的是四條罪狀〔（一）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二）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奪權；（三）迫害鎮壓廣大幹部、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四）指揮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六十條罪行（在兩高審訊後，可能有些改變）。對於他們的歷史等問題，審判將不涉及，不訴罪。特別法庭的審判只處理重大刑事犯罪問題。

五、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一件大事。各級黨委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注意黨內外的反映。要使幹部群眾瞭解反革命集團的刑事犯罪行為和工作中的錯誤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問題。對林彪、「四人幫」殘餘勢力和各種犯罪分子乘機進行的搗亂破壞，要堅決打擊。在審判期間，對群眾興高采烈的情緒，要注意引導到加強團結搞好生產上去，對可能出現的遊行，大集會，可用說服的方法加以勸止。各地如發現值得注意的情況和問題，望隨時報告。

中央認為，通過這次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應當達到揭露敵人，打擊敵人，教育人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促進安定團結和四化建設的目的。

（此件發至縣、團級）<sup>18</sup>

<sup>18</sup> 《幹審工作政策文件選編》，黨建讀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 (1980.11.2.) 最高人民檢察院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偵查終結，移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審查確認，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憑藉其地位和權力，施展陰謀詭計，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開的和祕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等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失敗，林彪等叛國外逃，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為首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續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災難是難以估量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事實如下：

### 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各方面的領導幹部。

(一) 策動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篡奪領導權。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策劃奪權，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

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並煽動迫害領導幹部，說：「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就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羅、陸、楊就很需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張春橋在上海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從基層到中央、黨權、政權、財權、文權以及其他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四月，張春橋在上海說：老幹部「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一個也不留！」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劃奪權，提出「改朝換代」，暴露了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二）誣陷、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把林彪、葉群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張春橋在北京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單獨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在張春橋的指使下，蒯大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組織遊行示威，張貼標語、大字報，散發傳單，呼喊口號，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決定批鬥劉少奇，並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組織召開「批鬥

劉少奇大會」，進行抄家，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康生、謝富治、戚本禹等煽動組織「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衝擊國務院。

江青直接控制並夥同康生、謝富治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反革命」。江青於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擅自決定逮捕關押河北省副省長楊一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天津市居民（原奉天紗廠協理）王廣恩、劉少奇的炊事員郝苗等十一人。在楊承祚病危期間，江青對專案人員說：「要突擊審訊，把我們所要的東西在楊死前搞出來。」楊承祚被折磨致死，王廣恩也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富治對專案人員說：「審訊要有狠心，下得手」，「要集體審訊，一審幾個鐘頭，非攻破不可」。江青、謝富治為了誣陷王光美是「特務」，還指使對病勢垂危的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進行刑訊。張重一被折磨致死。為了誣陷劉少奇是「叛徒」，他們對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同劉少奇一起搞工人運動的丁覺群和一九二九年同劉少奇在瀋陽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進行逼供。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覺群在獄中就申明，他被逼寫的材料「是打破事實的框框寫的」。孟用潛從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在獄中先後二十次書面聲明，他在逼供下寫的關於劉少奇的材料，「是虛構編造的」，應該撤銷。但丁覺群、孟用潛的更正、申辯材料，均被扣壓，不許上報。劉少奇被迫害致死。

（三）江青、康生密謀誣陷、迫害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親筆寫了一封絕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呈江青同志親啟」。信中說：「送上你要的名單。」在康生親筆寫的這個名單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名單中，列入「靠邊站的尚未列入專案的」七名和「有錯誤的或歷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絕大多數也先後受到康生等的誣陷、迫害。

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被誣陷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陳毅、彭德懷、賀龍、李先念、譚震林、李井泉、陶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薄一波、宋任窮。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先念、陸定一、羅瑞卿、陶鑄、葉劍英、劉寧一、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國務院副總理：陳雲、鄧小平、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

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劉瀾濤、李井泉、王任重。

被誣陷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還有：

蕭勁光、粟裕、肖克、陳少敏、王震、曾山、歐陽欽、王樹聲、王恩茂、鄧華、鄧子恢、譚政、劉曉、李維漢、楊秀峰、張際春、程子華、伍修權、錢瑛、王從吾、馬明方、李葆華、許光達、林鐵、鄭位三、徐海東、蕭華、胡耀邦、習仲勳、安子文、呂正操、張經武、康承志、葉群、楊獻珍、張鼎丞、舒同、潘自力、楊勇、黃火青、陳漫遠、蘇振華、馮白駒、范文瀾、李堅真、高克林、鐘期光、江華、李志民、楊成武、章漢夫、帥孟奇、劉仁、萬毅、周揚、徐子榮、劉瀾波、奎璧、區蘿覺、朱德海、張啟龍、馬文端、王世泰、廖漢生、洪學智、章蘊、徐冰、廖魯言、宋時輪、周桓、陳丕顯、趙健民、錢俊瑞、蔣南翔、韓光、李昌、王鶴壽、陳正人、趙毅敏、孔原、張蘇、楊一辰、趙伯平、張愛萍、姚依林、汪峰、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勁夫、李頡伯、廖志高、江渭清、譚啟龍、張仲良、張平化。

（四）陳伯達、謝富治和吳法憲利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天津破獲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以追「後臺」為名，陰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十九日，他們接見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趙登程等時，陳伯達說：破案「是起點」，「不是終點，老闆在後臺，後臺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

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謝富治說：「是起點，不是終點」，「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吳法憲說：「還不是第二個大走資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謝富治、趙登程等在追「後臺」中，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朱德是「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的「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參加的有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裡、王震、廖承志等，誣陷他們「裡通外國」，「準備武裝叛亂」，要搞「政變」。直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謝富治還對辦案人員說：「有的目前找不到證據，下決心鬥爭，案犯口供也算數」。

（五）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軼歐指使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郭玉峰，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編造《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中共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六十名委員、候補委員、有三十七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其中有「劉瀾濤、王從吾、錢瑛、劉錫五、帥孟奇、李運昌、王維綱、楊之華、李士英、李楚離、馬明方、龔子榮、陳少敏、方仲如、劉亞雄、張子意、王鶴峰、劉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陳鵬、陳曾固、鄧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吳溉之、馬國瑞、張鼎丞、吳德峰、張稼夫、廖蘇華、龔逢春、李景膺、蕭華。

（六）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編造「關於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並經康生親筆修改、審定。在這個報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有六十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務嫌疑」、「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三反分子」、「有嚴重問題」。其中有：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李井泉、林楓、劉寧一、張治中，委員陳少敏、楊之華、帥孟奇、趙毅敏、錢瑛、劉亞雄、李達、徐立清、王世泰、鬍子昂、劉瀾波、徐冰、徐子榮、張經武、楊尚昆、李延祿、韓光、梅龔彬、王昆侖、南漢宸、龔飲冰、曹孟君、史良、唐生智、孔原、胡耀邦、謝扶民、羅瓊、吳冷西、張蘇、武新宇、馬純古、俞靄峰、劉長勝、古大存、周禮、趙壽山、胡愈之、胡喬木、梁思成、童第

周、葉渚沛、陳其尤、王維舟、葉劍英、林鏘雲、郭健、楊蘊玉、華羅庚、趙忠堯、陳劭先、趙九章、茅以升、胡厥文。

(七) 康生、曹軟歐指使郭玉峰，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編造《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並經康生親筆修改、審定。在這個報告中，一百五十九名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有七十四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其中有：副主席彭真、劉瀾濤、宋任窮、徐冰、高崇民、委員王從吾、劉錫五、平傑三、楊東蓀、李楚離、王維綱、張子意、李運昌、龔子榮、李初梨、曹瑛、劉清揚、孔祥禎、馬輝之、張友漁、章蘊、王照華、周揚、吳溉之、何長工、林修德、唐天際、朱蘊山、蘇子衡、鞏天民、鄒大鵬、安子文、楚圖南、汪金祥、李立三、曾憲植、薩空了、張秀岩、吉雅泰、于毅夫、哈豐阿、王世英、劉曉、閻寶航、楊奇清、孫起孟、趙朴初、車向忱、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王稼祥、伍修權、張治中、孫曉村、史良、朱學范、劉斐、張孝騫、寸樹聲、俞大絨、鄭位三、陳國棟、高文華、王子綱、張邦英、胡克實、李昌、賀誠、鐘惠瀾、吳鴻賓、傅連璋、金如柏、陳其尤、熊慶來、張勁夫。

(八)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誣陷周恩來等搞陰謀，說：「他們國務院那些人，經常借談工作搞串連」，「總理是後臺」。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在北京釣魚臺十七樓密謀策劃，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說：「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的有小平、劍英、先念」，「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一樣搞篡權活動。一九七四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和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等利用輿論工具，煽動在全國範圍內批「現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誣陷周恩來。



（九）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張春橋、吳法憲、和邱會作等誹謗、誣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機會主義者」、「軍閥」、「野心很大，想當領袖」。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在戚本禹的策動下，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人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接著，成立了「揪朱聯絡站」，並策劃召開批鬥會。三月四日，戚本禹接見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些人，授意繼續對朱德進行迫害。戚本禹說：「你們自己搞，就搞成了；你們說是我叫你們搞的，就搞不成了。你們以為你們很聰明，其實最傻了，要不要搞，你們自己考慮。」

（十）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林彪誣陷鄧小平是「黑幫分子」、「反黨分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康生誹謗鄧小平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澤東主席提議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十月十七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釣魚臺十七樓密謀策劃，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周恩來、鄧小平等搞篡權活動，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

一九七六年二月到五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毛遠新進一步誣陷鄧小平。二月三日，張春橋針對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一號檔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一號檔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檔。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並引用古詩：「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再次暴露張春橋妄圖「改朝換代」的反革命野心。二月二十二日，毛遠新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馬天水、徐景賢等說，鄧小平「崇洋媚外，出賣主權」，「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搞「全面回潮」，「國家性質都要改變了」。三月二日，江青在部分省、自治區負責人座談會上，誣陷鄧小

平是「反革命兩面派」、「謠言公司總經理」、「法西斯」、「大漢奸」、「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四月二十六日，江青誣陷鄧小平有像林彪一樣的「大小艦隊」，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四月五日，張春橋誣陷鄧小平是「納吉」。五月十六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送審的「黨內確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文稿中，親筆寫了鄧小平「就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十一)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煽動篡奪外交領導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春橋指使王洪文、徐景賢等，借為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材料之名，編造所謂《陳毅反動言論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學習班中散發，誣陷陳毅「投降帝修反」，「為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同時，搜集、編造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

(十二)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一九六七年七月，康生、陳伯達和戚本禹接見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等，戚本禹布置對彭德懷進行批鬥迫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審批「同意」專案組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要「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彭德懷被迫害致死。

(十三)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一九六六年夏，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的材料。九月三日，吳法憲把他寫的誣陷材料送給林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葉群將她捏造的誣陷賀龍的材料，當面口授給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處長宋治國，指使宋治國寫誣陷賀龍的材料，並對宋治國說：「以你主動向我反映情況的口氣寫，不要以我指示叫你瞭解的口氣

寫」。九月七日到二十四日，宋治國把他寫的四份誣陷賀龍的材料送給林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說：「由賀龍的歷史投敵叛變，聯想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絕不會沒有，可以由歷史這個此，到現實這個彼」，進一步誣陷賀龍。賀龍被迫害致死。

（十四）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一九六七年四月，在葉群的授意下，蒯大富派人收集編造誣陷徐向前、葉劍英的材料，發表誣陷文章：「炮轟徐向前，打倒拿槍桿子的劉、鄧——徐向前」。同年六月，邱會作指使總後勤部「文化革命辦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編造誣陷徐向前的材料，並編印傳單，誣陷徐向前是埋藏在黨內、軍內的「一顆大定時炸彈，是個標準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十五）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一九六八年四月，林彪指令北京部隊召開黨委擴大會，策動批判所謂「華北山頭主義」，並派黃永勝、吳法憲和謝富治參加。江青、陳伯達誣陷聶榮臻是「華北山頭主義」的後臺，陰謀打倒聶榮臻。同年十一月，黃永勝誹謗說：「聶榮臻這一輩子也沒有幹什麼好事」，「這些人心是不會死的，一有適當氣候就會出來搞名堂的」。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江青又誣陷聶榮臻等在華北是「壞人當了道」。

（十六）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黃永勝批准廣州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報送的「關於揪叛徒調查工作的請示」，和這個請示報告所附的調查葉劍英的「第一號調查方案」，陰謀陷害葉劍英。一九六八年六月，黃永勝利用他在廣州製造的陷害廣州部隊副司令員文年生等的冤案，追查「黑線」，將逼供取得的假材料交給葉群，誣陷葉劍英等開「黑會」，「密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李作鵬夥同海軍的第二政治委員王宏坤、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寫材料，誣陷「賀、葉配合劉、鄧、陶企圖篡軍反黨」。

(十七)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捏造罪名，誣陷陸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和吳法憲等，誣陷陸定一是「叛徒」、「內奸」、「軍統特務」。陳伯達提出要將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指使下、煽動下，中共中央宣傳部九名副部長分別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國民黨分子」。

(十八)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林彪、葉群、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誣陷羅瑞卿「裡通外國」，是「內奸」、「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對海軍「懷有巨大陰謀」。

(十九)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幫派體系骨幹誣陷、迫害的，除本起訴書(三)、(四)、(五)、(六)、(七)條所列的以外，還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幹部：康克清、賈拓夫、周榮鑫、谷牧、呂東、高揚、段君毅、劉傑、孫志遠、王諍、張霖之、劉裕民、孫大光、袁寶華、何偉、錢信忠、蕭望東、萬曉塘、張淮三、趙林、趙紫陽、吳芝圃、閻紅彥、魏文伯、曾希聖、惠浴宇、王延春、方志純、文敏生、衛恒、霍士廉、楊植霖、王昭、楊靜仁、傅秋濤、劉少文、梁必業、劉志堅、李聚奎、饒正錫、李耀、彭嘉慶、湯平、趙爾陸、蕭向榮、王平、蔡順禮、劉道生、杜義德、陶勇、方正平、成鈞、徐深吉、張廷發、聶風智、吳富善、吳克華、歐陽毅、劉何、賀晉年、程世才、賴星雲、譚友林、崔田民、傅崇碧、莊田、晏福生、陳再道、鐘漢華、楊秀山、唐金龍、劉培善、劉轉連、張仲翰、黃新廷、郭林祥、甘渭漢、袁升平、楊嘉瑞、秦基偉、胡榮貴、孔飛、廷懋、王其梅等。

(二十) 誣陷、迫害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領導幹部，篡奪、控制中共中央的組織大權。一九六八年一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圖表，寫報告，誣陷一九三七年以後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聞天、陳雲、彭

真、鄧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或是「雙料貨」；誣陷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二十二人是「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和「三反分子」。還誣陷中共中央組織部有個「反革命集團」，是「黑窩子」，在全國「建立反革命據點」，「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組織部「澈底解散，宣布撤銷」。

（二十一）誣陷、迫害各級公安保衛部門、檢察機關、法院的領導幹部，篡奪、控制專政工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指揮、策動下、全國公、檢、法機關遭到澈底破壞。謝富治在全國煽動「砸爛公檢法」。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楊秀峰等和全國大批公安保衛、檢察、法院的幹部、民警遭到誣陷、迫害。康生、謝富治等在公安部還製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謝富治和另一名兼職副部長外，其他副部長都被逮捕、關押、副部長徐子榮被迫害致死。

（二十二）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親筆批示「完全同意」「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王力等提出的「澈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陰謀搞亂軍隊。

林彪為了控制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大批幹部、葉群。一九六八年四月，黃永勝在總參謀部說：「總參出了不少壞人，有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王尚榮」等，「他們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提出「澈底砸爛總政閻王殿」。林彪、葉群多次誹謗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原主任羅榮桓、譚政，製造「羅（瑞卿）、梁（必業）反黨集團」等冤案。黃永勝誣陷總政治部「是幾代招降納叛的地方」。邱會作誣陷總政治部「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差不多」，並積極參與「砸爛總政」的陰謀活動。總政治部大批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四名正副主任、二十名正副部長被誣陷為「篡軍反黨分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受到關押審查，袁子欽、王冰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江青、張春橋接見總政治部文化部原副部長陳亞丁等。江青說：「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看來要奪權，陳亞丁你去把權奪過來嘛！我看軍隊的文化工作還是讓陳亞丁管起來」。並對陳亞丁等說：「你們要放火燒荒。」策動亂軍奪權。

（二十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通過陳伯達、姚文元，控制宣傳輿論工具，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一九六六年六月，陳伯達組織編寫和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搞亂全國，亂中奪權，制造反革命輿論。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指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梁效」、上海的「羅思鼎」、《紅旗》雜誌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唐曉文」等寫作班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一九七六年春，姚文元親自修改審定，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等文章。姚文元、張春橋還審定馬天水、徐景賢的講話稿。這些文章和講話稿，把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的老幹部誣陷為「資產階級民主派」、「走資派」、「老走資派」，煽動加以迫害。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南京群眾張貼大標語反對張春橋，姚文元誣陷南京貼標語的群眾是「反革命」，並對魯瑛說：「這股反革命逆流，看來有個司令部」，「要注意北京的情況」。姚文元指使魯瑛派人到天安門廣場，搜集、編寫材料，這些材料經姚文元竄改，把群眾反「四人幫」、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的革命言行誣陷為「發表反革命演說和反革命口號」，「是沒落垂死勢力的掙紮和瘋狂反撲的一種表現」，誣陷群眾是「一小撮壞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還主張要「槍斃一批」。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九月，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魯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門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四川、雲南、黑龍江等省，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誣陷他們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走資派」，「組織還鄉團」，「翻案復辟」。

## 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實行反革命統治，煽動打砸搶，挑動武鬥，製造冤案，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

（二十四）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謝富治等的指使、策動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等七人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樂松等六人全部被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一九六八年一月，康生誣陷劉仁和副市長馮基平、崔月犁等，「出賣黨政軍核心機密，叛黨叛國」並批示「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對待」，「應將他們銬起來，進行嚴厲地突擊地審訊工作」。五月，康生、謝富治製造「以馮基平、邢相生為首的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冤案，誣陷馮基平等「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劉仁、鄧拓、吳晗、樂松生被迫害致死。

（二十五）一九六八年一月，張春橋、姚文元誣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資產階級頑固堡壘」、「黑班子」，誣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是一個極其狡猾極其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是「叛徒」。在他們的指使、策動下，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副市長和市委常委等十七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二十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陳伯達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在陳伯達的煽動下，製造了冀東冤案，使冀東地區的黨員幹部、群眾八萬四千餘人遭受誣陷、迫害，張文浩等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七）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京西賓館當面誣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說：「你是個叛徒！」「我憑四十年革命的經

驗，有這個敏感」，「你有刻骨的階級仇恨」，捏造趙健民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的計畫，「想乘文化大革命把邊疆搞亂」。康生、謝富治不准趙健民申辯，由謝富治當場宣布逮捕趙健民。在康生、謝富治的煽動下，製造了「趙健民特務案」，這個冤案使雲南大批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一萬四千餘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八）康生等利用挖所謂「內人黨」，在內蒙古誣陷、迫害廣大幹部、群眾，破壞民族團結。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說：「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的寬點，不要怕。」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說：「軍隊也有內人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治說：「內人黨明裡是共產黨，暗裡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謝富治的唆使下，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三十四萬六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二十九）一九六七年，康生等製造「新疆叛徒集團」冤案，誣陷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關押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一百三十一人「投敵叛變」、「潛伏我們黨內」，是「叛徒集團」，馬明方、張子意、楊之華、方志純等九十二名幹部受到迫害，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幫派體系骨幹，把一九四六年二月呂正操、萬毅、張學思、賈陶、劉瀾濤、栗又文、于毅夫等四十二人根據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經延安新華社聯名通電要求釋放張學良一事，誣陷為「經過長期預謀，妄圖叛黨投敵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並製造了「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九十人的冤案，進行誣陷、迫害。張學思、賈陶、車向忱、陳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三十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的北平、上海、天津、廣東、四川、雲南和全國其他地方的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招降納叛」，是「國民黨」、「叛徒黨」、「美蔣別動隊」，提出「一定要從地下黨開刀」，致使各地與敵人進行英勇鬥爭的大批中共地下黨領導人、黨員和群眾被誣陷為「叛徒」、「內奸」、



「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美國特務」、「間諜」、「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黃永勝夥同廣州部隊政治委員劉興元等提出對中共廣東地下黨進行「審查」，並組織了專門班子，誣陷中共廣東地下黨「招降納叛」，混進一批「叛徒」、「特務」、「間諜」製造了「廣東地下黨」冤案，使七千一百多人遭到誣陷、迫害，林鏘雲等八十五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二）林彪反革命集團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製造了大批冤案，使八萬多人遭到誣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黃永勝夥同劉興元從一九六七年五月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廣州部隊製造「反革命集團」冤案，誣陷副司令員文年生等「奪權搞政變」，株連七百多名幹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

吳法憲夥同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參謀長梁璞誣陷、迫害空軍大批幹部、群眾。吳法憲說：「你不鬥倒他，再反撲過來，就要殺我們的頭。」吳法憲誣陷空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搞地下活動」，要「奪權」，要「政變」。吳法憲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七十四人，顧前、劉善本被迫害致死。

李作鵬夥同王宏坤、張秀川誣陷、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眾。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鵬提出專案工作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同年十月又說要「猛打、猛衝、猛追」，李作鵬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

邱會作夥同總後勤部副部長陳龐等在總後勤部私設監獄，刑訊逼供。邱會作說要「狠鬥」、「狠審」、「狠專」，使大批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被邱會作直接誣陷、迫害的有四百六十二人，申茂興、王述臣等八人被迫害致死。

（三十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春橋為了鎮壓上海「工人赤衛隊」群眾組織，奪取上海市黨政領導權，從北京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李文靜，說：「勝利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去，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李文靜把張春橋的電話告訴徐景賢，徐景賢傳達了張春橋的電

話。在張春橋等的指使下，王洪文夥同打砸搶罪犯耿金章，組織指揮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攻打「工人赤衛隊」，傷殘九十人，製造了康平路武鬥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策劃、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關押、打傷六百五十人。事後，張春橋稱讚王洪文是「我們的司令」、「上海工人階級的領袖」。

（三十四）一九六七年五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鎮壓群眾。張春橋對王效禹說：「你有力量，我就支持你。」王效禹隨即在五月七日製造了省革命委員會大院武鬥事件，拘捕關押三百八十八人。事後，張春橋、姚文元又一次表示支持，祝賀「打了一個勝仗！」

（三十五）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搜查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葉群讓吳法憲把江騰蛟找來北京，對江騰蛟說：「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裡，現在究竟在誰手裡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些人搜查一下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五個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要絕對保密」。江騰蛟回上海後，組織四十多人，冒充紅衛兵，於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趙丹、鄭君里、童芷苓、陳鯉庭和顧而已的家。江騰蛟將搜得的東西分兩次送北京葉群住處。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親自監視下，謝富治、葉群助手將搜查來的有關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燒毀。

（三十六）一九六七年，張春橋在上海指揮反革命特務組織「游雪濤小組」（代號「二四四」），專門從事跟蹤盯梢、綁架、抄家、監禁、祕密刑訊和搜集情報等法西斯特務活動。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這個特務組織為張春橋搜集、編造誣陷中共中央華東局九十七名領導幹部的材料，繪製了「華東局黑線人物關係圖」，並編寫了三百期「掃雷簡報」和「動態」，提供了一百多萬字的情報材料，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幹部、群眾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七年冬和一九六八年春，這個特務組織派人去江蘇、浙江等地活動，誣陷華東地區黨政軍領導幹部在「長江以南搞一個地下武裝」，「密謀兵變」。一九六七

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少庸向游雪濤傳達張春橋的話，說：「要當心，你們去搞人家的特務活動，人家也會搞你們的特務活動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這個特務組織在給張春橋的「一年工作總結」中寫道，他們是「在一條特殊的戰線上戰鬥」，「這一年來，大量的工作是同敵人進行隱蔽的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直接間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張春橋在這份總結上親筆批道：「謝謝同志們。」

（三十七）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指使遲群、謝靜宜利用在清華大學的活動據點，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些部門和上海、遼寧等地的江青反革命集團幫派體系骨幹祕密串連，互通情報，並搜集一些省委領導幹部的講話記錄和省委檔。編寫「走資派還在走」、「情況反映」等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三十八）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幫派體系骨幹的指揮、煽動下，冤獄遍於全國。各民主黨派，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新聞、出版、衛生、體育等各界的大批幹部、群眾和大批歸國華僑遭受誣陷、迫害、致殘、致死。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誣陷、迫害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鄧寶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吳晗、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車向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周谷城，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中央常委、委員和候補委員大批受到誣陷、迫害，黃紹閔、梅龍彬、楚溪春、高崇民、劉清揚、潘光旦、劉王立明、劉念義、王性堯、唐巽澤、許崇清、李平心、陳麟瑞、鄭天保、王家楫、劉錫瑛、張璽、王天強等被迫害致死。

文藝界，僅文化部及其直屬單位受誣陷、迫害的就有二千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藝術家老舍、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應雲衛、鄭君里、孫維世等迫害致死。

教育界，僅教育部所屬單位和十七個省、市、受誣陷、迫害的幹部、教師就有十四萬二千多人。著名教授熊慶來、翦伯贊、何思敬、王

守融、顧毓珍、李廣田、饒毓泰、劉盼遂、馬特等被迫害致死。

科學技術界，僅中國科學院直屬單位、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研究院和十七個省、市，受誣陷、迫害的科學技術人員就五萬三千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冶金學家葉渚沛、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昆蟲學家劉崇樂、植物分類學家陳煥鏞、冶金陶瓷學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

衛生界，僅衛生部直屬十四個高等醫學院、校六百七十四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誣陷、迫害的就有五百多人。著名病理學家胡正祥、藥理學家張昌紹、胸外科專家計蘇華、針灸專家陸瘦燕、中醫葉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

體育界，大批幹部和教練員、運動員遭受誣陷、迫害。優秀教練傅其芳、容國團、薑永寧被迫害致死。

全國勞動模範大批遭到誣陷、迫害。著名勞動模範孟泰、時傳祥等被迫害致死。

歸國華僑、僑眷、僅十九個省、市被誣陷、迫害的就有一萬三千多人，二百八十一人被迫害致死。方方、許立、黃潔、陳序經、黃欽書、陳曼雲等僑務界著名人士被迫害致死。

全國各級黨政軍機關、企業事業單位、農村社隊和城鎮街道的幹部、群眾，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走資派爪牙」等，遭受迫害的難以數計。

### 三、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用「和平過渡的辦法」篡黨篡國失敗後，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

（三十九）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指使吳法憲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十月十八日，吳法憲將林立果、王飛和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等召集在一起，對他們

說：「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彙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周宇馳、王飛等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作了傳達。林立果夥同周宇馳、王飛等組成「調研小組」。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接見林立果、周宇馳、王飛和空軍司令部辦公室處長劉沛豐等，林彪問：誰是你們的頭？五月三日，周宇馳、王飛等開會向林彪表忠心，並共推林立果為「頭」。一九七零年十月，林立果為頭的「調研小組」組成為「聯合艦隊」，葉群為周宇馳、王飛等規定了人名代號。「聯合艦隊」是林彪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骨幹力量。

從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林立果、周宇馳的指使下，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七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王維國、廣州民航局政治委員米家農和廣州部隊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同舟等，在北京、在上海和廣州建立祕密據點。林立果等利用這些據點進行聯絡、私藏槍支、彈藥、電臺、竊聽器以及黨和國家的機密檔。

（四十）一九七零年九月以後，林彪加緊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蘇州密謀後，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副處長李偉信，從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訂了反革命武裝計畫「《五七一工程》紀要」，分析了形勢，規定了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提出「軍事上先發制人」，陰謀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五四三（注：一種導彈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奪取全國政權」或製造「割據局面」，並陰謀「借蘇力量鉗制國內外各種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據「《五七一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的計畫，在上海召集江騰蛟、王維國、七三五零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和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祕密開會，指定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

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制定了聯絡密語、暗號。

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四十一）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晚，周宇馳、于新野打電話給顧同舟，探聽到毛澤東主席在長沙同一些負責人談話的內容，當即密報林立果、葉群，顧同舟並書面報告葉群。六日，李作鵬在武漢得到武漢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主席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邱會作，黃永勝連夜打電話告訴在北戴河的葉群。林彪、葉群接到顧同舟、黃永勝的密報後，下決心採取行動殺害毛澤東主席。九月七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九月八日，林彪下達了武裝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九月八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帶來了葉群給黃永勝的密封親啟件，讓王飛送給黃永勝。九月十日上午，王飛將密封親啟件送黃永勝。九月十日，黃永勝葉群頻繁聯繫，五次通電話，最長的兩次分別達九十分鐘和一百三十五分鐘。同日，劉沛豐從北戴河帶回林彪寫給黃永勝的信，信中說：「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此信由林立果、周宇馳交給王飛，要王飛必要時送給黃永勝。九月八日至十一日，林立果、周宇馳先後在空軍學院和西郊機場的祕密據點，分別向劉沛豐、江騰蛟、王飛、李偉信和空軍司令部作戰部部長魯璿、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秘書程洪珍、零一九零部隊政治委員關光烈等傳達林彪的武裝政變手令，具體策劃部署殺害毛澤東主席，並指派江騰蛟為上海地區第一線指揮，密謀用火焰噴射器、四零火箭打毛澤東主席乘坐的火車，用炸藥炸蘇州附近的碩放鐵路橋，派飛機炸火車；炸毀專列在上海停車點附近的油庫，乘混亂之際殺害毛澤東主席，或由王維國乘毛澤東主席接見時動手。

林彪、葉群同時還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和叛國外逃準備，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指使周宇馳等從空軍司令部索取了東北、華北、西北地方

雷達兵部署圖，可作導航用的我周圍國家電臺頻率表，北京至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圖和機場位置、呼號、頻率表，廣州、福州地區機場資料。

（四十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王維國打電話向林立果、周宇馳密報，毛澤東主席已離開上海回北京。林彪、葉群獲悉殺害毛澤東主席的計畫破產，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策劃「如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實行南北夾擊」。九月十二日，林立果、周宇馳分別向江騰蛟、王飛、于新野、胡萍和空軍司令部情報部副處長王永奎等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廣州的飛機八架，派二五六號專機送林立果去山海關，並把這架飛機供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使用。王飛、于新野和空軍司令部情報部部長賀德全等擬定了南逃人員名單，研究了分工和具體行動計畫。當晚十時許，周恩來總理追查二五六號專機去山海關的情況，命令該機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謊報去山海關是飛行訓練，並偽稱飛機發動機有故障，拒不執行命令；一面給周宇馳通風報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林彪、葉群和林立果接到關於周恩來總理追查飛機的密報，即與劉沛豐等到山海關機場倉皇登上飛機，不等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服務員上機，飛機航行燈也沒有開，就命令飛機起動滑行，於九月十三日零點三十二分強行起飛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三點十五分，周宇馳、于新野和李偉信攜帶所竊取的大批國家機密檔和大量美鈔，在北京沙河機場劫持三六八五號直升機外逃。駕駛員陳修文發覺後，採取措施飛回到北京市懷柔縣，降落時陳修文被周宇馳殺害。

（四十三）林彪叛逃前，周恩來總理決定，二五六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但李作鵬給海軍山海關機場場站下達的命令竄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並說：「誰來指示要報告我。要負責任。」九月十三日零點二十分，二五六號專機準備起飛，尚未發動時，場站領導人打電

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託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四十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國外逃，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等為了掩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分別銷毀了他們與林彪、葉群等來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筆記本、照片等罪證。

## 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在他們面臨覆滅之際，策動武裝叛亂。

（四十五）一九六七年七月，張春橋在他審定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以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對王秀珍說：「要建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由我親自來抓。」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再次對王秀珍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裡。」一九七五年一月和八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對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王洪文還說：「要警惕修正主義上臺」，「要準備打遊擊」。一九七六年二月，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們可給我抓好」，「部隊靠不大住」。

（四十六）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姚文元在北京同上海寫作組成員陳冀德談話時說：「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陳冀德回上海後，向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作了傳達。八月，姚文元親自修改審定上海寫作組在「紅旗」雜誌發表的「加強工人民兵建設」一文中，提出這支民兵武裝力量「要同黨內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為暴力鎮壓和武裝叛亂進行輿論準備。



（四十七）一九七六年八月，南京部隊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談。丁盛說：「我最不放心的的是六四五三部隊」，「這個部隊我根本調不動」，這個部隊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立即檢查對民兵發槍情況。隨後突擊發槍七萬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門、各種彈藥一千多萬發，為發動武裝叛亂作了具體準備。九月二十一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接見徐景賢，聽取了丁盛到上海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密談和上海突擊發槍的情況彙報。張春橋對徐景賢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

（四十八）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賢、王秀珍派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規定了聯絡暗號。當晚，繆文金夥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祝家耀，打電話給中共上海市委警衛處政治委員會康寧一轉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語通報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發生了最嚴重情況。隨後祝家耀又打電話給康寧一，要他轉告王秀珍：「人員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徐景賢、王秀珍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實行緊急動員，決定「要幹」，「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賢當即下達手令，調集和部署民兵三萬三千五百名，組織了武裝叛亂指揮班子，並設立了兩個秘密指揮點，準備武裝叛亂，責成上海報社、電臺在宣傳上進行配合。上海警備區副政治委員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鐘定棟等，研究了武裝叛亂的初步方案，並經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薛幹清、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動方案。十月九日，施尚英召集十個區、五個直屬民兵師負責人開會，命令兵力集中，人車配套、槍彈配套，動用各種槍炮二萬七千餘件，調集車輛二百二十五輛，集中大量物資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廠、中國紡織機械廠的指揮所和各區民兵指揮部架設了十五部電臺，溝通了聯

繫。鐘定棟進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裝叛亂的作戰方案，他們決定從上海週邊到市中心設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對上海首腦機關、車站、碼頭、機場、港口、浦江隧道、橋樑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規定了口令和暗語。十月十二日，準備發表「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擬定了二十一條反革命標語。十月十二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陳阿大等又開會進一步策劃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控制報社、電臺，封鎖中央發布的消息，準備切斷電網，用鋼錠堵塞機場跑道，沉船堵塞吳淞口，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要「決一死戰」。

綜合上述犯罪事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迫害、鎮壓廣大幹部、群眾，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叛亂，證明他們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為目的反革命集團。他們所犯的嚴重罪行都有大量確鑿的證據。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遭受誣陷、迫害和遭受株連的廣大幹部和群眾，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騙的幹部、群眾，都是他們罪行的見證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本廳確認，下列十名主犯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別犯有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反革命誣告陷害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拘禁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本廳依法提起公訴。

被告人江青，女，六十七歲，山東省諸城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在押。

被告人張春橋，男，六十三歲，山東省巨野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在押。

被告人姚文元，男，四十九歲，浙江省諸暨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

會副主任。在押。

被告人王洪文，男，四十五歲，吉林省長春市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押。

被告人陳伯達，男，七十六歲，福建省惠安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在押。

被告人黃永勝，男，七十歲，湖北省鹹寧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押。

被告人吳法憲，男，六十五歲，江西省永豐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在押。

被告人李作鵬，男，六十一歲，江西省吉安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在押。

被告人邱會作，男，六十六歲，江西省興國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在押。

被告人江騰蛟，男，六十一歲，湖北省紅安縣人。逮捕前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在押。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已經死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五項的規定，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本案其他人犯另行處理。

此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兼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

## 國家檔案局印發《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的函 1980.12.09；國文件發〔1980〕455號

兩案審判工作小組辦公室、軍委總政兩案辦公室、中紀委二辦、中央檔案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辦公廳：

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精神，我局商得有關單位同意，制訂了《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現發給你們，請參照辦理。

國家檔案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

### 【國家檔案局關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檔案材料整理的幾項具體規定】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全部檔案，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建立一個單獨全宗，集中保管在中央檔案館。現對整理這個全宗的材料作如下規定：

#### 一、關於全宗的範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檔案全宗，應包括中央兩案專案組、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中央兩案審判工作領導小組等機構，以及審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周宇弛、江騰蛟等十六名主犯在工作活動中形成的需要歸檔的材料。由辦案單位將有關材料收集齊全，系統地整理立卷，待全部工作結束之後，再將整理好的案卷造具目錄向中央檔案館移交。

#### 二、關於作為罪證的原件的存放問題

在辦案過程中，為了證明主犯的罪行，需要從其他機關調取原件作

為證據材料的，其原件應分別不同情況加以處理，凡列為罪證需要調取的材料，在原位不作為重要材料而定期保存的，可索取原件；在原單位已作為永久保存的檔案或不宜於調取原件的，應調取複製件，注明原件的存放出處。在本全宗內交替使用的材料，原則上是在哪個階段形成的就放在哪個階段，其原件可放在最後結案的有關案卷中，其他階段存複製件。

### 三、關於聯合辦案單位有關材料的保存問題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理工作中，與公、檢、法機關、軍委總政、中組部、中紀委等單位直接有關的材料（如起訴，判決、罪證等有關材料）除本全宗保存一套原件外，由辦案單位對其有關的材料進行複製，提供上述部門保存。

### 四、在預審過程中形成的不作為罪證的材料，可根據檔的。

多少立成副卷。屬於黨的工作錯誤、路線錯誤的材料，應與罪證材料分別整理立卷，作為本全宗一部分。

五、非「集團案」的主要成員，需判刑和受三紀處分的，其檔案材料應由受理機關進行整理保管。不移交中央檔案館。

### 六、「集團案」檔案材料立卷歸檔範圍

1. 黨中央，中央領導同志對兩案審理的決定，指示、批示、講話以及辦案單位的請示報告。
2. 成立辦案機構的材料及辦案單位的工作、計畫、總結、會議文件、簡報、會議記錄、紀要、決議、有關負責同志的講話。
3. 「集團案」和各主犯的罪證：包括審訊筆錄、錄音、錄相、起訴書，起訴意見書、判決書等。
4. 立案、搜查、拘留、監保、逮捕等請示報告及批件、證件。
5. 受審人員在關押期間重要的思想反映動態等。
6. 受審人員治病等情況的報告及批件。
7. 值班日記（包括電話記錄），收發文簿，介紹信存根、辦案人員花名冊（有保存價值的），工作筆記等。
8. 行政財務文書事務等材料。

以上屬於案件檔案按有關部門的要求立卷。

七、不需要立卷歸檔的材料

- 1.重份和複印文件。
- 2.凡不能作為罪證的黨政軍部門的機密、絕密材料，業務資料，可清退給有關部門。
- 3.各種文件的草稿和歷次修改稿（有負責同志重要批示的要保存）。
- 4.未署名單位、姓名、時間的零散材料，和沒有保存價值的材料。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



1981

---





##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資料組 1981.1.

一九六七年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拋出了「文攻武衛」的反動口號。

江青在河南赴京彙報代表團會議上講：「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

七月三十一日張春橋接過江青提出的「文攻武衛」反動口號，盜用「上海工人要求」的名義，向毛主席寫了要求成立工人武衛組織的請示報告。

八月四日在張春橋的授意指使下，王洪文等人以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名義，凌晨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大會，借用「文攻武衛」的反動口號，蒙蔽和動員了數萬人到上海柴油機廠，砸掉了上海柴油機廠聯合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此後，武鬥在全市更加廣泛、更加普遍。

八月十一日江青頑固堅持「文攻武衛」這個反動口號。

「文攻武衛」這個反動口號出籠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更大規模的武鬥。江青為了逃避罪責，在接見首都紅代會等組織代表時對「文攻武衛」口號的問題作了狡辯，她講：「像河南二七公社，他們提出『文攻武衛』，你向我進攻，我就要還擊你，對不對呢？我覺得是對的。」「出於需要，出於必要，對革命有利，在有一些地方，條件具備了，應該自衛，不然革命派就遭屠殺、迫害。」

八月二十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決定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

砸掉「上柴聯司」後，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決定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並制訂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打算」中規定：「建立『文攻武衛』隊伍是為了用槍桿子保

衛筆桿子革命，「文攻武衛」指揮部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直接領導，參加「文攻武衛」組織的應是革命造反派隊員。」

九月一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小組的第一批工作人員報到集中。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組從各組辦、各局機關調集了三十餘名幹部，作為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於九月一日上午到淮海中路一四六九號（原市婦聯辦公地點）報到，當時負責接待的是鄭惠儀。

下午，王承龍（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向已集中的三十餘名指揮部第一批工作人員作動員，他講，社會上武鬥不斷發生，破壞大好形勢，迫切需要一支能指揮調動的武裝隊伍，可以對付。王承龍代表市革命委員會宣布指揮部籌備小組領導班子，由翁默清主要負責，鐘定棟、鄭惠儀兩人協助。鄭惠儀代表指揮部籌備小組把已報到的三十餘名機關幹部分編到參謀聯絡、組織、政宣三個組，並指定了三個組的臨時召集人。

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省赴京代表會議上講：「不過我聲明，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文攻武衛』不要去掉它的階級內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環境和條件。」

九月七日《關於「文攻武衛」組織成員及幹部的政治條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初稿出籠，作為各試點單位掌握的口徑。在這個「意見」中規定，「文攻武衛」組織成員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即造反隊員），廠一級「文攻武衛」組織領導成員應由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審查批准。這個稿子，後經多次修改，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定稿。同時，著手設計「文攻武衛」隊旗、臂章、符號的圖樣。

九月八日張春橋在接見工總司常委、委員時講：「我非常希望上海武裝十萬至二十萬工人，就放心了。國民黨來了也不要緊，什麼反革命暴亂都不怕。」「先編隊，再訓練，再發少數槍，能發一萬支槍。再搞一些高射炮，真正把上海工人階級不但從思想上武裝，手裡也有槍，文攻武衛就有辦法了。」

九月九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小組於九日下午，在淮海中路六二二弄（原黨校辦公地點），召開了由港務局、上鋼三廠、東方紅造船廠、滬東造船廠、上海矽鋼片廠、上海工具廠、先鋒電機廠等七個單位的領導幹部、造反隊負責人、駐廠軍代表參加的座談會。會上，首先傳達討論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然後，由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張寶林傳達張春橋有關建立「文攻武衛」的講話。這次會議確定，各單位應迅速抓緊開展組建工作，在國慶日前把隊伍組織起來。

九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小組的辦公地點搬到外灘中山東一路三十三號（原英國領事館）。這一天的上午，召開了由各方面代表參加的大會，王承龍代表市革命委員會當眾宣布，徵用英國領事館的房屋土地，並宣布整個三十三號園地及辦公樓由「文攻武衛」佔領，作為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辦公地點。

九月十一日張春橋在上海國慶籌備工作會議上造輿論，他講：「上海已報中央、主席，中央、主席已同意，要武裝左派。」

九月十三日籌建「文攻武衛」隊伍的第一個宣傳提綱出籠。

九月十五日為了擴大「文攻武衛」隊伍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市革命委員會決定，組織一支五千一百二十人的全副武裝的「文攻武衛」隊伍，參加慶祝國慶日的遊行，接受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檢閱。

九月上海港務局成立了文攻武衛，並被命名為上海市文攻武衛第一師，直屬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

十月一日上海文攻武衛隊伍五千一百二十人參加慶祝國慶遊行，在人民廣場接受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檢閱。張春橋當時在廣場檢閱臺上，看了這支隊伍，得意地對王承龍講：「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隊伍。」

十月九日上海文攻武衛隊伍第一次執行迎送外賓的保衛任務。十月九日至十六日，先後有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剛果（布廠代表團等三批外賓來滬，由十二個試點單位執行迎送、保衛任務，共調動兵力二萬零七百七十人次。

十月十六日張春橋在市革命委員會的報告會上講：「八月四日那天我在上海。不過我沒有和革命委員會聯繫，他們也不知道我在上海。四日晚上我坐著汽車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路兩邊的人，是包括打『聯司』回來的人」，「都很高興，其實我也很高興」，張春橋還講：「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衛指揮部，這個隊伍究竟怎麼搞法？我們對那個名字有一點意見，就是文攻武衛四個字包括太多了，那等於文化革命的兩個方面你們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為它基本上是個武裝，武裝組織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總而言之，工人應該武裝，這個方針是定了的。首先是工人，當然紅衛兵將來也可以武裝。你武裝麼，先要把班、排、連編起來。」

十一月十三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召開十二個試點單位「文攻武衛」負責人會議。會上，各單位負責人強烈要求明確「文攻武衛」與民兵的關係。

十一月十七日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會討論了文攻武衛的有關問題，並作了如下決定：

（一）文攻武衛性質、任務以及名稱問題。文攻武衛還是以民辦為好，但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是市一級群眾組織的機構。任務，主要對付內外一切階級敵人的侵犯、擾亂，在當前要協同政法指揮部一起執行處理、制止上海地區武鬥。名稱為革命工人武裝指揮部，要報中央再定。

（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體制，貫徹「三結合」，實行三三制，軍隊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會派的幹部不宜過多，還要從基層調一些工人造反派來充實指揮部。市內各區可設立文攻武衛指揮分部，屬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派出機構，受市指揮部直接領導和指揮。

（三）發展文攻武衛隊伍的步伐要加快，六八年一月革命一周年時要達到十萬人的隊伍。

（四）關於幾個具體問題：市指揮部機關的政治待遇，與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等同；指揮部的辦公經費另定居頭，由財政局撥款，文攻武衛隊伍的軍政訓練經費由民兵事業費開支；組織文攻武衛隊伍要注意改

造基層的民兵組織，凡已建立起文攻武衛隊伍的單位，文攻武衛組織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動和工作；文攻武衛隊員的符號，仿照解放軍的胸章；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要派人去警衛延安西路三十三號（原市委機關的辦公樓），任務：一是保護現場，二是防止再有群眾去衝擊。

十一月十八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小組傳達市革會常委會十七日晚上會議精神，並決定：（一）市指揮部工作人員分兩攤，一攤處理武鬥，另一攤抓緊隊伍發展工作；（二）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把楊浦、徐匯兩個區的領導班子建立起來，並由政宣組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進行文字修改，作為組建文攻武衛隊伍的宣傳提綱印發下去；（三）先發槍，給十二個試點單位。

十一月十九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發出第一個通告，內容如下：

「延安西路三十三號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地點之一。為了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有關部門的工作正常進行，自即日起，凡已進入該地的外單位群眾組織應迅速撤離，任何團體和個人，都不准侵佔，不准打砸，不准用任何藉口進行衝擊、破壞、搞武鬥。如有蓄意製造事端，混水摸魚，乘機搗亂者，我部將採取堅決的措施。」

這一天，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發通告的同時，還派出了第一輛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宣傳車，沿南京路、外灘、延安路、延安西路三十三號大院內外巡迴廣播宣傳「通告」全文，大造輿論。這次行動是王洪文和王承龍等一夥策劃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命委員會寫了《關於發展、壯大革命工人武裝隊伍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講：「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這個名稱包涵的面過於廣泛，沒有體現出工人武裝的性質，建議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裝指揮部』；凡是建立革命工人武裝的單位，民兵的訓練、教育、值勤等活動均暫停，由革命工人武裝隊伍代替；為了確保槍桿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裡，必須保持隊伍的純潔可靠。」

十二月五日張春橋在上海工代會閉幕式上講：「我們希望上海的工人，要用兩種武器，一個就是毛主席的思想這個武器，另外中央已經同

意了的把工人武裝組織建立起來。我說，最好上海工人能夠有十萬支槍。如果我們上海的工人，是毛主席思想武裝起來的，手裡不僅僅是有生產的工具，手裡還拿住一支槍的話，那我們上海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更加有力量，不管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什麼反動派，「都在我們上海工人階級的面前統統要完蛋！」

十二月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調動隊伍對國務院各部，各省市的駐滬辦事處進行查封。這次行動，是王洪文、王承龍等一夥一手策劃的。搞這次行動的臨時指揮部班子由王洪文、王承龍、張寶林、鐘定棟四人組成，下設作戰、秘書、機動、後勤四個組。參加這次查封行動的「文攻武衛」部隊，共約五千人左右。一千多名大專院校紅衛兵也參加了這次查封行動。開始查封了五十六個中央各部及各省市駐滬辦事處，後來發展到對中央各部及各省市的縣、廠礦企業駐滬辦事處、倉庫也進行了查封，這樣，先後共查封了六百三十一個單位，查封房屋面積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二平方米。

十二月九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張寶林、鐘定棟等人秉承王洪文等人的旨意，對上海鐵路分局水電段搞了打砸搶行動。

十二月十一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命委員會報告，要求在上棉十七廠、上海冶煉廠、上海矽鋼片廠、滬東造船廠、上海港務局等五個單位，先各裝備一個連的武器，並要在一九六七年底前下發步槍六百五十支。

十二月十五日在煤炭部駐滬辦事處革命群眾義正詞嚴的要求下，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派人去開了四個多小時的座談會。

十二月十七日在王洪文、王承龍等一夥的策劃下，市指揮部對十大飯店和一批市級醫院採取了突擊檢查的行動。這是一次有目的、有計劃地要查他們所謂的走資派，捉了外省市幹部幾十人，關在交通大學，進行法西斯審訊。

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調動近萬名文攻武衛隊員，對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和飯店進行突擊檢查，搞得旅客很有意見。

十二月二十日繼十二月七日行動之後，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又發了

個「通告」。通告內容摘要如下：

#### 通告（一）

一、我部組織的文攻武衛隊伍是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統一組織、集中指揮的一支武裝隊伍，它不受任何一級群眾組織的指揮和約束。

二、凡盜用我部名義進行非法活動，招謠撞騙，胡作非為，混水摸魚的，我部將採取堅決措施，嚴加追究。

三、凡未經我部批准同意，任何單位、任何群眾組織、任何個人均不得以任何藉口盜用「文攻武衛」組織名義，查封外地駐滬機構或其他任何組織。否則，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將由他們負完全責任。

四、我部所查封的一切房屋財產，均由我部接管，由市革會統一處理，其他任何部門、任何個人不得動用和插手，如有違者，將採取革命行動。

十二月二十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楊浦區指揮分部建立，地點設在上棉十七廠，指揮分部領導班子由吳立義（區人武部部長）、毛毓琪（市指揮部派去）、鄧成福（上棉十七廠文攻武衛副團長）等人組成。接著，徐匯、虹口、閘北等區的文攻武衛指揮分部也陸續建立。

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打擊流氓阿飛為名，經王洪文、王承龍等批准，由張寶林、鐘定棟、康正勤等人組織文攻武衛五千餘人，抓了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其中有許多是里弄幹部和群眾，連一些小孩也被抓起來，造成了極壞影響和嚴重後果。

#### 一九六八年

一月三日批准成立機電二局文攻武衛師。

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周年活動，張春橋、王洪文等一夥利用這個機會擴大「第二武裝」的政治影響。他們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周年決議中寫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武裝隊伍，在群眾專政中發揮了強大的威力。要逐步地整頓和擴大隊伍，加強思想建設，增強組織紀律性，積極創造條件，為實行全市的工人武裝和全民皆兵做好準備。」後於二月五日上海市革會檔上報中央、國務院。



一月十九日市指揮部總結了一份題為《上海革命工人武裝在保衛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材料，這個材料，是一九六七年底中央文革聯絡員鄭曉峰按江青意圖來指揮部搞起來的。所謂經驗總結完全是借題發揮，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是張春橋的「改朝換代」思想的產物。

一月二十六日炮製了向外省、市推銷黑貨的情況反映。內稱：到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止，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已向山東省革委會、四川省革籌小組、廣東省軍管會、浙江省軍管會、哈爾濱市治安指揮部、長沙市革籌小組、南昌市工人武裝指揮部、衡陽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青島市工總司、河南二七公社、株州市工總司等十一省、市來訪代表團介紹了組織文攻武衛隊伍的所謂經驗。

二月十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會報告稱：「市文攻武衛隊伍的各級組織、各個成員不論在平時或戰時，都必須聽從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領導和指揮。」

二月十九日王洪文到指揮部傳達張春橋的話。張春橋講：「文攻武衛隊伍幹了不少好事，也出了不少毛病，要特別注意，不要解散重來。你們調動隊伍都是誰調的？要嚴格控制。解放軍調一個連要經過毛主席批准。文攻武衛調一兵一卒要經市革命委員會批准，要有二至三人批准。重型機床廠一個人要撤職。」「文攻武衛隊伍要普遍辦學習班，指揮員、政委要首先學習。我很關心，也很擔心，這個隊伍我是請示過毛主席的。」

王洪文還講：「主要從政治上純潔我們這支隊伍，敵人也千方百計地向我們隊伍裡鑽，目前要純潔隊伍，對違反紀律的要開除，營以上幹部，指揮都要討論。」

在這一天的下午，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東方紅造船廠召開了上海市文攻武衛「十二·七」行動總結大會，參加會議的有連以上幹部一千六百餘人。王洪文、王承龍到會講話。

二月二十日張春橋在接見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赴滬學習團時，拼命貶低解放軍和民兵的作用，鼓吹文攻武衛可以用武鬥壓服人。他講：「工

人武裝制止武鬥比解放軍好，解放軍有『四個不』，講話也受到限制。一武鬥，他們（工人武裝）戴上一頂柳條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嗎，我也是；你是群眾嗎，我也是；你辯論，我就同你辯；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樣子，我們這個隊伍比民兵好，因為是造反派，是在階級鬥爭中建立的，原來的民兵是在和平環境中建立的。」徐景賢也插話講：「有個地方搞武鬥，上海警備區司令去講沒用，我講幾個小時也沒有用，結果武裝工人拿著棍子去，問題解決了。」

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發出《關於文攻武衛隊旗、印章、符號的使用和保管通知》

三月一日王洪文到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會議上對大家講「目前，我們不能發槍，就是考慮隊伍是否純？怕槍桿子被敵人拿去。」「現在多方面提出來要到文攻武衛來工作，經一查有些人歷史不清楚。」「這支文攻武衛隊伍是未來的民兵，但是與以前的民兵不一樣。這支隊伍是在鬥爭中形成的，是在鬥爭中不斷壯大起來的。」「上海建立文攻武衛隊伍，春橋同志向毛主席正式報告過的，毛主席同意的。」「我們這支隊伍戰鬥力是比較強的，北京文攻武衛隊伍就沒有上海強。」「這支隊伍是一個新生事物，全國沒有一個完整的經驗。文攻武衛組織起來代替了民兵。對這個新生事物要愛護，要經常總結，每打一仗就要總結一次。」「我們要好好抓，上海發展二十萬人，敵人來了就可以抗一抗。」

三月六日市革命委員會以書面向中央彙報一、二月份工作，多處提到文攻武衛的作用，貶低民兵。

在講到隊伍建設時講：「這段時期，我們還組織了一支五萬人的工人文攻武衛隊伍。」「我們每次刮『紅色颱風』，主要就靠這支力量。現在，他們『殺』出了威風，在群眾中有了相當影響。哪裡發生武鬥，只要文攻武衛隊伍一到，雙方偃旗息鼓，沒有話說。現在已經可以看出，這支隊伍比原來的民兵好。」「今後還要不斷整頓，逐步擴大到十萬人。」

三月十二日張春橋向蘇州來滬代表團兜售文攻武衛黑貨。

這天晚上，張春橋在上海展覽館小會議廳，向蘇州「無革派」來滬代表團講：「我倒是贊成你們（蘇州）可以組織起一個武裝隊伍，那是要聯合起來後，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我們這裡不是有一個文攻武衛指揮部嘛！但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聯合比較鞏固，否則的話，我們上海這五萬人的武裝，要是變成派性的就不得了。我們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群眾專政。那還是在去年，我們正式報告了中央，報告了主席，主席是贊成的。對這個文攻武衛隊伍，我們只武裝工人，這個也報告過毛主席，他也贊成。」「等到你們的革命委員會比較健全了，革命大聯合鞏固了，便於顯示革命造反派的威力，可以有這麼個組織。」「我們準備武裝十萬人，搞它十萬武裝，」「我們是從戰備考慮的。我們不但發步槍，還準備搞高射炮部隊，飛機來了，我們就幹掉。」

三月二十七日張春橋在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命委員會座談會上講：「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權威，就是從十一月份才真正有的。」「我們一抓階級鬥爭，就把有些任務交給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現在文攻武衛指揮部很有權威。人民解放軍處理不了的事，它可以處理，因為解放軍有個『四不』怕，群眾也不怕，你武鬥呀，你叫人民解放軍去制止武鬥，人民解放軍的辦法實在不多，弄來弄去只有李德生同志在淮南的那個辦法，把自己的隊伍往中間一插，你們兩邊打我罵我，我都要在中間把你們隔開，不准你們打，只有這麼一個辦法，沒有別的辦法。文攻武衛指揮部這個隊伍去了，他當然也不必動武羅，但他話好說，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那我們兩個人有問題就辯論嘛。」「所以，現在很有威信，」「我們市革命委員會前面的牆壁上老是刷標語，你用個東西貼上說這個地方不要刷，不行，他不聽的。後來，文攻武衛指揮部在那個地方插了個旗子，就不敢刷標語了，就可以保持這個大樓比較乾淨。門口人民解放軍站著崗的，沒有用。」「我們是充分地發動群眾來搞專政，組織了這麼一個隊伍，現在組織了六萬人，四個師。我們準備搞十萬到十五萬人。」「原來的民兵戰鬥力很差，現在上海的文攻武衛已經可以看出來，比原來的民兵好，因為他是造反派，還有是在階級鬥爭的

風浪裡建立的。」

四月十二日社會上出現了炮打張春橋的事件，市指揮部機關一片混亂。

上午九時，指揮部幾個頭頭把機關人員組織成三路，分別上街收集社會動向。張寶林等到復旦大學看大字報，康正勤到工總司王洪文那裡去商討計謀。鐘定棟、鄭惠儀到康辦找王少庸及張春橋的老婆文靜摸底。

到中午，外灘街上已貼滿了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文匯報的高音喇叭對準了指揮部大院廣播宣傳，號召文攻武衛戰士行動起來造張春橋的反。

市指揮部領導小組在下午二時及晚上七時，先後二次召開區、師及各基層文攻武衛組織的頭頭會議。會上，告訴大家，炮打張春橋是「從陰溝洞裡刮出來的一股陰風」。要求大家堅決穩住部隊，聽從市革會的指揮。

四月二十四日市指揮部為上海建築機械廠主要頭頭參與炮打張春橋問題，暫停發展文攻武衛組織，向市革命委員會寫報告。這個廠屬第五批組建文攻武衛單位，已審批隊員六百人，原打算在五月份建立文攻武衛團。由於廠的幾個主要頭頭寫了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指揮部決定暫停發展文攻武衛組織，待該廠揭開階級鬥爭蓋子後再籌建文攻武衛組織。

五月四日因「北航紅旗」六六屆畢業生陳福利在滬參與了「四·一二」事件，多次去復旦大學活動，反對張春橋，書寫「誰在上海搞獨立王國，決沒有好下場」「提出打倒朱錫琪的口號是政治錯誤」，「下定決心，反右傾，誓死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二軍大『紅旗』揪出黑後臺的革命行動」等大字報。為此，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會領導寫報告，要求將陳送到公安局拘留審查。王承龍於五月九日批：「我們不處理。此人強行押送到原校。」

五月六日在張春橋、王洪文等一夥大造文攻武衛的輿論下，上海的報紙配合刊登了報導文攻武衛的消息，使不少省、市受騙上當，前來上海「取經」。市指揮部的情況反映第三期，向張春橋、王洪文等一夥作了彙報。情況反映摘要如下：

到五月六日為止，先後「有黑龍江、陝西、寧夏、河北、河南、四川、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武漢、南京、青島、濟南、哈爾濱、南昌等三十七個省、市、地區革命委員會群眾組織的代表專程來訪。」「我們已組織專門人員……當做嚴肅的政治任務去做」。

五月二十日南京市文攻武衛隊伍成立大會，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發了賀電。

五月二十四日市指揮部向市革會報告，在四、五月期間、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協助工交組對全市五十七處宗教廟宇的房屋，進行了接管查封，共有面積八萬一千平方米。查封後由工交組派人來管理。

六月六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同市公檢法軍管會，市勞動局革委會一起，於凌晨二時對支疆倒流人員中的「違法犯罪」分子採取了強制集中統一行動。這次行動的指揮班子由姬應伍、吳步林、王繼成（勞動局）王思賢、張寶林、鐘定棟、康正勤七人組成，調動了四千多名文攻武衛戰士，強制集中了二百零五人。又從山東、杭州等地抓回支疆青年造反司令孔令傑、宣傳部長尤國強等十四人。對這二百一十九人（關押在黃浦路二十號地下室），除拘留的外，強制遷送返回原單位。

在這次行動中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還專門調了一百多名文攻武衛隊員，長期脫高生產崗位，負責辦班及看管、審理、遷送。

六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在文攻武衛「對敵鬥爭動員大會」上講：「各個單位在對敵鬥爭比較尖銳的情況下，應該掌握敵情，掌握敵人的動態，只有對敵人的活動規律，敵人的情況掌握了，一旦需要，我們才能夠穩、准、狠地給予敵人狠狠的打擊。」「調動一個班、一個排、一個連，要經過市革命委員會，要經過我們四個人（廖政國、王少庸、王洪文、王承龍）簽字批准。如果要調動一個營的話，我們要請示張春橋同志，因此，各單位……都沒有權力擅自調動隊伍。」

七月四日市指揮部提出關於調動文攻武衛隊伍的建議，上報市革會。其中規定：調動一個連需經市革會「三王一廖」四個領導中的二人批准；調動一個營需經三人批准；調動一個團需經四人共同簽署批准，

並報張春橋、姚文元；調動一個師需經張春橋、姚文元批准。

七月十九日市革會常委討論文攻武衛問題，會議鼓吹用文攻武衛改造民兵，取代民兵和公安幹警、市指揮部領導成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王洪文講：「文攻武衛的建設有利於民兵的改造，打仗起來要有特種兵，立足點在於打。當我們發展到這個數字（十至十五萬人）後，還要研究怎樣改造民兵的問題。」「文攻武衛指揮部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可以考慮吸收造反派同志參加。」「重要目標的保護應由文攻武衛來擔任，民兵的活動停止了。」

王少庸講：「指揮部系統問題，不要按原來依區劃分的辦法，原來區武裝部的形式是不適用了」「區分部的名字太難聽了，這個名字是否可以改一下，最好用『師』」。

徐景賢講：文攻武衛的任務是「保衛上海革命新秩序，社會上的活動也還要靠這支隊伍的力量，如海員俱樂部門口就非要依靠這支隊伍」，「這個部隊是很可愛的，因為是工人自己的部隊。」

七月二十四日在王洪文、王承龍等一夥的策劃下，市指揮部調動文攻武衛部隊上街宣傳中央「七·三」布告，到八月九日止，共出動文攻武衛宣傳車一千零九車次，文攻武衛隊伍一萬零六百一十九人，大造文攻武衛隊伍的聲勢，擴大文攻武衛隊伍的影響。接著，先後派出了八十多個文攻武衛小分隊進駐所謂的老大難單位。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組織了七千多人的文攻武衛宣傳隊，用數百輛車子浩浩蕩蕩開進閔行地區，進駐上海電機製造學校、上海化工學校、華東航校、勞動局第一技工學校四個單位。此後，又以類似的方式搞所謂貫徹落實中央「八·二八」命令等，這些活動，名義上是落實毛主席戰略步驟，解決老大難，實際上是去插手這些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支一派，壓一派。

七月二十六日市文攻武衛同意成立上鋼一廠文攻武衛組織籌備領導小組，七〇年十月批准了民兵師領導班子。

七月至十月期間市指揮部在原中山東一路三十三號辦公樓下「牢房」裡，先後關押過多人。

八月四日經王洪文、王承龍等一夥的同意，市指揮部與市公檢法軍管會聯合搞了一個「八·四」衝擊行動。行動領導小組由李彬山、姬應伍、張寶林、陳敢峰、胡永年五人組成，下設聯合行動辦公室，具體負責這次行動。他們為了迎合王洪文的口味，特意把行動日期定在「打聯司」一周年。這次行動調動文攻武衛部隊二萬二千七百九十餘名，近千輛車子，在十個區及近郊四個縣統一行動，抓了一千六百多人。

八月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發賀電。賀電說：「我們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全體戰士和各條戰線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直接領導下，最近組織了三百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到一些工廠、學校……」。

九月十七日在王洪文、徐景賢等一夥的策劃下，市指揮部在上海雜技場召開了對陳丕顯、曹荻秋同志的電視批鬥大會。會議由張寶林主持。這次批鬥會上，全盤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為用「文攻武衛」改造民兵製造輿論。

九月二十日市指揮部調了二萬名文攻武衛隊員，約三萬名大專院校紅衛兵及財貿職工，於深夜十二時和二十三日凌晨四時，對全市車站、碼頭、大飯店、醫院、水路、公路及重要場所將近三百處，進行了突擊清查，抓了一千九百八十二人。這次清查行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國慶日。

十月一日在國慶活動中再一次突出文攻武衛隊伍：（一）遊行隊伍，文攻武衛方塊在正中前排，三軍在文攻武衛的右側，工宣隊在文攻武衛的左側；（二）選派三千名佩戴符號的文攻武衛隊員負責大會主席團周圍的保衛工作；（三）人民廣場周圍的十五個制高點派了十五個文攻武衛排的兵力負責控制；（四）廣場標兵線由文攻武衛隊員負責；（五）調動近十萬人的兵力負責整個慶祝活動警衛任務。

十一月四日市指揮部機關舉辦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學習班。這期學習班，在張寶林、鐘定棟等人的引導下，把批判矛頭集中對準了陳毅同志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在肅清「二月逆流」流毒的藉口下，進一步把矛頭指向軍隊。當時，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組負責人李文高

同志（曾任二十七軍團長，後轉業到地方工作），對涉及軍隊及陳毅同志等老師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當場與張寶林、鐘定棟等人爭吵了起來，張、鐘組織市、區兩級機關的到會人員對李文高同志進行圍攻。康正勤在會上點名攻擊李文高同志是指揮部的「不見得派」，張春橋在市里的一次大會上講，文攻武衛指揮部也有一個「不見得派」。

十二月二十日市指揮部搬到長壽路五百八十二號上棉一廠辦公。當時的公開理由是工人武裝的領導機關要到工人群眾中去。實際上，當時普陀區兩派鬥爭尖銳也影響到社會上，王洪文、王承龍等一夥策劃指揮部搬去，是去「壓陣」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於下午一時在同濟大學大禮堂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市文攻武衛創四好連隊運動誓師大會》。

在王洪文、王承龍等人授意下，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江蘇蘇州、無錫和浙江杭州派出小分隊，以檢查上海去這些地方遊山玩水的車輛為名，在上海與江、浙二個省交界處定點設卡，隨意扣車捉人，為「第二武裝」擴大政治影響。

### 一九六九年

一月二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會議同意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今後組織發展工作有關審批許可權的報告，即「文攻武衛」團、營、連單位的發展經市指揮部（領導小組）集體討論決定（幹部也是如此）。

二月四日由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和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聯合組成「上海市清查辦公室」，辦公地點開始設在總工會五樓，後遷至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內，辦公室由王維國、張寶林、鐘定棟等人負責，當天王少庸等人親臨坐鎮，共出動「文攻武衛」、公檢法人員、里弄幹部等七萬多人，抓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嫌疑分子一百四十九名。二月六日又出動了近七萬人，清查江、河船隻七千五百多條，抓了六十八人。這次行動延續到二月十五日，共出動二十八萬人，抓了二千五百一十六人（其中外地一千一百五十五人）。



三月二十一日黨的九大召開前夕，王洪文給文攻武衛指揮部下達指示：「發展工作可快一點，好的單位可發展一批，要注意面。」加緊拼湊「第二武裝」。

三月二十四日又搞了一次以「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現行活動」為主要內容的衝擊行動，到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為止，共抓了三百七十六人。

四月九日上海市文攻武衛第一次創四好經驗交流大會於四月九日至十一日在交通大學召開。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一千一百三十三人。杭州社會治安指揮部、鹽城地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派代表專程來滬參加大會。

王維國、葉昌明到會講了話。張寶林致開幕詞，鼓吹：「必須在文攻武衛隊伍中反復地、深入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把創四好運動提高到網上、線上、權上的高度來認識」。「要警惕穿新鞋走老路」。

四月九日在黨的九大召開前夕，王洪文和張春橋等密謀策劃，並於四月九日晚上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叫廖祖康到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鐘定棟等傳達他們的指示：「關於文攻武衛的隊伍，還可繼續發展，但請注意隊伍的品質，特別要注意領導班子的問題，幹部要進行審查，在可能的情況下搞些幹部集訓，主要是政治訓練，在適當的時間可搞軍事訓練，但以政治帶動軍事……」。文攻武衛指揮部頭頭立即向王洪文寫信，吹捧「對我們的工作是很大的鞭策」，並表示要辦好文攻武衛幹部學習班，加強軍政訓練，加快文攻武衛隊伍的發展速度。

四月二十八日為文攻武衛參加工總司學習班的問題，王洪文從北京來電話：「文攻武衛同志要抓緊、抓狠，要嚴格要求，這也是培養新幹部的方法，各區參加文攻武衛工作的解放軍如果要參加的話由他們自己決定。」

四月三十日晚上，廖祖康向王洪文匯報，「文攻武衛和工總司合辦學習班，改善了與工總司區聯絡站的關係。」王洪文說：「今後的學習班可考慮文攻武衛和工總司一起辦。」

五月二十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召開了各區集訓班（相等於區聯辦）負責人會議。傳達了張春橋關於撤銷文攻武衛、公檢法軍管會聯合辦公室的所謂指示。

六月三日文攻武衛指揮部給市革會的《關於上海人民防空情況的調查和今後意見》中講：防空機構「這個爛攤子不能適應當前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從機構到指揮，必須……進行改革和重建」。

七月十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發出通知：建立上海市文攻武衛水上指揮部。

七月十五日以文攻武衛為主，和市公檢法軍管會、市革會有關組辦組成「市維護革命新秩序辦公室」（簡稱「維辦」）在黃浦路二〇號開始辦公，王維國、李彬山、張寶林、鐘定棟、劉志明等為主要負責人。這個機構從七月下旬到九月底，在全市統一搞了九次大的行動（不包括以區、縣為單位的零星活動），共出動十四萬多人，抓了三千四百四十二人。

時間	行動名稱	出動人數	抓人數
7月23日	刮「颱風」	14600	663
7月29日	搜查公園、車站、碼頭	12000	511
8月29日	水上大搜查	30000	60
9月1日	刮「颱風」	6600	994
9月2日	搜查旅社	29000	141
9月3日	搜查公園、空房	20000	185
9月16日	整頓交通	37000	未有記載
9月20日~9月23日	打擊投機倒把	未有記載	848
9月26日	刮「颱風」	未有記載	40
合計十四萬多人次3442			

七月十九日經王洪文一手策劃，於下午六時左右，在原海員俱樂部（延安路外灘）和南京東路友誼商店門口，事先埋伏了文攻武衛，接著在門口放爆竹、吹喇叭，招引人行，然後包圍抓人。當場被抓三百九十九人（其中有孕婦和七十多歲老人），押到交通大學逐個審問，稍有不滿和反抗者，便遭拳打腳踢棍棒敲。這次行動具體指揮是鐘定棟等人，王洪文、徐景賢、李彬山等親臨現場「觀戰」。

七月三十一日在研究貫徹落實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市革會擴大會議上，張春橋講：「上海出問題要用文攻武衛包圍」。王洪文狂叫「不承認市革會水也不給他喝，飯也不給他吃」。

八月一日七院十一所的革命群眾對七月三十一日市革會擴大會議上張春橋關於「上海出問題要用文攻武衛包圍」的講話提出抗議，他們說「中央布告規定要用解放軍，張春橋卻要用文攻武衛，這是張春橋另搞一套」。

八月二日借宣傳「七·二三」布告為由，文攻武衛共出動三萬多人，近百輛宣傳車遊行。然後向一百零二個所謂老大難單位派駐了「文攻武衛小分隊」。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七時三十分王洪文找文攻武衛指揮部李彬山、張寶林、鐘定棟、康正勤、閻波去市革委會，傳達張春橋關於「要文攻武衛總結兩年來工作」的所謂指示。李彬山、張寶林等人提出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機關設在上棉一廠不適應工作的需要，要求搬到黃浦路二十號辦公。王洪文、王承龍均表示同意。

九月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市革會名義起草了給毛主席、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上海市文攻武衛隊伍成長、建設情況的報告》。

八月二十七日王洪文指使文攻武衛指揮部派隊伍進駐七院四所、八所、十一所。

九月十七日王洪文指使《工人造反報》刊登了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從九月十五日起遷至黃浦路二十號辦公的啟事。

十一月五日根據群眾來信和上海拖拉機廠挖防空洞時發現原日寇在江灣五角場地區的一個地下防空設施。文攻武衛指揮部撇開人防部門，派出六百多名文攻武衛隊員，清理這一設施，並定名為「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〇一工程。」

十一月十二日市指揮部壞頭頭為了控制水上交通，依照「四人幫」的旨意，把原歸楊浦區人武部領導的海洋漁業公司民兵改建為文攻武衛直屬團，劃歸市指揮部領導。

十二月二十七日按照王洪文的黑旨意，文攻武衛指揮部在上海摩托車廠組建第一個文攻武衛摩托排，並裝備五十輛摩托車。規定這支隊伍「由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直接掌握，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聽候市革委會調用」。不到半年時間，市區每個區成立了一個摩托連，擴編成「上海市文攻武衛摩托團」。

十二月鐵路分局文攻武衛師成立。

### 一九七〇年

一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委會要求組建民兵摩托車隊，提出需要摩托車三百五十輛，以擴充「幫武裝」，控制民兵特種兵隊伍。

一月十三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寫了「關於建立水上防空統一指揮的問題」的請示報告，經市革委會常委討論同意，把水上防空指揮大權交給「第二武裝」。

報告提出「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下，設立一個十人至十五人的水上防空指揮組，工作人員有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港務局、打撈局、交運局、海運局，長航分公司、水產局等單位，從文攻武衛組織中選調」。

報告中規定水上防空指揮組的任務是：「平時指揮水上階級鬥爭」，「戰時指揮反空襲鬥爭」。

一月十六日批准成立上鋼三廠文攻武衛師。

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交通大學召開上海文攻武衛「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代表會議，到會二千五百多人。

一月三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委會報告，提出要成立六個高炮師。

二月二十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張春橋關於要刮一次「紅色颱風」的旨意，向市革委會寫了「關於對三十七名犯罪分子進行衝擊的報告」。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賢、王維國於二十七日批示意見是：「抓人的事，應由公檢法軍管會辦理，需文攻武衛配合的，請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大力配合。」此後一段時間，文攻武衛停止單獨搞所謂「刮紅色颱風」。

三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張春橋、王洪文關於「組織發展工作，要符合戰備要求，消滅空白」的「指示」，加緊擴充隊伍，拼湊「幫武裝」。一九六九年這一年，就發展了六百三十一個單位，四萬一千六百名文攻武衛隊員，是一九六七年、六八年發展總數的二倍。至此，已建立了七個師、七十二個團、一百五十一個營、六百二十三個連，共二十一萬人。發展了八百五十五個單位，占工交系統工廠單位的百分之四十。

三月十六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賢、王維國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抓人的事，應由公檢法軍管會辦理」的批示，向市革委會寫了「關於對在押人員、未了專案的處理和今後有關社會治安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1.衝擊對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檢法懲處，一般的交工廠、單位處理；2.專案，交公檢法；3.除交辦任務外，一般不再受理群眾扭送人員、調解民事糾紛、維護劇場、車站、碼頭秩序等任務。四月一日，市革委會批示：「同意這個報告。公檢法軍管會需請文攻武衛配合的行動，請文攻武衛大力配合。」

三月二十七日上海警備區向市革委會寫了《關於組織民兵對外賓進行軍事表演的請示報告》，建議有關部門組成一個辦公室，抓好民兵對外表演的的工作。可是，市革會批示：「不要單獨成立辦公室，可由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具體負責日常工作，經費仍按老規定報銷。」這樣，從警備區奪走民兵對外表演的領導權。

四月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委會寫了《關於調整充實文攻武衛區指揮部領導班子的意見》，提出各區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核心中工人成份太少」，要求「每區擬適當增加工人成份，並建議警備區黨委充實骨幹」，進一步奪警備區對民兵的領導權。

四月六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召開所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市文攻武衛落實黨中央三個檔講用會」，參加的有連以上幹部三千多人。

王洪文到會吹捧「第二武裝」的「主流」、「大方向是好的」，在鬥爭中「立了新功」；攻擊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搞花架子」；說上海

文攻武衛「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成長的，使上海的民兵得到改造」；恣意修改《民兵工作條例》的內容，說參加民兵「身體條件可以放寬，年齡上也可以放寬」，並要民兵搞「高效炸藥」。

四月十四日文攻武衛摩托團（籌）提出報告，在第一季度訓練了四批骨幹，計一百五十人的基礎上。準備將一百六十六輛摩托車下放到各摩托連隊去，以利民兵「抓社會階級鬥爭」，應付緊急情況用。

五月十一日為了組建基幹團，擴大「幫武裝」，市革委會「二辦」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召開了十個區的革委會和人武部、指揮部負責人會議，對十個區基幹團的團職幹部人選進行討論協商，明確文攻武衛基幹團的團職領導幹部，從區人武部和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幹部中選配。

五月二十八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委會寫了「關於上海市文攻武衛十個區基幹團團職幹部任命的請示報告」，後上海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分別發了任職的命令。

五月三十日李彬山參加市革委會常委碰頭會，專門研究文攻武衛改名問題。主要是張春橋的話，李在傳達時說：「市、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是指揮工人民兵，暫時不動不改」。繼續保留「第二武裝」指揮部。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虹口體育場召開了所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幹隊伍成立大會」，宣布將「文攻武衛」改名為「上海民兵」。會議由李彬山主持，出席大會的有市革委會和駐滬三軍的領導，市革委會各組辦、工總司、婦聯、共青團和各區、縣、局負責人。參加會議的民兵有四萬六千二百餘人。

會上，王洪文說：「文攻武衛改稱為上海民兵」，「改變名稱並不意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採取行動，全市刮了一次「紅色颱風」，組織民警、民兵、紅衛兵、里弄幹部對三百九十名對象進行衝擊，實際抓到三百一十九名。

九月一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壞頭頭為了進一步貫徹張春橋、王洪文所謂民兵要抓社會階級鬥爭的「指示」，又與市公檢法軍管會聯合向市革會寫了「關於對公路、水路、旅館和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進行一次全面突擊檢查的請示報告」，這次打算出動五千民兵。他們打著所謂「清

查」的幌子，行亂抓人之實。

九月十七日市公檢法軍管會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民警、民兵、紅衛兵、里弄幹部二萬餘人（其中民兵一萬二千人），對全市二百五十三個中、小旅社，三十九個公園，二百五十三個碉堡，以及黃浦江，蘇州河的一千五百六十只小船，進行了一次所謂「清查」。這次衝擊了二百一十五人，隨意扭獲了六十六人。

九月十九日徐匯區民兵在一次所謂刮「紅色颱風」的行動中，執勤到汾陽路一五八號弄內時，與王維國的「專案組」發生了衝突。王維國向張春橋告狀，說文攻武衛衝擊了專案組。張春橋下令要查清楚，鄭惠儀根據張春橋的指示，經過調查後，寫了《關於九月十九日晚民兵執勤在汾陽路一五八號弄內與所在機關發生爭執情況的報告》，李彬山逐字逐句進行推敲和修改，列印後由鄭惠儀附信先送王洪文。王洪文親自修改後，重新列印，再送張春橋。

九月二十八日上海警備區召開熱烈慶祝毛主席關於「大辦民兵師」偉大號召發表十二周年大會。

王洪文在會上大放厥詞，攻擊說：「市里條條專政未解決好。公檢法抓治保、消防，指揮部去抓民兵，這怎麼辦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這不好」；提出「民兵要把治保、消防擔負起來，不要再另外組織了」；要求「各區抓一個單位試點，保衛、人武、消防幾個部門在一個單位，合在一起」；還胡說「這樣，利於一元化領導，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王洪文第一次公開拋出了「三位一體」的黑貨。

十月十二日批准成立上鋼五廠民兵師、交通運輸局民兵師。

十月十三日批准成立長航分局民兵師。

十月十七日王洪文竄到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說：「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工作很多，我覺得還是抓階級鬥爭，如果離開了這一條，這個隊伍的生命就不會很長了」。進一步提出要抓「三位一體」的「試點」，胡說：「民兵，在一個廠子裡，要交給它任務，如管四類分子、治安和消防等工作，都要擔負起來」，「這樣把這些工作搞到一起，民兵就有生命力了」。

十月中旬南京軍區廖容標副司令遵照毛主席關於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指示的精神。來上海解決撤銷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問題。在浦東大樓廖副司令親自召開的一次十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地方頭頭的座談會上，指出「隨著形勢的發展，現在的民兵領導機構，已不適應形勢，全國都是武裝部，只有上海還叫文攻武衛指揮部」，解決的辦法，「武裝部和文攻武衛，可以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就是撤銷文攻武衛指揮部，恢復警備區、人武部抓民兵工作的傳統體制。在壞頭頭鐘定棟、鄭惠儀事先策劃和煽動下，參加會議的區指揮部頭頭紛紛跳出來「發難」，圍攻廖副司令。這個問題就此被迫擱了下來。

十二月二十九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壞頭頭根據王洪文關於要抓「三位一體」試點的「指示」，第一次轉發了《文攻武衛靜安區指揮部在國棉二十廠進行「三位一體」體制改革試點情況》。

#### 一九七一年

一月三日張春橋、王洪文為了籠絡和控制「第二武裝」，上海市召開第四次黨代大會時，專門分配給市文攻武衛指揮部一個名額，鄭惠儀去參加的。幾個壞頭頭對張春橋、王洪文感恩不盡，表示拼老命也要把「第二武裝」經營好。

一月八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會寫了「關於落實刮『紅色颱風』的準備工作和碰到的問題」的報告，提出在春節前全市統一搞次行動，衝擊二百二十六名對象。同時，在報告中列了公安局三條「罪狀」：1.對文攻武衛刮紅色颱風「一直不予表態，表示難辦」；2.民兵小分隊去「派出所不給轉介紹信」，3.楊浦公安分局與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原來關係密切，敵社情互相通氣，「現在聯繫中斷了。」

二月八日王洪文為了加快裝備「第二武裝」，背著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上海製造大量武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王洪文的旨意，向市革會寫了「關於發動民兵製造半自動步槍的報告」，說上海電纜廠抽了二十多名民兵，取名為「六一〇」車間，已試製了六十多支槍，建議今後以上海電纜廠為主，再抽幾個廠進行生產和配裝，每年生產三千支至五千支槍，經費由財政局報銷。最後，提出由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



有關局、軍工組具體負責實施。在這個報告上，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批示：「繼續試驗下去，希望由工交組軍工組負責。原用經費，同意財政部門支付。」

三月三日批准成立上海鐵路局民兵團。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為了進一步吹捧林彪，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召開了所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代表會議》，出席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

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都到會講了話。王洪文說：「民兵工作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大教訓的，一下子給衝垮了。如果民兵不這樣參加階級鬥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會衝垮。過去民兵組織是比較健全的，但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衝垮呢？過去民兵有很大的弱點，不參加或很少參加當時的階級鬥爭，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

三月二十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馬天水所謂關於打擊現行犯罪分子，整頓車站、碼頭秩序的指示，十個區採取了一次統一行動，動用民兵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六人，衝擊各種對象七百三十三人。

閘北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提出「配合地區狠抓階級鬥爭的打算」，第一次提出「組織民兵宣傳隊進駐里弄，配合街道狠抓階級鬥爭」。市指揮部頭頭髮現了這個所謂「新生事物」，立即用簡報轉發全市，並指出：「這樣做法很好」，「希各區指揮部經常注意總結這一方面的經驗」。

四月九日盧灣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根據市委對「衝擊對象給予長期勞動教育」的指示，第一個提出將衝擊對象放到工廠，舉辦勞動教育學習班，把「管、審、教」結合起來，做到「邊學習、邊交代、邊核實、邊結案」。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壞頭頭又發現了一個所謂「新生事物」，立即用「簡報」轉發全市，並指出：「盧灣區『三·二七』學習班貫徹邊勞動、邊學習、邊批判的教育管理計畫，我們認為切實可行，現轉發給各區指揮部參考。」這樣，「三邊」勞動學習班，各區指揮部普遍辦了起來。

四月十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剛果（布）國家人民軍坦克學員進行軍事表演，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四百三十人。

四月十六日根據王洪文的「指示」，閘北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從十三個工廠組成十三支民兵小分隊，首批進駐十三個裡委會，配合里弄抓所謂「社會階級鬥爭」。這樣，「第二武裝」的黑手就伸進了街道里弄。

四月二十一日張春橋、王洪文陰謀騙取毛主席、黨中央對「第二武裝」的肯定，以滬委（七十一）十三號檔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了「關於上海城市民兵工作的情況報告」。報告中他們沒有敢把偽造的「民兵改造」的指示拋出來，也沒敢講「重建」民兵，隻字不提上海警備區對民兵的領導。

五月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委、市革會、警備區黨委寫了「關於下發高炮武器的請示報告」，提出最近中央軍委調撥給上海民兵一百七十四門炮，加上過去已裝備的四十二門，現共有二百一十六門，準備下發到民兵高炮連隊。從而，進一步控制民兵高炮隊伍。

五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為了製造更多的武器裝備「第二武裝」，發函致市財政局，要求撥款十六萬元，試製步槍和增添有關設備。

五月十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老撾愛國戰線黨英雄模範代表團進行軍事表演。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五百五十人。

五月十七日市、區二級文攻武衛指揮部從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全面開展所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運動。

五月二十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進行軍事表演。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五百五十人。

六月二十五日為了使「幫武裝」聽從「四人幫」的調動和指揮，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提出的「關於調動民兵許可權的建議」中規定：調動一個連，經區委批准，報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由市指揮部報市委、市革會備案；調動一個營，由市指揮部領導小組研究通過，報市委、市革會

備案；調動一個團，必須報市委、市革會批准。他們隻字不提民兵要聽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

六月二十八日「文攻武衛」改名為「上海民兵」已一年多，市指揮部對簡報的報頭仍用「文攻武衛簡報」。在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從簡報第三十八期才首次啟用「上海民兵簡報」報頭，署名仍用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

七月六日楊浦區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上海電梯廠等單位的民兵，派出了民兵小分隊，進駐眉州街道，抓所謂社會階級鬥爭。王洪文發現了這一「新生事物」立即予以肯定。

七月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幾內亞共和國軍事代表團進行軍事表演。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四百二十人。

七月十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為擴大「幫武裝」，籌建上海市建築工程局、上海鐵路分局、江南造船廠三個民兵師，向警備區黨委寫了「關於組建上海市建築工程局等三個民兵師的請示報告」，要警備區黨委批准、任命。

七月二十六日在王洪文多次提出要抓「三位一體」的試點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各區抓點的基礎上，向市委、市革會寫了一份「關於『三位一體』試點情況報告」。在報告中，吹噓搞「三位一體」的所謂「優越性」是：第一，有利於黨委加強對武裝保衛工作的一元化領導；第二，有利於精兵簡政，是基層鬥、批、改的主要課題；第三，有利於進一步加強民兵建設；第四，有利於進一步加強治安保衛工作；第五，有利於進一步落實戰備工作。

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情況簡報」第二二五九期以《工人民兵到里弄去抓階級鬥爭》為題，反映了閘北區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民兵進駐街道里弄，抓所謂社會階級鬥爭、教育青少年、促進民兵思想革命化的「經驗」。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維國、王少庸等看後，作了批示。此後，全市「小分隊」就紛紛進駐街道里弄。

九月二十五日普陀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區野營訓練指揮部、區人民

防空辦公室合併，取名為「上海市普陀區戰備指揮部」。

九月二十七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羅馬尼亞武裝部隊軍官休假組進行軍事表演，觀看的外賓有二十人。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四百五十人。

十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寶山縣吳淞公社等單位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進行軍事表演，陪同觀看的外賓有五十人。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五百人。

十月十二日「九·一三」事件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加緊對「第二武裝」的控制，再次提出「關於調動民兵許可權的建議」，規定「上海民兵受市、區黨委、革委會統一調動，直接指揮。具體執行機關是市、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其他任何組織、任何單位、任何個人，都無權調動一兵一卒」；調動一個連、一個營、一個團，要分別經過區委、市指揮部領導小組、市委同意。李彬山親自修改，把軍事系統也列為其他組織。

十月份徐匯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十二月十日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向市委、市革會寫了所謂《依靠群眾，主動打擊階級敵人現行破壞活動的情況報告》，反映徐匯、盧灣、黃浦等區公檢法和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及上海鐵路分局民兵師（籌），從十一月下旬開始，分別採取了所謂革命行動，衝擊了各種現行犯罪分子二百一十一名；肯定公檢法與文攻武衛相互配合，聯合行動；抓人少，聲勢大，震動大；「敵變我變」，講究戰術等所謂經驗。

十二月十三日王洪文在去北京前，竄到指揮部交底，並對下一步的「任務」作了安排。他提出：「三位一體的試點經驗還要很好抓一下。要在原來的基礎上，再找幾個單位繼續試點，我已經給國棉十七廠的同志講過了，要他們繼續好好搞一搞，你們也可以再抓一下。這不光是上海的問題，要報中央才能解決」，「你們先搞，市委將來派人與你們一起研究，搞一個東西上報中央」；接著，王洪文提出要搞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說：「我已同周司令商量過，還是要合，不合怎麼辦呢？先把兩個指揮部合併起來再說。首先是上面要合起來，

上面合了下面就好辦了，合了有利條件多！」，「名字叫什麼，可以研究，大家考慮」。

十二月十四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委和警備區黨委寫了「關於建立上海市電信局民兵師的請示報告」，加緊擴大「第二武裝」。

十二月十七日在王洪文的親自授意下，楊浦區委向市委寫了「關於區文攻武衛和野營訓練兩個單位合併辦公的報告」，提出「合併後名稱為：上海市楊浦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屬區委、區革會的一個組辦，在區委、區革委會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在業務上仍分別受市級兩個機構的領導」；建議「指揮部成立五人領導小組，由吳立義任組長，鄧成福任副組長」。市委常委會議討論：「同意」。這是張春橋、王洪文批准文攻武衛和野營訓練合併的第一個區，是他們奪警備區領導權的重要步驟。

十二月二十一日長寧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市委批准，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採取了一次所謂「革命行動」，組織民警、民兵、紅衛兵、里弄幹部參加，其中出動民兵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人，抓了八百二十八人。

### 一九七二年

一月五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會寫了「關於建立上海海運局民兵師請示報告」。

一月十八日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簡報第七期，介紹了以公交汽車二場六十五路車隊為主，上鋼三廠民兵參加，抽了一百二十多人組成「跟車戰鬥小組」，抓公共汽車上社會階級鬥爭的所謂經驗。王少庸一月十九日批示，說：「我建議把六十五路的經驗，認真推廣到各個線路，以及輪船、火車和商店等。要及時總結經驗，堅持下去」。

一月二十八日市革會二辦、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召開所謂「一二·二五」革命行動經驗交流會。

李彬山在會上說：「這次會議，目的是要進一步發動車站、碼頭、輪船、公共車輛、旅館、浴室、茶樓、商店的民兵狠抓社會階級鬥爭，

要發現一個衝擊一個，發現一批衝擊一批，邊審查核實，邊衝擊批鬥，放開手全面出擊」。

二月六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和市野營訓練指揮部根據王洪文的「指示」，聯合向市委、市革會並警備區黨委寫了「關於文攻武衛同野營訓練兩個機構合併的請示報告」。提出：關於名稱，「大家傾向稱『人民武裝指揮部』」；「關於組織領導和工作範圍問題」，「合併後機構屬市委、市革會的一個組辦，在市委、市革會和警備區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建議「成立一個九至十一人的領導小組」。

二月九日上海警備區收到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和市野營訓練指揮部聯合寫的關於「兩部」合併的報告後，黨委經過研究，以十八號檔向市委寫了請示報告，報告提出：「我們同意合併，名稱叫『上海民兵指揮部』，是市委、市革會的一個組辦，在市委一元化領導下，日常工作有警備區領導」；建議「兩部合併後，應重新成立一個領導小組」。

市委常委會於三月二十四日進行討論：「同意」報告的意見。

二月二十八日靜安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三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委寫了「關於小分隊配合地區狠抓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報告」，說：「根據去年三月十七日市委關於上海民兵要主動深入地抓階級鬥爭的指示精神，我們即在閘北區選擇了十三個工廠民兵與十三個里弄掛鉤，摸索民兵如何經常配合地區抓社會階級鬥爭的經驗」，「截止今年二月底，全市已派出六百六十九支民兵小分隊，與全市六百六十九個里弄（占全市里弄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六）掛鉤」。

王洪文見了如獲至寶，提出：「請文匯報派人幫助文攻武衛把這份材料再認真整理一下，在毛主席關於「三落實」指示發表十周年前後報告中央，或在報上發表或者轉發」。妄圖騙取毛主席、黨中央的肯定後，對外販賣。

三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日本齒輪座劇團進行軍事表演，觀看的外賓有四十五人。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四百五十人。

三月十二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東埔寨英·薩利特使進行軍事表演，觀看的外賓有十二人。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四百五十人。

三月二十日搞脫產的民兵小分隊，不符合勞武結合的原則，受到廣大民兵的抵制後，王洪文、馬天水假惺惺地說「據知各區里弄都派有工人文攻武衛小分隊，這批同志都是產業工人，長期脫產不好，請通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和二辦改進，改為業餘為好」。

四月八日根據王洪文，馬天水關於民兵小分隊「改為業餘為好」的「指示」，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立即向市革會寫了「關於民兵小分隊轉入業餘的報告」。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張敬標於四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同意民兵小分隊要堅持業餘活動。」其實，他們「堅持業餘」是幌子，仍大量抽人脫產。

四月十六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寶山縣吳淞公社等單位民兵對外表演小分隊為智利海軍「埃斯梅拉達」號練習艦的官兵進行軍事表演，觀看的外賓有二百四十人，參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員有五百人。

五月十日根據王少庸關於「把六十五路的經驗，認真推廣到各個線路」的「批示」，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廣」，向市革會寫了「以路線鬥爭為綱，狠抓公共車輛上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說：「以六十五路公共汽車和二十路電車為試點，現已推廣到六十七條公共汽車、電車線路上去」。

六月九日批准成立建工局民兵師、海運局民兵師。

六月二十二日經市委批准，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採取了一次所謂「革命行動」，組織民警、民兵、里弄幹部、紅衛兵三千九百餘人，從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各區指揮部持續不斷地採取分散行動，共衝擊了六百四十七名對象，並到處去遊鬥。

七月二日王少庸竭力贊成「第二武裝」實行法西斯專政所採取五花八門的做法。在本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寫的「對準備衝擊對象採取上門教育的方法初見成效」的一份簡報上，稱讚「這次行動，……比過去都有所進步」，「此次採取上門教育，即『緩衝』

的措施，是個好的作法。在今年夏季至國慶日前，我建議繼續發動群眾，對那些可沖可不沖的青少年犯罪分子，更多的採用這種『緩衝』做法」；並提出「對於城鄉結合部聯合行動，尚未見到反映，不知有些經驗否，盼告」。

七月五日根據王少庸關於搞好市郊結合部治安秩序的「指示」，寶山縣與楊浦、虹口、閘北三個區的公檢法軍管組和文攻武衛指揮部，聯合採取了一次所謂「革命行動」，抓了六十一人。這是第一次進行的區、縣聯合行動。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把十個區與近郊縣分成三個片：南片（徐匯、南市、黃浦區與川沙、上海縣掛鉤），西片（長寧、普陀區與嘉定縣掛鉤），北片（楊浦、閘北、虹口區與寶山縣掛鉤）。發動農村民兵抓所謂社會階級鬥爭，即由此開始。

七月二十八日市委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開常委會，研究民兵抓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李彬山向王洪文告中央公安部的狀，說「最近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提出，非專政機關不能抓人的問題，有些人怕目前文攻武衛抓階級鬥爭而犯錯誤」。王洪文聽後立即為「第二武裝」打氣，撐腰說：「抓人不抓人都要從是否有利無產階級專政來考慮問題」，「不要怕，犯了錯誤有問題由市委、市革會來檢討，用不著擔心，你們要好好總結經驗」；徐景賢說：「什麼叫專政機關，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是專政機關之一」，文攻武衛「今後不叫抓人，可叫衝擊」。

八月十九日市委以滬委（七十二）批示第五六八號，給上海警備區的批復中說：「你們報來的（七十二）上警三十二號《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的請示報告》收悉」。「經市委常委會議討論，同意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和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成立『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市區、郊縣的民兵工作和全市野營訓練工作」。

「同意由李彬山、胡守富、吳立義、夏琳、鐘定棟、鄭惠儀、閻波等七位同志為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李彬山同志任領導小組組長，胡守富、吳立義兩同志任副組長」。

八月二十八日李彬山為了向「四人幫」報功，叫文攻武衛指揮部單獨向王洪文寫了一份「關於『三位一體』試點情況報告」。



在這份報告上，李彬山親附一信給王洪文肉麻地說：「王政委：你交待我弄的『三位一體』的材料，因不知你走得那麼快，沒有來得及在你開會前弄好送去，現將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整理的一份材料送上作參考，不當之處請指示。」

九月二日為了加緊做好「兩部」合併的工作，李彬山在浦東大樓七樓小會議室，又一次召開指揮部領導小組會議。他在談到「兩部」合併的時間時，傳達了王洪文的一段話說：「寶林同志不回文攻武衛指揮部了，市委打算分配他其他工作」；接著，研究了「兩部」合併的步驟，工作和建立機關黨支部問題。

九月五日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黃浦路二十號）禮堂，召開「兩部」合併動員大會，會上，李彬山首先傳達了王洪文的「指示」，最後宣布了機構設置和組長以上人員的名單。

九月份黃浦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九月十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為「上海民兵指揮部」，下設辦事組（內分秘書、管理小組）；政工組（內分宣教、幹部、群保小組）；後勤組（內分裝備、財務、衛生小組）；指揮組（內分作戰、訓練、動員小組）。從這時開始，取下了「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招牌，換上了「上海民兵指揮部」的牌子。辦公地點也從黃浦路二十號，遷至南京西路一四一八號。

九月十二日上海民兵指揮部發出第一個通知，說「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市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成立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由李彬山、胡守富、吳立義、夏琳、鐘定棟、鄭惠儀、閻波等七位同志組成」；「李彬山任組長，胡守富、吳立義為副組長」。

十月一日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委寫了《關於社會治安情況和進一步加強措施的報告》，十月三日馬天水作了批示：「看來我們對流氓犯罪分子打擊不力，一方面加強審訊，同時依靠群眾調查摸底，要準備集中打擊一批流氓犯罪分子」。馬天水對「第二武裝」又下了要大規模抓人的命令。

十月五日市革會二辦、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市民兵指揮部聯合召開

了十個區、近郊四個縣公檢法、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會議，傳達了馬天水的所謂指示，提出要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擊現行犯罪分子的破壞活動。五、六日二天晚上，全市出動民兵巡邏小分隊二百三十九支，四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市公檢法治保組和楊浦、徐匯、虹口三個區，組織了二千四百多人次，在南京東路、西藏路、外灘等主要幹道上的十七個點周圍巡邏守候，扭獲了四十一人。

十月六日王秀珍到李彬山家裡，對李等人交底說：「民兵的思想、組織建設等，這個問題很重要。關鍵問題是用什麼樣的思想去統帥這個隊伍」；提出「我們這樣大的一支隊伍，單靠你們幾個不行，要注意選拔一些幹部，現在缺少幹部，在你們民兵系統裡要提供輸送一些幹部」；最後，她關照「李副政委專心把民兵隊伍帶好」，「關鍵時刻好用得上。」

十月九日市公檢法領導小組和市民兵指揮部，組織十個區和上海、嘉定、寶山縣的民警、民兵和群眾，又刮了一次所謂「紅色颱風」，抓了五百三十九人。同時，還出動民兵巡邏小分隊二百八十五支，三千八百人，對鬧市區、市郊結合部以及碉堡等處，進行守候和搜查，又扭獲了九十七人。

十月十七日為了擴大「第二武裝」的影響，市民兵指揮部向市委寫了「關於組織民兵參加拍攝電影幾個問題的請示」，說「『八一』製片廠準備拍攝一部民兵訓練紀錄片。其中要反映城市民兵防空隊伍訓練的情況，並確定在上海攝製民兵高炮、高機和摩托隊伍的訓練鏡頭」。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批示：「同意，指揮部要很好地組織，對參加拍攝的民兵要認真訓練一下，要注意安全」。

十月二十七日在康平路小禮堂市委召開常委會研究公判大會的問題。當談到抓人問題時，張春橋惡狠狠地說：「要麼不抓，……抓了不要隨便放」，「放人也要經過群眾，好人讓群眾去做，這樣才能叫作專政是群眾的專政」。

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十個區民兵指揮部和公檢法，出動大批民警、民兵和里弄幹部，進行了一次集中衝擊，共抓一百三十三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虹口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 一九七三年

一月八日張春橋、王洪文指派的《人民日報》國內部負責人紀希晨等兩人來市民兵指揮部。自稱是「張春橋、王洪文要我們來總結上海民兵經驗，並在全國推廣」，李彬山、鐘定棟、鄭惠儀等進行接待。

一月九日下午王秀珍、張敬標到市民兵指揮部，王秀珍說：「儘管王維國壓，春橋支持我們」。她又說：「關於向人民日報記者（指紀希晨等兩人）彙報的問題要圍繞著主席的指示是怎樣落實的，實事求是向他們彙報」，「不要作為一般的記者來接待，要重視。」並指使李彬山等「要準備向中央寫個報告」，還胡說什麼「工總司、文攻武衛是路線鬥爭的結果」，「上海的工作是春橋、文元、洪文同志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

一月二十三日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接見了紀希晨，李彬山也在場。在這次談話中，王洪文、徐景賢大發謬論。王洪文大肆吹噓文攻武衛成長史，徐景賢鼓吹說，文攻武衛的「鬥爭歷史是在『一月革命』反經濟主義妖風的鬥爭開始的」，那時「就產生了民兵的一支骨幹隊伍」。

一月二十六日盧灣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一月份閘北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二月二十八日市民兵指揮部向王洪文、王秀珍寫了《關於市、區指揮部工作人員原單位要求調回的情況和我們的意見》，反映有不少單位要求調回工作人員「抓革命、促生產」。馬、徐、王及金祖敏等人於三月十四日作了答覆：「要各級黨組織支援和關心民兵工作，重視和選拔、培養民兵幹部，更好地發揮民兵的作用。」並要「市委組織組與民兵指揮部研究一下，根據精兵簡政原則，民兵幹部儘量做到相對穩定」。以穩住「第二武裝」指揮部這個攤子。

三月七日晚上，馬、徐、王在錦江小禮堂，召集警備區劉文學政委和市民兵指揮部領導成員開會，金祖敏和張敬標參加。王秀珍說：「洪文同志在三月四日來電，其中談了一件事，說毛主席最近多次談到上海

民兵，問上海民兵發了多少槍？……後來主席要軍委給上海民兵發二十萬枝槍。」（注：查無此事）「洪文同志說，把毛主席這個指示傳達給警備區和民兵指揮部的同志，要把民兵工作搞得朝氣蓬勃。」洪文同志還說上海生產的高炮超產的今後還可再留一點。」徐景賢說「步槍也是批林整風的很大勝利，把工人武裝起來可以防止陰謀家。」馬天水則講「發槍是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不要單純看是發武器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王秀珍還叫嚷「在市一級班子裡，只有鄭惠儀、鐘定棟你們兩個人，工人還沒有」，「要大膽從工人中選拔幹部，來掌握槍桿子。」

三月十日紀希晨由北京寫信分別寄給徐景賢、李彬山和上海民兵指揮部，並附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支強大力量》一文的小樣。後來還通過長途電話告訴上海民兵指揮部說：「這個材料作為內部動態已報政治局審查，什麼時候發表再說」。

三月十五日祕魯海軍「獨立號」練習艦官兵四百五十餘人來滬訪問，市民兵指揮部組織楊浦區民兵軍事表演分隊五百餘人進行了軍事表演。

三月十九日馬、徐、王用上海市委名義，以滬委（七十三）十八號檔向下轉發上海民兵指揮部《關於教育改造違法青少年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對民兵可以將違法青少年隨便抓起來，「組織起來到集訓班清查問題」的做法，竟予以肯定，企圖使「第二武裝」擁有抓、關、押的非法權力。

三月二十四日王秀珍指使李彬山說：「要準備寫加強上海民兵建設的材料」，還說洪文同志打電話來說，「上海民兵的建設要好好研究一下」，「市委最近開一次會議，要研究民兵工作希望你們準備一下」。第二天，李彬山對鐘定棟等進行了傳達，並作了研究。

四月一日馬、徐、王秉承王洪文的旨意，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開市委領導會議，研究加強「第二武裝」建設問題，王少庸、張敬標等都到會。會上，李彬山彙報情況和提出下一步意見，馬、徐都插了話。徐景賢故作神祕，要大家討論發二十萬枝槍「意義深遠在那裡？」又聳人聽

聞地說：「要與批林聯繫起來，武裝產業工人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同時防止野心家、陰謀家搞陰謀活動」。馬天水也大講什麼「武裝工人階級是毛主席的一個戰略思想」，發槍「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叫嚷「第二武裝」「在政治上要起更大的作用」，對配發槍枝的原則，徐景賢規定「以武裝工人為主，郊區也武裝部分」，會上討論，二十萬枝槍的四分之三給市區，把市區的舊雜槍調給郊區，但馬天水認為不行，要「二十萬枝槍全部給市區，市區原來的槍給郊區」，並提出基幹民兵年齡是否可以放寬「五歲」。

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常委會上得意忘形地說什麼「上海的工作在全國說來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城市」，「在解放以來的歷次大的政治鬥爭，上海的影響都比較大，……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說了」，說上海在九、十次路線鬥爭中都是「重點之一」，上海同志要「爭氣」。接著，又講起毛主席問「文攻武衛還在不在？」「要給上海民兵二十萬枝槍以及上海民兵的作用」。會上，他對控制上海報紙的黨羽王成龍說：「你們的文匯報要經常報導上海民兵，要定期報導，個把月報導一次。」他還胡說：「搞工會不能抓文的不抓武的。我們在工會任務中不能專門列一條，但我們要關心民兵工作，這次報告中我專門講了一段，我對這一句很欣賞：『一旦像林彪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妄圖實行反革命政變，就叫他們在我們上海工人階級的武裝面前，碰個頭破血流』。」他要大家把「工會工作和民兵工作結合起來」，動員黨羽，親信都來苦心經營「第二武裝」。

四月十五日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中，竟下令要各級工會抓民兵工作，要求「繼續加強上海工人民兵隊伍的建設，使工人民兵成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一支強大力量」，蓄謀以工會一條線控制民兵。

四月十六日王洪文在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講話時，大叫上海工人階級「也要用槍桿子武裝起來」，並別有用心地影射說：「一旦像林彪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妄圖實行反革命政變，就叫他們在上海工人階級的武裝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四月二十五日王洪文在好八連命名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大叫「要加強民兵建設」，利用一切機會造輿論。晚上，李彬山向王洪文匯報發槍的有關問題。

五月馬、徐、王指示上海電影製片廠搞上海民兵題材的創作。後來由市民兵指揮部成立了一個電影劇本創作小組，用了三年時間編寫成一本叫《江城柱石》的劇本。

五月十日市民兵指揮部以絕密級（七十三）五十號檔，向市委上報了《貫徹毛主席關於武裝產業工人的指示進一步加強上海民兵建設的請示》，報告說：「毛主席決定發二十萬件武器武裝上海工人階級，對於加強戰備、防範侵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表示「一定要把這支工人武裝建設成為一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堅強力量」，「一旦像林彪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妄圖實行反革命政變，就叫他們在武裝工人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並提出武器配發原則「主要裝備產業工人民兵，適當裝備一部分貧下中農」，擬「首先武裝十個基幹團和獨立團、十八個高炮團、摩托團；其次武裝市區基幹民兵和沿海島嶼、預定反空降地區的基幹民兵」。

五月十一日智利空軍阿瓦洛斯上尉航空學校代表團一行七十人訪滬，市民兵指揮部組織虹口區民兵軍事表演分隊五百餘人進行了表演。

六月七日市民兵指揮部以（七十三）六一號檔上報市委《關於「三位一體」的試點報告》，再次報告了從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起，在上棉十七廠等八個單位，將民兵、治保、人防部門合併成一個叫「武裝保衛組」的試點情況。

六月八日馬、徐、王用市委名義，以（七十三）三二號檔上報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上海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自吹自擂，把「第二武裝」說成是「不穿軍服的子弟兵」，把「第二武裝」對廣大群眾的非法抓、關、押，說成是「按照黨委部署，配合公安部門，集中行動，主動出擊」，並包藏禍心地說「在城市民兵要不要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同時還把重新組

建上海民兵，「派出一千餘支民兵小分隊，深入里弄」等私貨塞進了報告，其險惡用心在於騙取黨中央、國務院批准，謀得合法。

六月九日馬天水打電話給市民兵指揮部說：「上海民兵指揮部要結合討論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好好討論一下如何抓好階級鬥爭問題。看來好像有點鬆。你們要好好研究一下，要有點措施」，督促「第二武裝」繼續抓緊所謂「參加社會階級鬥爭」。

六月十日馬天水、王秀珍把吳立義、鐘定棟找到康平路小會議室，彙報當前民兵抓階級鬥爭和有關民兵建設的情況。馬天水要吳立義、鐘定棟寫個發槍計畫「報告市委」。在彙報到區指揮部幹部變化時，馬天水講：「核心小組成員變動要報告市委，這是牽涉到槍桿子掌握在什麼人手裡的問題。」指使將原來他們認為較好的，現已調走的幹部「開個名單由市委組織組去調回來」，規定「今後二個區的頭頭如要有變化，你們領導核心要集體簽署」。彙報時，王秀珍陰險地問：「現在的隊伍是否指揮得動呢？」對於幹部問題，王秀珍講：要「結合中央工作會議傳達討論，提高如何對新生力量的看法」，馬天水要市、區民兵指揮部「應調一些工人為骨幹」，還說上海參加十屆黨代大會三十名產業工人代表，專門給工人民兵兩個名額，「市委這個意見報告了洪文同志，政治局同意了這個意見」。談到所謂抓階級鬥爭問題時，馬天水指使每天巡邏的民兵人數可從二千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王秀珍也叫嚷「要發揚一月革命精神」，「好的經驗不能丟」。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紀希晨寄來兩篇關於上海民兵的報導。紀信中說：「此稿已送中央幾位負責同志，是否能用，最後由中央決定。修改稿件中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掌握內外的問題。民兵的許多重大鬥爭，不好公開見報。報導稿標題一是《上海城市民兵積極投入社會階級鬥爭，堅決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支強大力量——在戰鬥中的上海民兵》。

六月二十日馬天水在上海市公安工作會議上講話，他說什麼上海局勢的掌握與穩定「與民兵這支隊伍是分不開的」，「這支隊伍不僅是武裝力量，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文攻武衛隊伍」。馬天水還竭力緩解廣大公

安幹警對「第二武裝」非法抓人、關押進行的抵制和鬥爭，說：「民兵抓社會階級鬥爭是個傳統，今後不能削弱，只能加強。」要公檢法「依靠民兵」，與民兵「密切協同作戰」，對產生的矛盾和雙方的關係，「要正確處理，加強領導」。賣力地為「第二武裝」搞法西斯專政辯護。

七月七日朱永嘉打電話給鐘定棟，談到市委寫作組研究寫民兵情況報導的問題。並告訴說，昨晚洪文同志來電，對景賢同志說，已看了《人民日報》寫的那篇報導，意見還要繼續寫兩個報告：1.寫一、二個工廠，並談到工廠民兵如何搞「三位一體」的；2.區、縣民兵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如何參加階級鬥爭的情況。指使上海進一步炮製頌揚「第二武裝」的文章。

七月十一日南京軍區對「四人幫」破壞傳統的「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進行了堅決抵制，並在《東海民兵》第八期上仍然重申了民兵工作條例中關於民兵武裝「絕對不能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規定。馬天水、王秀珍對此惱羞成怒，竄來指揮部，馬天水說：「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民兵工作也隨著來了一個大革命」，「我們的民兵現在既管人民內部矛盾，又管敵我矛盾」，「這個革命傳統是在鬥爭中形成的」。對於警備區編寫的歌頌民兵光榮傳統的民兵歷史鬥爭故事，則橫加指責，說「光寫歷史，不寫現實，洪文也批評這個問題」，是「思想有問題」。王秀珍也說：「抓上海民兵這是有戰略意義的，如果再有像林彪那樣的野心家出現，就與他幹」。

同一天，根據王洪文的旨意，馬、徐、王下令市委寫作組，派了五個人，來市民兵指揮部炮製《上海城市民兵情況的調查》。鄭惠儀接待。

七月十四日王洪文把一九六七年七月張春橋要求成立武衛組織的請示印發給上海市委並附信給馬、徐、王和周純麟同志。王洪文的信，是妄圖利用「第二武裝」進行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反革命信號。

七月二十四日馬、徐、王用半天加一個晚上召開了市委、警備區黨委兩委常委擴大會，販賣張春橋的《報告》和王洪文的《信》。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及各組長也參加了會議。馬、徐、王借機大整警備區。徐景賢說過去的民兵「沒有戰鬥力，再合法有什麼用處」，攻擊警



備區編印《民兵工作情況》是「二元化」、「是非法的，是與民兵工作利益違背的」，公開剝奪警備區管民兵工作的權力。馬天水也叫嚷要「進一步揭露矛盾」，把矛頭引向警備區，煽動大家進行反軍亂軍。

七月二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研究決定，從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一日以六個半天，組織各組副組長以上幹部學習張春橋的報告和王洪文的信，其中用四個半天「擺存在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市、區民兵指揮部開始點燃了反軍亂軍的鬼火。

七月二十七日根據王洪文七月七日要上海「繼續寫兩個報告」的旨意，市委寫作組會同市指揮部組織力量炮製出《上海城市民兵情況的調查》及七份附件，《調查》的題目是「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後來這個材料流毒全國。

八月上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對民兵工作講了一些黑話。王洪文說什麼「對改造民兵認識不足，實際上這是對毛主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搞好民兵工作認識不足。這是對新鮮事物支持與不支持的問題。」姚文元講：「民兵問題主要是路線問題，誰來指揮，什麼機構抓，屬市委領導，還是警備區領導，不在乎。」王洪文也說什麼「民兵不管誰管，關鍵在路線正確不正確」。

八月十二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集市、區指揮部副組長以上幹部和民兵直屬師、團負責人一百六十六人，用四天時間學習張春橋的報告和王洪文的信，出了二期簡報，李彬山作了會議小結。簡報中說「改造民兵」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民兵建設，「提出了任務，指明了方向」，市區兩級民兵指揮部，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民兵工作的一種好形式，「三位一體」是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生事物，應加以肯定，叫嚷「對待民兵指揮部的態度問題，實際上是對新生事物的態度問題，路線問題」，「決不能搞業務部門的垂直領導」。

八月十四日馬、徐、王召開區、縣、局及有關組辦負責人八十人左右的會議，傳達張春橋的報告和王洪文的信。會上，徐景賢公然提出「要用文攻武衛成長壯大的具體事例教育幹部和群眾」，攻擊民兵武裝不能用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規定是「把自己手腳束縛起來了」，

說搞民兵「怕影響生產的觀點是比較近視的」，「建設工人民兵對內可以防止野心家、陰謀家搞反革命政變」，還大捧王洪文的「三位一體」是「領導又集中，人力又節約，工作有成效」。王秀珍也說：「對抓民兵我曾聽到江青同志說過，有同志講主席是高瞻遠矚，江青同志說主席是深謀遠慮。」馬天水則叫嚷就是「五大、六大以後」也要「抓社會階級鬥爭」。民兵班子要「軍幹群」相結合，民兵骨幹「各工業局要支持，不能調回去」，已回去的「需要的可以調回來」，並公開提出「體制要逐步解決」

八月十五日市委以（七十三）批字第七三二號批文下達《關於調周宏寶同志任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的批復》，派周宏寶來控制「第二武裝」。

八月二十七日江蘇省無錫市民兵指揮部參觀團十一人，到上海參觀，至八月三十日結束。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電視臺來滬拍攝一組《上海民兵在前進》的電視影片，以上棉二十二廠為重點，拍攝了民兵巡邏、民兵小分隊進里弄「抓階級鬥爭」以及老民兵講傳統等內容，至九月十五日完成。

八月三十日「四人幫」一夥結黨營私，將周宏寶等拉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周宏寶去京參加十屆一中全會。

九月十日首都工人民兵參觀團作為首批的外地民兵參觀團一行二十六人，由張世忠（十屆候補中委）帶隊到達上海。王洪文自京電告，要民兵指揮部李彬山、周宏寶、吳立義、鐘定棟熱情接待，前去機場迎送。代表團在滬期間，聽了市民兵指揮部的介紹，看了一些民兵單位，馬、徐、王都去住處看望，至九月二十日離滬。

自此開始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全國除西藏外，先後有四十九個地區派五十三個代表團（共七百一十七人）來上海參觀，僅至七三年底，就接待了代表地方和軍隊二十六個單位的二十個代表團，三百五十五人。

九月十五日王洪文在有市民兵指揮部領導成員參加的市委常委彙報、研究民兵工作的會上，全盤否定民兵的歷史功績和民兵建設的光榮

傳統，說「像過去那樣搞，文化大革命一來，又一下子摧垮了」；說「從民兵到文攻武衛是個很大改造」；吹捧「第二武裝」是「新生事物」，「有威信」，很「厲害」，「張春橋看得很遠」。他竟然誣蔑「十五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文件是背著中央搞的」，「針對上海文攻武衛的」，「十六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解放軍報》刊登民兵工作條例有關民兵武裝「絕不能用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規定是「謬論」，煽動「你們可以轟他一下」，叫嚷「我就是要抓，誰都可以抓」，「民兵的威信是打出來的」。他還居心叵測地說「改造民兵」「有阻力」，「人家老反」，「充滿著鬥爭」，指責「有的區要恢復過去那一套」，暗示警備區、人武部是阻力，鼓勵他的爪牙「反潮流」，煽動反軍亂軍。

九月十九日王洪文帶著陳阿大竄到上海電纜廠提出「上海今後要武裝幾十萬民兵，我們現在只有二萬多（條槍），「要想辦法多搞一些」，指使陳阿大「說明解決一些設備和材料」。「把三十到四十個工廠裝備起來，搞土生產線」，以大力加速生產槍支，裝備「第二武裝」。

九月二十二日浙江省民兵學習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來滬參觀，九月三十日離去。

九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對《人民日報》等三報談到民兵宣傳問題時說：「上海同其他城市和其他地區以及農村情況相同，文化大革命，民兵不少衝垮了，成建制的造反的不多，很多傾向是保舊市委的」。說「改造民兵」是春橋向毛主席報告了，總結了經驗，「也可以叫改造，也可以叫革命」。「上海民兵指揮部，主要是軍隊和地方同志共同搞的。原來軍隊不大瞭解工廠情況，工作布置下去很難開展，現在軍隊參加、市委直接管。……有利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

九月二十五日南市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

十月七日遼寧省委書記魏秉奎帶領東北地區三省赴上海學習小組，共二十二人到上海訪問，至十月二十日結束。

十月九日上海民兵簡報第五十八期轉發了《上海縣積極組織民兵參

加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簡報。為了大力把郊縣民兵引上邪道，至年底  
前，連續轉發了四期上海縣民兵所謂「抓階級鬥爭」的簡報。

十月十日批准成立市肥料公司民兵團。

十月十二日廣州軍區參觀團七人抵滬，參觀至十九日結束。

十月十九日山西省參觀團七人來滬參觀，二十八日結束。

十月二十六日天津市參觀團十八人來上海，參觀活動到十一月七日。

十月份「四人幫」和馬、徐、王為了重賞李彬山經營「第二武裝」  
有功，特地從分給上海四屆人大代表地方名額中撥出一個名額，把李彬  
山拉作代表。

十一月一日安徽省參觀團二十四人，到上海參觀，活動至十三日  
結束。

十一月八日昆明市參觀團十五人來滬訪問，至十七日結束。

十一月十二日甘肅省民兵工作參觀團十五人來滬參觀，至十九日  
結束。

十一月十六日河北省民兵工作學習團二十五人來滬參觀，至二十六  
日結束。

十一月十七日陝西省參觀團到滬，共十一人，至十一月二十七日  
結束。

十一月十九日市工交組以（七十三）五二三號檔上報市委、市革會  
《為處理部分槍支、子彈的請示報告》，提議將精度超差的「半自動步  
槍三千支，彈殼表面微點鏽斑的鍍銅槍彈五十萬發和鋼殼槍彈一百十一  
萬發」，減價撥給上海民兵，需七十四萬七千元。十二月二十四日，市  
革會領導表示同意。

十一月二十日四川省參觀團十九人來滬，參觀訪問至十二月一日  
結束。

十一月二十二日市民兵指揮部以（七十三）一三一號文件轉發《關  
於靜安、虹口區服務公司民兵營「結合本職業務，狠抓階級鬥爭」的情  
況》，按語推崇「這是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一種好形式，也是加強  
民兵自身建設的重要途徑」，要求「各單位要進一步加強對這一工作的

領導，認真總結、推廣和發展這方面的經驗」。

十一月二十三日市民兵指揮部以（七十三）一三一號檔上報市委《關於選調產業工人充實市、區民兵指揮部領導班子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根據市委『市、區兩級指揮部要整頓，要充實產業工人』的指示精神」，計畫所需的民兵幹部「除了在市、區兩級指揮部內部選拔、培養之外，尚需從基層單位選調二十一名工人」，條件是所謂「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表現比較好」。還提出選調「擬由市民兵指揮部和區委先與基層單位協商物色對象，爾後請市委組織組調配」，明目張膽奪了警備區對民兵幹部的任免調配權。十二月十九日，馬、徐、王批了「原則上同意報告意見」，但對調配權上還不敢做得十分露骨，表示「請市委組織組與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協商解決」。

十一月二十七日根據馬天水八月十四日關於民兵「在體制上是有些問題」的旨意，市民兵指揮部上報市委《關於機構、人員調整的請示報告》，提出了將四大組十一小組合併為七個組。並通過重新安排軍、幹、群幹部的比例，排擠走擔任正副組長的軍隊同志四人和革命幹部二人，為以後安插親信作準備。報告十二月十九日得到馬、徐、王的批准。

十二月三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市、區指揮部副組長、區、縣人武部副科長以上幹部，以及民兵直屬師負責人一百六十二人的會議，傳達貫徹「四人幫」一夥炮製的《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那個材料。會議共開七天，至九日結束。

十二月五日十屆中委、湖北省工會主任王超柱帶領二十七人的省參觀團，參觀上海民兵，十五日結束參觀活動。

十二月九日市委在友誼電影院宴會廳召開區、縣、局、大專院校負責人會議，傳達貫徹《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的材料。馬、徐、王都到場，馬天水主持會議，徐景賢宣讀文件，李彬山作了以過去民兵糟，「第二武裝」好為主要內容的發言。最後馬天水說開這個會是要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要領會什麼「改造民兵的偉大思想」，還說「三位一體」推廣「有阻力，有矛盾，不破不立，要踏踏實實地推

廣」。並反復要求各級黨委對民兵工作「加強領導」，「作為鞏固無產階級的大事來抓」，送好的同志「優秀」工人「充實領導班子」。以加強「第二武裝」建設。

湖南省參觀學習團二十二人來滬，至二十一日結束活動。

十二月十日福州軍區參觀團十四人來滬，參觀至二十一日。

十二月十七日馬、徐、王與市民兵指揮部壞頭頭，秉承王洪文黑旨意，從徐匯區揭開了調整區指揮部組織的序幕，用「路線不正」的大棒趕走了區人武部兩名參加區指揮部領導小組的同志。市委組織組以（七十三）六二九號文批復了由徐匯區委出面提出「調整充實」領導班子的報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參觀學習團二十七人來上海參觀。內容安排與晚來四天的江蘇代表團相同。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幫」的支持下，馬、徐、王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民兵工作大會》，給「第二武裝」大造聲勢，到會的有市革會各組辦和區、縣、局以及基層單位的負責同志，警備區和區、縣人武部以及駐滬海、空軍的負責同志，市、區民兵指揮部人員和民兵連以上幹部一萬多人。徐景賢主持會議，王秀珍傳達了《武裝工人建設城市民兵》的檔。馬天水說「文攻武衛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中誕生的」，「是在階級鬥爭中壯大的」，已經成為「平時管理和改造城市、戰時保衛和堅守城市，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支有力的武裝力量」。要大家對上海民兵「這個新生事物、新鮮經驗」「一定要支持」，要各級黨委「加強對民兵工作的領導」，「作為一件大事來抓」。

十二月二十五日江蘇省參觀團二十一人來滬參觀，至一九七四年元月七日結束。

十二月二十九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省軍區參觀學習團二十五人來滬，參觀活動到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結束。

#### 一九七四年

二月三日王秀珍竄到市民兵指揮部，找李彬山、鐘定棟密談。王秀珍說：「這個運動是江青直接指揮的，同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有關係，

你們要想些問題，要心中有數，要想得深一點。中央派八十位元記者下去抓。你們要組織人下去抓點。批林批孔是嚴重的階級鬥爭，不要空對空，要聯繫實際。對民兵建設，洪文同志在信中指出的，代表一部分人。有人一提到上海民兵，眼睛都紅了。有的人對我們什麼都攻擊，一百個不順眼，民兵指揮部，有的地方阻力相當大，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我們每個同志要按洪文同志講的五條，敢於反潮流。現在黨政軍民學都在抓批林批孔，你民兵不抓，潮流來了，這支隊伍到底聽誰指揮？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要愛護、支持、鞏固和發展，不斷開花結果」。

李彬山彙報：「明天下午開十個區頭頭會議，研究批林批孔問題」。

王秀珍說：「你們可以先請他們彙報，彙報是怎樣抓的？有什麼打算？有什麼行動？有什麼好的做法？要多開這樣的會。李副政委你多講講，這樣也就指揮得動了。」

李彬山、鐘定棟彙報準備開個大一點的交流會。

王秀珍說：「你們抓了典型，我贊成開個大一點的會議，我動員馬老參加一下，請領導同志來講講，報紙上可造造輿論。你們準備好就是了。」

鐘定棟當天就對指揮部一個工作人員說：批林批孔不能空對空，一定要聯繫民兵建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實際進行。上海民兵建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為什麼這樣激烈，問題表現在指揮部，根子在警備區。要從根本上解決上海民兵建設上的問題，要通過運動、從民兵指揮部打開缺口，隨後追到警備區。

二月四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十個區指揮部頭頭會議，彙報批林批孔運動情況，傳達王秀珍二月三日講話。

二月上旬周宏寶從北京參加學習班回來後，在市民兵指揮部一些人中散布「上海警備區是螞蜂窩，要捅。」唆使和發動貼警備區的大字報。他對鐘定棟說：領導很關心我們民兵，老鐘你是老指揮部的人，情況熟悉，也可以找些人議論議論，作準備，要在最近時間內把機關運動搞出一些眉目來。

二月十一日王秀珍電告鐘定棟說：春橋同志指示，請民兵指揮部那

一位同志整理一下對南京軍區的意見，由我們轉給南京軍區。

鐘定棟即與鄭惠儀商量，由他們兩人收集、整理一份七千餘字的誣告材料，經李彬山、周宏寶審閱同意，於二月十九日上報給馬、徐、王轉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提供整南京軍區的炮彈。

二月中旬「四人幫」及其餘黨馬、徐、王打著充實產業工人的幌子，從市總工會調二名常委（施尚英、印玉泉）、二名委員、一名學習班考察對象，加上一名婦聯委員，安插到市指揮部領導小組和各組的領導崗位上。

二月十四日經過鐘定棟等人的策劃，靜安區指揮部周天明和市民兵指揮部徐維賢等三人，貼出了兩張矛頭指向警備區和南京軍區的大字報。市指揮部領導小組當即研究，表示支持，決定召集各區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和指揮部各組正副組長會議，進行傳達討論。並決定把這兩張大字報印發各區指揮部、民兵師部和市指揮部各組。

會上，由鄭惠儀宣讀了這兩張大字報，接著周宏寶要大家表態。大家表態後，周宏寶說：大字報起了點火放炮作用。如何聯繫實際，擊中要害，非常及時。民兵問題上聯繫實際不是沒有而是很多，敢不敢把民兵建設上的問題揭出來，這是個很大的考驗。不管什麼人，哪個單位，哪一級，都要揭。

在指揮部壞頭頭的煽動下，十個區指揮部向區人武部和警備區的大字報也紛紛出籠。二月十七日，市指揮部印發了一份「市指揮部機關批林批孔鬥爭掀起新高潮」的簡報，摘錄了大字報中攻擊警備區、南京軍區對所謂新生事物「不支持」。

二月馬、徐、王把周宏寶，李彬山、鐘定棟等人召到康平路市委辦公室，聽取他們彙報指揮部運動情況，進一步策劃反軍亂軍。鐘定棟說：「警備區沒有個態度，群眾還有顧慮。」馬天水趕忙說：「我們要到指揮部看大字報，支持你們，這樣有利於群眾揭蓋子」。王秀珍說：「大字報要引導，揭問題要集中，要抓住重點，可以點周司令、劉政委、章副政委的名。過幾天，我們請周司令到指揮部看大字報，教育教育他。」



二月中旬馬天水、王秀珍於一天深夜竄到市民兵指揮部看大字報，對指揮部反軍亂軍行動表示「滿意」，並對指揮部頭頭再三交代：「你們要提高警惕，你們的老窩不要被人家搗掉了。」規定指揮部要經常保持一個班值班，可以帶武器。從此以後，市民兵指揮部就增加了荷槍實彈的警衛分隊。連指揮部機關本身，也發了衝鋒槍、半自動步槍、自動步槍各拾支。

二月十九日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以宣布指揮部領導班子為名要周司令到指揮部參加會議，實際是騙周司令看大字報，對周司令搞突然襲擊，組織圍攻。

二月二十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十個區指揮部頭頭會議，分析批林批孔形勢，部署下一步運動，進一步掀起反軍亂軍高潮。

三月十一日市民兵指揮部在軍人俱樂部禮堂召開市、區兩級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批林批孔大會。

周宏寶在會議小結時說：「對民兵建設上揭出來的問題，要從路線的高度來批判。是改造民兵，還是反對改造？是堅持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對民兵參加階級鬥爭是積極支持，還是反對阻止？城市民兵堅持以產業工人為主，還是走老軌道？是肯定鬥爭中形成的民兵指揮部和三位一體，還是否定、扼殺這一新事物？這些都是大是大非問題。我們要發動群眾查一查在民兵系統、在民兵建設上有沒有在十次路線鬥爭中遺漏的問題。」周宏寶還叫嚷「要發揚『五不怕』精神，不要把棱角磨掉，不怕打擊報復。死都不怕，還怕什麼打擊報復」。

三月二十至二十五日王秀珍祕密竄到北京，向「四人幫」彙報上海批林批孔運動情況，溜回上海後對周宏寶等祕密部署「第二武裝」要「加強戰備」。她說：「這場運動的阻力，關鍵問題還是在軍隊同志的思想不通，這個問題值得注意。你們要提高警惕。王副主席要上海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工作。」從四月初開始，在馬徐王的直接導演下，市民兵指揮部的李彬山、周宏寶、鐘定棟等人，搞了一次長達三個月的「祕密戰備」，槍口是對準警備區部隊的。

四月二十一日後方基地民兵指揮部成立，周宏寶去參加成立大會，

並宣布班子。

四月二十九日由市民兵指揮部起草，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義，給國務院、中央軍委寫了一份「關於增產常規武器裝備上海民兵的請示報告」。報告謊稱為了「加強城市民兵建設」，「我們打算在動員線生產不影響民品任務，小三線軍工廠保證完成調出計畫任務的前提下，進一步發動群眾，挖掘潛力，增產一批常規兵器武裝上海民兵。」加緊裝備「第二武裝」。

四月三十日晚上，指揮部頭頭按照馬、徐、王的意圖緊急命令楊浦區調二百名全副武裝民兵於黃浦路二十號集結待命；調徐匯區二百名全副武裝民兵於區革委會大院集結待命。李彬山說：「我們都是在網上、線上跳的人，我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頂多殺頭吧！」表示要豁出命來與黨、與人民為敵到底。

五月三日至六月底市民兵指揮部舉辦一期新幹部學習班。這期學習班是按「四人幫」及其餘黨「民兵要輸送幹部」的要求辦的。挑選了五十二名文化大革命的「老造反」、「工人新幹部」。學習班結束後調二十二人到指揮部工作。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市民兵指揮部和郊區組聯合召開郊縣民兵工作會議。縣委書記、縣民兵領導小組和縣人武部領導參加。這次會議是經過張宜愛、李彬山密謀策劃後召開的。目的是要篡奪郊縣的民兵領導權。李彬山在會上作了「關於郊縣民兵抓階級鬥爭的情況和今後的意見」的發言。五月三十一日，這個發言以郊區組和指揮部的名義，作為「請示報告」報給了馬、徐、王。報告說：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建議在各縣縣委的領導下，建立一個七至九人的民兵領導小組。用民兵領導小組取代人民武裝部。報告還規定用民兵團取代公社武裝部，排擠專職人武幹部。

五月二十八日內蒙呼和浩特市民兵總指揮部二十一人，抵上海參觀訪問。

六月初周宏寶對施尚英說：市委領導（馬、徐、王）要李彬山回警備區機關搞運動。我們要支持李回去。警備區路線端正了，我們這裡的

問題也解決了。我們在這裡要配合、支持他到那裡搞。

六月十日吉林省四平地區學習小組十一人，到上海參觀活動了四天。

六月中旬一天，周宏寶從馬、徐、王那裡開會回指揮部，對鐘定棟說：地方同志也可以到警備區機關貼大字報、刷標語，觸一觸他們。鐘定棟立即對周宏寶說：是否我們一起去警備區機關看看大字報，對大家也是一個發動。周宏寶說：我去太注目，不好。後來，在周宏寶和鐘定棟等人策劃下，組織指揮部一些人，由鐘定棟帶領，沖進警備區大院，貼大字報，刷大標語。鐘定棟還策動靜安區指揮部到警備區去刷大標語。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李彬山、張宜愛把去南京軍區送大字報的十三人召集到市民兵指揮部三樓會議室開會，布置、交代去南京送大字報要注意的問題。規定大字報一定要貼在院子裡，不能關在屋子裡；對站崗的戰士不要鬧對立；到南京街上去看看大字報；到了南京後，及時打電話回上海。

本月一天，周宏寶在指揮部對一些人講：警備區現在好像是老大難單位一樣。老大難單位就應該派工宣隊進去。徐維賢講：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警備區也可以派工宣隊進去。我們應有工人階級自己的司令員、政委。鐘定棟講：李彬山當政委，周宏寶當司令員，軍隊、民兵一把抓，這樣就能捏起來了，矛盾也少了。

七月二日市革會機關民兵團建立。鐘定棟去講所謂文攻武衛傳統，送長矛、藤帽，並配發了輕機槍、全（半）自動步槍三百七十餘支，超出基幹民兵人數的三分之一。七四年又派市指揮部辦事組許××去擔任武保組長，進一步控制了市革會機關民兵團。

七月十三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市革委會寫了一個「關於上海民兵裝備十年規劃設想意見的報告」。報告說：根據市委領導關於裝備民兵五十萬件武器和總部民兵裝備要搞十年規劃的要求，加強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民兵建設，以適應平時發展和改造城市，戰時保衛和堅守城市的需要。全市現有二百六十四萬民兵，規劃五十萬件武器。

八月二十日批准江南造船廠民兵師成立。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一年市指揮部就對該師實施領導了。

八月二十六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經驗交流會。會上周宏寶在講話中打著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旗號，鼓吹「聯繫民兵建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抓住重點深入批」，「學習關於民兵要改造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一夥否定革命新生事物，反對民兵改造的反革命罪行。」其矛頭，完全是指向上海警備區、南京軍區和三大總部的。

八月三十日山東省民兵學習參觀團一行二十四人，由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省工會主任宋慶友帶隊抵滬，參觀活動至九月八日。在接待中，周宏寶串通代表團個別人，策劃了一次由上海民兵指揮部十幾個人參加的所謂座談會，向省軍區一位對「改造民兵」提出異議的領導同志大談「改造」「重建」民兵的重要性、必要性，施加壓力，直至「通了」為止。

九月二日至二十五日吳立義參加總參召開的民兵組訓工作座談會。吳立義在會上聽到有些大軍區、省軍區同志對「第二武裝」的所謂「新鮮經驗」「民兵改造」等問題有看法，吳立義就認為這是路線沒有搞正。連忙寫了一份材料，偷偷摸摸送到祝家耀（注：祝是「四人幫」安插在中央公安部的親信）那裡，叫轉送王洪文。王洪文、張春橋在看了這份材料後，利用「接見」的機會，大整中央軍委和三大總部的領導同志，迫使會議重新起草了《會議紀要》，破壞了這次會議的原定計劃。

九月四日市革會工交組、地區組和民兵指揮部聯合召開全市駐里弄民兵小分隊工作經驗交流會。四千三百多人參加了會議。王秀珍、周宏寶、陳阿大等在會上講話。他們鼓吹「民兵建設問題上，充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充滿著前進與倒退的鬥爭。民兵小分隊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生事物。」

這次會議，炮製了「上海民兵城市里弄民兵小分隊暫行工作條例」。

九月六日銀川警備區、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公安、民兵赴滬學習組十五人到上海參觀訪問，至九月十四日結束。

九月中旬全國人防領導小組在旅大召開全國人防工作會議，會議規定由警備區和人防辦公室領導同志出席會議，馬天水卻指名要民兵指揮部的鐘定棟去出席這次會議。

九月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發了一份「關於上海郊縣民兵在抓階級鬥爭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這個規定分五大部分，共二十條。

在關於對現行犯罪分子進行衝擊的問題部分，規定「凡需衝擊的對象，由基層黨組織根據群眾的要求提出，社、鎮、場黨委討論同意，報縣民兵領導小組審查，經縣委批准。報市民兵指揮部備案，並開《查詢證》方可實施衝擊。」「根據本縣階級鬥爭特點，凡搞全縣性的清查和衝擊行動時，須經縣委討論決定，報市民兵指揮部，由市民兵指揮部報市委，經批准後，組織實施」。

這個「幫法」經過李彬山、周宏寶批示同意。鐘定棟在審稿時寫了批語：「把市委領導同志關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佔領法律陣地的指示精神寫進去，包括送工廠邊勞動，邊教育，邊審查的做法，要在這份規定裡體現一下。」

九月十八日對於總政有一位同志來上海體驗民兵生活一事，王少庸批了幾個字：「既然來了，還是請民兵指揮部接待吧，情況請及時報市委。」態度冷淡、勉強。徐景賢、王秀珍都作了圈閱。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六日市民兵指揮部和上海人防辦公室，組織一千餘名民兵在松江米市渡進行黃浦江架設浮橋的演習。這是一次排斥解放軍，由民兵單獨幹的演習。馬、徐、王親自去觀看這次演習。

九月二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在市革會禮堂召開紀念毛主席大辦民兵師指示發表十六周年大會，周宏寶在講話中說：「上海民兵重建的七年，是戰鬥的七年。」「這場鬥爭是圍繞著民兵要不要改造，要不要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民兵要不要參加社會階級鬥爭，基層民兵組織要不要搞『三位一體』等問題展開的。鬥爭的實質，是堅持還是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是加強還是削弱無產階級專政，是堅持革命、堅持前進，還是復辟、倒退，對民兵建設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是支持還是扼殺」。「通過批林批孔，市、區兩級民兵指揮部機關的廣大幹部揭露了上海民兵建設上存在的大是大非問題，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從路線上分清是非，提高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覺悟，同時在組織上充實了一批路線鬥爭覺悟高，富有革命朝氣，能密切聯繫群眾的產業工人，加強了

市、區兩級指揮部領導班子的建設。但是，民兵建設上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並未結束。」

十月五日軍事科學院五人來上海召開了幾次民兵工作座談會。市民兵指揮部作戰、政工、訓練組，黃浦區民兵指揮部、上海縣民兵領導小組，以及一些民兵基層單位參加了座談。

十月十二日北京木材廠五人來滬參觀了上棉二十一廠等六個單位的民兵工作。

十月二十三日瀋陽市赴上海學習人員十人抵滬，參觀至十月二十八日結束。

十一月五日至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人防辦公室聯合召開「上海民兵、人防工作會議」四百二十一人參加會議。其中民兵系統二百七十二人，人防系統一百四十九人。會上傳達了王洪文在總參民兵組訓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周宏寶作會議小結，最後馬天水、王秀珍到會講了話。

馬天水在講話中說：「中央領導同志（「四人幫」）對上海民兵工作也十分關心，工作一定要做好。」「我們今天各部門領導同志都來了，對人員方面要支持，要大力支持。市指揮部反映調個人很困難，工交組、各局要大力支持。」「民兵抓階級鬥爭要做的更出色，更有成績，要有更多更好的經驗。」「三位一體問題，下面合起來，上面還是各條線，怎麼辦？這個要逐步解決，區裡管民兵工作的，下去也可以瞭解公安工作，管公安工作的，也可以瞭解民兵工作。這樣為逐步把機關合起來創造一些條件。」

十一月七日天津市民兵代表團赴上海學習人員八人，到上海參觀至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八日北京軍區宣傳隊赴滬採訪民兵事蹟工作組六人，到達上海採訪，活動到十一月三十日結束。

十一月十三日遵義市公安局十人組成的遵義市民兵代表團來滬，參觀活動了一天。

十一月十四日七人組成的哈爾濱市民兵工作學習小組，來上海參觀，至十一月十五日結束。

十一月十九日市民兵指揮部發出「關於一九七五年度民兵組織整頓意見」的通知。在民兵年齡問題上另立章程，規定「普通民兵年齡男性十六至五十歲左右，女性十六至四十歲左右，基幹民兵男性十六歲至三十五歲，女性十六歲至三十歲」。

「關於『三位一體』辦事機構的組織設置，黨委、總支廠，一般設立武保組。武保組既是革委會的辦事機構，又是民兵組織的辦事機構。為了順利開展武保工作，武保組的主要領導由民兵團、營的幹部擔任為宜，獨立支部廠原則上不設武保組，民兵、治保、消防三項工作在黨支部領導下，由民兵連統一負責，分工專人抓。」

十一月二十五日對河北省軍區來滬參觀，馬天水指示「辦公室可電告他們，住處較緊張，是否請他們少來些同志。」

同時，廣東省佛山市民兵代表團在上海，對楊浦、普陀區的民兵組織體制問題進行了訪問，並參觀了上海縣和靜安旅社中心店等單位。

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大總部「建立各級民兵指揮部調查研究小組」一行二十人，由總參軍務動員部靳玉峰副部長帶領到上海調查，到十二月二日結束工作。在市民兵指揮部彙報之前，周宏寶、施尚英、鐘定棟等人進行了精心策劃。周宏寶指使鐘定棟發言，並說「錯了我負責」。為鐘壯膽。他們還針對靳副部長的「保守」，組織一批人在會上開炮，向總部施加壓力。

同日，市民兵指揮部一次接待了：河北省民兵工作學習小組十人、旅大市民兵代表團、總政宣傳隊創作組六人，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隊三人，市民兵指揮部向他們吹噓了「第二武裝」的經營情況，並參觀了一些單位。

十二月四日總參、總政、總後調查組在東湖路招待所召開座談會，徵求對民兵體制問題的意見。周宏寶、吳立義、鐘定棟參加了座談會，這夥人在會上要求成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或國務院中的「民兵工作部」，在組織體制上，對總部同志大加壓力。

晚上，周宏寶在民兵指揮部值班室對施尚英、鐘定棟等說到體制問題時公然說：「還是建立兩支武裝好，一支是軍隊，一支是民兵，相互

可以牽制。」

十二月十日總政治部文化部的陳亞丁寫信給王洪文，說「為了進一步宣傳和推廣上海的新鮮經驗，八一電影製片廠擬拍一部集中反映上海民兵的彩色紀錄片。」「影片內容擬突出反映毛主席關於武裝產業工人、改造民兵的思想。反映上海民兵在上海市委一元化領導下積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改造和管理城市，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的經驗。」王洪文十月三十一日在這封信上批了「擬同意，也希望拍首都民兵。」張春橋圈閱了這個報告。馬天水批了「請民兵指揮部、電影局黨委閱，並予以協助搞好。」

八一電影製片廠《上海民兵》攝製組八人，攜帶張春橋、王洪文的批件，於十二月十日來上海進行採訪，寫出拍攝提綱，準備一九七五年初開拍。由於這年年底，毛主席接連批評「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當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告戒「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交的」。迫於這種形勢，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張春橋對於拍攝這部影片的送審提綱又作了「批示」，說「洪文同志，拍這部片子，我是同意過的，根據現在的形勢，我建議現在不拍。將來再說，你看如何？」王洪文也批了「同意春橋同志意見。」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攝製組同志帶了這個「批示」，來上海告別。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軍區民兵代表團二十七人抵滬，參觀至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廣東省汕頭市民兵代表團五人來上海參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結束。

十二月二十六日山東省煙臺地委六人來上海參觀學習，至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結束。

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全國各地來函、來人聯繫學習民兵工作，體驗民兵生活，拍攝民兵題材電影等共有二十九個單位。

### 一九七五年

一月一日張春橋在電話記錄稿上批示：「請市委和民兵指揮部同志注意：不論向那個單位介紹上海經驗，都必須向他們強調，必須在工人



階級隊伍實行了革命大聯合的條件下，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才能建立民兵組織。這一點，我們過去強調不夠，不妥。以上請洪文同志文元同志閱後退馬天水同志。王洪文批了「同意春橋同志意見」，姚文元批了「如有新華社、人民日報或其他單位來上海寫此種稿件，務請注意掌握審查，不要有求必應。」

一月六日瀋陽軍區參觀團十人到達上海，參觀至一月十四日。

一月十一日安徽省安慶軍分區民兵參觀團來上海參觀訪問到一月十五日。

一月二十五日對鄭州市金永區民兵指揮部來參觀訪問，王秀珍批示：「希望按春橋同志意見辦。請民兵指揮部查一下春橋同志原批示。」馬天水批示「問一下省委辦公廳，來的地區大聯合是否鞏固，如大聯合不鞏固，不予接待。」

一月二十七日鄭州市金水區民兵指揮部六人抵滬，參觀至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二日施尚英給王秀珍寫了一封效忠信。信上說：「二月底（七四年）到指揮部，正是批林批孔聯繫實際揭矛盾的時候」，「從指揮部同志揭露出來的許多問題來看，我看法根本一點，還是領導權的問題，不管林彪死黨黃永勝、王維國一夥的扼殺破壞，還是南京軍區、警備區某些同志的抵制或不支持，歸根到底就是想奪市委對民兵指揮部的領導權，甚至有的搶民兵的領導權。圍繞著這個問題的鬥爭，當然是十分激烈的。」還說：「到指揮部後，我在思想上經常碰到的矛盾，也是我經常想的，就是洪文同志和你多次講的，不要受自己職務的變化，而把菱（楞）角磨掉，要頭上長兩個角和謙虛謹慎，這兩者關係怎麼處理。」

二月三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市革委會寫了一個「關於上海在外地的工礦單位民兵組織領導關係的請示」。請示說：上海在外地的萊蕪鐵礦、新橋銅礦、大屯煤礦、梅山鐵礦等單位迫切要求他們的民兵工作也歸上海管。五月二日，市委辦公室打電話通知指揮部，轉告上海市委領導同志批示：「這個問題看一看再說」。事實上，這個問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早有規定，應由當地民兵工作部門管。而「四人幫」餘黨所謂

看一看再說，就是為了擴大幫派勢力，為插手外地打下埋伏。

二月四日鐘定棟授意辦事組，將徐匯區民兵指揮部組織民兵小分隊討論新憲法第二十八條中關於「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不受逮捕」的規定的情況，編成市民兵指揮部簡報下發。簡報借討論新憲法之名，曲解毛主席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指示的本意，胡說。根據憲法精神民兵可以抓人、關人。為「第二武裝」可以「立法」、「執法」、「管法」，實行法西斯專政製造理論根據。

二月十八日晚上，王秀珍到市民兵指揮部檢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情況，施尚英、鐘定棟等向王秀珍彙報了民兵在學習新憲法時，有人對民兵指揮部隨意抓人、關人問題提出了質問。王秀珍說這是沒學好，也沒掌握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提出要從理論上把民兵能抓人、關人的事情搞清楚，否則就會動搖懷疑，自己否定自己。企圖繼續用新生事物的幌子來欺騙群眾，挑動廣大民兵拒不執行新憲法。

二月二十二日蘭州軍區八人民兵參觀團抵滬，參觀活動至二月二十八日。

三月五日施尚英在南市區舉辦的民兵幹部集訓班上講話中，提出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聯繫民兵建設實際，要弄清五個為什麼：民兵為什麼要改造？為什麼要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為什麼要實行「三位一體」？為什麼要搞廠區掛鉤、平戰結合？為什麼城市民兵要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為什麼民兵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以鞏固發展民兵建設上的新生事物、新鮮經驗。以後，這「五個為什麼」作為一九七五年的民兵政治工作要點之一。

三月六日對於牡丹江市來上海參觀，市委頭頭批示，「請你們作一般性的介紹。」

三月七日海南行政區、海南軍區參觀團十五人，在上海參觀至三月十八日。

三月十一日南京軍區民兵工作檢查組十二人到上海檢查民兵工作，至三月二十七日結束。

三月十一日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等人向馬天水、王秀珍寫了一

份書面報告，對於上海交運局按南京軍區《交通戰備工作座談會議》要求組建的三個汽車戰備團，以軍區沒經過市委和沒與市民兵指揮部聯繫為藉口給予取消。

三月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起草了一份《關於貫徹執行國務院、中央軍委（七十三）一六二號文件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經馬天水審閱同意，上報總參、總政，南京軍區和上海市委及警備區。

報告總結了所謂批林批孔以後民兵工作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新鮮經驗和新的發展；揭露了所謂民兵建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打著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幌子，把不同意搞民兵指揮部，反對動用民兵任意抓人，堅持軍隊搞民兵工作等正確意見，都列為妄圖開歷史倒車的反動思想。還侈談什麼著重研究民兵建設上的所謂理論問題。為大搞「第二武裝」製造理論根據。

三月二十四日海軍民兵工作參觀團一行三十五人來滬參觀，至四月四日結束活動。

三月二十六日市民兵指揮部向市委報了一個《一九七五年民兵工作意見》，五月四日上海市委以滬委（七十五）八號檔轉發給各單位。「意見」要求，郊縣全部建立民兵指揮部，要發揮「三位一體」的作用。通篇不提民兵工作接受軍事系統的領導。

八月十五日武漢市民兵工作參觀團十一人，由十屆中委、市委書記、民兵指揮部總指揮長董明會帶隊，到上海參觀至八月二十三日結束。

九月上旬王洪文向李彬山個別交代，要把人武部、民兵指揮部合併，要民兵指揮部先搞試點。李彬山把王洪文的「指示」向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作了傳達。

九月十八日王洪文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陪同下，在錦江小禮堂接見了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全體成員（李彬山、施尚英、吳立義、鐘定棟、印玉泉、鄭惠儀、吳冬梅），由李彬山向王洪文匯報工作。

當李彬山彙報到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時，王洪文講：「現在是否將人武部和指揮部合起來，抓一、二個區、一個縣試點一下。把人武部做的一些工作都並過來，複退、徵兵都可並過來，人防

工作也可帶過來，對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裝部，可以叫指揮部。」「上海民兵指揮部要搞個編制，把武裝部的人要考慮進去」。

「對民兵的組織形式爭論是很大的，過去爭論的是民兵要不要參加社會階級鬥爭，將來爭論的是組織編制問題。如果否定了組織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務，去年的檔有人還在反，組織形式推翻了，任務也推翻了。試點要抓緊，現在就試。四個多月內拿出材料來，這個問題老不解決，就危險。現在這個問題通的人少，不通的人多。沒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這個機構改過去了，我二十年後還是要改過來。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還是要把它改過來。你們要把試點抓好了，把材料給我報主席，主席批了，誰也不敢反，誰也沒話好說了。」

王洪文還交代：「你們要警惕，你們這個隊伍不要被人家指揮、上當」。民兵「行動還是要聽民兵指揮部的指揮，不能多頭指揮」。「你們現在這麼多武器，哪個大軍區有這麼多武器？」「要搞戰略、戰術訓練」，「不但要會打仗，而且還要鍛鍊幹部的指揮，這很重要。」

王洪文最後對指揮部頭頭說：「不要光氣，要看到鬥爭的複雜性，想想今後階級鬥爭怎麼抓？重大問題要反映。總之，要做好工作，不要讓人家抓辮子」。

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在徐景賢、王秀珍陪同下，帶了市指揮部頭頭、十個區和上海、寶山縣民兵指揮部的部分頭頭，到警備團靶場打靶。打靶前，王洪文接見了他們。王洪文說：要促一促訓練。民兵基本動作要學會，班、排、連防禦、進攻要學會，否則拉出來不會打仗。給你槍要會打、打得准。巷戰也要學會。要求不要太高，一年左右時間，從單兵到班、排學會基本動作，利用地形地物。你們要檢查人家，要人家學好，首先要自己學好，打不好是沒有理由的。徐景賢當場吹捧：洪文同志帶領我們學軍事。親自抓軍事訓練。打靶後還一起攝影「留念」。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頭頭用四個半天時間，討論王洪文兩次講話。第一步，領會精神，談認識；第二步，聯繫實際，找差距；第三步，研究貫徹措施。他們說：「洪文同志接見，不僅是對我們

領導小組的關心和信任，更重要的是對我們這支隊伍的關心、信任和寄於希望。」「洪文同志的指示，意義非常深刻，很有針對性，激勵了我們工作的信心，使我們感到了責任重大」。原來「對鬥爭後的勝利看得多，對勝利後還要鬥爭想得少，思想比較麻痺。經洪文同志一說。現在感到頭腦比較清醒了。」「一致表示，今後要經常想想洪文同志提到的問題。」施尚英說：領導說到底了，鬥爭的性質指出來了。現在處於關鍵時刻，中國隨時可能出現修正主義。這是嚴重鬥爭。有出現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危險。領導交了底，不要走彎路。

九月二十二日市民兵指揮部在市革會禮堂召開《紀念毛主席「大辦民兵師」指示發表十七周年》大會，參加的有各區、縣民兵指揮部、民兵直屬師團及部分基層民兵組織負責人共一千八百人。馬天水，王秀珍到會講話，施尚英作總結發言。大肆吹捧王洪文「關心」上海民兵，叫囂要「認真總結、推廣『三位一體』經驗，真正做到『三位一體』。」施尚英說「我們不能只看到鬥爭的勝利，也要看到勝利後的鬥爭」。

九月二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寫了一個「市指揮部領導小組學習討論洪文同志的指示情況和貫徹意見」，報告說：「為了把洪文同志的指示落到實處，變領導意圖為群眾的行動，我們打算，在當前，首先是召開各區、縣和直屬師團民兵領導幹部會議，傳達好，學習好，貫徹好。通過傳達洪文同志指示，學習討論領會精神，聯繫實際，找出差距，振作精神，奮發圖強，不斷前進」。報告提出於十月三日至七日召開這個會議。

十月初王洪文帶了馬天水、徐景賢、馮國柱、張敬標等一批人，竄到上海近郊一個祕密工程點，王洪文詳細問了儲備糧、油、鹽及戰備車輛的情況，並親自查看，整整搞了一個下午。王洪文說：這個工程，非常有用，打起仗來，這是上海的一個指揮所」，並交待同去的人，回去後要布置他的一些小兄弟們都來看看，做到「心中有數」。

十月三日至七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民兵幹部會議，傳達王洪文九月十八日的講話。各區、縣指揮部領導和各組組長，直屬師團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市民兵指揮部各組正副組長、工作人員共三百三十餘人出席會

議。施尚英作會議動員，李彬山傳達王洪文的講話，吳立義代表領導小組彙報學習體會。

十月八日李彬山去王洪文處彙報工作，講到兩部合併試點，準備向市委寫個報告時，王洪文說：「還要什麼報告，你們就做吧。」十月九日，李彬山向領導小組傳達了王洪文的指示，並討論決定，上海縣由鐘定棟去試點，施尚英主動提出到楊浦、盧灣區搞試點。並要李彬山掛個名，具體由施搞。

十月八日市民兵指揮部給上海市委寫了一個「關於合併組織機構試點的請示」，請示說，我們學習了王副主席和市委領導同志對民兵工作的批示，在全面領會精神，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對王副主席提出的，要把人武部、民兵指揮部、人防辦公室、複退辦公室合併起來，先進行試點的指示，作了專題討論。大家認為，王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意義很深刻，是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們選了三個點（市區：盧灣區、楊浦區；郊區：上海縣）。準備組織三個組，分別由領導小組同志帶領。根據調查情況，同有關部門和群眾商量研究提出機構合併體制、編制，報告市委，經批准後正式進行合併。

十月十三日李彬山、施尚英一起到了盧灣、楊浦區委，給兩個區委領導傳達了王洪文關於實行「兩部合併」的指示和指揮部試點打算。鐘定棟帶領人馬到了上海縣。他們用王洪文的指示壓兩個區、一個縣，強令實行「兩部合併」，叫嚷「這是王副主席考慮了很久的一個方向性的問題，帶有巴黎公社的意義」。儘管這樣，人武部的同志對試點調查組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施尚英、鐘定棟等被駁得理屈詞窮，兇相畢露地說：「這是對王副主席的態度問題」，「我們的做法就是與軍委擴大會議不一樣」，「兩部合併是形勢的需要，並也要並，不並也要並。」

十月十五日馬天水秘書房佐庭打電話給市民兵指揮部頭頭，說王洪文九月十八日接見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全體同志的講話，不准擴大傳達。

十月二十日廖祖康打電話給市民兵指揮部頭頭，追問送傳達提綱給警備區的事。

十一月一日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就送五份傳達提綱給警備區一事給王洪文、馬天水、王秀珍寫了一封檢討信。

十一月十二日市委召開組辦會議結束後，馬天水、王秀珍把施尚英留下，對施說：王洪文打電話來要合併試點材料。施說：還沒有合併呢，怎麼寫報告？馬天水說：你們從總結經驗角度寫。馬天水要施尚英立即組織力量，抓緊著手寫，並叫市委寫作組幫助市指揮部一起搞。馬天水還向施交底說：這個報告你們寫，由我們市委名義報。王秀珍幫腔說：寫材料要有理、有利、有節，材料要過得硬。你們領導要化力量上去把這事抓好。

施尚英根據馬、王的意圖，回來後即搭了一個班子，由鄭惠儀具體抓。與寫作組一起，於十一月底炮製了一份關於貫徹《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和民兵組訓工作座談會議紀要，報給了市委。十二月中旬，由寫作組向施尚英、鄭惠儀等傳達了王洪文對這個報告「要馬上改一下」的黑指示。市指揮部修改後，由馬天水親自修改用市委名義上報給「四人幫」。

十一月二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以所謂要落實「王副主席關於加強戰備訓練的指示」，通知各區、縣民兵指揮部和民兵直屬師團對武裝基幹團進行考核，要求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前結束，中旬，市民兵指揮部進行抽查。

十二月九日上海市人民出版社報經市革委會文教組批准，要市民兵指揮部編寫一本軍事理論叢書《大辦民兵》和一本《上海民兵鬥爭故事》。政工組寫了報告，施尚英、吳立義、鄭惠儀批准同意編寫，抽調了四位同志進行這項工作。經過九個月的時間，搜集了民兵故事四十多篇，炮製了《大辦民兵》一書初稿，洋洋三、四萬言。在這本《大辦民兵》中，極力鼓吹「民兵改造」等私貨，以擴大「第二武裝」這個所謂「新生事物」的影響，製造輿論。

十二月十日馬天水、王秀珍等人聽取盧灣、楊浦、上海縣兩部合併試點彙報。馬天水等聽取彙報後說：民兵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民兵要抓階級鬥爭，要武裝部指揮也指揮不了。軍委擴大會議也沒有解

決這個矛盾。為瞭解決這個矛盾，所以洪文同志提出要試點。總之，我們的組織形式要適應鬥爭的需要。和軍隊還有什麼關係發生，要根據任務來定。

馬天水等還說：「四部合併」，分兩步走。因為對「四部合併」來講，精簡不是主要的，我們要從本質上考慮問題。先把人武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要知道關鍵是人武部，把人武部並起來了，其他的我們好解決。

馬天水還針對人武部同志反對「合併」的問題說：機構合併，這是一場組織革命，合併中有鬥爭，合併後還會有鬥爭。搞合併，搞試點，不抓批判是不行的。警備區要抓一抓武裝部的思想工作，不通不行，半通也不行。

十二月十五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一個「關於上海縣『兩部一辦』合併的請示報告」。提出「合併後的機構名稱為『上海民兵上海縣指揮部』，它是縣委、縣革會的一個辦事機構，是全縣民兵的領導機關」，「指揮部在縣委一元化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接受上海民兵指揮部的領導，今後，凡是民兵和人防工作，統由民兵指揮部負責」。同時明確提出整個機構的合併於當月二十五日前告一段落。迫不及待地把人武部和防空辦兩個機構併吞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寫了「關於楊浦、盧灣區人武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的請示報告」，用同樣的手段併吞了兩個區的人武部。

十二月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集中機關各組黨員正副組長，由施尚英傳達市委黨員幹部會議精神。施尚英小結時說什麼右傾翻案風在教育戰線上，在民兵戰線上都有，在各條戰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市民兵指揮部的簡報中說：「今年軍委擴大會議，以加強人武部建設，來否定適應鬥爭需要的民兵指揮部，從而否定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製造『編制就是法規』的根據，說民兵指揮部不合法。」「軍委擴大會議以後，總參開了裝備會議，會議不講路線，不講文化大革命，要軍隊把民兵工作管起來，要人武部把民兵武器彈藥管起來。」「這些情況說明要堅持民兵建設上的新生事物，必須堅持鬥爭，才能前進。」



十二月十九日市民兵指揮部召開機關工作人員會議進行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員。說什麼這場右傾翻案風來得大，來得快，來得猖狂。煽動大家聯繫實際，揭露民兵戰線上的「事實」。他們炮製的簡報說：《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和《民兵組訓工作座談會議紀要》這兩個文件下達後，事隔一年不到，到了軍委擴大會，隻字不提民兵指揮部，而提出加強人武部。全國軍體會也提出「軍體要由人武部來領導。」幾個月來，許多地方的民兵指揮部被壓抑，被打擊，被扼殺。改造民兵今後還有的鬥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市民兵指揮部打報告給市委，提出關於郊縣民兵領導班子的審批手續，分別由市委組織組、市指揮部和縣委組織組負責審批和選配，剝奪了警備區和人武部對民兵幹部的審批權和領導權。十二月三十日，市委組織組電告同意報告意見。

十二月三十一日市民兵指揮部與市高級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後方基地黨委聯合打報告給市委，請示皖南基地公安處和中級人民法院體制與編制方案。請示說，為使適應上海在皖南地區的廠礦和企事業單位的佈局以及對敵鬥爭的需要，經研究擬將公安處與法院定名為「安徽省皖南基地公安處」和「安徽省皖南基地中級人民法院」，與上海民兵後方基地指揮部組成一個統一的領導班子（對外掛三塊牌子），行使地區一級的公安、法院的職權。請示還提出編制說：皖南基地民兵、公安、法院領導機關，分設辦事、作訓、保衛、審理四個組，編制人員四十名，並視情建立一個看守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委辦公室發文給上述四個單位說：市委領導同志說：原則上同意按照報告中的方案與安徽省公安局、法院協商解決。這個請示中所提的體制和編制，搞的就是王洪文的「三位一體」的貨色。

### 一九七六年

一月三日市民兵指揮部舉辦的區指揮部政工幹部、理論骨幹學習班開學，有二十人參加，至十四日結束。學習班以學習元旦社論為名，進行煽風點火，在民兵系統掀起了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的惡浪。施尚英在開始和結束時都講了話，他大講是什麼「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要大家研

究「和過去的修正主義頭子有些什麼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攻擊解放軍報「不提民兵指揮部」。還說，「我們這裡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指揮部這個組織，他們從組織上否定了，那就什麼都沒有了」。「現在重溫王副主席去年九月份對我們的指示，更感到親切」。「王副主席當時講，有人要撤銷民兵指揮部，現在看到了出處」。要大家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當好骨幹，出一些高品質的文章。

一月初李彬山要市民兵指揮部機關理論小組寫一篇「民兵改造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要像《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那樣有說服力。」重彈「民兵改造」的老調，大談民兵指揮部的「優越性」，但始終未見報，後借楊浦區指揮部的文章拋出了一些主要觀點。

一月上旬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不久，施尚英竄到鐵路局上海站「聯合辦公室」，要他們彙報情況，後來，又把他們叫到市民兵指揮部說：「現在階級鬥爭很複雜，火車站是階級鬥爭的溫度錶，要組織力量抓『敵情』」，「要收集總理逝世後的反映，要收集社會上的『謠言』」，「只有這樣，才能進行預測」。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等人，還三令五申要「聯辦」關心「大事」，要「抓國內國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動向」，說什麼「民兵光抓小偷有啥意思，只不過是經濟問題，要注意政治問題」。「你們要把情況抓起來，發現情況要立即向指揮部彙報」。

二月十八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財政局寫了一個「關於一九七六年度民兵經費預算」的報告。內稱，七六年度經費預算一千零九萬五千元，其中：裝備購置費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元，主要購置新中華廠生產的自動步槍一萬支，電纜廠生產的半自動步槍六千支；裝備摩托連用的三輪摩托車六十輛。

李彬山去北京參加打招呼會議，王洪文把他找到釣魚臺，對李說：兩部合併「不要等批了，你們抓緊並起來就是了。」李彬山回上海後，親自到楊浦、盧灣、上海縣傳達王洪文的指示，並於三月底宣布了「兩部合併」，明目張膽地砍掉了人武部。

二月二十二日王洪文對徐景賢、王秀珍說：上海民兵是春橋和我兩個人搞起來的。

三月三日下午，市民兵指揮部召開了「民兵幹部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區、縣指揮部和直屬師團的負責人共一百三十人。施尚英在會上講，「要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資派和他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名道姓地進行攻擊。最後說。「要堅持民兵改造的正確方向，堅持民兵抓社會階級鬥爭。」極力煽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

三月十九日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討論，要成立一個「上海民兵軍政學校」。李彬山說：「上海民兵這樣大的隊伍，沒有一個軍政學校，經常打『遊擊』，確是個損失，我想就是要搞一個『軍政學校』。我主張搞的不要太小，五百人左右好。」施尚英說：「要成為我們的直屬單位。」為經營「第二武裝」進一步作組織準備。

三月二十一日批准成立石化總廠民兵師。五月二十一日上午開成立大會，施尚英、吳立義到會並講話。

同日，批准成立市衛生局民兵團，五月十日開成立大會，施尚英、吳立義、鐘定棟參加大會並講話。

三月二十三日市民兵指揮部舉辦民兵幹部學習班。參加的有各區、縣指揮部、直屬師團的負責人和政工幹部、理論骨幹共六十二人，至四月三日結束。學習班賣力推行「四人幫」反革命政治綱領，為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培養骨幹，製造輿論。借所謂「南京事件」攻擊中央領導同志。

三月三十日市民兵指揮部印了「一九七六年民兵工作意見」，上報下發。要求各級民兵組織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發動和組織民兵積極投入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區、縣人武部和民兵指揮部的合併，要在試點的基礎上，抓緊總結經驗，逐步推開。」「三位一體」的民兵組織，要不斷完善和鞏固，進一步發揮它的作用。里弄民兵小分隊要進一步加強建設，充分發揮作用。還強調要切實搞好軍事訓練。重點抓好排以上幹部、武裝基幹團、特種兵和防空專業隊伍的訓練。市區民兵要進行巷戰、街壘戰、地道戰的訓練。

四月一日鐘定棟慌慌張張地趕到上海火車站聯合辦公室。一面惡毒污蔑革命群眾對「四人幫」的鬥爭，一面聲嘶力竭地要擺開架勢展開

「反擊」。他們擅自決定組織民兵分兵把口，控制車站，下令：對北方來的旅客要嚴密注視，發現可疑的人員，要嚴加查詢，決不能漏掉一個；對於寫在列車上的所謂「反動標語」（反對「四人幫」，悼念周總理的），要不惜任何代價，澈底洗刷，決不能讓它流入市內。對於講反對「中央首長」的話，貼反對「中央首長」的標語的人，要毫不手軟，馬上抓起來，甚至對刷悼念周總理的大幅標語，也要追查。

四月初「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極端害怕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烈火燒到上海，搞亂他們篡黨奪權的基地，亂了他們的陣腳。由王秀珍出面，緊急召集民兵指揮部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公安局薛幹青、徐成虎，總工會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和王日初等一幫小兄弟到東湖招待所密謀策劃。王秀珍傳達了王洪文要加強「戰備」的「指示」，部署公安、民兵「兩家」制定所謂「防止反革命暴亂實施方案」。

四月六日市民兵指揮部李彬山等人召集了區、縣指揮部和直屬師團負責人會議，會上布置了所謂的「戰備」。

四月七日市民兵指揮部向市委報了一份「關於上海化工機械廠基幹民兵陸國梁問題的情況」的簡報增刊。共青團員陸國梁於三月十九日向車間黨支部寫的大字報中寫道：「鄧小平同志是正確的」，並說「馬列的話在當今的蘇聯已經是不靈了，在當今的中國，情況不是這樣。因此，我們到馬列著作中去尋找思想武器，結果卻發現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是符合馬列精神的。假如對這些講話要進行批判，那就無異於要對馬列精神進行批判」。這均被誣為「大毒草」、「詭辯手法」，還要組織力量對陸進行批判，進行內查外調，要查背景。

四月八日王秀珍竄到市民兵指揮部機關，向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等人說：「昨天與洪文同志通了個電話，洪文同志講，從北京出現的事（指天安門廣場事件）我們吸取的教訓，要隨時分析敵情，在矛盾轉化，敵人已經出來時，不能『五不』，就要進攻。我們要研究這個事」。李彬山當場獻計說：「戰備值班隊伍可以用拉練形式拉出來，看一看有否戰鬥力」。王秀珍當即表示，戰備演習拉練搞一下很好，並且

還同意了市指揮部幾個壞頭頭炮製的以「反擊」為代號的所謂戰備實施方案。王秀珍還說：「文化大革命中的好的做法，要很好總結。通訊聯絡，你們也要研究一下」。

四月十一日市民兵指揮部根據所謂「反擊」的方案，給市委寫了一個「上海民兵戰備機動兵力夜間拉練計畫」。這個計畫一開頭說：「为了更好地使上海民兵擔負起保衛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勝利進行的任務，擬從四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對十個區和建工、港務、交運、江南、鐵路分局和上鋼一、三、五廠等八個直屬師團的戰備機動兵力（在一萬人以內）分批進行一些夜間拉練活動」。「通過夜間拉練，要增強民兵指戰員的戰備觀念，檢查民兵幹部的值班情況和組織指揮能力，鍛鍊提高戰備部隊應急能力和戰鬥力，進一步促進戰備機動兵力的落實。使上海民兵在市委的領導下，切實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為保衛這場偉大門爭作出貢獻。」施尚英、鐘定棟還有葉昌明等，都到有關區去進行所謂「檢查」。

四月二十六日市民兵指揮部和市公安局聯合寫了一個「關於反謠、追謠工作的情況和請示報告」。要求「把反謠、追謠的鬥爭作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新高潮的組成部分」；「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揮部聯合設置臨時的反謠、追謠辦公室。各區、縣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根據工作需要，可由公安、民兵抽調專人組成臨時反謠、追謠班子。」

五月十三日哈爾濱市民兵參觀團十七人到達上海，參觀訪問。至五月二十二日結束。

五月十六日至五月底總政文化部陳亞丁，派《衝鋒向前》劇組，來上海體驗生活，準備排練。徐景賢要市民兵指揮部熱情接待。《衝鋒向前》劇組來後，市指揮部吳立義負責接待，安排鐘定棟介紹「上海民兵成長史」，李彬山、施尚英說：希望你們早日排好這個戲，能早日看到你們的演出。

五月中旬至七月底市民兵指揮部舉辦第二期「工人新幹部學習班。」從各單位挑選了三十五名所謂路線鬥爭覺悟高，對文化大革命有感情的「造反派」，待學習後，安插到市指揮部各組當頭頭。

五月二十六日市民兵指揮部寫了一個「一九七五年度民兵整組總結」。內說「在這次整組中，各單位始終把推廣鞏固『三位一體』作為整組工作的一項主要工作來抓」。「到目前為止市區已實行『三位一體』的單位，占應實行『三位一體』單位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

五月二十九日瀋陽市和平區民兵指揮部三人抵滬，參觀活動至六月二日。

六月七日南京市民兵指揮部五人來上海參觀，至六月十一日結束活動。

六月中旬王秀珍對施尚英、薛幹青等人說：外交部通報（內容是毛主席不接見外賓）傳達以後，下面有什麼反映？並說：毛主席不接見外賓是有內容的，這個你們可以想像的，有些話我在喉嚨口，不好講出來。施尚英向王秀珍彙報幾個工作，請示武器發放問題，王秀珍說：你們抓緊打報告給市委。

六月十七日馬天水在施尚英、吳立義、鐘定棟等人陪同下，竄到靜安區旅社中心店民兵連。馬天水說：「我們民兵是在鬥爭中形成的，是在九、十次路線鬥爭、『批鄧』中形成的。旅社民兵工作，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首先抓路線鬥爭，同黨內走資派鬥爭是重點。」

六月十七日馬天水一夥從靜安旅社中心店出來，又到了上棉二十二廠，聽取上棉二十二廠和滬東造船廠（事先通知了）彙報「三位一體」情況。馬天水說：你們兩個單位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三位一體」真正從思想上合起來了，這個經驗很好。「三位一體」有很大發展，要進一步發展，這是真正體現群眾專政。民兵工作要從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應該認識更清楚了吧。像這種事只有靠民兵。打擊走資派挑動的反革命案件，靠軍隊直接出面比較困難。民兵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產生的，走資派最怕民兵。民兵要同走資派鬥，還要同社會上階級敵人、企業內部的階級敵人鬥，這是社會基礎。

六月十八日馬天水在施尚英、鐘定棟等人陪同下，又竄到靜安區愚園街道民兵小分隊。馬天水說：你們的經驗，主要抓了階級鬥爭，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各方面都抓，抓青年，抓老年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

級鬥爭是尖銳複雜的，我們要佔領這個陣地。看來你們搞得比較出色，區委要深入細緻的推廣。

六月十九日市民兵指揮部在市革會禮堂召開紀念毛主席民兵工作「三落實」指示發表十四周年大會。會上，施尚英作會議小結，馬天水、王秀珍都在會上講了話。

施尚英大談「改造」、「重建」，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叫嚷要「發展和鞏固上海民兵的新鮮經驗」。

馬天水在講話中說：「把民兵隊伍建設好，就能更有力地粉碎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復辟，不管他們用和平演變搞復辟也好，還是用反革命暴亂也好，都能對付。」「通過四月初首都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我們對於建設民兵的意義、民兵肩負的歷史使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我們開這個會，就是要把工作搞得更好，這就是會議的目的。」接著就大肆攻擊中央領導同志。

六月二十八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市委寫了一個「關於武器分發的請示報告」。七月三日，馬天水打電話給施尚英，問為什麼全自動步槍不下發？並「指示」全自動步槍要全部發下去。施尚英問：「是否還要重新打報告？」馬天水說：「不要重新報告了。」

六月二十八日吉林省延邊朝鮮自治州民兵參觀團八人來滬參觀，至七月二日結束活動。

六月下旬至七月二十日市指揮部鐘定棟帶人到靜安區旅社中心店民兵連「蹲點」，炮製了一份題為《努力把旅社民兵辦成與黨內資產階級鬥爭的陣地》的所謂經驗。鐘定棟硬要這個旅社的民兵在旅客中找「走資派」，說「最好揪縣委書記以上的，實在沒有，找出個大隊支部書記也好」。硬逼著民兵連幹部對所屬十六家旅社逐個打電話詢問。在鐘定棟「蹲點」期間，清華大學有十幾位學員正好住在這個旅社，鐘就千方百計要他們寫一篇吹捧上海民兵揪「走資派」的經驗新在哪裡，好在什麼地方的文章。

七月八日市民兵指揮部給各區指揮部發出書面，通知說：「為了工作和鬥爭的需要，我部直通你部的電話分機一律安裝在值班室，保證日

夜暢通。望遵照執行。」

七月九日市革委會文教組給市委、市革委會寫了一個「關於抽調民兵參加拍攝影片《盛大的節日》的請示報告」。徐景賢、馬天水批示同意。

七月上旬馬天水電告施尚英，上海在外地單位的民兵組建起來，屬市指揮部直接領導。

七月二十二日市民兵指揮部與市革會財貿組、地區組聯合召開了「靜安區民兵結合本職抓階級鬥爭的現場經驗交流會」，一千七百人參加了會議。市民兵指揮部施尚英、財貿組黃金海、地區組曹征風先後在會上講了話。施尚英說：「現在革命深入了，階級關係產生了變化，這就對我們民兵提出新的課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我們民兵怎麼鬥？對於這個問題，靜安旅社中心店民兵連等單位，已經走到前面，為我們開闢了一些路子，希望大家根據自己行業的特點創造出新的經驗來，這也是今天現場會議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是對各單位的主要希望」。

七月二十三日遼寧省軍區赴滬參觀團十八人，抵上海訪問到八月十日結束。馬天水和王秀珍對這次接待很重視。馬天水專門批示：告訴民兵指揮部準備一下，熱烈接待、相互學習，準備介紹點經驗。住東湖，辦公室告訴東湖一下，具體民兵指揮部去落實。馬天水、王秀珍都專門去東湖招待所看望。臨走時，王秀珍還破例宴請該團全體成員。表示了特別的熱情。

八月十日晚上，施尚英在市委開會，問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關於武器報告事。馬天水發現報告還沒批下去，就對辦文的同志大發雷霆說：我關照過的，這麼重大的事給你們耽誤了。即把這個報告拿過去又批了：「立即發」，並對施尚英等說：「你們明天就發。」八月十一日和十三日，李彬山和施尚英按照馬天水「立即發」，「明天就發」的黑指示，分別召開區、縣、直屬師團緊急會議，把武器分配了下去，並限各單位於八月底前全部從警備區倉庫把武器領出。

八月二十日市民兵指揮部發出通知，通知說：「為了在批鄧鬥爭中進一步加強民兵建設，市指揮部政工組會同楊浦、長寧、靜安、閘北區



指揮部政工組的同志，一起編寫了《搞清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明確民兵的主攻方向》、《同黨內走資派鬥，最要緊的是解決路線問題》、《堅決與走資派對著幹，鞏固和發展民兵建設上的新生事物》等三篇民兵學習講話提綱（討論稿），現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利用民兵活動日、政治夜校、軍政訓練班、整組教育等項活動，組織民兵幹部和戰士進行學習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

九月江蘇省海安縣角斜公社民兵參觀團十六人，來滬進行了參觀訪問。

九月十日毛主席逝世後的第二天，在二十個小時中，市民兵指揮部突擊發了子彈六百餘萬發，炮彈一萬五千發，為「四人幫」用武力篡權作準備。

九月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李彬山、施尚英、吳立義、印玉泉等人以市民兵指揮部名義，向市委報了一份「關於奉賢縣民兵領導小組的若干問題與我們的建議」的報告，誣告在奉賢民兵領導小組內的奉賢縣人武部的領導，「有些同志階級立場和路線有問題」。「報告」說：「這個民兵領導小組實難承擔全縣民兵工作的重任，急需調整充實」。「主要領導不適宜留在那裡擔任民兵領導工作」，「建議警備區黨委給予調動」。

十月七日馬天水接到中央通知去北京開會。

十月八日十四時半，李彬山接到康辦通知，同張宜愛一起到康辦的學習室，由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三人召見。王秀珍就立即介紹了所謂情況很不好，王又說，機關的安全保衛工作要注意。李彬山即說：「部隊人數有限，要民兵協助」。王（少庸）說：「我馬上找公安局和民兵指揮部來談」。

十五時半，施尚英和鐘定棟接到通知，來到康辦常委學習室，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王少庸召見，市公安局的薛幹青和徐成虎也在場。徐景賢、王秀珍介紹了所謂「情況不正常」、「中央出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馬老軟禁起來了」等等，布置民兵和公安要「加強戰備」。

二十二時，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三人在李彬山家策劃動用民兵參加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方案。

二十三時半，施尚英在李彬山家打電話給王秀珍，王要施等三人即回市指揮部機關。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三人到市指揮部機關，接著，王秀珍帶了徐景賢寫的手令，和馮國柱、廖祖康、楊新亞、康寧一等人到了市民兵指揮部。王秀珍講：「今晚我們分成三個班子，徐景賢、王少庸、張宜愛帶了一批人在另外一個地方，敬標他們在機關，現在情況更加嚴重了，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電話回來說：心肌梗塞（這是王和繆約好的情況最嚴重的暗號），『門關起來了』、『動不了了』、『文化部于會泳原來要出國，是華國鋒取消的，肯定中央出了問題』、『可能馬老和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幾個領導同志都抓起來了，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隨即施尚英彙報了他們三人研究的幾條反革命武裝叛亂措施，王表示同意，並指出要抓落實。王秀珍又說，把吳立義、印玉泉、吳冬梅馬上找回來，施說，吳冬梅在勞動，王講，那就算了。此時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馬振龍、王明龍、汪湘君、沈涵等人也陸續到指揮部，後有王秀珍向這邦小兄弟繼續講情況。

十月九日凌晨二時，根據廖祖康的意見，市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吳立義、鐘定棟、印玉泉等人，召集作戰組、特兵組、後勤組負責人在作戰組策劃制訂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施定了十個區和兩個指揮點上開設電臺以及上鋼三廠也設電臺，並要求在九日下午六時前溝通聯絡。施還定了江南造船廠作為指揮點，吳立義也提出到中國紡織機械廠，施也同意把它作為指揮點。施還明確了分工，指揮由一線負責，二線隱蔽待命，如一線出問題，二線代替指揮。施和鐘去江南造船廠，為基本指揮點，吳和印到中紡機廠，為預備指揮點，市指機關由陳振安負責。並明確民兵指揮部聽王秀珍指揮。

八時半和九時，先後召開了市指揮部和十個區五個直屬師負責人會議。會上施尚英按八日議定的方案和口徑作了布置。有的區提出是否要向區委彙報，施講：「不要報了」，吳立義說：「這次『戰備』，部隊官兵各不相干」。會後，聯絡員立即隨各區負責人下去。

十時半和十一時、施尚英、鐘定棟帶了六個人，吳立義，印玉泉帶四個人，各帶手槍和兩部十五瓦電臺以及報務員，分頭進入江南廠和中紡機廠兩個祕密指揮點。

十月十日十一時，施尚英在江南廠點上，接到市指揮部陳振安電告「李彬山要去南京開會」。施要陳振安到李彬山處去一次，要李彬山有情況即打電話回來。

十二時，陳振安電告施，李彬山下午乘火車去南京，已和李約好了暗號，如打電話回來說要買照相機就說明問題嚴重了。

十八時，在江南造船廠點上，施尚英親自起草了一份電報稿，發給十個區指揮部和中紡機廠點。並親臨報房，監督發報，直至十一日凌晨二時，鐘定棟逐一對十個區發回的電報進行審閱，並在每份電報上簽了名。

十月十一日施尚英又告訴鐘定棟，馬天水沒回來，又通知徐景賢、王秀珍去北京開會，飛機在濟南被叫下來檢查後，才進了北京。然後鐘定棟就開始銷毀黑材料，銷毀了有關「四人幫」及馬、徐、王的言論、黑指示、批示，及鐘自己寫黑信告黑狀等材料。

二十一時，在市指揮部負責中轉的陳振安電告江南造船廠點上的鐘定棟：黃浦區人武部部長楊清河彙報，李寶奇政委從南京開會回來了，傳達了軍區首長指示，警備區黨委擴大會暫告一段落，要加強戰備，董副司令在會上布置戰備工作。鐘即要人將此情況電告在東湖招待所的施尚英。

二十一時半，施尚英從東湖招待所去康辦開會，會上講了徐景賢、王秀珍打回電話「明天要回來，工會和民兵不能動」。施尚英密告警備區加強戰備的事。張敬標講：「李彬山、張宜愛、楊新亞也從南京回來了」。施電話找李彬山未成，回到東湖招待所，聽說北京釣魚臺有個反革命集團，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的消息，十分驚慌，議論了對策，就分手了。臨走時約定十二日下午二時在市工人文化宮碰頭。

與此同時，江南造船廠點上，鐘定棟自接了陳振安有關警備區加強

戰備的電話後，指使人員用電話檢查各區「戰備」兵力落實情況和加強重點目標檢查等，鐘定棟親自打電話給虹口區指揮部頭頭劉裕根，要劉「抓好隊伍落實，準備一些機動力量」。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時半，吳立義和印玉泉到江南造船廠點上，和施尚英、鐘定棟等人一起通氣密商，感到「凶多吉少」。

上午九時，吳立義接警備區通知，即去警備區開會，走前研究了聯絡辦法。

十八時，施尚英從李彬山家回到市工人文化宮五樓貴賓室，在場的有廖祖康、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王明龍等人。施尚英談了從李彬山處得來的情况，說「現在可以肯定這三個人出事了」。施又竄到黃濤家活動一番後，才又回到東湖招待所。

二十時半，施尚英到康辦常委學習室開會，在場的有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陳阿大、葉昌明、朱永嘉、王日初、王知常、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人，馬振龍是二十一時半自己來的。首先，施尚英談了從李彬山處得來的情况，別人又談了其他方面的情况。接著就是一片反革命歇斯底里的叫囂，要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最後，馮國柱宣布常委會意見，「現在各路各方面要積極準備好幹，行動一定要統一，等他們三個領導（指馬、徐、王）回來後，再統一行動」。散會後，施尚英又和廖祖康、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到總工會策劃向下「吹風」，「準備幹」。

施尚英在康辦開會時打了兩個電話給鐘定棟，第一次是在馮國柱等人表示同意幹後，要鐘檢查一下各單位負責人值班情况和「戰備」民兵值勤人數。第二次是馮國柱宣布開正式常委會密商時（他在外等候），要鐘馬上搞一個重點目標保衛方案。他離康辦前又告印玉泉，要印在十三日凌晨三時前趕到江南造船廠。

鐘定棟找來有關人員，親自標圖、口授了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規定了重點保衛目標，布置了兩個梯隊八千餘人和一百輛卡車及一個摩托團（三百五十輛摩托）的機動兵力，內外三層包圍圈以及內圈的六個口子，還有指揮核心的形成，彈藥補給，通訊聯絡、社會治安等等。從十

二日晚上一直搞到十三日凌晨二時。交印玉泉看後又作了修改和補充。即由鐘在重點目標方案上題名為「捍一」，在週邊控制方案上題名為「方二」。

十月十三日二時，施尚英從總工會回到江南造船廠指揮點，找鐘定棟、印玉泉和作戰組長、特兵組副組長密商。談了社會上的風聲和市委常委會情況及市委的部署。

十時，市公安局薛幹青、徐成虎電話找施去看敵臺監聽記錄，施要他們作些「準備」後，又竄到總工會活動。

十四時，施到江南造船廠與鐘、印交換情況，談到馬天水已從北京開會回來，黃金海等要拉民兵他未同意等。十六時，戴立清、馬振龍等又到江南造船廠點上來要拉隊伍，施不敢，想等市委開會後再說。故未同意。

二十時半，通知施、鐘到錦江小禮堂開會。會上，馬、徐、王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拿出了毛主席手書影印件，但鐘和總工會一夥還在會上亂嚷，由於幻想馬、徐、王再主持上海工作，只好表示要聽市委的。

十月十四日上午，李彬山、施尚英、鐘定棟參加市委召開的區、縣、局黨員幹部會議，下午，李、施向市民兵指揮部機關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他們一個個哭喪著臉，如喪考妣。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至此澈底破產。

下午，《解放日報》王景派記者去市民兵指揮部，一方面要搞個指揮部頭頭轉彎子的內部情況，另一方面要指揮部寫篇表態文章，明天見報。第二天（十五日），上海兩報都刊登了民兵指揮部的表態文章。這是「四人幫」餘黨妄圖掩蓋策劃「第二武裝」搞反革命武裝叛亂罪行的一個花招。

十月十七日市民兵指揮部頭頭被迫在黃浦路二十號市民兵指揮部小禮堂召開了由機關工作人員和十個區代表參加的約二百多人的聲討「四人幫」的會議。

十月十八日市民兵指揮部突然提出要組織二萬武裝民兵到人民廣場

集合，先開聲討會，後遊行。廣大民兵識破了指揮部壞頭頭的陰謀詭計，反對這次遊行，而且紛紛到黃浦路二十號，要李彬山、施尚英交代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罪行，摘掉了上海民兵指揮部的牌子。

此後，全市廣大民兵紛紛起來造市、區指揮部頭頭的反，「四人幫」苦心經營十年之久的「第二武裝」，頃刻瓦解。

十月二十八日上海警備區在浦東大樓開會，宣布市委指示：上海民兵工作要加強，市委分工周司令抓民兵工作，具體工作由警備區來管。

周司令在會上指出：「中央任命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來上海主持工作。」

會上還宣布了警備區黨委決定派朱萬國副司令、王枚副政委到市民兵指揮部領導運動和工作。同時南京軍區也派了一個工作組，由司令部動員部副部長王學泰同志帶領，到市民兵指揮部指導工作。這樣，就把被「四人幫」及其餘黨長期篡奪的民兵工作領導權，指揮權重新奪了回來，在上海市委的統一部署下，恢復了上海警備區、人民武裝部做民兵工作的傳統。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關於加強民兵工作的決定。市委決定：在市委的領導下，由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同志分管民兵工作。民兵的日常工作，市委委託上海警備區負責。

十一月一日經上海市委批准，上海警備區組織十萬民兵隆重集會遊行，熱烈歡慶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歡呼我黨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同志出席了上海民兵的盛大集會。大會通過了給華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致敬電，周司令在會上講了話。會後民兵進行了遊行。

### 說明

為了澈底揭露「四人幫」在上海大搞第二武裝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我們根據收繳的「上海民兵指揮部」的檔、報告、記錄、講話稿等材料，按時間順序整理編寫了這份資料，作為「四人幫」拼湊「第二武裝」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歷史記錄，定名為《「四人幫」經營

「第二武裝」的記事》。由於我們水準所限，編寫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僅供領導同志和領導部門參考。

資料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 1981.01.23；特法字第一號

公訴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兼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副廳長喻屏、史進前，檢察員馬純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聲、王耀青、馮長義、曲文達、朱宗正、江文、孫樹峰、李天相、沈家良、張中如、張英傑、張肇圻、孟慶恩、圖們、鐘澍欽、袁同江、敬毓嵩。

被告人江青，女，現年六十七歲，山東省諸城縣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中共第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現在押。

被告人張春橋，男，現年六十三歲，山東省巨野縣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現在押。

被告人姚文元，男，現年四十九歲，浙江省諸暨縣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共第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現在押。

被告人王洪文，男，現年四十六歲，吉林省長春市人。原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現在押。

被告人陳伯達，男，現年七十六歲，福建省惠安縣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第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現在押。

被告人黃永勝，男，現年七十歲，湖北省鹹寧縣人。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現在押。

被告人吳法憲，男，現年六十五歲，江西省永豐縣人。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現在押。

被告人李作鵬，男，現年六十六歲，江西省吉安縣人。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現在押。

被告人邱會作，男，現年六十六歲，江西省興國縣人。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現在押。

被告人江騰蛟，男，現年六十一歲，湖北省紅安縣人。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部隊空軍政治委員。現在押。

辯護人律師韓學章、張中，為被告人姚文元辯護；

律師甘雨霽、傅志人，為被告人陳伯達辯護；

律師馬克昌、周亨元，為被告人吳法憲辯護；

律師張思之、蘇惠漁，為被告人李作鵬辯護；

律師王舜華、周奎正，為被告人江騰蛟辯護。

被告人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黃永勝、邱會作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也不要特別法庭指定辯護人為他們辯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是根據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成立的。這個決定規定本法庭的任務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案，對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向本庭提起公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



較輕的，適用本法。」本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進行審理，聽取了公訴人支持公訴的發言；審問了各被告人，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辯護和最後陳述；聽取了辯護人的辯護；聽取了證人的證言；聽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陳述；核實了各種與本案直接有關的證據。

本庭確認，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有共同的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國家機構、軍事機關，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機構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有共謀的犯罪行為，形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和已經死亡的林彪（原中共第八、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部長）、康生（原「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謝富治（原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葉群（原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林彪之妻）、林立果（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林彪之子）、周宇馳（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國家政治生活陷於極不正常的狀態，社會主義法制受到嚴重破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憑藉他們當時取得的地位和權力，採取公開的和祕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有預謀地誣陷迫害國家領導人，誣陷迫害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陰謀顛覆政府和破壞軍隊，鎮壓迫害廣大幹部、知識份子和社會各階層群眾，毒害廣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治權。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前後共達十年之久，殃及全國各個地區各個領域，使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社

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受到特別嚴重的危害，使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給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危害國家和社會的行為，無論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還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都構成了犯罪。本庭的職責是嚴格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刑事犯罪，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本庭不審理各被告人的不屬於刑事犯罪的其他問題。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犯罪事實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劃顛覆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確定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方針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同年一月二十二日，張春橋說：「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從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上述反革命目的，雖然由於黨、政府、軍隊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他們確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嚴重地破壞了政府的機構，嚴重地妨礙了政府的工作，嚴重地破壞了人民公安保衛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控制了中共中央的組織、宣傳部門和國務院的文化、教育、衛生、民族等部門的領導權；奪取了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領導權；一度「砸爛」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奪取了一些軍事機關的部分領導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共謀誣陷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葉群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張春橋單獨召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他組織遊行示威，首先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夥同康生、陳伯達決定對劉少奇進行人身迫害，從此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從一九六七年五月開始，江青直接控制「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夥同康生、謝富治指揮專案組對被逮捕關押的人員進行逼供，製造誣陷劉少奇

是「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偽證。一九六七年，江青為了製造誣陷劉少奇的偽證，決定逮捕關押河北省副省長楊一辰（原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幹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原輔仁大學教授，王光美之師）、天津市居民王廣恩（原奉天紗廠協理）和劉少奇的炊事員郝苗等十一人。在楊承祚病危期間，江青對專案人員說：「要突擊審訊，把我們所要的東西在楊死前搞出來」。江青的決定，使楊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揮的專案組也使得王廣恩被迫害致死。江青夥同謝富治還指使對病勢危重的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原輔仁大學教授，王光美之師）多次進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後僅二小時即死去。江青夥同康生、謝富治等人，指使專案組對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同劉少奇一起進行工人運動的丁覺群和一九二九年同劉少奇在瀋陽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進行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由於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致使劉少奇遭受監禁，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在康生同意下，指使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組織實施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的人身迫害，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造成重傷。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對彭德懷「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彭德懷被折磨致死。一九六六年七月，康生誣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等人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八月，林彪指使吳法憲編造誣陷賀龍的材料。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由於林彪、康生等人的誣陷，致使賀龍遭受監禁，被折磨致死。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黃永勝批准廣州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報送的《關於揪叛徒調查工作的請示》及所附的「第一號調查方案」，陰謀陷害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為「叛徒」。一九六八年六月，黃永勝把誣陷葉劍英「密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材料交給葉群。一九六八年八月，黃永勝和吳法憲捏造事實，誣陷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多次

誣陷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是「現行反革命」、「叛徒」、「內奸」，並決定對他進行人身摧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康生製造了一個誣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名單。同年八月，康生又製造了誣陷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和誣陷第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的名單。同年十二月，謝富治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的名單。在這四個名單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一百零三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五十二人，第四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七十六人，被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務嫌疑」。這些被誣陷的人先後都受到了迫害，其中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八人，國務院副總理十二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二十二名，中共中央總書記、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十四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六人，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十一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種會議上，點名誣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二十四人，使他們一一受到迫害。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江青點名誣陷後，遭到非法關押，被打成重傷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批幹部，企圖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受他們的控制。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提出「澈底砸爛總政」。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空軍、海軍誣陷迫害了大批幹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製造了大批冤案，使八萬多人遭到誣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各級黨政幹部，以圖奪取他們尚未奪取的部門和地區的領導權。一九六八年一月，康生等人誣陷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幹部，直接控制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領導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各級人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大批幹部、民警，被他們迫害致死的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大批幹部。在康生、謝富治等人的

指使、策動下，奪取了北京市的領導權，北京市領導幹部十三人遭到誣陷迫害，市委書記劉仁、鄧拓和副市長吳晗、樂松生被迫害致死。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使、策動下，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上海市領導幹部十二人遭到誣陷迫害，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張春橋直接操縱、指揮上海的「游雪濤小組」，從事跟蹤盯梢、綁架、抄家、拘禁、刑訊和捏造情報等特務活動，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誣陷華東地區領導幹部在「長江以南搞一個地下武裝」，「密謀兵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製造大量冤案，在全國範圍內煽動「打砸搶」，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一九六七年，康生等人製造了「新疆叛徒集團」冤案。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黃永勝等人先後製造了「廣東地下黨」和廣州部隊「反革命集團」冤案。一九六七年，由於陳伯達的煽動，使冀東冤案造成嚴重的後果，大批幹部和群眾受到迫害。一九六八年，康生、謝富治製造了雲南「趙健民特務案」冤案。同年，由於康生、謝富治的煽動，使所謂「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冤案造成慘重的後果，大批幹部和群眾被迫害致死致殘。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煽動下，製造了「『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冤案。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指揮和煽動而造成的冤案，使各級黨政軍機關、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各界的大批幹部和群眾以及大批歸國華僑遭受誣陷迫害。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有：著名作家、藝術家老舍、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應雲衛、鄭君里、孫維世等人，著名教授熊慶來、翦伯贊、何思敬、王守融、顧毓珍、李廣田、饒毓泰、劉盼遂、馬特等人，著名科學家趙九章、葉渚沛、張宗燧、劉崇樂、陳煥鏞、周仁等人，衛生界著名專家胡正祥、張昌紹、計蘇華、陸瘦燕、葉熙春、李重人等人，體育界優秀教練員傅其芳、容國團、董永寧，著名勞動模范孟泰、時傳祥等人，僑務界知名人士方方、許立、黃潔、陳序經、黃欽書、陳曼雲等人。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團嚴重破壞民族團結，使各少數民族的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到殘酷迫害，吉雅泰等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全國範圍內挑動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規模武鬥，借此奪權和殘酷鎮壓廣大群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張春橋的指使下，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打傷九十一人，在全國開創了利用武鬥奪權的惡劣先例。一九六七年五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製造了省革命委員會大院武鬥事件，拘捕關押三百八十八人。同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組織、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的武鬥，關押和傷殘六百五十人。

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都各自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它們在結成聯盟的同時，又有尖銳的矛盾。一九六九年，林彪被確定為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一九七〇年，林彪意識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的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圖謀提前「接班」。林彪明知江青的野心決難得逞，但是要毛澤東主席支持自己提前「接班」是絕不可能的。因此，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決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組成了武裝政變的祕密骨幹力量，取名為「聯合艦隊」。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上海制訂了武裝政變計畫，取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據《「五七一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的計畫，在上海召集江騰蛟和七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王維國、七三五〇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南京部隊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祕密開會，指定江騰蛟為南京、上海、杭州「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的負責人。同年九月五日 and 六日，林彪、葉群先後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報，獲悉了毛澤東主席察覺林彪在密謀奪權的談話，決定對在旅途中的毛澤東主席採取謀殺行動，發動武裝政變。九月八日，林彪下達了武裝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並由林立果、周宇馳對江騰蛟和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以及「聯合艦隊」的其他骨幹分子進行具體部署。正當林彪反革命集團緊張

地策動武裝政變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對他們的陰謀有所警覺，突然改變行程，於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謀殺計畫失敗後，林彪隨即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到他當時準備作為政變根據地的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根據林彪的命令，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胡萍安排了南逃廣州的飛機八架，於九月十二日將其中的二五六號專機祕密調往山海關供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林立果使用。當晚十時許，周恩來總理追查二五六號專機突然去山海關的行動，命令將該機立即調回北京。胡萍一面謊報二五六號專機去山海關是飛行訓練，並偽稱飛機發動機有故障，拒不執行調回北京的命令；一面將周恩來總理追查飛機行動的情況報告周宇馳。周宇馳隨又報告了林立果。當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〇時六分，李作鵬兩次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時，將周恩來總理關於二五六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九月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這時李作鵬仍然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葉群、林立果得以乘二五六號專機叛逃。林彪得知周恩來總理追查專機去山海關的情況後，判斷南逃廣州另立政府的計畫已不可能實現，遂於十三日零時三十二分登機強行起飛，外逃叛國，途中機毀人亡。

九月十三日三時十五分，在北京的周宇馳等人得到林彪外逃消息後，劫持三六八五號直升飛機外逃，被迫降。從直升飛機上繳獲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竊取的大量國家機密檔和策劃武裝政變的材料。

林彪等人叛國外逃死亡後，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繼續進行誣陷迫害各級領導幹部的犯罪活動。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團指揮「梁效」、「池恒」、「羅思鼎」等寫作班子進行反革命煽動，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各級領導幹部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已經成為他們所謂繼續革命的對象。一九七六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誣陷迫害大批領

導幹部，圖謀最終顛覆政府。三月，江青在對十二個省、自治區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點名誣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領導幹部。同年，張春橋指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馬天水、徐景賢在上海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變成走資派」。同年，王洪文和姚文元指使《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派入到國務院一些部門和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材料，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組織還鄉團」，「翻案復辟」，並且以此作為向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和地區進行奪權的根據。一九七六年三月至五月，江青反革命集團捏造事實，誣陷南京，北京和其他各地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是「反革命」，誣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煽動鎮壓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

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張春橋、王洪文以上海為基地，建立和擴大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張春橋審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的報告中，就提出所謂「以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積極建立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王洪文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多次對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骨幹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你們可給我抓好」；「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要準備打遊擊」；要他們加緊發展「民兵武裝」。江青反革命集團計畫利用他們自認為屬於已有的這支武裝力量，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一九七六年八月，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林彪餘黨、南京部隊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說，駐在上海附近的六四五部隊，「我最不放心」，「這個部隊我指揮不動」，「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隨即決定由他們所控制的武器倉庫中發給「民兵」槍七萬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門，各種彈藥一千多萬發。九月二十一日，張春橋在北京聽取徐景賢彙報丁盛談話和給「民兵」發槍的情況後，對徐景賢說：「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十月八日，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獲悉江青、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後，決定發動武裝叛亂。他們所組織的武裝叛亂的指揮班子進入了指揮點，架設了十五部電臺，溝通了聯絡。他們還調集和部署了「民兵」三萬三千五百名。十月九日，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攜帶各種槍炮二萬七千餘件。十月十二日，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另一負責人鐘定棟制定了取名為「捍一」、「方二」的兩個作戰方案。當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交組負責人陳阿大等人開會，策劃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宣稱要「決一死戰」。由於中央採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鬥爭，他們的武裝叛亂計畫未能實現。

本庭經過四十二次法庭調查和辯論，有四十九名證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證，對各種證據八百七十三件進行了審查。大量的物證、書證、鑒定結論、證人的證言以及被害人的陳述，充分證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十六名主犯中，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等六人已經死亡，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決定對他們不再追究刑事責任。特別檢察廳並決定，對江青等十名主犯以外的本案其他人犯，另行依法處理。本庭確認，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的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如下：

（一）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為首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江青誣陷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夥同康生、陳伯達作出決定，對劉少奇進行人身迫害，從此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自一九六七年五月開始，江青直接控制「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夥同康生、謝富治指揮專案組對被逮捕關押的人員進行逼供，製造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偽證。一九六七年，江青為了製造迫害劉少奇的偽

證，決定逮捕關押楊一辰、楊承祚、王廣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楊承祚病危期間，江青決定對他「突擊審訊」，使楊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揮的專案組也使得王廣恩被迫害致死。江青夥同謝富治指使對病勢危重的張重一多次進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後僅二小時即死去。江青夥同康生、謝富治等人指使專案組對丁覺群、孟用潛進行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叛徒」。由於江青等人的誣陷，致使劉少奇遭受監禁，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夥同康生密謀誣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分子」。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種會議上，點名誣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二十四人，使他們一一受到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點名誣陷張霖之，使他被非法關押，並被打成重傷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誣陷全國勞動模範、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是「工賊」，使時傳祥遭受嚴重摧殘，被折磨致死。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鄭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

一九七六年，江青夥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同年三月，江青在對十二個省、自治區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點名誣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領導幹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江青對她所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政府、殘害人民的罪行，都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二）被告人張春橋，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同江青一起組

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在十年動亂中，張春橋是向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奪權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終的煽動者，策劃者，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說：「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多次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張春橋夥同江青領導他們的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大量活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春橋為了奪取上海市的領導權，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打傷九十一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張春橋在濟南支援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拘捕關押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張春橋單獨召見蒯大富，指使他組織遊行示威，首先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

在張春橋的指使、策動下，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上海市領導幹部十二人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曹荻秋、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操縱、指揮「游雪濤小組」進行特務活動，製造冤案，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誣陷華東地區領導幹部在「長江以南搞一個地下武裝」，「密謀兵變」。

一九七六年，張春橋夥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同年三月，張春橋指使馬天水、徐景賢在上海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變成走資派」，是他們所謂繼續革命的對象。

張春橋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為基地，建立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被告人張春橋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三) 被告人姚文元，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姚文元積極參與江青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姚文元直接控制宣傳輿論工具，長期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姚文元指揮「梁效」、「池恒」、「羅思鼎」等寫作班子，誣衊重新出來工作的各級領導幹部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已經成為所謂繼續革命的對象，煽動對他們進行誣陷迫害。

一九六七年，姚文元積極參與奪取上海市領導權的活動。姚文元參與誣陷上海市領導幹部曹荻秋等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姚文元在濟南參與支援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

一九七六年，姚文元夥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同年一月至九月，姚文元指使魯瑛派人到國務院一些部門和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材料，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一九七六年三月至五月，姚文元捏造罪名，誣陷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是「反革命」，誣陷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煽動鎮壓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

被告人姚文元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四)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王洪文積極參與江青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參與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打傷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組織、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的武鬥，關押和傷殘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夥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王洪文指使：魯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的材料。

王洪文夥同張春橋，以上海為基地，建立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

武裝」，多次指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加緊發展「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一條反革命傷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五）被告人陳伯達，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陳伯達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陳伯達控制宣傳輿論工具，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一九六六年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煽動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迫害鎮壓。

一九六七年七月，陳伯達夥同江青、康生決定對劉少奇進行人身迫害，從此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

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多次誣陷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是「現行反革命」、「叛徒」、「內奸」，並決定對他進行人身摧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陳伯達在唐山說：中共冀東地區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由於陳伯達的煽動，使冀東冤案造成嚴重的後果，大批幹部和群眾受到迫害。

被告人陳伯達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六）被告人黃永勝，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黃永勝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黃永勝同意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對彭德懷進行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黃永勝批准廣州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報送的《關於揪叛徒調查工作的請示》及所附的「第一號調查方案」，陰謀陷

害葉劍英為「叛徒」。』一九六八年六月，黃永勝把誣陷葉劍英「密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材料交給葉群。

一九六八年，黃永勝夥同吳法憲捏造事實，誣陷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黃永勝還誣陷總參謀部的領導幹部。同年十二月，黃永勝誣總政治部「招降納叛」，積極參與林彪「砸爛總政」的犯罪活動。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黃永勝提出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決定對廣州部隊副司令員文年生等人進行「審查」，製造了「廣東地下黨」和廣州部隊「反革命集團」兩個冤案，致使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到誣陷迫害，副省長林鏘雲和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黃永勝向林彪密報了毛澤東主席察覺林彪在密謀奪權的談話，致使林彪下決心採取行動謀殺毛澤東主席，發動武裝政變。

被告人黃永勝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七）被告人吳法憲，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吳法憲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吳法憲受林彪的指使，於九月三日寫了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的材料送給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吳法憲夥同黃永勝捏造事實，誣陷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吳法憲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幹部要「奪權」，批准關押、迫害空軍幹部和群眾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部隊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殺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政變的骨幹力量「聯合艦隊」。

被告人吳法憲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

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八）被告人李作鵬，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李作鵬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李作鵬在海軍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修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被告人李作鵬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九）被告人邱會作，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邱會作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七年，邱會作指使人竊取總政治部的檔案材料，誣陷總政治部的幹部，在林彪「砸爛總政」的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邱會作在總後勤部私設監獄，刑訊逼供，直接誣陷迫害了幹部和群眾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湯平、周長庚、顧子莊、張樹森、申茂興、王述臣、張凌鬥、華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邱會作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十）被告人江騰蛟，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江騰蛟在上海參加林立果為建立武裝政變「指揮班子」召開的祕密會議，被指定為南京、上海、杭州「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的負責人。九

月八日，江騰蛟接受林立果傳達林彪發動武裝政變手令，參與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主席，並擔任上海地區第一線指揮。江騰蛟在殺害毛澤東主席的計畫失敗後，積極參加林彪、葉群準備南逃廣州的反革命行動。

被告人江騰蛟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一條反革命殺人罪（未遂）。

上列被告人王洪文、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各自供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江騰蛟在林彪叛逃的第二天，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吳法憲、邱會作，江騰蛟揭發了林彪、江青等同案犯的犯罪事實。黃永勝供認了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實。姚文元把自己的犯罪行為說成是犯錯誤，不承認是犯罪。張春橋不回答法庭對他的審問。江青破壞法庭秩序。

本庭根據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分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三十八條和第二十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被告人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處被告人陳伯達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黃永勝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李作鵬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邱會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判處被告人江騰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以上判處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兼特別法庭庭長江華

副庭長伍修權曾漢周黃玉昆

審判員王文正王志道王戰平甘英史笑談

甯煥星司徒擎曲育才朱理之任成宏

任凌雲·劉麗英劉繼光許宗祺嚴信民

蘇子蘅巫寶三李明貴李毅吳茂蓀

沈建張世榮張敏范之費孝通

駱同啟高朝勳高斌黃涼塵曹理周

翟學璽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印）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書記員郭志文黃林異

## 王洪文研究論文

1. 鐵驥.《周恩來與「全面整頓」》[J].黨員之友, 1994, (8).
2. 陳東林.《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自身錯誤的認識與糾正》[J].當代中國史研究, 1995, (1).
3. 李豔君, 婉君.《張春橋與「安亭事件」》[J].黨史博采, 1996, (6).
4. 張壽春.《力薦英才作棟梁——周恩來與鄧小平重新出山述評》[J].南京社會科學, 1998, (2).
5. 王玉貴.《毛澤東六選接班人》[J].黨史縱覽, 1998, (5).
6. 葉永烈.《「四人幫」興衰》採訪手記[J].黨史博覽, 1999, (10).
7. 王凡.《釣魚臺內外的江春(上)》[J].黨史博覽, 2002, (1).
8. 陳家付.《刻骨銘心的歷史記錄——十年「文革」中的十次抗爭》[J].黨史縱橫, 2002, (5).
9. 柳鈞.《毛澤東與八大軍區司令對調》[J].黨史博采, 2003, (1).
10. 斯夫.《「文革」中毛澤東提出「三要三不要」內情》[J].黨史博覽, 2003, (10).
11. 金哲.《「文革」紀事》[J].黨史文苑, 2003, (5).
12. 王永欽.《批極「左」, 還是批極右?——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重大分歧(五)》[J].中國糧食經濟, 2003, (12).
13. 高繼民.《江青四次發難鄧小平》[J].黨史文苑, 2004, (1).
14. 程中原.《1975: 鄧小平主持各方面的整頓》[J].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4, (2).
15. 錢江.《劉冰上書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緣起》[J].黨史博覽, 2004, (5).
16. 張榮輝.《「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來龍去脈》[J].黨史博采, 2004, (6).
17. 程金蛟.《毛澤東和他選擇的接班人》[J].黨史縱橫, 2004, (6).
18. 煥然.《從工人到黨中央副主席躍變的「文革」神話序曲——「安亭事件」始末》[J].黨史縱橫, 2004, (10).

- 19.張仕文.《謝振華將軍蒙冤《三上桃峰》內幕》[J].軍事歷史, 2004, (6).
- 20.餘煥椿.《「文革」中輿論導向的扭曲(下)》[J].百年潮, 2005, (3).
- 21.霞飛.《風雲初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張春橋(上)》[J].黨史博采(紀實), 2005, (6).
- 22.《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J].黨的文獻, 2005, (4).
- 23.王勇.《馬天水夢斷上海灘》[J].黨史天地, 2006, (3).
- 24.金鳳.《王洪文、王效禹採訪追記》[J].炎黃春秋, 2006, (5).
- 25.霞飛.《「文革」發跡前的王洪文(上)》[J].黨史博采(紀實), 2006, (8).
- 26.霞飛.《「文革」發跡前的王洪文(下)》[J].黨史博采(紀實), 2006, (9).
- 27.霞飛.《陳阿大沉浮錄》[J].黨史博覽, 2007, (6).
- 28.霞飛.《「安亭事件」中的張春橋》[J].黨史縱橫, 2007, (11).
- 29.霞飛.《王洪文的「小兄弟」陳阿大沉浮錄》[J].文史博覽, 2008, (2).
- 30.陳抗美.《王洪文挨「鬥」記》[J].文史博覽, 2009, (5).
- 31.葉永烈.《「文革」中是誰向毛澤東推薦了王洪文》[J].蘭台內外, 2010, (4).
- 32.李海文, 蘇承業.《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四人幫」餘黨覆滅記》[J].文史參考, 2012, (9).
- 33.金光耀.《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從葉昌明的《工作筆記》看「工總司」》[J].書城, 2013, (1).
- 34.楊孟衡.《三上桃峰》五易其稿[J].炎黃春秋, 2013, (12).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48. 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4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50. 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51. 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52.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54.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55. 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56. 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57.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9. 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60.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6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2. 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80.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1.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2.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 83.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4.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5.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 8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 87.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 8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89.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 90.[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2.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3.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4.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5.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6.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112. 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113.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4.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115. 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116. 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117. 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118.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119. 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0.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 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22. 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123. 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124. 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25. 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7. 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12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29.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13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 141.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142.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 143.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 144.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 145.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 146.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 147.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 148.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49.「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 150.《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 151.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 152.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 153.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 楊健采寫, 《無罪流放: 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8。
158. 金沖及主編, 《周恩來傳(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
160. 定宜莊, 《中國知青史——初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161. 季羨林, 《牛棚雜憶》,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
162. 劉小萌, 《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163. 李輝編著, 《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 海天出版社, 1998年。
164. 徐彬編著, 《風雨福祿居: 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65. 曾繁正, 《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 紅旗出版社, 1998年。
166. 黃崢,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8年。
167. 劉冰, 《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8年。
168. 韋君宜, 《思痛錄》,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t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 《「紅衛兵」與「嬉皮士」》, 明鏡出版社, 1998年。

- 174.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5.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 176.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 177.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 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1.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1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3. 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194. 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195. 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6. 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197.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198.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199. 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200. [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1. [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2. 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203. 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204. 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205. 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206. 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207.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208.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209.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0.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213. 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4. 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5. 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6. 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217. 王申西，《王申西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21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219. 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0. 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21.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2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223. 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社，2002年。

224. 中嶋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225. 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2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2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2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29. 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231. 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32. 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33. 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234. 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5. 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236. 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237. 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238. 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239. 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275. 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276. 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277. 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278. 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279.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280. 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281.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282. 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3.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284.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5.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6.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287.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288. 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289.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0. 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91.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 298.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 299.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 300.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 301.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 302.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303.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 304.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05.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 306.[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7.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8.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09.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5. 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6. 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7. 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8. 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9. 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320.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21. 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322. 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324.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325.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326.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一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19</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20</sup>他

<sup>19</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20</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21</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d/lsj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d/lsj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21</sup>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王洪文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5  
冊；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9-10)  
BOD版  
ISBN 978-986-92955-4-3(上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5-0(下冊：平裝)

1. 王洪文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4641

文革風雲叢書10 PC0487

## 群眾暴政與政治投機： 王洪文與「文革」（下）

---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責任編輯 / 杜國維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楊廣榕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5月 BOD一版  
定價：5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2955-5-0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陰謀家、野心家王洪文，為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一直處心積慮地妄圖打倒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老同志。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

（1977.9。節錄）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時間跨度為1967-1976年，收錄王洪文的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下冊時間跨度為1977-1981年，收錄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以及特別法庭判決書等。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王洪文藉由群眾暴政獲得提拔任用，最後被捕監禁的史實。